

“王明旭博士不仅是我亲爱的朋友和最优秀的眼科医生，他也是我认识的最伟大的人之一。”

——多莉·帕顿

“试图用几句话来表达我对王明旭博士、他的成就、他的勇气、他的坚韧意志和他的信仰的感情，就像试图把一辆马克卡车装进一只麻袋。这位了不起的人克服了几乎不可能的困难，成为了他专业领域的翘楚，王明旭博士的存在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查理·丹尼尔斯

“我认识王明旭博士近二十年了，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眼科医生和朋友。自从三十多年前，王明旭作为一个一无所有的学子踏足美国，他的生活就充满了美国梦的精神，彰显了我们在这个伟大国度享受的自由。我极力推荐他的自传《重见光明》。”

——威廉·H·弗里斯特参议员，医学博士
前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如果我与王明旭并无交情，我会难以相信他的人生经历。但我确实熟识他，他的人生正是一部关于信仰、毅力和卓越的非凡历程。”

——比尔·哈斯拉姆，田纳西州州长

“王明旭因其为无数人进行的眼科手术而家喻户晓，他改善了他们的视力。你一旦看过他在电视上的广告，就很难忘记他还是一位舞厅的舞者。但众所周知的是，王明旭博士也慷慨地将他的时间和才华献给了他人，帮助其他国家的盲童恢复视力。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礼物呢？纳什维尔有幸能将王明旭博士视为我们的一份子。”

——卡尔·迪恩，纳什维尔市长

“我深受尊敬的朋友，王明旭博士，已经达到了人类成就的高峰。他的个人和职业的胜利，展示了自由和慈爱的人道主义者的本真。他那独特的人生故事，只有他自己能够最好地讲述，并将给所有了解他的人带来深深的启示和祝福。”

——温菲尔德·邓恩博士，前田纳西州州长

“《重见光明》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它生动展示了坚韧不拔、乐观向上和深沉信仰不仅能够造就个人的成就，也能让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强大。这是王明旭博士从中国共产主义灰暗的岁月中崛起，到在美国成为一位杰出的医生和慈善家，他的人生历程见证了美国梦的无限可能。”

——拉马尔·亚历山大参议员

“王明旭博士的人生历程，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苦难中挣脱出来，一路成长为美国最杰出的医生之一，这个故事会让你坚信：一切皆有可能”

——赖斯·布鲁克斯博士，纳什维尔贝瑟
世界宣教教会的高级牧师
每个国家事工的联合创始人
畅销书《上帝未死》的作者

“自2000年我接受了王明旭博士的LASIK眼科手术后，我们就成为了朋友。我很荣幸能在他的王氏基金会董事会服务，并亲眼见证他如何慷慨地运用他的才华和技能，带给人们视觉的恩赐。王明旭博士的人生故事独特且鼓舞人心，他本人更是如此。我为他能在新书中分享这个故事感到十分高兴！”

——雪莉·泽特林

所有者，雪莉·泽特林公司

“我认识王明旭博士很多年了。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眼科医生、作家、获奖的交谊舞者、慈善家和亲

爱的朋友。王博士是文艺复兴全才的典范。他作为眼科医生的技艺堪称传奇，他对全球患者的同情和关怀更令人赞赏，他的基督教信仰更是引领并驱使他前行！”

——科琳·康威·韦尔奇，博士
注册助产护士
美国护理学会院士
美国助产护士学院院士
南希和希利亚德·特拉维斯
护理教授
院长荣誉退休
范德比尔特护理学院

“我很荣幸能在王博士还是哈佛医学院的学生时指导他在我的实验室工作。他在探索前沿科学并在顶级期刊《自然》上发表文章的同时，还在他的临床职责和其他追求中表现出色。从那时起，他一直在眼科手术的激光应用技术开发方面走在前列，他的新书真实而感人地记录了他丰富多彩的人生故事。”

——乔治·丘吉尔，博士
遗传学教授
哈佛医学院

“《重见光明》就像一场情感的过山车，让人一旦开始阅读就无法放下，每一页都充满了面对生活最艰难困苦的人性光辉。这是一个关于坚韧和决心的故事，一个在深深的黑暗中寻找一线光明的奥德赛，最终形成一波恩典和怜悯的浪潮。王博士写道，‘在我生活的这些年里，我一次又一次地学到，往往就在这些特别困难的情况下，人类的能力似乎已经达到了尽头，我们真的有机会遇到上帝的真正力量。’这难道不是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故事吗？我们在与亲人、同事、上帝共享的起伏中挣扎着寻找意义和理解，我们努力发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目标。王博士的人生旅程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他以谦逊之心超越自我，寻找

真正的和平与自由。我强烈推荐这本书给每一个人。作为一位电影和电视的执行制片人，我期待看到《重见光明》在银幕上焕发新生！”

——大卫·费舍尔
法学博士
首席财务官，金斯顿路影片

重见光明

重见光明

从苦难到医治的旅程

王明旭，医学博士，物理学博士

From Darkness to Sight

*A Journey from
Hardship to Healing*

文链智能 译

重见光明

© 2016 王明旭博士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商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都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方式——电子、机械、复印、扫描或其他方式——进行复制。除了评论者可以在评论中引用简短的段落外。有关本中文版许可或特殊销售的信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drwang@wangvisioninstitute.com。

译者联系方式: contact@culture-links.com

致谢

致我父亲王振生博士，我母亲许阿莲博士，我兄弟王明宇博士，我妻子王安乐，我儿子王丹尼斯和我的义父米沙·巴特诺夫斯基和朱恩·鲁道夫，以及我整个家庭，以及我的老师、导师、同事和朋友。

致我的病人，我与他们共享从黑暗到光明的旅程。

致中国，我的出生国，塑造了我的性格。

致美国，我的收养国，给了我自由和服务的机会。

致上帝，万物的创造者。

目录

重见光明	6
前言	11
引言	13
正文	17
第一部分 她能看见吗?	17
第一章	18
玛丽亚（上）	18
第二部分 在中国的成长	26
第二章	27
杭州	27
第三章	35
污点与我的母亲	35
第四章	47
逃离幽灵	47
第五章	58
新希望的曙光	58
第六章	68
小鸟飞翔	68
第三部分 在美国的生活	79
第七章	80
三剑客	80
第八章	90
黄点	90
第九章	99
白宫之行	99
第十章	104
重燃梦想	104
第十一章	129
更高的力量	129
第十二章	141
收养之国	141
第十三章	147
格温	147
第十四章	160

两封信	160
第四部分 回馈	170
第十五章	171
复明基金会	171
第十六章	184
世界首例	184
第十七章	189
舞动的医生	189
第十八章	199
对孤儿的关爱	199
第十九章	208
多莉	208
第二十章	212
回馈	212
第五部分 我如此美丽!	221
第二十一章	222
玛丽亚(下)	222
关于作者	237
致谢	240
如何帮助复明基金会	243
关于这本书的额外推荐	245

前言

我与王明旭的初次邂逅，可以追溯到1999年，那时我正在为美国参议员的连任做准备。作为同行医生，也是哈佛医学院的校友，我对他在科研和眼科学领域的杰出贡献有所耳闻。然而，我对那次会面最深的印象，却是他对现在他称之为自己的伟大国家的热爱。

我们大多数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作为美国人所享有的自由，我们的成长会是何等的模样。明旭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岁月中在中国长大，在那个时期，数百万的青年被流放到国家最贫瘠的地方，承受着一生的艰苦劳作和贫困生活。明旭在他还只是个青少年的时候，就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他梦想成为家族中的一员医生的愿望看似已经破灭。然而，凭借他的坚韧不拔和他父母的不懈努力，明旭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他对抗共产主义政权，终于来到美国寻求自由，建立他的未来。

多年以来，我与明旭一直保持联系。当我担任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时候，他访问华盛顿特区，我们讨论了东西方文化的问题。当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的时候，我们讨论了中国的商业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只要我们努力工作，把他人的需要放在自己之前。自从我认识明旭，他就一直努力工作，无私奉献。他建立了一个知名的眼科诊所，人们从全球各地来向他咨询视力问题。我自己的许多家庭成员都接受过明旭进行的激光视力手术。他还建立了王氏复明基金会，这是一个501(c)(3)非营利慈善机构，已经帮助许多患者——包括儿童——恢复视力。如果没有明旭的努力，这些

患者中的许多人可能会在他们余生中生活在黑暗中。

我也曾凝视过那片黑暗，那里唯有治愈的希望才能带来一线光明。在苏丹，我在一次医疗救援行动的最后一天，被叫去看一个正在恢复的严重伤员。当我走进他正在恢复的那个单间建筑时，我发现他蜷缩在床上的角落里。他吸引了我的注意，他的微笑穿透了昏暗房间的阴影。我问我能为他做什么，他告诉我，两年前，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在苏丹的内战中被杀。我们谈话的八天前，他的腿和手被地雷炸掉。最让我震惊的是，即使在那样的灾难时刻，这个人还叫我进来感谢我在那里。他对我说：“我失去的一切——我的家人，我的腿，我的手——如果我的人民有一天能拥有美国所拥有的自由，那么这一切的牺牲都是值得的！谢谢你……不是因为你是医生，而是因为你是美国人。”

我带着这个人和他的故事，作为我作为医生和参议员，明旭作为医生和慈善家的工作的象征：自由、机会和同情心是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核心。我认为王明旭博士是我的朋友，也是一位优秀的美国人。

《重见光明》记录了明旭从中国的少年寻找自由，到在美国建立新生活，逃脱流放，对抗种族歧视和经济困难，最终成为世界知名的眼科医生和慈善家的非凡旅程。他的故事是从东方到西方，从无神论到信仰，从恐惧、贫困和歧视到治愈——对自己和他人的鼓舞人心的故事。《重见光明》挑战我们想象一个没有自由的生活，展示了希望、决心和信仰如何帮助一个人找回它。

威廉·H·弗里斯特，医学博士
前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引言

你能从一个人的眼睛中解读出许多关于他或她的故事。试想一下，遇人之初，你的视线首先落在对方的眼睛上。你能从对方眼神的微妙变化中猜测出许多信息。我们根据从他们的眼神中读取的情绪，对他们做出快速的判断。他们的眼神透露出爱意、愤怒、惊讶还是恐惧？他们是用眼神邀请你交谈，还是逼你保持沉默？正如威廉·莎士比亚所言，眼睛是我们灵魂的窗户，我深信这个说法！作为一个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眼睛、探索它们在有机、生物、机械甚至情感上如何运作的眼科医生，我已经学会了通过他们的眼睛与我的病人沟通，理解他们的感受。藉由上帝的恩赐，我能够帮助他们恢复视力，将他们从黑暗中引向光明，这对我而言是最令人欣喜、最有意义的经历。这就是驱使我前行的动力，我为此而活！

在过去的30年里，我一直致力于帮助人们重见光明，完成了超过55,000次的手术（包括对超过4,000名医生的手术），治疗了来自美国几乎每个州和全球超过55个国家的患者。我坚信这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召唤，一种服务和回馈社会的召唤。

然而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一个二十出头、刚刚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中逃脱出来的年轻人，我对医学的追求是因为家族传统。出生在医生世家的我，自小便梦想成为一名医生。我记得最早的记忆，就是看着我的祖父、父亲和母亲——他们都是医生，他们辛勤工作，竭尽全力地帮助病人。服务他人的愿望在我心中深深扎根，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摧毁了我的这个梦想。

然而，如果你在1982年我刚来到美国时看进我的眼睛，我不确定你是否能看到一个充满服务欲望的21岁年轻人。我刚刚经历了我生命中最艰难的旅程，几乎丧失了一切——包括我的家庭、教育、家园，甚至我的尊严和生命。我的眼神充满了恐惧。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几乎偷走了我青春的快乐和自由，阻碍了我接受教育、怀揣希望和梦想的机会。我来美国，只是为了寻求自由。

我无法确切地说出，我生活中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戏剧性变化，是归功于什么……但它确实发生了。可能是我14岁的时候，我的教育被突然中止，面对着被下放和一生贫困的可怕命运，我心中埋下了坚定的决心。或者是毛泽东的死亡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被推向了一个决定我人生命运的全国考试。或者是我父母的不懈奋斗，他们在几乎没有机会的情况下为他们的儿子找到了未来。或许是我从东方到西方的生活的戏剧性转变，我冒险进入新世界寻找自由，口袋里只有五十美元和一本英汉词典，但心中有一个大的美国梦。然后，可能是那些珍贵的、改变一生的时刻，其中许多病人一直生活在黑暗中——有些人甚至几十年——他们被告知他们是不可逆转的盲人，永远无法再看见，所有其他的努力都失败了，我成为他们的最后希望，依靠上帝的恩典，加上奉献和辛勤工作，我们终于能够把他们从黑暗中带出来，进入光明。就像一幅宏伟的挂毯，所有这些相互连接的事件和经历，引发了我生活中的戏剧性变化，被编织成我感激并珍视的画面，超过了言语所能表达的。

当我回首过往，我被无数个在我生命中留下印记的目光所吸引，他们的生活故事，以及与我自身故事交织在一起。

我清晰记得和父亲共同在杭州那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中漫步的情景，他那坚定、稳定而充满深情的目光，正是他教会我在生活中坚韧不拔，永不言败。

我也记得中国的独裁者、红卫兵和民兵那充满仇恨、愤怒和暴行的眼神，他们的目光下，我在年仅八

岁的时候险些丧命！

那个女教师惊恐而又睁大的眼神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她是在月光下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学校高墙逃跑的少数人之一——当我和爸爸走近她确认她是否是我妈妈时，她转向了我们。

我仍然被一个被判死刑的人的形象所困扰，他绝望的乞求和他眼中的痛苦神情，他在人群中乞求怜悯，然后是他们的尖叫和尖叫，当他脖子上挂的纸板标志在生死关头突然翻转时。

我记得遇到麦克内斯比教授那温和而鼓舞人心的眼神，他帮助我抵达美国。他的眼神充满了智慧、关怀和对平等的尊重。相比之下，还有米勒教授和安德森教授充满偏见的目光。幸运的是，他们眼中的歧视只是激发了我更加努力工作，证明他们是错误的决心。

还有罗纳德·里根总统的眼神，他像一个祖父一样，用亲切、温和和支持的目光看着我。在那些眼睛中，我看到了领导力、力量和远见。

我深深地记得我儿子的眼睛，那么无邪，充满了对爱的渴望；我母亲的眼睛，总是带着笑容，鼓励我前进；我六岁的弟弟，他对我充满了敬仰，尽管我们弹奏的是同一种乐器，他却不知道我弹奏的原因——我正在为生命而战！

在我的生活中，有太多的目光，充满了情感，来自于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我不禁将他们每个人都视为我生命旅程的重要部分。我不仅是东方的产物，也是西方的产物；两者的传统都深深地影响了我。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又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多年后，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与你们分享我的故事了。这是一个关于生存和决心的故事，从黑暗到光明；这是一个关于自由和机会的珍贵的故事。

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照顾了数千名患者，我开始明白，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最能理解光明的价值。这揭示了我生活中反复体验到的一个共同主题。作为人类，我们往往会把我们拥有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直到我们失去它们。事实上，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

我自己！）会花费余生的时间去找回我们失去的东西，深深地希望我们在拥有它们的时候能更加珍视它们。

谁最珍视视力？那些失明的人。谁最珍视自由？那些没有自由的人！

对我们生活在美国的每一个人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这样：我们能否跳出人类历史的桎梏，能否破除人性中理所当然的惯性，能否在拥有生命中如自由这样珍贵的东西时就懂得去珍惜，而非等到失去后才懂得其珍贵。

如果这本自传能唤起你对生活的珍视，即使在你觉得所有希望已经破灭的时候，也能在你的内心种下最微小的希望之种，那么写这本书所付出的所有努力就是值得的。

我的眼睛在这些年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天马行空到心如刀割，从惊魂未定到情感激荡，从心怀希望到欢愉满溢，爱意洋溢，种种情感在我的眼中交织。今天以及未来的每一天，我的眼睛都充满了感激之情。我感谢那些在我最黑暗的时刻给予我鼓励和帮助的人们。我对我在中国接受的文化熏陶和传统深感感激，对我在西方得到的机遇和信仰的馈赠充满感激，它们让我得以窥见神的内心，经历了多年的个人蜕变。最重要的是，我感激我从这个我如今称之为家的伟大国家获得的自由之礼。这是属于我，也属于我们所有人的礼物。《重见光明》是关于如何失去和重新获得自由之礼的漫长而艰辛的旅程。

第一部分 她能看见吗？

第一章 玛丽亚（上）

检查室内鸦雀无声，每个人都屏息凝神，紧张地等待我透露玛丽亚是否还能重见光明的答案。我心如重锤敲打，面对刚刚传来的坏消息，我无从开口。我凝视着这位美如画的少女那受伤的双眼，内心深处涌现一个问题：“我们真的能帮她找回失去的光明吗？”

坐在我对面的，是名叫玛丽亚·莫拉里的东欧摩尔多瓦少女，一个十五岁的孤儿。她肌肤如雪，面容娇好，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年轻时的奥黛丽·赫本。然而，她从未见过自己的容颜，在她的记忆里，世界从来就是一片黑暗。即便她身处检查设备的掩护之下，我仍能感受到玛丽亚的紧张和恐惧。她跋涉千山万水，走过将近九千英里的路，只为求证我是否能给她带来光明。对她而言，视力不仅意味着自由和独立，更象征着对充满希望的未来的渴望。没有光明，她的未来将一片黯然。

玛丽亚从七岁起便在摩尔多瓦巴尔蒂的一家孤儿院中度过她的童年，她和许多因家庭贫困而被遗弃的孩子们相依为命。自她踏入孤儿院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有见过她的母亲。玛丽亚的祖国夹在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之间，是欧洲最不富裕的国家之一。普遍的贫困不仅导致了无数家庭的破碎，也使得许多人变得极易遭受剥削。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被贩卖为性奴，再也没有人听到过他们的消息。眼下，玛丽亚正面临着同一个同样的恐怖命运：因为她即将年满十六岁，达到孤儿院规定的最大年龄。她会不会像许多同样境遇的女孩一样，最终流落街头，孤苦无依？玛丽亚不仅

年幼，更需他人照料，因为她是一名盲人。她的未来将会怎样？这是一个连想象都让人心痛的问题。

虽然我个人从未经历过失明，但我深深理解那种身处黑暗和面对不明朗未来时的绝望与恐惧。我成长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是中国历史上极其混乱和危险的时刻之一。我对于像玛丽亚那样面临的无所不在的贫穷和无法言说的绝望感同身受。我能感受到玛丽亚对机遇和自由的无尽渴望。当我与她年纪相仿的时候，我所有的希望都被夺走了，每天的挣扎只是为了生存。玛丽亚的处境让我回想起自己生命中那段充满恐惧和不确定的时光，现在，我多么希望能够抚慰她，告诉她未来可以变得更好。但在那一刻，我对她是否真的能够看见的那一丝丝微弱的希望，心中充满了疑虑。

如果不是因为史蒂夫和琳恩·亨德里希这对有爱心的夫妇，我也许永远不会与玛丽亚的生命相交。正是他们下定决心要帮助玛丽亚，不让她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境地。

2012年夏天，亨德里希一家随同位于田纳西州弗兰克林的“公正与怜悯国际组织”（JMI）前往摩尔多瓦首都基希讷乌，开展了一场短期的宣教之旅。这个组织致力于为贫穷、孤儿及被遗弃的人群带来正义和希望——正如玛丽亚这样的孩子们。亨德里希一家在城外的一个夏令营提供服务。琳恩向我回忆了他们的所见所感。营地入口不远处是一大片金黄的向日葵田，四周环境污浊不堪，孤儿们便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他们的学校假期。作为虔诚的信徒，亨德里希夫妇坚信上帝对孤儿的爱与关怀。他们希望能与营地里的孩子们建立深刻的联系，传递上帝神圣的爱。

琳恩第一次看到玛丽亚时，她独自一人坐在长凳上，而其他孩子都在不远处玩耍。琳恩告诉我，玛丽亚看上去心情十分低落，显得非常孤独。于是，琳恩和一名翻译一起坐到玛丽亚身旁的长凳上，但她依旧沉默寡言，双眼只是盯着地面。

“嗨，玛丽亚；我是琳恩。”

玛丽亚低着头，没有回应。

“我能和你聊聊吗？”琳恩问道，“我想见识一下你的美。让我看看你那张美丽的脸庞吧。”

当玛丽亚最终抬起头来时，琳恩注意到这个少女的眼睛存在严重的问题。难怪她总是默默地坐在角落，头垂得低低的，避开所有人的目光。她的左眼被一片乳白色的疤痕覆盖，而她的右眼则不停地左右摇晃，无法集中注意力。通过翻译，玛丽亚向琳恩透露，自她有记忆以来，她的视力就一直很差。左眼完全失明，右眼只能分辨模糊的光影，而且这几个月来，她的视力还在迅速恶化。她害怕自己即将完全陷入黑暗。作为一个即将离开孤儿院的孤儿，面临被抛弃进入一个更加孤独的世界，这位年轻的少女感到无比的痛苦和绝望。

琳恩一家在摩尔多瓦的这段时间里与玛丽亚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系，他们迫切地希望尽其所能去帮助她。亨德里希夫妇一回到美国，便将玛丽亚的故事告诉了他们所在的教会——滚石社区教会。故事深深触动了教会的一位成员，他联系了自己的眼科医生，而医生又将亨德里希夫妇引荐给了我。除了从事白内障和激光手术，我还与另外三十位眼科医生一起，通过非营利的王氏基金会，为视力受损者提供免费眼科治疗。我们的团队致力于为那些不仅面临重大视障、失明，而且无力承担手术费用的患者进行复杂的复明手术。

玛丽亚的处境深深触动了我。年轻时，我也曾在困境中得到过许多好心人的帮助。现在，我很荣幸能有机会为这位年轻女孩提供类似的支持。

让玛丽亚来到美国的过程充满了挑战。我与亨德里希夫妇以及公正与怜悯国际组织合作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处理完所有繁琐的文件，为玛丽亚获得了医疗签证。更加棘手的是，她的母亲仍然在世，我们必须设法联系到她，得到她的正式同意。终于，在漫长的等待之后，有一天玛丽亚的校长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玛丽亚要去美国了！正是亨德里希夫妇。从她

与他们十五个月前的那次意外相遇开始，他们决定协助她前往美国，接受王氏基金会所提供的医疗照护，这或许将使她有生以来首次真正看见这个世界！

得知玛丽亚终于要来美国时，我无比激动，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她见面。通过她的医疗记录，我了解到她的眼病情况异常复杂，治疗将会非常困难，但我下定决心要竭尽全力。

2013年10月21日，那是星期一，我正在办公室里忙碌，突然一位技术员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她来了。”

技术员虽然没提名字，但我心里清楚是谁。我的心瞬间提速，我和我的团队等待这一刻已经超过一年了：玛丽亚，终于到了。

我快步向接待区走去，心中满是期待与兴奋，甚至还幻想着迎接我的将是一个热情的拥抱。但出乎我的意料，那里的每个人都静静地坐着。玛丽亚胆怯地缩在红色沙发上，低头弄着自己的手指。琳恩似乎在安抚她，而史蒂夫则坐在不远处。我一走近，他和琳恩便抬起头微笑着。

“王医生，这就是玛丽亚，”琳恩介绍说。

一位来自公正与怜悯国际组织的翻译用罗马尼亚语轻声和玛丽亚说着什么，玛丽亚胆怯地抬起了头，她那布满疤痕的白色眼睛显得无比脆弱。她羞涩地和我握了握手，我能感觉到她的紧张。

“欢迎来到这里，玛丽亚！现在我要检查一下你的眼睛，”我说。

大家随我回到了检查室，玛丽亚紧紧抓着琳恩的手臂，琳恩慢慢引导她走过走廊。

根据我从摩尔多瓦收到的有限医疗记录，我知道玛丽亚的左眼因视网膜脱落，几乎已无复明的可能，这可能是早产和营养不良的后遗症。她的右眼患有晚期白内障，严重到失明的程度，而且眼睛有反复发作的历史。当我透过显微镜观察她的眼睛时，内心深处充满了忧虑。尽管我之前已对她的右眼状况有所了解，但亲眼见到的情况远超我的预期。玛丽亚的情况比我

想象的还要糟糕。她的右眼不仅白内障严重，角膜上也布满了疤痕，虹膜变形，瞳孔也因长期炎症而收缩不堪。这些问题几乎让人感觉无从下手。我该如何向史蒂夫和琳恩解释这一切呢？我不想让他们或玛丽亚感到失望，尤其考虑到她跨越重洋，而他们又对她抱有如此多的期望。

检查过程本身也异常艰难。她的眼睛不断快速地向左右摆动，这是先天性失明常见的一种症状。尝试在她不停移动的眼球中对焦，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透过那些疤痕密布的角膜，我确认了她左眼的视网膜确实已经脱落。我向史蒂夫和琳恩解释说，由于视网膜已无法正常工作，玛丽亚的那只眼睛恐怕将永远失明。在那些比摩尔多瓦更富裕的国家，这样的情况通常会通过及时的手术得到解决。当我意识到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如此多的人无法获得最基本的医疗保障，我感到无比沮丧。

现在，玛丽亚的右眼成了我们唯一的希望。但白内障浓厚到几乎完全不透明，使我无法透过它来评估眼睛内部、视网膜以及视神经的健康状况。更为关键的是，即便她眼内的其他部分状况良好，角膜上的疤痕、变形的虹膜和因炎症造成的损害也将使任何尝试手术移除白内障的努力变得极其困难和危险。

我深吸了一大口气。如果早知道她的眼睛情况如此糟糕，我或许会从一开始就说，将她从地球的另一端带来几乎是不值得的。但现在她已经来到这里，退无可退。我就那么坐着，努力克制住自己，生怕透露出内心的恐慌。

我最大的担忧是，如果手术继续，可能会让许多人失望，包括玛丽亚和所有的支持者在内。为了把她带到这里，我们付出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大家对此抱有巨大的期望，但现在看来，我们所有的努力似乎都可能白费。然而，就像我生命中的许多其他时刻一样，我不愿意就这样放弃。我必须相信，上帝安排这一切定有其原因，尽管目前我们还看不清楚。

我坐在那里默默祈祷：“上帝，我推测您对她必

有您的安排。这位远道而来，站在我面前的年轻女孩，您对她一定有一个计划。”

我抬头看向玛丽亚和亨德里奇夫妇，说：“我们继续进行检查吧。”

因为白内障太厚，无法透视，我们需要做超声波检查来确认她的右眼视网膜是否也发生了脱落。

“这是决定性的一步吗？”史蒂夫问。

“是的，如果玛丽亚的右眼视网膜也脱落了，那我们几乎就没有恢复她视力的可能了。但如果视网膜还完好，那我们就有希望。”

“你觉得可能会是脱落的吗？”他追问。

我犹豫了一下，不太愿意直面这个我内心深知的事实。“考虑到她早产、营养不良、从出生起右眼视力就不佳、缺乏适当的眼科护理，以及她在另一只眼睛上已经经历的视网膜脱落，这个可能性确实很大。”

我们都清楚，我们面前的是一项近乎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在检查室里紧紧挤在一起，我在心中祈求上帝让我们能够接受他对这次超声检查结果的安排。我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和亨德里奇夫妇做心理准备，以面对可能出现的巨大失望。

大约30分钟后，超声波检查结束了。在我查看结果之前，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吐气的同时，低头审视着打印出的结果。她仅剩的右眼并没有视网膜脱落！

感谢上帝！我如释重负。我猛地合上文件夹，转身去找玛丽亚、史蒂夫和琳恩。我们勉强通过了第一轮重要的测试，我们的旅程可以继续了，但在有望给玛丽亚带来视力之前，我们还需要克服更多的障碍。

我对团队说：“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成功迈出了第一步，但这只是玛丽亚恢复视力这个艰巨过程的开始。我尝试向他们形象地解释，整个过程就像连续抛硬币；每一次硬币落地，都必须是正面向上，我们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而这样的情况需要连续发生十次。每一次抛掷，结果只有两种：成功或失败。任何一次的失败，都意味着所有的努力告终。我们必须成

功通过剩下的九次，玛丽亚才有可能重见光明。”

“那整个过程成功的几率有多大？”史蒂夫问。

“非常之小。”

“如果我们失败了会怎样？”

“她可能会失去现在仅存的那一丝视力，未来的生活将是一片漆黑。至少现在她能感知到光亮。”我顿了顿，然后补充说，“但如果我们成功了，玛丽亚将有机会看见这个世界，甚至是她自己的面容，那将是她生命中前所未有的体验。”

史蒂夫和琳恩犹豫地相互对视。我们静静地坐在那里，深感这个决定对玛丽亚及其未来带来的深远影响。

“你们现在不需要马上做决定。请回家，花些时间祈祷，”我说。

我希望自己的话能让他们感到更加安心，但我知道必须让所有人都为最糟糕的情况做好心理准备。尽管如此，我内心深处依旧怀揣着一线希望，感觉我们可能会见证一个奇迹。我预感上帝正在做着安排，因为他引领我们走到了这一步。尽管单凭人力似乎难以实现这个目标，但我坚信上帝会介入，并显现他的能力。在我经历的这些年里，我一次次地认识到，正是在我们面对巨大挑战、似乎已经到达极限的时候，上帝真正的力量才会显现。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和祈祷，我最终建议玛丽亚接受手术。她和亨德里奇夫妇都同意了。我们都清楚手术的风险，知道成功的几率非常渺茫，但我们坚信，上帝正在掌控一切！

2013年11月7日，也就是星期四，我们在对玛丽亚的眼睛进行初步检查的两周多之后，再次聚集我在纳什维尔市中心的办公室附近的一个门诊手术中心。

我们来到了决定性的时刻。在手术中心里，一道醒目的红线标出了手术区的入口，除非完成了必要的洗手和手术前准备，否则任何人都不得越线进入。

“就是这里了，”我宣布，“再也没有回头路。”

我最后一次解释了手术的流程后，所有人都聚集

在玛丽亚的周围，手拉手地祈祷。玛丽亚已经做好了手术的准备，她躺在担架上，戴着淡蓝色的手术帽，身上覆盖着白色的毯子。史蒂夫和琳恩祈求上帝赐予我在手术中的智慧和指导。知道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我衷心地祈求上帝能帮助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并且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会给我们平安。事实上，我正在为全队做好心理准备，以面对可能的失败。

当我步入手术室的时候，四周柔和的光线就像阳光一般温暖，我感到所有的焦虑和紧张都释放了。此刻，我必须全神贯注。玛丽亚的视力乃至她的未来，现在都掌握在我的手中。我望向躺在担架上、处于无意识状态的玛丽亚，心中不禁想到了年幼的自己，在那个无法预知的未来被彻底改变的时刻。我清晰而痛苦地记得那段被黑暗所困扰的可怕时光，我下定决心，绝不能让玛丽亚也陷入同样的黑暗。

我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难以言喻的痛苦，经历了生命中太多的起起落落，至今我也不明白我是如何熬过那些苦难的。在我最黑暗的日子里，我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许多人在那场灾难中倒下，甚至失去了生命，而我却侥幸存活了下来。上帝为什么允许我经历那么多几乎毁灭我生命的困难？他是否为我预设了某种目的，如果真的如此，那又是什么呢？

我戴上无菌的手术手套。手指尖上的疤痕依旧清晰可见，那是我在最黑暗的岁月里，四十年前的一个寒冷冬天，因为在极度寒冷中弹奏二胡而留下的冻伤。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三十四年前那段漫长而充满挑战的旅程，它将我从中国杭州带到了遥远的异国，美国。

第二部分 在中国的成长

第二章 杭州

“我的孩子怎么会孤身一人出现在街头？”我妈妈吓得脸色发白地质问。照顾我的人急忙跑了出来，一个劲儿地道歉。我坐在高脚椅上，面带天真的微笑，对大人們的惊慌显得毫不在意。

因为我父母的职业都很繁忙，他们工作的时候，一个当地家庭会照看我。那个家庭有好几个孩子，他们通常就把我一个人放在一个传统的中国高脚椅里，那是一个由沉重红木制成、高达几英尺的圆筒形座椅，中间有一块平板，让一岁大的孩子可以站着抓着边缘，不至于跌落。即便在那么小的时候，我也不愿意被困在家里某个昏暗的角落。我渴望探索，想看看这个世界。虽然我还只是一个婴儿，但我设法通过前后晃动我的小身板，让高脚椅移动。我整天都在这么做，直到我将椅子一点点地挪遍了那个家庭的整个屋子，最终甚至挪到了街上。当我妈妈在那里找到我时，她惊呆了。这一定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场景——一个小宝宝使劲地摇晃着高脚椅，冒着车水马龙的危险在街上穿梭。不用说，从那以后，那个家庭对我的看管变得更加小心了。那时的我还太小，实际上对这件事并没有什么记忆，只是长大后，我妈妈常常给我讲起这个故事。

“你从一开始就和其他孩子不同，”她说，“你总是对周围的事物充满好奇，下定决心要做到最好，不管你手头有什么。”

多年以后，那份始终如一的专注、与生俱来的韧性，以及永不言败的斗志帮助我从那个比看顾我的那

个家庭里的阴暗角落还要艰难的环境中挣脱出来。

我的父母都是医生，而我父亲更是出自一个医学世家。我的父亲，王振生，成长在福建省的一个古老小镇安海。我的祖父，王鼎培，是安海的一名知名医生，因其慷慨解囊而声名远扬。安海的市长曾盛赞他为“怀有救世济民之心的医生”，这是对他在医疗职业生涯中对社区无私奉献的官方认可。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常常恳求祖父讲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如何勇敢地治疗受伤的士兵、流离失所的难民，以及无数贫苦农民的故事。每次聆听的时候，我的手指总会不自觉地沿着挂在他墙上的那块木制匾额轻轻滑过，那是感激的病人送给他的，我能感受到每一道由诚挚的感激雕刻出的木纹。

在我祖父的家族中，有九个家庭成员都是医生。身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我父亲几乎可以说是生来就是一名医生。他曾告诉我，在他还是小学生的时候，他就在家里设立了一个小诊所，为他的朋友治疗各种小伤小病。

我爸爸在1953年的夏天，在浙江医科大学遇到了我妈妈，许阿莲。那时，他们都是医学院的新生。我妈妈并不像我爸爸那样出自医学世家。她选择走上医学之路是因为亲眼见证了严重疾病在她的家乡——福建省漳州附近的乡村——肆意蔓延。在医学院，她专攻如小儿麻痹症、天花和血吸虫病等传染性疾病，这是一种由寄生虫引起的病症。她深信，这是她肩负的使命——正如我爸爸、我爷爷，乃至我爷爷的家族一样——全力以赴地消灭那些对贫困人口造成巨大威胁的可怕疾病。

我父母在1958年从浙江医科大学毕业。他们俩都是出类拔萃的学生，毕业后便立即开始了在学校及其附属教学医院的工作。那一年晚些时候，他们喜结连理。

我出生于1960年10月24日的清晨。最初，妈妈还在为我到底该取什么名字而犹豫不决。但在我出生后，她躺在床上看着太阳从地平线升起，照亮了整个小镇，

一切都金光闪闪、如浴在粉红色的光芒中。于是，她决定给我取名为“明旭”，寓意“东方明亮的太阳”。

尽管我出生那天早晨阳光灿烂，但那个时期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阴暗的时刻之一。1958年，就在我出生的两年多前，中国的开国领袖和深受人民爱戴的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发起了“大跃进”运动。所有中国公民都被召集起来，为这个旨在让中国跨入现代工业时代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农场被弃置，农民被组织起来在自家后院的土炉中炼钢。结果是灾难性的。到1960年我出生时，中国正深陷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中。在短短三年里，据估计有三千六百万人死亡。

饥荒在农村地区尤为严重，几乎全国各地的食物都十分短缺，在灾难性的“大跃进”结束后的几年里贫穷依旧普遍存在。我出生时，我父母的月收入仅为一百零六元人民币，约合十三美元。我记得，在我童年的早些时候，我们家主要靠大米和蔬菜为生，因为我们负担不起肉类。有一个周末，我的父母花费了他们仅有的积蓄，买回了一小块饼干。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小吃简直稀罕至极。他们将饼干仔细对半分开，给我一半，剩下的一半则他们俩分享。我的父母总是无私地爱我，全心全意为我的幸福着想，尽管生活拮据，但他们已经竭尽全力。而且，当你在像杭州这样中国最古老和最美丽的城市之一长大后，你很难感觉到贫困或不幸。

杭州，这座位于中国东海岸的浙江省省会，坐落在上海的南方。我们家位于城北，靠近一座山脚，那里有古城墙的遗址。晚饭后，我爸爸经常带我在山上散步，那时候镇上非常宁静，只有蟋蟀的鸣叫声。我们穿过密集的树林，月光照亮我们的路径。爸爸走得很慢，充满耐心，因为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走，跳过那些投射在地上的阴影，就像它们是会溅起水花的水坑。

我父亲曾告诉我，我们的星球是一个绕着太阳旋转的球体。他指着夜空，向我解释月亮是如何绕着地球转动的。

“爸爸，那月亮怎么会掉下来呢？”我好奇地问。那时的我还只是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孩。

他沉思了一会儿，“是引力定律让它保持在那个位置。等你再大一点，你就会懂的。”我父亲是位医生，并不是物理学家，但他对科学怀有极大的热爱。

“那为什么月亮会那么亮呢？”

“月亮就像是一面镜子，它反射了太阳那耀眼的光芒，”他解释道。

我试图想象我们是如何在这个巨大的球体上行走，而在我们旁边，有一个炽热的火球和一个悬浮在太空中、能反射光芒的镜子。我的好奇心总是得不到满足，对于我每一个提出的问题，爸爸都给予了基于理性和科学的答案。他从不提及任何神秘莫测的事物，也不谈论任何更高的力量或是造物主。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没有上帝，几乎也没有宗教，人们信奉的只有共产主义的教条。我对生活和这个世界的童稚问题总是得到简洁、逻辑性和科学性的回答。我的父母培养了我探索未知的好奇心，鼓励我尽可能多地提问。

有一天，我和妈妈并肩走在城市的街道上，目睹了建筑工人们正在挖掘地面——那个被爸爸称为“地球”的巨大球体。我不禁好奇，如果他们一直挖下去，穿越到地球的另一端，会发生什么情况。那边的人是不是会倒立行走？他们长得又是怎样的？我从未想到，未来的某一天，我竟会真的生活在那个神秘的地方——美国，地球的另一半。

我四岁那年，我们全家搬到了距离西湖不到一英里的三层公寓楼中。多年来，每逢周末的下午，我们一家就会沿着西湖那宁静的湖边散步。我总是跑在他们前面，手臂不时穿过柳树垂下的修长枝条，掠过水面上的荷花和睡莲。爸爸告诉我，西湖的秀丽景色几千年来一直是诗人和画家寻求灵感和庇护的地方。他还向我讲述了关于古桥、亭子和宝塔的传说与历史。湖面延伸至远方，与雾气缭绕的群山相接。每逢春日，嫩绿的樟树叶使这些山峦更添生机；而到了夏末，空气中弥漫着桂花的浓郁芳香，我会深深地吸一口气，

享受那份独有的芬芳。

然而，与西湖周边的自然美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那显得有些单调乏味的居住环境。我们的家位于一个灰暗的混凝土建筑之中，离我父母工作的医学院很近。在那个年代，展现出任何资产阶级审美趣味都被视为危险。我们所穿的“毛装”，一般是朴实无华的蓝色或灰色。周围的建筑物也都是刻板的方块形，呈现出一种统一的灰暗色调。尽管我们生活在如此接近大自然的地方，但家中却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美丽或优雅的装饰。大多数家庭墙上挂着的，只有毛主席的肖像、田间劳动的农民的照片，以及寥寥可数的几张黑白家庭照。每个家庭都必须保持整洁、简朴、有序，完全符合工人阶级的严格标准。

我们这个年轻的小家庭与其他十五户人家挤在这栋楼的二层，共同居住在一间仅有一百三十平方英尺的公寓里。我们共用走廊尽头的一个浴室。这个大浴室一头是三个洗手池，另一头设有隔间。厕所需要手动清洗，而且没有淋浴或浴缸。气候温暖时，我便在外头用水管冲洗。天气变冷时，我们要么去公共浴室洗澡，要么就是在家里用一个大盆装满冷水，然后把它放在我们门外的火炉上加热。

我们的公共浴室大部分时间都缺水。冬天，水管经常被冻住；夏天，由于供水有限而且消耗量大，水压非常低，常常不足以供应到二楼和三楼。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整栋三层楼的四十五个家庭便只能挤在一楼的公共浴室前。大家手持水桶，在长长的队伍中耐心等待，有时几个小时只为打到一桶水。我们的楼房里没有空调或暖气，室内的温度总是与室外保持一致。夏天里，我和父亲为了消暑，经常只穿一条短裤在公寓里和公共走廊上走动；而到了冬天，我不得不在室内室外，甚至睡觉时，都穿着厚实的棉衣来抵御寒冷。

我们的公寓窗户开阔地望向一片低矮房屋错落有致的田野。我常常将小板凳拖到窗边，踩上去伸长脖子看外面的世界。因为我们家里没有电视，我就将胳膊靠在窗台上，下巴支在手背上，享受着窗外日复一

日的生活“剧场”。这些都是我儿时的“电视节目”。我的视线所及之处，是建筑密集、人群熙来攘往的街区。我看到邻居们从他们的后门走出来，用木棍拍打衣物上的灰尘。没人拥有洗衣机或烘干机，所以大家都是用肥皂和洗板手洗衣物，然后清水漂洗，挂起来晾干。至于我们的洗衣方式，我父亲用铁丝和竹棍制成了一个长方形的架子，从我们的窗户伸出，再急剧地弯回窗框顶部。我们并不是唯一一个如此巧妙利用窗户空间的家庭。所有邻居的窗户外都装有类似的晾衣设施。不论是哪一天，宿舍的外墙都挂满了五颜六色、形状各异的衣物，宛如临时旗帜，默默诉说着我们对那简陋居住条件的适应和坚守。

尽管如此，这种亲密的生活方式确实让我们与邻居建立了深厚的了解。这栋楼里住着许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我们没有电子游戏、电子设备或电视，也没有什么玩具，但这些都不重要。在那物质匮乏的时代，我的想象力成了我最大的玩伴。天气温暖时，我会领着一群孩子在外头踢足球、玩捉迷藏。天气寒冷不宜户外活动时，我就在我们那间不大的公寓里给他们讲故事，进行小型表演，逗得他们哈哈大笑。我用剪刀从纸板和纸上剪出整个微缩王国，有城墙、房屋还有城堡。我用布头和泥巴做出了可以戴在手指上的小偶人。我的父母的床变成了我们的舞台，床柱上垂下的蚊帐是我们剧场的幕布。我在床前拴上一根绳子，上头挂着床单。我跳上“舞台”（床），藏在床单后面。邻居家的孩子们都聚在床前，坐在小凳子上，入迷地观看我的手偶戏表演，表演的都是中国的传奇故事。我特别喜欢扮演孙悟空，这个充满创意、勇往直前、在西游记中克服重重困难的神话人物。我的母亲常常是在下班后回到家，发现我们围在她的床前。她会在昏暗的房间里耐心等待，直到我的表演结束，当这个临时剧场的幕布落下，灯光再次亮起，我的小偶人们向观众鞠躬道谢时，她会热情地鼓掌。

我的弟弟明宇出生在1968年的夏天。有一天我回家，看到一群大人围在我父母的床边。我挤过人群，

用肩膀顶开他们，一直挤到床边。我的新弟弟就躺在床垫中央，被毛毯紧紧包裹着。他早产了三周，脸上满是皱纹。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新生儿会有这么多皱纹，于是我叫他“小老头”。不过我也为他取了一个正式的名字。我的名字明旭的意思是“明亮的太阳”，于是我建议父母为他取名“明宇”，寓意“明亮的宇宙”。我是太阳，但我希望他能成为更宏伟的存在。

作为哥哥，我比明宇大八岁，经常要照顾这个小家伙。就像我妈妈曾经去幼儿园接我一样，我也承担起了从幼儿园接他回家的任务。我的脖子上挂着一根绳子，绳子上系着一把钥匙，那是我们进入公寓的钥匙，因为父母那时通常还在工作。我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准备晚饭的米饭。我们的楼里没有公用厨房，但每户人家的门外走廊上都有一个小煤炉。当小明宇玩耍时，我就在一碗水里洗米，点燃煤炉上的火，然后将碗放在火上煮。有时，我会让米饭在火上煮得时间稍长一点，水便会沸腾而溢出。对面的邻居奶奶看到后会大声叫我，我便及时赶回去，掀开盖子，以免米饭烧焦或溢出的水熄灭了煤炉的火焰。

晚上，我们一家围坐在方桌旁共进晚餐。饭后，屋内寥寥无几的家具间，堆满了我父母的书。然而书的种类只有两种：医学教科书与共产主义相关书籍，比如《毛泽东语录》——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小红书”——以及毛的其他著作。屋里不允许有其他类型的书——没有文学，没有诗歌，没有艺术——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书籍都是禁止的。

然而，爸爸和我之间有一个小秘密。藏在书架上，掩于那些“红色书籍”之后的，是一本珍贵的诗集，那是一本收录了中国唐朝四大诗人作品的书。爸爸希望我能通过学习这些古老的诗句，来欣赏我们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一位伟大的诗人是李白，他生活在八世纪，常以月亮为伴，他的作品曾激发了我年少时的无限遐想。我对这些诗歌非常痴迷，以至于现在，五十年过去了，我仍能背诵那些诗句。

李白曾写道：“人生得意须尽欢。”从小，我就

学会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努力享受生活的精神，这种精神引领我度过了接下来的岁月。我们的物质生活或许贫乏，但我们对彼此的爱与家庭的亲情却是无比丰富。我的父母创造了一个氛围，在那里，我从不因为与众不同而感到自责或受限，我可以自由地探索和提出问题。它给了我情感上的安稳，让我敢于憧憬未来。我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穿上父亲在医院工作时的那件白大褂，我甚至准备了一个小医药箱，随时携带。父母还会给我一些旧的医疗器械、药瓶和其他用品，我会在我的小铁盒里装满镊子、碘酒、棉签、绷带和草药膏，像小时候的父亲一样治疗伙伴们的小伤口。在那些年少的岁月里，成为一名医生是最常有的梦想。我经常想，延续家族的医学传统将是多么光荣的事情。

尽管我怀揣着这些年轻的梦想，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另一个更大的灾难即将来临，它将紧随着那场在中国各地夺去无数生命的大饥荒而至。当我刚刚踏入小学校门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之中。它的破坏力在短短几年内会变得无比强大和广泛，给整个国家带来深远的影响。没有哪个家庭能够幸免——我们也不例外。

第三章 污点与我的母亲

“你想进监狱吗？你在学校做了什么？你不想活了吗?!” 我母亲的眼睛充满了恐惧。

那天，我刚从学校回到家，爬上宿舍楼的二楼，正要走进我们的公寓，她就从里面冲了出来，显得慌乱不安。

我感觉下巴在颤抖，无法想象出了什么事。我怎么可能会有麻烦？我一向是个好学生，班级的班长，人缘好，从没做错任何事。

我跟着妈妈走进公寓，爸爸在里面焦虑地来回踱步。他让我坐下，告诉我学校刚刚发现有个学生犯了叛国和反革命的罪行……而我被认定是罪魁祸首！

被定为反革命意味着坐牢甚至死刑，所以我吓坏了。我因为自己陷入的麻烦而颤抖和哭泣，我实在是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事。

在那个时候的中国，麻烦无处不在。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性饥荒和死亡证明了毛主席的错误。为了拯救国家，几位党领导人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几年内经济开始反弹。但毛担心他即将失去自己的权力，于是他逮捕了他的高级副手，重新确立了他对党的权威。然后他发动了臭名昭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有力地清除所有的反对者，并追求创建一个只忠于他的工人阶级统治的社会。

文化革命的第一个目标是消除高等教育。毛自己只接受过小学教育，所以他讨厌任何比他受过更多教育的人。他认为知识和教育是邪恶和政治异议的源头，必须被打压。就在我1966年开始上小学的时候，中国

各地的大学都被关闭了。知识分子被贴上了“臭老九”的标签，这是社会等级的最底层，甚至低于罪犯、妓女和乞丐。教育与城市生活被视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威胁，因此原本有望升入大学的数百万青年被迫派往国家最贫困的地区，注定要过上一辈子的贫困与艰辛劳作。被驱逐出去进行“劳动再教育”意味着在恶劣和贫穷的条件下工作，一生只能赚一两美元的工资。这样微薄的收入或许只够租一个需要与十几人挤在一起的狭小房间，每天仅能勉强吃上一点米饭。这种被驱逐的命运就像是一种无期徒刑，他们被永久地禁止回到城市。许多聪明才智的年轻人从此销声匿迹，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或听到他们的消息。在无法承受这种残酷驱逐的重压下，有些人甚至选择了自杀来结束这一切。

在我所在的社区，曾目睹一个令人心碎的场景：一个稍长一些的青少年的父母含泪乞求，哀求当地共产党的领导不要把他们的女儿赶走。父亲焦急地摆弄着手中的帽子，母亲则紧紧依靠在他的身旁，哭泣着恳请领导能够发发慈悲。然后有一天，那个青少年就消失不见了。家庭无能为力，因为政府已经把她所谓的“户口”改到了国家贫穷和遥远的地区，所以她将被迫永远生活在那里。严格的户籍制度让共产党政府对公民拥有了绝对的控制权。每个人只能在一个地方合法注册户口，这也决定了他必须在那里生活。除非政府真的改变了一个人的户口地点，否则一个人绝对没有权利生活在其他地方。如果那个青少年没有遵守驱逐令，而是留在我们的家乡，她将被送进监狱。食物配给也与这些户口紧密相关，因此，如果那个青少年试图在她的户籍地以外的任何地方生存，她将无法获得任何食物配给，面临饥饿的威胁。一旦共产党的官员决定变更一个人政府指定的户籍地，就无法逃避这种被迫迁移的命运。人们被束缚在自己的注册城镇，只能在那里度过一生，无法改变。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或者有时被称为“文化大屠杀”）过程中，估计有二千万青年的生活被这个计划摧毁。

国家动员年轻一代来重燃革命的火焰，协助毛泽东清洗他的反对者。年轻的学生们被组织起来，化身为臭名昭著的红卫兵，他们的左臂上系着象征着革命的红色臂章，上面饰以金色文字。这个年轻的组织，宛如盖世太保一般，被赋予了根本性的任务，那就是要揭露和清除任何有资本主义、精英主义或资产阶级倾向迹象的人。红卫兵学生们在全国范围内破坏历史纪念碑和文化遗址，攻击并羞辱他们的老师和校长，让他们带着牌子在公共广场上游行，他们经过的时候吐口水踢他们。到处可见指责老师的大字报，许多教育者被投入监狱，有的甚至遭到处决，还有些被迫走上了自杀的道路。成群结队的孩子们，情绪激昂，对那些曾经致力于培养他们、为他们的未来擘画蓝图的人进行谴责和羞辱。这些原本应受到尊重的教师，如今却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凌辱和折磨。学生们烧掉他们的课本，抵制课堂。全国各地的学校都一片混乱。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已经从高等教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红卫兵、工人和农民接管了学校、工厂、医院和企业。那些拥有专业知识和权威、本应负责运营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官员，被暴力地取代，他们的位置被只懂些马克思主义教条、却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农民和工人所填补。我的学校，延安第二小学，也被没有受过教育的工厂工人接管，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经营一所学校。他们赶走了我们的校长，改变了我们的课程内容；我们只能学习共产主义的教条，科学和人文学科却被排除在外。每天中午，我和我的小同学们在田径场集合，背诵毛主席的教导，练习“忠字舞”，向我们敬爱的领导人表示忠诚。每一次集会，红卫兵都会利用这个机会向我们灌输党的原则和宣扬最高领导人的光辉形象。我站在一排排整齐的学生之中，我们每个人都身穿蓝色裤子、白色衬衫和红色领带。我们一起行动，一起前进，一起发声。红卫兵站在我们面前，情绪激昂地高喊，向我们灌输毛泽东是如何建立现代中国的伟大叙事，他是如何将我们从封建主义的枷锁以及西方大国的压迫下解救出

来。他们激情满怀地讲述，这些西方大国曾经使中国饱受羞辱长达一个半世纪，而毛泽东则是如何成功地统一了一个被内战重创、四分五裂的国家，如何英勇地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此，我们被灌输着一种义务，那就是必须时刻以毛为榜样，追求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的生活。生活在一个一党制的体系中，对于那些习惯于拥有选择权的人来说，这样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在美国，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意见；他们可以自行决定支持哪种意识形态；他们可以在多党制的框架下投票选择。而在那些岁月的中国，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自由。我们甚至不能自主选择是否加入那个唯一的执政党——共产党，因为成为其一员不仅极其困难，而且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地位。党员身份往往意味着特权和来自党的种种好处，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显得尤为宝贵。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一旦被认为与党有所冲突，那便意味着置身于险境。我们要么表态支持执政党，要么就得面对生命受到威胁的风险。任何形式的异议都是绝对不被容忍的，持不同政见者往往会遭到严厉的镇压，甚至被处以极刑。在那样的氛围中，像所有其他学生一样，我也被这种全民动员的狂热所裹挟，几乎无法自拔。当工厂工人接管了我们的小学，并针对某些老师时，我像所有其他学生一样，不得不随大流。在一个命运多舛的日子里，我在红卫兵的命令下，站在教室的窗台上，手颤抖着写下：“打倒赵老师！毛主席万岁！”红卫兵挑中了这名老师，命令我们所有人公开反对和批判他。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谴责一个对学生如此尽心尽力的老师，但在那种情况下，我除了服从那些掌权者的命令之外别无选择。然而，当我放学回家，看到母亲眼中的恐慌和担忧，我开始后悔那天早些时候的所作所为。

“你到底在学校做了什么？”她问，声音因恐惧而变得尖锐。

她和爸爸从我学校的某个人那里听说，我在窗台上写了一些煽动性和反革命的话。

“你写了什么，明旭？！”爸爸问到，声音充满

了愤怒。

“没什么坏的！”我说。“只是革命口号。”

“你的老师们发现‘打倒毛主席！’是你的笔迹。你写的是这个吗？”他问，声音颤抖。

我的脸刹时变得冰冷而苍白。一定有人把我在窗台上用粉笔写的两句话故意模糊了中间的部分！

学校正准备把我定性为反革命，宣称我对敬爱的最高领导人构成严重威胁，对无产阶级社会构成威胁，一个应该被关进监狱甚至被处决的反动分子！

那时，我只有八岁。

我颤抖着，我在一张纸上重新写下了那两个口号，让我的父母亲自看看我实际上写的并不是反革命的话语。

那天晚上，经过与妈妈紧张而激烈的讨论后，爸爸说：“我们必须去和学校领导谈谈。如果我们不澄清这个误会，明旭的档案里将永远有一个污点。”

“档案”在中国是极其重要的，它是官方记录个人一生各个方面信息的文件。普通公民是不允许查看自己的档案的，因为它是共产党保管的秘密文件。它记录了你过去的所有行为，并决定了你的阶级和地位，你是否有资格得到优待和晋升，以及你是否对政府和党构成威胁。

“污点有多大？”我害怕这所谓的污点会跟随我一生！

许多个夜晚，我都被同一个噩梦纠缠——我梦见一滩墨水从当地党委办公室的桌上墨水瓶中溢出，它沿街滚动，穿过院落，一直追到我的家。然后，它会猛地撞向楼房的一侧，在晾着的裤子和衬衫上留下痕迹，随后穿过窗户潜入我们的屋内，最终找到并缠绕我，就像我手指操纵的木偶在墙上投下跳舞的阴影。这个噩梦仿佛要无休无止地折磨我，永不离去！

后来我才明白，我父亲所提到的“污点”并非真的是某种实体的标记，而是被放入我个人档案的一份声明，将我定性为反动分子。因此，我的未来将不可逆转地被玷污。没有任何学校会再收我为学生，没有

任何单位会聘请我为员工。在共产主义的体系下，我档案上的这个污点预示着一片漆黑的未来。这个指控，这个沉重的误会，将摧毁我余生的所有可能！

我的父母连续几个晚上都无法入睡。离我几英尺远的小床上，我可以听到他们翻来覆去，彼此低声交谈，他们的声音充满了紧张和担忧。

“我们明天还要和学校开个会，”我妈妈有一晚这样说，“我希望他们能听我们解释。他们必须听。我们不能任由明旭的未来就这么毁掉。”

那个晚上，我也难以入眠。我躺在床上，被恐惧彻底吞噬，眼睛盯着窗户，看那可怕的污点是否已经找上门来。我知道有些年纪比我大的学生因为被标记为反革命，他们的档案上留下了那可怕的污点，结果选择了自杀。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在自由落体，又害怕又迷茫。但就在我即将完全崩溃的时候，我的父母迅速采取行动应对这场危机。

他们带我去了几次和学校官员的会议，试图说服他们宽恕我的过错。

“请接受我们最诚挚的道歉，”我妈妈说，“明旭还只是个孩子。他的涂鸦本无恶意，是别人篡改了他的话，扭曲了其含义。”

“不管你要怎么做，”我爸爸恳求道，“请不要在他的档案上留下污点。你想怎么惩罚他都可以，但请别给他那样的标记。”

红卫兵让我们在外面等候，他们在隔壁房间举行了一场漫长的闭门会议，决定着我的余生。我们被恐惧笼罩。每一秒的等待都感觉如同永恒。

最终，一位学校官员回来了，“我们认为，也许明旭并没有故意写这些话，”他说。

我感觉就像千斤重担突然从我肩上卸下。我的父母潸然泪下，泪水中带着难以置信的宽慰。

“不过，这依旧是一项非常严重的过错，”官员继续说道。“如果明旭想避免档案中留下污点，他必须承担一些严重的后果。”

尽管我勉强避免了被公开指责为反革命和遭到起

诉的命运，但我所受的惩罚仍是沉重的。回到学校，我被贬为三年级的垫底生。我所获得的一切荣誉和奖项都被取消了。我被剥夺了之前凭借努力赢得的全国学术优秀奖的资格。我的同学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们能感觉到我一定做了些很糟糕的事，所以他们好几个月都在躲避我，仿佛我患有某种传染病一般。尽管我庆幸终于避开了那个致命的污点，但内心的羞愧和孤独感却依旧如影随形。

我的家庭一直强调学习和知识的重要性。即使是毛主席自己也曾经说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在学校努力学习是获得好工作和有前途的未来的关键。我坚守这个信念，即使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我也感激我家人的关爱和支持。尽管我被贬为了班级的垫底生，但我们共同抵御了那不祥的污点！我心想，只要我不懈努力，坚持学习，保持出色的成绩，我终将重新崛起。

我父亲继续在医院担任内科医生。在那段动荡的时期，作为一名忠于政府的医生，他没有太多的社会或经济特权，但这种身份让他在社会上既安全又必要。也就是说，一切都进行得相对顺利，直到红卫兵威胁要关闭我父母教学的医学院。

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吃饭时，我妈妈的一个同事急匆匆地闯进了我们的家。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阿莲；红卫兵即将摧毁大学和所有的实验室！”他急切地说。

妈妈从凳子上跳起来，准备冲出门去，但爸爸把她拉住了。

“不要去，阿莲。太危险了！”他恳求道。

“我必须去。我不能坐视不管，看着他们摧毁我的实验室和教室。”

她和同事急匆匆地离开了。不一会儿，爸爸也决定跟去。他吩咐我留在家里，然后迅速走出了门。他想找到妈妈，确保她的安全。我紧跟着他，抓住了他的腿不放。

“爸爸，别把我一个人留在家！”我不知所措，

感到非常害怕。他勉强抓起我的手，我们急忙离开了大楼，朝着大学跑去。

在去学校的路上，一队满载红卫兵的卡车呼啸而过。他们头戴竹帽，挥舞着金属棍子，高喊革命口号：“毛主席万岁！摧毁资产阶级的学校！打倒这些臭老九教师！”

我能感觉到我父亲越来越紧张。他加快了步伐，我努力地跟上他。

“快跑，明旭！”他在肩头大喊。“我们必须在那些卡车到达大学之前赶到！”

我拼了命地跑着，试图跟上父亲的步伐。我的肺仿佛要被烧焦，眼睛也因风而流泪。当我们跑到大学门口时，我感到心脏砰砰直跳，几乎喘不过气来。我大口大口地呼吸，四处张望，只见一群红卫兵已经抵达并封锁了大门。在刺眼的聚光灯映照下，教师们一个个从大学里被赶了出来，红卫兵挥舞着铁棍毫不留情地打着他们，直到他们在地上痛苦地扭动和尖叫。接着，红卫兵继续痛击，直至教师们的头骨崩裂，到处都是血迹。我被吓得紧闭了眼睛，开始抽泣。爸爸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迅速带我离开了那个恐怖的地方。

我紧张地透过眯缝的眼睛观察着四周。爸爸带我跑到了大学的后方，我们站在一道高墙之下。这里黑暗笼罩，但借着月光，我能看到有人影在墙上挣扎着爬行，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命在逃命。我认出了其中的很多人——都是和妈妈一起工作的教授们。爸爸和我急切地等待着，目不转睛地扫视每一个翻过墙的人，希望在他们当中看到妈妈安全地爬过来。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我们走近一位妇女，想确认她是否是妈妈时，她那充满恐惧的眼睛和惊恐的表情。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都被噩梦困扰，梦见一个鬼魂般的女人用她那双惊恐的大眼睛盯着我。

墙那边不断有人爬过，逃离那片混乱与恐怖的土地，但我们始终没有看到妈妈的身影。

“爸爸，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吗？”我一遍又一

遍地问他，我的声音颤抖。我很害怕。如果红卫兵在这里找到我们，爸爸和我会被打吗？

“明旭！你的妈妈还在学校里，我们怎么能回家？”他大声说，声音紧张而愤怒。接着，他感觉到了我的恐惧，于是拍拍我的背安慰我，不久我就在他的肩膀上睡着了，累得精疲力尽。

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我们家公寓的地板上。耳边回荡着呻吟声，那是人在痛苦中无法掩饰的抱怨声。我努力抬起头，顺着声音望去，只见妈妈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着，床单上布满了血迹。我惊呆了，呆坐在地，不知所措。

当父亲发现我醒来时，他走过来告诉我，母亲并没有逃走，而是选择留下来保护实验室，那里存放着她和其他人几十年的医学研究成果。当红卫兵最终在那里找到她时，他们用铁棍狠狠地打她，直到她血肉模糊地倒在地上，然后把她丢在那里等死。幸运的是，红卫兵中有一位是母亲的学生，他无法忍受看到自己的老师被打死。他冒着生命危险和被视为反革命的风险，通过一个鲜为人知的出口把我母亲带回家，父亲在那里止住了她的流血并包扎了她。这位年轻人，我们全家欠他一条人命，但在我醒来之前，他已经离开了。他从未告诉我父亲他的名字。

那天我所见证的人类的残忍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中。那些老师和我母亲所遭受的一切——红卫兵的暴行，他们殴打并杀害了许多老师，他们把我母亲的身体打得遍体鳞伤，把她推到了生死边缘——这一切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多年来始终难以磨灭。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和我都睡在地板上，让妈妈能独占整张床，好好恢复，因为她全身都是骨折和淤血，躺在那里不能动弹。在家里休养了几个月后，母亲需要的护理超过了我和父亲所能提供的，所以她被送到了福建省的我奶奶家，那里离杭州有两天的火车路程。两年里，我只能在暑假期间看到母亲。她大部分时间都卧床不起，只有在恢复的第二年才能起来走动。直到今天，我母亲的身体仍然时常疼痛，她的

右手食指因为被打而永久地弯曲了。

就在我母亲终于恢复过来的时候，我们又失去了她。1971年初的一天，我们收到了令人恐惧的消息。作为对她试图保护实验室和教室的报复，我的母亲将被下放，永远地离开我们。但是，其中一位共产党官员表现出了仁慈，他说，由于我母亲家里有两个孩子，他们将展现他们敬爱的领导人毛主席的伟大慈爱和宽宏大量。我的母亲不会被终身流放，而是会被安排到贫瘠的乡村，作为一名“赤脚医生”在简陋的条件下为农民服务，并在田间劳动，收入极其微薄。

那时候，我父母的工资加起来是每月一百一十八元，相当于十五美元。虽然他们的生活比许多只有一个人工作的家庭要好得多，但他们不得不把所有的积蓄都用来支付一个老妇人来帮忙照顾我的小小弟弟。两年时间里，父亲失去了妻子的陪伴，我和弟弟也失去了母亲的关爱。她每年只能回家一次，我们只能通过书信与她保持联系。我们的家庭因此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缺。

文化大革命的非人道行为没有放过任何人，尤其是最初的五年极其残酷。学校被迫关闭，数以百万计的学生被赶出城市，很多年轻人宁愿选择自杀也不愿面对被流放的命运，与家人永远分离。为了遏制这股恐怖的死亡浪潮，政府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他们的铁腕政策，修改了流放规定，允许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保留一名孩子在家。这名“幸运”的孩子可以避免被流放，条件是他必须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城市中找到一份收入来源的工作。这种强迫父母在子女中作出选择的政策，了解到未被选中的孩子将面临流放和贫穷，是极其残酷和不人道的。哪位父母能够承受作出如此痛苦的选择呢？

就在我快要完成初中学业的时候，父亲从医院回来，看起来疲惫不堪，沮丧失落。他一直是那位理智、安静、果断的父亲。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沮丧。

那天晚上，我听到父母在绝望地低声争吵。

“明旭还有两个月就要初中毕业了！我们必须决

定选择哪个孩子，”父亲强调道。

“选择明旭。让他留下来，”母亲恳求道。

我的弟弟明宇比我小八岁，那时只有六岁，所以母亲认为，她和父亲在明宇到了面临被下放的年龄之前还有八年的时间。她希望在那之前事情可能会有所改变，如果没有，那也会给他们时间去找出一个保护他的方法。

“但是，如果我们选择明旭，那么为了让他利用这个‘被选中的’政策，他必须立即放弃学业，不去上高中，因为如果他去了，他可能在毕业后就被下放，因为政府已经声明他们可能在明年取消‘被选中的’政策，”父亲说。然后他以一种悲伤的声音补充道，“但另一方面，如果明旭不去上高中，不拿到他的文凭，他将永远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那总比被下放好！”母亲的声音越来越高。

“但是就这样剥夺他的教育机会太残忍了！他是个优秀的学生。当他长大后，想知道为什么他的教育会这样突然中断，我们要怎么跟他解释？他将找不到一个体面的职业，成家也会很难。他会恨我们一辈子的，我也会恨我自己。”

“他不会恨你的，”她说。“他会明白，在这个时候，你面临的可怕的选择，你做出了最好的决定来保护他。”

我深知，一生中，教育以及先后进入高中和大学是成功的关键，这不仅对我，对我的父母，还对整个王家都至关重要。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大学中获得一席之地，意味着能在国企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因为文化大革命导致大学关闭，那时高中文凭便是能获得最高学历。没有高中学历，就意味着只能过着从事体力劳动、收入微薄的生活，每月勉强赚到三十元——也就是四美元。

我父亲发出了一个充满痛苦和忧虑的沉重叹息。

“如果他不是这么优秀的学生，这个问题也不会让我如此头痛。但他一直都很有上进心，特别是在过去几年，尽管遭受羞辱、被打压，甚至因为那次可怕的学

校口号事件，差点被划为反革命！他从所有这些困境中挺了过来，现在本有机会接受好的教育，我们却要亲手毁掉这一切，毁掉他的人生?!”

晚餐时，我们静静地坐着，面前是简单的一餐——一米饭、蔬菜和炒鸡蛋。我父亲注视着我，他的眼中充满了悲伤和迷茫。

“儿子，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有一天要故意剥夺你的教育！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们做出这个可怕的决定，不让你继续接受高中教育，是多么的痛苦。”

所以在1974年的春天，我14岁的时候，我的教育在我读完九年级后突然结束。尽管我是被选中的那一个，但我仍然必须在一两年内找到有收入的工作，否则我仍然可能面临被下放。但是，只有初中的教育，要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父母一直在为我拼搏，哪怕前方的希望微乎其微。他们还会再来救我，用他们那独特、新颖，有时甚至是非法的方式，帮助我走出这片黑暗。

第四章 逃离幽灵

黎明前的寒风中，我抱着我的二胡，这种古老的中国乐器，手提一把小凳，走出了家门。我坐在公寓楼附近的街角，家人和邻居们都还沉浸在梦乡。寒风卷起飘落的雪花，它们在空中翻滚，形成一个个小小的白色旋风，宛如微型龙卷风般在街头跳舞。我穿上了最暖的衣服，但因为我们的负担不起手套，我弹奏时只能空手对抗严寒。覆盖着蛇皮的小音箱搁在我的膝盖上，左手握着二胡的颈部。当我右手拉动着两根弦，深沉而悲伤的旋律便涌了出来。

我一生都被灌输，良好的教育是通往成功和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现在，我的教育之路戛然而止，伴随着对未来所有的希望也烟消云散。仅有的初中文凭让我无法找到一份工作，我的父母告诉我，我唯一的出路是成为一名舞者或音乐家，这些职业还能在共产党政府看来有所价值。全国各地的歌舞团都在公共场合表演，宣扬着党的理想。毛主席的妻子江青创作了八个标志性的戏剧，赞颂革命的胜利，描绘外来侵略者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失败，以及农民、工人和士兵的光辉形象。自小，我看的都是这些样板戏。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一场对文化的大屠杀，在那个时期，除了江青的八个作品，其他任何类型的电影或创新性表演都被禁止。

像许多年轻人一样，那八出国家级戏剧的每个字、每个场景我几乎都能倒背如流，因为我们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重复观看。我与生俱来就对音乐和舞蹈有着不可名状的热爱，这是我从父亲那里遗传的。还在读

小学的时候，我就在歌舞团担任重要角色，为各个工厂、企业乃至公共场所的观众重现经典故事。有一次，我扮演一名士兵，负责监督年轻女性为人民解放军洗衣；另一场演出中，我变成一位老者，驾着马车，把收获的稻米运向北京。每当观众对我的表演报以热烈的掌声，我都感到无比的快乐，因此我投入更多的时间来练习我的表演和舞蹈。

14岁那年，我被迫辍学。我希望依靠我的音乐和舞蹈背景，能在共产党的歌舞团里占得一席之地，这样就可以免于被下放，避免一生贫穷和辛苦劳作的命运。由于我之前经过了系统的舞蹈训练，我成功地通过了杭州艺术学校的几轮严格选拔。但尽管我表演的舞蹈动作与我小时候的一样，现在的感觉却截然不同。这一次，每一个步伐，每一个旋转，我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不再是出自对艺术的热爱，而是出于对在乱世中寻找一席避风港的迫切渴望。

作为对舞蹈生涯的一个补充，我开始认真学习二胡，这是我父母仅花两元钱，也就是三十美分为我买的乐器。这个看似简单的乐器一次只能演奏一种音调，严格来说，它无法演奏和声。但当娴熟地演奏时，它所发出的音乐却是如此丰富、充满灵性，透着一股淡淡的忧伤。我从小就偶尔会拉一拉二胡，但现在，我紧紧抓住它，如同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我想，即使我作为舞者的梦想破灭，如果我足够幸运能成为政府艺术团的二胡演奏家，我仍有可能避免那无望的下放生涯。

有时，我的弟弟明宇会坐在我旁边，手里拿着一把小型二胡。他喜欢陪着我，模仿我做的一切。我们会一起为家人以及父亲的同事们演奏二胡二重奏。看着那时仅六岁的弟弟，我心中充满柔情，也强烈地渴望回到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明宇把琴弓在弦上来回拉动，他以为我们只是在玩耍。他并不知道，我是在为生存而战斗。

我孜孜不倦地练习二胡，除了每周的正式课程，我每天要练习长达十五个小时。清晨，我会去街角演

奏，免得吵醒邻居。我的左手紧紧抓着乐器的颈部，在寒冷中很快就会变得麻木，我不得不停下来。二胡的长颈靠在我的肩上，琴弓则横放在我的膝盖上，我会向冰冷的手指呵热气，揉搓双掌。看到我的初中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走向高中，我的心里满是愤怒、嫉妒和绝望。我曾是个成绩优异的学生，我多么想与他们一道步入学校！他们很多人是家中的独生子，高中毕业后不必担心下放的命运。而我，来自一个多子女家庭，无缘高中甚至大学，我的教育之路就此戛然而止。

一旦邻居开始日常活动，我便回到室内继续练习，但屋内没有暖气，温度跟外面几乎无异。我的手因长时间暴露在寒冷中而冻伤，当它们开始回暖时，疼痛难以忍受，冻疮导致水泡破裂，流出液体。这些伤口持续了好几周，直到皮肤终于愈合，留下淡淡却永久的疤痕，至今犹见。然而，但我的手指上的任何疼痛都无法与面对流放生活中深深的痛苦和绝望相比。

我练习的最著名的二胡曲目之一是“二泉映月”，出自盲人民间音乐家阿炳之手。这首乐曲是中国音乐宝库中最珍贵的曲目之一。尽管阿炳从未真正看到他的音乐所描绘的景象，但他在心中想象着月亮的光辉映照在两个融为一体的泉水之上。这段旋律优美动人，充满了渴望和未曾实现的梦想，作曲家通过音乐表达了他对能见到这美景的向往。

当我坐在凳子上，弹奏这首乐曲时，我的灵魂似乎与那悲伤和渴望的旋律产生了共鸣。作为一位年轻人，我本应期待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但就像无数的年轻人一样，我被贴上了社会最底层的标签，仿佛永远也触摸不到幸福的边缘。这位年迈的作曲家虽然看不见，但他能通过音乐想象美好。而我，虽能看见美，但对未来却感到茫然。二胡的旋律宛如月光，那挂在空中熠熠生辉的镜子，它照亮了我与父亲早年在森林中的漫步。现在，这月亮又为我映射出什么样的光芒？我看不到任何东西，只感受到无尽的黑暗，延绵至生命的每一个角落。

我全情投入舞蹈和二胡的学习，因为这是唯一能

引我走出黑暗的通道。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技艺有了显著的提升。老师对我的进步表示满意，我和我的父母都为可能通过即将到来的表演考试、加入杭州歌舞团而感到欣喜，这意味着我可能免于被下放的悲惨命运！我对这个机会感到如此兴奋，几个星期都难以入睡，一直在心里倒数着表演考试的日子。

然而，有一天，父亲下班回家，他的脸上写满了悲伤。他告诉我的事情，让我感觉比外面寒冷的冬风还要冷，还要苦。

政府发现，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学习音乐和舞蹈是有别的动机的，也就是说，他们只是为了避免被下放。他们认为这是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公然试图规避下放政策。作为回应，官员们宣布，他们那一年不会从杭州选任何音乐家或舞者！

听着父亲的话，我感到呼吸都困难。绝望再次席卷而来。我整整一年都在舞蹈和二胡上倾注了心血！所有的练习、冻伤、疼痛，现在看来都是白费！那几天，我只是茫然地在我们社区里徘徊，心感空虚。我的生活失去了方向，仿佛我正走在浓雾弥漫、看不见尽头的道路上。从我还是个小孩起，我就一直在忙碌，学习，努力工作，期待着未来。但现在，我却陷入了停滞和无用的境地。我还能有什么选择呢？如果我不快点找到一份有收入的工作，我仍然面临着被下放的威胁。

我的父母不忍心看到我沦落到贫困之中。他们知道必须找到办法让我保持忙碌，不能让我在街上无所事事，因为如果年轻人被发现游手好闲，他们很可能被捕并被送往劳改营。于是，我的父母想出了一个办法，既可以暂时让我避免麻烦，也能让我藏身——要我学习医学，虽然这在当时是违法的。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国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被允许重新开门迎学，我父母工作的医学院便是其中之一。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学入学考试就已被取消，因此，能够入学的学生都是那些实际上不需要通过任何考试的人，他们大多是共产党官员的子女或有

政府背景的人。

我的父母敦促我考虑在他们的大学学习医学，即使只是为了求知。

“我为什么要学医，当我根本没机会成为一名医生？”我质问。

“明旭啊，记得，知识永远是宝贵的，总会派上用场的，”爸爸温和地解释道。“你要持续学习，说不定哪一天你能用上你现在学的知识呢。”

我实在是看不出这其中有什么意义，但我也清楚，如果我继续在街上游荡，被赶出去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还是同意了。当我问父母我怎么可能被允许学医，毕竟我连个正式的学生都不是，他们告诉我，他们会想办法的。接着，我的父母向他们的同事透露，他们打算偷偷地让我进入学校，并请求教授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天早晨，父亲带我去医学院的解剖实验室。三面墙上都是玻璃柜，里面陈列着各种浸泡在令人作呕的化学液体中的身体部位——一个截肢的手、一只患有癌症的脚、一个人的头颅。

“我的儿子想在这儿学习医学，”我父亲对实验室的老师说，“你能辅导他，帮他赶上其他的医学生吗？”

老师打量着我，“但他太年轻了啊！”

“给他一个机会吧。他或许会给你带来惊喜的。”爸爸坚定地回答。

另一个教授的孩子也在躲藏——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孩——和我一起。几周以来，我们俩紧跟着实验室的老师，他从一个瓶子中取出人体部位进行讲解。这些标本的视觉冲击让人感到不适，但那些漂浮的肢体并不是最令人恐惧的。在房间另一侧，隔着几英尺远的墙，有一个大书架。书架后面是棺材，里面躺着死者，通常是那些在公共场合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并被处决的人。他们的遗体被送到医学院，因为绝大多数死者的家属害怕，一旦他们去认领亲人的遗体，也会被打上反革命的标签。

在我们研究瓶中标本时，我心里一直想着这些死者距离我们是如此之近。解剖老师讲课时，我会竭力倾听来自棺材的任何声响。每当我觉得自己听到了些什么，就会惊跳起来。我一直担心会有尸体从棺材的静寂中复活过来，但让我稍感安慰的是，它们并没有……除了在我梦中的夜晚！我连续几个月都做着恶梦，白天学到的人体解剖知识使得夜晚的梦境愈加逼真。尸体会从棺材中爬出来，哀求着找回他们失去的部分。那些没有手、脚或头的生物，它们腐烂的皮肤从骨架上脱落，直到我惊醒，浑身大汗，鼻中还残留着死亡的气息。

当我们终于结束了解剖的课程，逃离了那充满恐怖阴影的实验室，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

导师在与我的父母讨论我的学习进度时，赞不绝口。“你们的儿子是个天才！”他兴奋地宣称，“他仅用两个月就迎头赶上，现在已经完全准备好参加正规的人体解剖课程了。”

自那以后，我每天都去医学院，尽管这样做是违规的。我藏身于大讲堂的后排，试图混入那些正式的学生中，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比我年长很多。我的父母有时也会站在讲台上授课。每当他们讲课，他们期待我在场，而我也的确坐在那里，孤独地听着。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无意义的，因为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被允许成为一名医生。我凝视着窗外，看着其他人在一个我找不到自己位置的社会中忙碌着。尽管噩梦已经结束，但并没有新梦想来填补我的生活。在我眼里，我的世界空虚而无意义。

我再也没有见过实验室的那个女孩，但我开始注意到一个总是坐在讲堂前排的年纪较大的女孩。她已经二十多岁了，非常美丽，而我是一个青少年，我发现自己对学习活人的解剖学比死人的解剖学更感兴趣。我在整个课程中都在盯着她看，无法专注于讲座。如果她回过头来给我一瞥，或是对我微笑，那一刻足以让我快乐一整天。那也是我在未来许多年里，与她——或任何女孩——最近的距离。在当时的共产主义中

国，学校严厉禁止男女生之间的任何亲密接触，校园里绝不允许有任何约会行为。即便是国家批准的八个样板戏，在多年的时间里也从未有过爱情线索。婚前的浪漫或性行为被视为资产阶级腐朽的象征，是与无产阶级价值观格格不入的。共产党政府把所有浪漫或婚姻问题都视为“个人小事”，认为这些都应该置于为共产党服务的更高目标之后。对于我来说，浪漫是如此遥远，简直是一种奢侈品。生活的重压几乎要把我压垮，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在绝望中寻找一线希望和一丝幸福。

我的父亲是一位知名的心血管医生和血液学专家。我有时会和其他医学生一起陪他在医院查房。他带我们去看病人，他会提问，然后听取并回应学生的答案。作为教授之子，我虽年纪尚轻，实验室的白大褂几乎拖到了地上，但人们对我颇为尊敬。我初尝作为一名医生的成就感，从内心深处为能站在那样的位置，作为我父亲的儿子而感到骄傲。我渴望成为像他那样的人，继承我们家族的事业。

渐渐地，我对自己所学的医学内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了解人体的运作机制，探究我们如何能够深入理解并找到治愈疾病、帮助他人的方法，这一切都让我着迷。尽管我并未经过合法途径学习医学，也没有成为医生的明确机会，但在心底，我真切地希望，如果我能真正精通这些知识，掌握得足够好，也许，我还拥有成为医生的一线可能性！

然而，一天早晨，当我正准备离家去上学时，父亲阻止了我。他不得不再一次带着沉重的心情告诉我，我的未来又一扇门被紧闭了。

“明旭，从今天起，你不会再回到医学院了。”他声音沉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这是我人生中第二次，父亲不得不亲手终止我的教育生涯！他告诉我，一旦医学院的管理层发现我未经许可就参加了课程，他们便威胁要解雇他，除非我立刻离开。

就这样，我被迫离开了……一个我甚至从未正式

注册过的学校！

接下来的几天，我就关在家中，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我曾接受父亲的挑战，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医学学习中，而现在，我甚至不能理解为什么连这个机会都被剥夺。不像那些通过共产党内部关系得以进入学校的学生，他们对学业不甚关心，而我却对此充满热情，渴望学习！最近，随着对医学知识的逐渐掌握，我开始梦想或许有朝一日我能成为一名医生。但现在，这样的希望也被无情地粉碎了，残酷的现实像重锤般击打下来。我意识到，不管我多么努力，成绩多么优秀，如果没有得力的共产党背景，我将无缘任何学校的大门，更别提有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了。

看到我如此沮丧，父亲深感忧虑。

“明旭，要记住，人生的道路很少是直线前进的。在找到属于你的路之前，往往会有许多曲折和挑战，”他说，“但无论如何，都要怀抱希望。永远不要放弃希望。”

我躺在床上，看着地板上的影子逐渐拉长。我想起了小时候，那些爱玩的小玩偶投在灰暗墙壁上的剪影。那段欢快的童年记忆伴随着影子，在夜幕降临时消散无踪。难道我所有的欢乐回忆仅存于那些早年时光？前方只是一片黑暗吗？我翻来覆去，被一种熟悉的恐惧笼罩，辗转难眠。我开始意识到，不管我怎样努力去抵抗厄运，黑暗好像总能找到我——那些不祥的污点、无声的尸体、永远潜伏的被下放的威胁。我多么想逃离这一切，追求那光明与自由。

不久之后，我初中时的同学柳辉给我介绍了一位名叫胡天马的年轻人。胡天马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害，生前他是一位著名的剧作家，有“中国的阿瑟·米勒”之称。他最知名的剧本是关于一座古城，城内的居民起义反抗暴政。这部剧本被共产党政府视为对其统治的挑战，因此，胡天马的父亲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随后被捕并处以极刑。在行刑日，全城会在公共广场举行一场庄严的仪式。被审者站在台上，披着长袍，脖子上悬挂着写有他们名字的厚纸板。士兵

们紧紧抓住犯人的头颅，每当一个人的名字被宣布，他的纸板就会被翻过来查看。如果审判结果是名字上的每一个字都被逐一划掉，那么这名犯人就能苟延残喘，被判无期徒刑。但如果名字上被划上了一道长红线，那么这名犯人就会被判即刻执行死刑。大量的民众，有时高达数千人，会聚集在一起观看这些公开的审判。每一次翻板，都是一次关乎生死的刹那，每一个决定都伴随着人群的一片惊呼和尖叫。

被判处死刑的人们被军车押送到城市边缘的一个小山丘下。他们在那里跪着，每当枪声划破寂静，他们就会向前栽倒，子弹直冲他们的后脑。

当我第一次见到天马的时候，我在想，他是否也曾是站在广场上围观的人群之一。他是否亲眼目睹了父亲名字上的那个死亡标记？

我想起了医学院的棺材。

天马十七岁，我十五岁，我们都被禁止入学，也找不到工作，因此都面临着被下放的危险。但天马因为失去了父亲，所承受的悲痛远超过我。

天马继承了他父亲的文学天赋，写了很多诗歌。我们和另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柳辉一起，在天马狭小的卧室里聚在一起，四周的墙壁上贴满了我们的小说、诗歌和画作。

“明，我们要怎样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天马问，“辉和我是作家。你有什么特长？”

“我会跳舞，喜欢音乐，也会拉二胡。”我回答。

“你应该学习音乐创作，”他建议，“或许我们可以通过联合创作歌曲找到出路。”

我立即投入到音乐创作的艺术中，为天马和辉的许多诗篇创作了旋律。其中一首是天马写的《囚徒之歌》，它描述了一个被剥夺了自由和快乐的城市。

“在山脚下，那是我的家乡。那里没有水，没有阳光。人们走在城里，无精打采，面无表情，没有快乐，没有幸福。让我们做吧，让我们打破我们手上的手铐，让我们冲破监狱，为了自由！我们是囚犯。我们必须为我们的自由而战。”

我们埋头苦干，用写作和音乐创作充实每一天。我们创作了大约五十首歌曲，甚至完成了一部歌剧。我们尝试将一些作品提交给音乐杂志，但没有一部被发表。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考虑到我们歌曲的主题，没有引起过多关注实际上是我们的幸运。我们的音乐中流露出了我们对自由、教育和机会的无尽渴望。我当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我们的歌曲是多么的大胆。仅《囚徒之歌》一曲，就足以让我们被投入监狱，或是被带上广场的处决台。

我们还如此年轻，但我们短暂的人生已经饱受创伤，充满了悲剧和痛苦。未来看不到任何希望，没有解脱的迹象。我努力挣扎，却屡屡碰壁。那些曲调中蕴含的斗志，正处于濒临熄灭的边缘。

我的父母，在我寻找各种可能的职业道路时，一直是我坚实的后盾，但他们也快要失去希望了。我母亲无助地感觉，不论我尝试什么，我都将被下放。

“你必须找工作，”我父亲坚定地说，“不管什么工作都行，否则如果政府发现你没事做，他们会立刻把你下放。”

所以，在多年的挣扎和尝试之后，我最终放弃了对理想职业的追求，接受了一份城市中最低工资的工作。

每天早晨，我骑着一辆摇摇晃晃、生满锈迹的自行车，与其他成百上千的上班族一起穿梭在杭州的街道上。每到红绿灯，就会有一大群骑自行车的人停下来。那是夏天，大家都穿着白色短袖衬衫或T恤，因为其他颜色是被禁止的。我与他们一起等待着交通灯的变化，双手紧握自行车把手，脚踏实地，准备随时出发。当灯变绿时，我们如洪水般涌上街头，每个人都尽力快速蹬车。

半小时后，我抵达了一家出版厂，并走过了巨大的钢制大门。这家工厂最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的第五卷。我加入了一群年纪比我大的女性工作人员，我们一起坐在桌旁，用厚实的棕色纸包装着成捆的书籍，然后将它们堆放在手推车上，准备运送到全国各

地。

我曾是个充满才华和前途的学生，如今却只能接受最低标准的薪资，被困在社会的最底层，看不到任何升迁的希望。当我意识到我所有的努力，我所有曾经怀抱的希望——学习拉二胡、舞蹈、医学和音乐创作——全部落空时，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我无法想象自己要一直做这种单调乏味、重复性高、收入微薄的工作，直到生命终结。包装那些重重的书本使我的双手疼痛，背部弯曲发僵，我所赚的仅能够购买柴米油盐。

我每天的工资相当于十美分，第一笔双周薪水只有一美元。尽管收入微薄，当我收到它时，我还是松了一口气。在感觉自己无用、无能为力的两年多后，我终于可以为家庭做出一点贡献了。

但那第一张薪水支票，也成了我从书籍包装工作中得到的最后一笔收入。因为就在我开始这项工作的十四天后，我父亲带回了一条震撼的消息，这个消息将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报纸上的头条并不显眼，那条公告只有寥寥数行，但它的意义却是深远的。红绿灯终于变为了“行”。终于，我和中国的其他人一样，将会朝着一个全新的方向前进。

第五章 新希望的曙光

“你听到了吗？”我低声问道。我和朋友坐在我家公寓的地板上，我们正在欣赏我从小就开始精心收集和整理的邮票、糖果包装纸和烟盒的彩色收藏，我已经把它们整理成了自制的相册。我的手指停在书页的一角，我的朋友侧着头聆听，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那无疑是一支葬礼进行曲的旋律。音乐从走廊里每个房间的收音机中飘荡出来。朋友一言不发地站了起来，冲向他自己家的公寓，我紧跟在后。我们进去后，发现他的家人都在交头接耳，神情显得有些焦虑。

记者用无情的语气宣布：“毛主席去世了。”

我迅速离开朋友的公寓，走到外面。那是1976年9月9日，星期四的一个温暖的下午。我穿过杭州的街道，赶到天马的公寓，进入他那个墙上贴满诗句的小卧室。

他正在打盹，但我把他摇醒，告诉他刚刚发生的事情。他看起来陷入了沉思，但随后，他的脸上慢慢浮现出微笑。

“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他笑着说。

毛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中国。它剥夺了近二千万年轻人的未来，并夺去了超过一百万人的生命。毛逝世后，这场疯狂终于结束。政府官员们认识到，如果人民被迫持续生活在如此的苦难、贫困和混乱之中，他们将无法保住自己的权力。邓小平随后崭露头角，打败了那些坚持政治意识形态高于人民福祉的毛派追随者。在邓的领导下，新的务实政府启动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使中国在随后的几十年里

经历了重生和经济转型。

那天晚上，我带着我从印刷厂得到的难得的一美元双周工资回到家，自豪地展示给妈妈看。当爸爸回到家，他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就像是抱着一座胜利的奖杯一样。

“看这个！”他指着报纸一个角落里的一个小小的两英寸公告。当我看清上面写的内容时，我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是真的吗？”我几乎不敢置信地问道。“是的！高考要重新开始了！”

十年（1966-1976）来，全国大学入学考试一直被搁置，学生们被剥夺了任何高等教育的机会——我也在其中。现在，毛泽东已经去世，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这是一个何等悲剧的错误，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所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关闭的大学现在都即将重新开放。

我最后一次回到工厂，因为我现在有机会重返校园。我告诉我的工作站的同事们，这将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天。他们对我即将离去感到遗憾，但都送上了最诚挚的祝福。他们对我说，他们相信我注定要去做更伟大的事情。尽管我从未真正喜欢过我在那里的工作，但我的同事们一直非常友好和关心，我知道我会怀念他们。

那一天工作结束时，当我向大门走去时，我向我的同事们大声喊道：“五十年后再见！”几十年后，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我无从知晓，但我清楚的是，我终于重新拥有了希望，一种可能超越我所有想象的希望。离开那份工作的时候，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能考上大学，但至少现在我有这个机会！

那天晚上，当我们坐下来吃晚饭时，我的家人对我可能真的会上大学的消息感到无比兴奋。

“回想起来，我真希望我们当初没有让明旭退学，”妈妈说。“现在要想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就更困难了，毕竟这需要扎实的高中基础。”

天哪，妈妈说得一点都没错。在所有的兴奋之中，

我没想到的是，对于我来说，与那些没有错过过去两年高中教育的学生相比，现在想要进入大学会更加困难。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追赶如此之多的学业几乎是不可能的。妈妈刚才表达的那份遗憾淹没了我，让我感到一片茫然。这两年来，我费尽心力地寻找工作来避免被下放，而我本应该在高中学习。如果我真的去了高中，我本有很大的机会上大学，但现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等一下，我不能就从我离开的地方开始上学吗？就在九年级结束后？”我问道。我原本以为我会开始上十年级，然后照常升入高中，三年后参加大学入学考试。

“不行，明旭，你需要直接跳到十二年级，”爸爸说，“因为只有十二年级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全国大学入学考试。”

“你爸说得对，”妈妈补充说。“你必须在现在到考试之间的时间里，补完你错过的学年。”

“但考试只剩两个月了！我怎么可能做到？”我焦虑地问，“即使我能奇迹般地跳过两年半，进入十二年级，我真的有机会上大学吗？”

爸爸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缓缓开口，声音里充满了无奈。

“鉴于今年有那么多人竞争那么少的名额，十二年级的学生可能只有寥寥无几的机会。”

爸爸解释说，1977年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上大学最难的一年。十年的高考空白造成了巨大的学生积压，那一年的大学申请人数是往常的十倍。

我张大了嘴，看着我的父母，无言以对。

“这不可能！”我几乎是哭喊出来的，双手捂脸。

我已经两年多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了。我如何能在短短几个月内学完整个高中课程，然后和数百万的考生争夺仅有的几个大学名额？我的父母一定是在开玩笑。我哭了。

“我不能重新开始上十年级，然后三年后再考大学吗？”我恳求道。

“不行，我的孩子，”爸爸温柔但坚定地说。“你要明白，这里不是一个自由选择的地方。没有人能保证政府不会明年再次改变政策，或者又是十年！所以你必须把握今年的机会，因为这样的机会可能再也不会有了。”

我明白他们的担忧。他们见证了个国家因为政府的专制而经历的种种变革。他们知道我们不能指望任何长期的自由或稳定。他们不信任体制，害怕我失去上大学的机会。

我知道他们是对的。我回想起这几年来我是如何努力避免被下放的。我尝试的每一件事都以失败告终——舞蹈、二胡、医学和音乐创作。我下定决心，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只要能避免再次感受到那种深深的痛苦和失望。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感受着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掌握如此多学习内容的重压，还要在十二年级中争取到前几个百分点的成绩。

“我怎么可能完成这一切呢？”我困惑不已。“放心，交给我们吧。”爸爸对妈妈投去了一瞥。她的脸上洋溢着信心，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尽管我的父母满怀信心，但我却丝毫没有底。这可能是我唯一的机会，逃离困境，寻找未来的曙光，但现在我意识到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感觉自己的未来和家族的荣誉都压在了我的肩上。压力如山，我感到恐惧，但我别无选择，只能如中国的谚语所说，“背水一战”。我不能退缩，因为一旦退缩，我就会“落水”，所有更美好生活的希望也将随之破灭。

我父亲的一位病人正好是杭州第十一中学的副校长杨老师。爸爸联系了杨老师，恳请她帮忙。不久之后，我就回到了教室，坐在其他普通的十二年级学生之间。杨老师只告诉学校的其他领导，我是从另一所学校转来的十二年级学生。没人认识我，也没人提出任何问题。

刚开始上学没多久，杨老师把我叫到一旁，告诉

我两周后有一场重要的数学考试。我必须通过这次考试，否则我就会面临彻底的失败。如果我无法留在学校，那我也就失去了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资格。

我感到惊慌失措，全身乏力。面对紧迫的两周，我需要掌握两年半的数学知识！一如既往，父母成了我坚实的后盾。爸爸联系了他的一些病人中的教育工作者。他提出为他们及其家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以此换取他们在数学以及物理、化学、生物、中文、政治和英语等科目上对我的辅导。

教师们每周几次来到我家，对着厚厚的学习资料进行针对性的指导。我每天投入十五到十八个小时的学习，夜以继日。当我感觉大脑仿佛要融化时，我会转换科目；当眼皮沉重时，我使用冷水洗脸，继续战斗。

幸运的是，我通过了数学考试，这是我迈出的第一步胜利！但实际上，数学是我最得心应手的科目，因为我对它情有独钟。它就像物理一样，逻辑性强，符合我的思维方式。这个小小的胜利仿佛是我未来几周需要攀登的高山中的一个起点。

家人给予了我无限的支持。有一天，妈妈下班回来，怀里抱满了考卷，那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大学入学考试试卷，她从同事和朋友那里借来的。爸爸也从他的病人那里搜集到一些习题。当时由于没有复印机，他们夫妇二人晚饭后就坐在桌旁，手抄每一个问题，花费了无数个小时。

之后，我的父母开始轮流对我进行严格的测验，内容涵盖从科学到人文的所有科目。当大学入学考试的日期逐渐临近时，他们还为我举行了模拟考试，扮演着监考官和助理的角色。

“把这当作是正式的考试，”爸爸严肃地指示，“记住，除非去洗手间，否则你不能离开房间，且不能携带任何文件。准备好了吗？开始吧！”

几个小时过后，妈妈会准时进来，宣布“时间到”。尽管只是模拟，但我们都非常严肃对待，丝毫没有松懈。我深知，真正的大学入学考试将是我一生

中最为艰巨的挑战。

每当家里人都已入睡，我仍坐在我的木头书桌前，在昏暗的灯光下，继续我的夜间学习。我每晚只能睡上几个小时。我变得日渐消瘦，因为我忙于学习而没有时间吃饭，更别提充足的休息了。我虽然感到身心俱疲，但这一切都不重要。失败的念头——回到过去几年的绝望和无助——成了我前进的动力。在我的生命中，我第一次看到了一线希望之光照进了长年困扰我的黑暗牢房，因此我下定决心，要竭尽全力撬开那扇通往自由的大门。

但我也清楚，由于十年的教育空白，对于有限的新生名额的竞争将异常激烈。1977年的大学录取率仅为可怜的三到四个百分点，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低点。

全城的上千名学子们都在紧张地备考，焦虑的氛围弥漫着每个角落。我白天上学，夜晚则骑着父亲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赶往本地大学参加辅导班。那个宽敞的讲堂，和我两年前偷听的医学课的教室一样，此刻却挤满了成百上千的学生和年轻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曾下放了十年，如今正努力争取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骑车回家的路上，路上空无一人。孩子们都从街角和院子里消失了。我们居住的公寓楼内，曾经回荡着笑声和年轻人的喧嚣的走廊，现在却静悄悄的。这座城市的宁静，映射出所有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心情，对一个即将奇迹般复苏的未来的期待——这是数百万青年及其家庭的共同心声。

然而，就在我和同学们拼命复习的时候，考试的报名资格突然改变了。父母的预言成真了——在这个共产主义国家，没有什么是稳定不变的。未来几周，我必须不断适应，尝试在不稳定的环境中重新站稳脚跟。

由于中国十年来首次的大学入学考试吸引了远超预期的报名人数，官方决定必须大幅削减有资格参加考试的考生数量。在那一年，让每个报名者都参加考试是不可能的任务。我们这些高三学生——作为最年

轻的合格报名者——将承受这次削减的主要冲击。仅在大学入学考试前的几周，政府便宣布了新政策，全国的高三学生必须通过一系列严格的筛选，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进入考场。经过几轮繁重的测试，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每一轮的淘汰赛中被淘汰。

杭州大约有五十所高中，每所学校高三平均有三百名学生。然而，每所学校只有十名学生有资格进入下一轮选拔。那些幸运的五百名学生接下来必须在更大范围的竞争中一决高下，每个区只有二十名学生能晋级。最终的考核将从杭州市一万五千名应届毕业生中，只选拔出区区十名学生！

历经每一轮残酷的淘汰，我都竭尽全力挺了过去，每次过关都让我身心俱疲，却又如释重负。最终，不可思议的是，我挺过了所有关卡，荣幸地成为了从杭州市选拔出的十名学生之一，走上了大学入学考试的战场。

1977年全国考试的大日子，一个清澈的寒冷的十二月的早晨，我离开家，骑自行车去我指定的考试地点，一个当地的高中，这是杭州的几十个考试地点之一。在考试开始之前，我已经筋疲力尽，所以我甚至没有精力紧张。几个月的学习，几周测试和竞争，长时间的工作和睡眠不足都已经让我筋疲力尽。我几乎没有足够的力气蹬自行车，当我到达考试地点时，我已经处于迷茫状态——而这是一生中最关键的考试！我已经攻克了三个敌人的防线，但我几乎没有力量去进行第四场也是最后一场战斗……这是最重要的一场！

接下来的三天，从早上八点一直到下午五点，我们几百名考生在考场上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考试大战，屈身应对接踵而至的各科问题——物理、数学、化学、地理、生物、英语、中文文学、历史以及政治。考场内鸦雀无声，大家都疲惫不堪，既无法激动也难以集中精神。我感到自己处于一种麻木和半梦半醒的状态，仿佛我只是在机械性地回答着每一个问题。对于自己的表现，我也只能说是略感自信，认为自己应该还算

不错。

在测试的最后一天晚上吃晚饭时，爸爸问我做得怎么样。

“我可能做得还不错，”我无精打采地说，因为我已经筋疲力尽，准备倒下来睡几个星期。

在与其他孩子的父母交流后，得知他们许多人都对孩子的表现不抱太大希望，我的父母心情一振，家中充满了新的希望，也许这一次，我真的能够抓住上大学的机会了！我们多年的努力和付出，可能终于要得到应有的回报！

就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门外传来敲门声。那个年代，像大多数中国家庭一样，我们家没有电话，来者是谁我们无从得知，但猜测可能是众多关心的同事或朋友之一，他们想来了解我考试的情况。但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一次来的是刘医生，他负责为在附近山顶批改成千上万试卷的教育工作者提供医疗服务。刘医生宣布着：“政府又改政策了！”

我的心一沉。每次政府官员改变规则，这几乎都意味着我之前所有的努力都要付诸东流，我需要再次斗争，只为在接下来的挑战中存活。这一次又会是什么样的变故呢？刘医生解释，即将入读大学的高中生的数量将进一步剧减，现在全省五千万人口中，只有四名学生能够脱颖而出。“小明考得怎么样？”刘医生问。“他觉得自己答得还凑合，”父亲回答说，“但天呐，看来现在这样可能还不够，因为录取的名额又缩减了！”

我注意到爸爸和妈妈相视一眼，他们的脸上都写满了失望。

刘医生告别离开后，我们全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经过了那么多艰难的选拔，我以为上大学的希望触手可及，没想到我的机会似乎又在眼前破灭，大学的门似乎对我而言更加遥不可及了！

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家充满了热情和奋斗的氛围，一切都是为了那个新的希望——一个被夺走了十年的向往大学教育和更美好生活的希望。但当刘医生传来

那个坏消息的瞬间，所有的这些都烟消云散了。

再有几周就是中国新年了。除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新年曾一度被认为是封建的旧习，遭到压制之外，它一直是中国几千年来最重要的节日。这个节日期间，工厂和商业活动会全面停摆，人们会花上一个星期的时间进行庆祝。全国各地的家庭，不论贫富，都会花几天时间大扫除、购物、烹饪，为节日做准备。

我和弟弟通常都很乐意帮忙，和妈妈一起准备一些我们一年到头都期待的特别菜肴。我们最喜欢的就是粽子——一种美味的米制馅饼，里面塞满了猪肉，再用竹叶包裹成锥形，用绳子捆扎。这道菜需要耗费很长时间来准备，但在妈妈的身边，我们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开玩笑，一切都显得格外有趣。

然而今年，那份欢乐不复存在，一切准备工作都变得索然无味，甚至我们最爱的食物也失去了往日的香甜，因为我们对新年的期待已经黯然失色。那一年，我们家只是形式上过了个年。

数周悄然流逝，没有任何消息传来。在这最后也最关键的一轮中，我似乎已被淹没在人海之中。在一个有五千万人口的省份里，只有四名高中生能得以进入大学！成为那四个最优秀者之一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尤其是对于像我这样刚刚“跳级”的学生。我本应该更加关心，但我因为疲惫而昏睡了几周。

我开始设想回到出版厂，我可能又会回到每天赚取微薄薪水的日子。我想象着回去后，那些年长女性同事脸上的复杂表情——既有高兴又有失望。我的思绪渐渐回到了我青少年时期的那段黑暗时光，那种绝望感似乎又要将我重新拖入无尽的黑暗中。

然后有一天，妈妈拿着一封信冲进公寓，向我挥手。她兴奋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指着信封，我看到上面印着教育部的标志。

我从床上一跃而起。这一刻，是我一生中最为关键的时刻，充满了期待与恐惧。

我手颤抖着，缓缓地撕开信封，拿出里面的信纸。每一个汉字仿佛都在书写我的未来。“王明旭，

你已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专业是分析化学。”

我和妈妈欢声尖叫起来。我的小弟弟也咯咯地笑着，鼓掌庆祝。

我停顿了一下。“但中国科技大学在哪里？”我根本没有申请过那所学校；事实上，我甚至从未听说过它。在全国高考那天，我只填报了三所医学院作为我的志愿，包括我父母工作的那所学校，以及我两年前非法上课的那所学校。我梦想成为一名医生；这一直是我的心愿。我后来才知道，经过十年的停滞，1977年的中国大学录取制度混乱无章，大部分学生的个人选择都被置之不理。取而代之的是，顶尖大学可以优先挑选各省高分学生。

这意味着，我不仅成为了全省仅有的四名被大学录取的高中生之一，而且显然成为了中国一所顶尖学府——被誉为“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科技大学的优先录取对象。我的父母喜出望外。尽管我没有进入心仪的医学院，但我即将踏入大学的殿堂了……这是我曾以为终生都不会发生的事！

我的心情喜悦到无法自拔。新年的庆祝活动对我而言有了全新的意义。中国新年游行中著名的舞龙象征着年兽，这是一个传说中的怪兽，每年新年都会出来害人。而传说中，这个怪物最怕红色、巨大的声响和火光。我沉浸在城市那洋溢着幸福和繁荣象征的红色海洋之中。那恐怖的黑暗，曾长时间笼罩我，现在被四处绽放的烟花的光芒驱散。在中文里，“年”既是“怪物”的意思，也是“年份”的意思。我的生活中的“年兽”——那些曾吞噬我所有希望和梦想的漫长黑暗岁月——终于被击败了。

第六章 小鸟飞翔

烟花的烟雾还未消散，家人就带我前往杭州火车站，启程去上大学。出乎我的预料，等待我们的是一片混乱。近一英里长的学生和他们的亲友在车站排成长队，犹如一条巨大的黑龙。看到如此之多的人群，我感到焦虑不已。一列火车怎么可能载得下这么多人？我又如何能挤上去呢？

当火车缓缓驶入站台，车厢门一打开，那条长龙便开始蠕动。下车的人远远没有那些急于上车的人多。车门瞬间便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拼命往里挤，只为能挤上这趟火车。

我被人潮挤得透不过气来，感觉肋骨都要被压断了。

“我挤不上去！”我几乎是在向父母呐喊，呼吸都困难。

“明旭，这边！”看到我们没机会从那些拥挤的门挤进去，爸爸在几节车厢之外敲窗，说服里面的一位乘客帮忙把窗户打开，将我拉上车。父亲把我举到窗边，那位好心人把我拉进了车厢。

这位陌生人刚刚还愿意伸出援手，但当他看到我的行李也要通过窗户传进来时，立刻脸色一沉。

“我们哪儿有地方放这些东西！”他愤怒地吼道。

车厢里座无虚席，站立的空间也被挤得水泄不通，有些乘客甚至冒险坐在头顶的行李架上。我几乎找不到空间呼吸。

我急切地看着那个人。“但这是我的行李！我上大学需要它们。”

他低声抱怨了一句，然后勉为其难地帮我把行李拉进了拥挤的车厢。

随着警笛声的响起，我向我挤进来的窗户伸出手。窗户上的玻璃因人们的体温而蒸气腾腾。我向我的父母和弟弟，天马和柳辉，还有所有陪我来火车站的朋友和亲戚挥手告别。

我向父母保证，我会让他们和我的老师为我感到骄傲。“我会为王家争光的，”我说。在中国，姓总是放在名字前面，因为它意味着的不仅仅是个人。在这里，我是“王明旭”，一个王家的成员，然后才是“明旭”。如果我能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我就能给所有和我共享这个姓氏的人带来荣耀。这份责任的重量在我的心头沉甸甸的。

当我挥手告别时，我看到父母的眼中充满了泪水。辉后来告诉我，他问父亲为什么会感到悲伤，因为送孩子上大学本是每个中国父母的骄傲，这本是多么美好的时刻啊。

“因为我们意识到，他已经长大，”父亲回答，“他真的离开家了。”

看着他们愁云满面，泪眼婆娑，我心中不禁痛了一下。我会非常想念他们。我没有机会告诉他们，我有多么感激他们一直以来对我始终如一的支持和深深的爱意。他们一直坚定地相信我，始终陪伴在我身边。如果没有他们的坚持不懈，我是无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火车开始在铁轨上缓缓启动，向着北方蜿蜒前行。车轮在铁轨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我的脑海中泛起了一首旋律。这首歌曲旋律欢快，令人振奋。我挤出一些空间，掏出一支铅笔，在一张废纸上涂鸦起来。我在火车上创作的这首歌，我给它起名叫“小鸟”。我想象着一只曾被困在笼子中的麻雀，如今终于能够自由地飞向广阔的天空。

我踏入中国科技大学（USTC）的北门，正式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涯。我站在门口，让一个朋友为我拍下

了这一刻，我将这张照片寄给我的父母和所有的亲戚。经历了多年的奋斗，梦想曾显得如此遥不可及，我从未真正相信我能步入大学的门槛，因此那一刻感觉如诗如画，如梦如幻。多年来，我的教育被突然中断，面临被下放的恐惧，我无法相信我真的站在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的门前！我心中充满了感激；我终于步入了命运的舞台。

在我到达校园之前，我得知中国科技大学原本位于北京。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被迫迁至安徽省的合肥，这个地方距离首都南边有六百多英里。许多拒绝迁移的教授被起诉并被投入监狱。在那些困难岁月中，学校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而现在，我是1977级的新生，我们在1978年的春天入学，我们是全国各地精英汇集的一批，我们将帮助学校重新焕发生机。我被分配去学习分析化学，这是一门研究物质中存在的元素及其性质的学科。然而，我更倾向于学习物理，它的逻辑性更强，对我来说更有意义。在分析化学中，你可以将一瓶红色的溶液和一瓶绿色的溶液混合在一起，得到黄色的结果，这完全取决于物质的性质。对我来说，这里面的逻辑太少。我很快就改变了我的专业，转向化学物理，这是一个更偏向物理定律和概念的分支。我可以使用计算机、电路和激光等工具，而不是烧杯、燃烧器和化学溶液，来研究分子的性质或原子的结构。

激光比任何其他事物都更吸引我的想象力。这种聚焦的、统一的、单色的光束在自然界中是找不到的。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爸爸告诉我，自然光其实是光谱中所有颜色的混合。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给我展示了一个棱镜，并演示了光通过它时如何折射成不同的颜色。作为一个孩子，我发现散射的阳光可以通过放大镜聚焦，点燃纸张，让小蚂蚁四处寻找避难所。作为一个大学生，我了解到这种迷人的技术是通过刺激原子释放能量来提取和引导单色的光，这就是激光（LASER）。

在我在USTC的第一年，我了解到激光背后的物理

学可以追溯到1905年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第一台工作的激光器是在1960年建造的。到了我上大学的1978年，这种独特的光源已经在集成电路电子、航空航天、建筑甚至娱乐中开始大放异彩。我被我们被允许看的第一部美国电影《星球大战》中的激光所吸引，我被绝地武士、他们的神奇光剑，以及使用如此先进的激光武器进行星际战斗的飞船所吸引。

在我在中国科技大学的第三年，我首次在一个名为马兴孝的教授的实验室里真切地接触到了激光。马教授当时正在借助激光对气体分子的化学反应进行研究。他通过改变激光的颜色，并监测分子发出的光，从而确定了目标分子的结构和密度。当我置身于他的实验室之中，我看到绿色和黄色的光线在房间里四处飞舞，从各个角度的镜子上反射出锐利的光芒。这样的场景我从未见过。当马教授讲话的时候，他的脸庞和整个实验室都映衬着他的激光的色调。我感到了一种充满魔力和无限可能性的气氛。我深信科学和技术可以带来奇妙的变化，激光科学很快就成为了我的热情所在。

然而，在我第一个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些令人痛心和不安的消息。我的父亲到校来告诉我，他被派往非洲的马里。他没有太多的选择。他解释说，中国一直在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提供社会和经济援助，包括急需的医疗服务。最后，我的父亲将在那里待上三年，没有休假。当我母亲近十年前被下放到农村的时候，我父亲、弟弟和我还能互相依赖，但现在我家里只剩下我和弟弟明宇，我非常担心妈妈和他。

我父亲新职位的一个好处是他被允许购买一些在中国难以得到的有价值的物品。他给我寄了一个计算器和一个可以录音的小型磁带收音机。因此，我成了校园里少数拥有这样高科技设备的学生之一。那个小收音机在我学习英语，以及后来为我在美国的未来做准备的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在中国科技大学，我认识了一个比我大五岁的同

学，他叫李乐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用走私的教科书学习美式英语，现在他的英语比校园里的大多数学生还要好。乐平想找一个愿意和他一起学习和练习美式英语的人，因为我们的英语课程主要限于阅读和写作，很少有口语练习，而且主要是英式英语。

乐平对美式英语的热衷以及他对美国的强烈兴趣吸引了我，因为我对美国也充满了好奇。我最早接触美国是在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被教导说美国是一个“纸老虎”——看似强大，但实则脆弱，只要你用铅笔戳它，它就会像纸一样撕裂。我们被展示了一些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城市看起来贫穷，人们看起来不快乐，受到压迫，甚至有非洲裔美国人被毒打或被私刑处死的情况。

“这就是美国的真实面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贫穷和不幸无时无刻不在。”老师们告诉我们，“这就是生活在一个富人剥削穷人的国家的情景。但在中国，工人阶级才是真正的主人。我们过得更好。”

然而几年后，官方的态度有了改变。1972年2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与毛主席和周总理进行了一周的会谈，旨在与北京建立正常关系。在两国几十年的疏远和敌意之后，尼克松总统称他的访问为“改变世界的一周”。在尼克松访华的几个月前，我和我的小同学们接受了一项严格的教育计划，旨在让我们了解美国。官员们正在迅速为美国总统的到来做准备。我们被告知，这位总统，他曾经公开反对共产主义，现在却想要把红色中国向美国开放，这将有助于他的连任。我们被指示，如果我们遇到总统或他的随行人员，我们不应该说话，甚至不应该笑，只需要保持礼貌和正式。

我自然是未曾想过能有机会真正见到尼克松总统或其随行人员。然而，当我所在的学校歌舞团被选中在杭州西湖畔迎接尼克松总统时，我与数百名年轻人一同站在那个下午的街头。我们身穿蓝色裤子，白色衬衫，红色领带，一手握着中国国旗，一手握着美国国旗，看着尼克松总统的车队慢慢驶过。尼克松总统

和周总理并排站在一辆敞篷车里，向人群微笑并挥手致意。我几乎无法相信，我竟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见到一位美国总统！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逐渐开放了对西方书籍和电影的引进。作为中国科技大学的一名学生，我看的第一部美国电影是《未来世界》，这是一部关于成人幻想主题公园里的机器人的科幻电影。在从小就被灌输关于美国的负面形象后，我对现代美国的真实面貌感到震惊。在这部电影中，城市街道没有满是垃圾的地方，人们也不像乞丐一样瘦弱，孩子们没有穿着破烂的衣服。我开始质疑我多年来所接受的教育。也许，我对美国的了解并不全面。

跟乐平和许多其他年轻人一样，我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充满了好奇心。乐平向我推荐了“美国之音”，这是一个每晚八点播出的广播节目。得益于我父亲，我成了校园里少数拥有收音机的学生之一，所以在节目开始前的几分钟，我会走出教室，以免打扰其他正在学习的同学。其他同学也陆续从教室和自习室走出来，走到黑暗的人行道上，我们这些有收音机的人就在校园各处围成小圈子，聆听着广播员的声音：“这里是美国之音。”

每晚半个小时，我们听的节目都是专门为外国人学习美式英语设计的。其中有一个叫做“美国之音特别英语节目”，特意放慢了语速。另一个叫做“英语900句”，是一本美式英语口语教科书。我一周接一周地吸收这些课程，并录下特别英语节目，这样我就可以花几天的时间听，抄写，记忆。对我来说，学习美式英语就像吃饭一样重要，我深深被其吸引。

然而，乐平还有更多的诀窍。

“明旭，最好的学习方法是看英语电影，”他说。

“我们在哪里能找到这些电影？”我反问。乐平告诉我，电影被锁在英语系的一个储藏室里，但学校的规定限制了我们的进入。

“我们可以在非工作时间进入那个建筑，”他解释说，“没有人会知道。”

他的计划很大胆，但可能会使我们陷入麻烦。我对此保持警惕，但我对学习英语的渴望比我对被抓到的恐惧更强烈。

一天晚上，十一点的宵禁过后，灯熄灭，所有的学生都去睡觉了，乐平和我偷偷地从我们被锁住的宿舍溜出来，向英语系走去。校园一片漆黑。我想象着被抓到，被迫在其他学生的嘲笑中，用手和膝盖在食堂的地板上擦洗，我的心跳得很快。

我们攀越了一道高墙，悄然进入院子，然后通过一扇窗户潜入了英语系的大楼。乐平在白天的时候就已经熟悉了这座建筑，他故意留下了一丝窗户的缝隙，这样我们便能在夜深人静时从外面轻易地撬开它。我们互相扶持着，就像我第一次踏入大学，一个伙伴在拥挤的火车上伸出援手一样，我们艰难地通过窗户钻入了建筑。

储藏室空间巨大，里面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圆形钢盘。我们无法触及到真正的电影，只能找到音频盘。一部电影的音轨需要四五个盘。我们挑选出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名篇《尼罗河上的惨案》，将第一卷音频放到一个大如手提箱的播放器上。当我们在深夜的幽暗房间里聆听着电影，我们对我们的秘密行动被揭发的恐惧，混杂着这个让人心悸的谋杀案的紧张气氛，让我更加惴惴不安。

每周无数个夜晚，我们冒着被捕和惩处的危险，一遍又一遍地听同一部电影。我们每次都会在特定的片段暂停，反复琢磨对白，试图模仿演员们的发音和语调。每次聆听完毕，我们都会在凌晨两三点悄然溜回宿舍。虽然早课在七点半就开始，我常常上课打瞌睡，但我的英语水平却提高得惊人。

电影并非我唯一热衷的“洋货”。在文化大革命过后的时期，中国对西方的了解更加开放，我们被允许接触更多的世界文学。我发现了司汤达和亚历山大·仲马的奇妙之作，这两位19世纪的法国作家的小说让我首次接触到了宗教、精神和上帝的概念。我惊叹于基督教信仰如何深深影响了西方的伟大文明。学

校的限制让我无法更深入地探索这些想法，但它们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越是研究西方和美国，它们就越是显得像一个更高的境地，一个我可以逃避的自由之地，一个黑暗和恐怖无法找到我的地方。1981年秋，我在中国科技大学的第四学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大学发布了一个在校园里引起了轩然大波的声明：学校将派遣一小部分毕业生去美国。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消息。也许我去美国的机会终于来了！

1979年，中国与美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大学已经交换了几年的专业学者。尚未有太多的中国学生去过海外，但中国科技大学告诉我们，他们将会挑选一小部分优秀的学生出国留学，尽管被选中的人仍然需要自己获得入学资格和经济援助。

每个系都被要求提名最优秀的候选人，我有幸成为化学系选出的候选人之一。一个基于成绩和面试的严格选拔过程，将申请者的数量缩减到只有前五名。虽然我从未预料到会有机会去美国，但幸运的是，我在过去的四年里一直在努力并热情地学习美式英语。我决定说服我的面试官，我应该得到我们系一百多名学生中的五个名额之一。我阐述了我对全面探索和精通科学，特别是激光物理的渴望。我提到，美国培养出了世界上最多的诺贝尔奖得主，我承诺，如果我有幸被选中去美国学习，我会为我所在的学校和国家争光。

不久后，我得知自己被选中去见詹姆斯·麦克内斯比教授，他是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一位化学教授，即将来到中国科技大学进行访问。这次会面将帮助学校决定最终的五名将被送往美国的学生名单。除了我与尼克松总统的短暂而遥远的接触外，这将是我第一次与美国人近距离接触。在麦克内斯比教授的讲座前一晚，我翻阅了一本英语教科书，以便在他的演讲后向他提问。我必须寻找一种方式来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这样他或许能帮我获得中国科技大学的出国留学批准，甚至在他的大学获得助教职位。这可能是我唯一的机会去美国并在那里自给自足。那天晚上，我兴奋得几

乎无法入睡。

第二天，翌日，麦克内斯比教授在约一百名学生与教职员工面前发表了演讲。他显得高大，鼻子挺拔！他那浓厚的美国特征与我截然不同，是我所见过的一切之中最为独特的。演讲结束后，麦克内斯比教授询问大家是否有问题要问。当其他学生保持得正规肃静，我立刻举起了手。他示意我提问，我站起来向他提出了我前一晚精心准备的问题。

“教授，你们学校的学术负担是多少？”

麦克内斯比教授看起来很困惑。“你可以详细解释一下你的问题吗？”

“你们学校的学术负担是多少？”我再次问道。

“对不起，我依然不明白。你所说的‘学术负担’具体是指什么呢？”

我同样难以理解他，因为虽然我之前学了很多英语，但我的英语口语水平还是不够。令我窘迫的是，我突然意识到我只准备了这一个问题，但我并没有准备好如何回应麦克内斯比教授可能的答复。所以，我当时能想到的唯一应对方式就是保持微笑，并反复重复同样的问题。

“你们学校的学术负担是多少？”

更令我恐慌的是，我意识到他可能无法理解我问题的原因是，虽然我的确在前一晚拿出一本英语教科书准备问题，但那是一本英式英语教科书，而非美式的，所以“学术负担”这个表达在美国可能并没有在英国那样具体的含义！

他困惑的表情持续着。我看着我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希望正在迅速消散，我准备接受失败，就此坐下。

“啊，你是问‘获得博士学位需要修多少学时’吗？”

麦克内斯比教授终于理解了我的问题，并给出了答案。尽管我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回答，但我实现了我的目标；我成功的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正如我所期待的，教授的确对我印象深刻，也许并不是因为我基础的英语，而是因为我在一次又一次向他

提问。

在他离开讲台之前，麦克内斯比教授指着我说，“我希望在美国见到那个小伙子。”

虽然我没有完全理解他的话，但看到他微笑，我知道我已经达到了我的目标。他会帮助我去美国！

麦克内斯比教授以他在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化学系主任的身份，为我打开了通往美国求学的大门，为我和我的同学周建新以及戴际宏提供了助教的岗位，他们同我一样，是我们系被选派出国深造的五名学生之一。在那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我手中已经握有了马里兰大学的正式录取通知书和我的美国学生签证。麦克内斯比教授还慷慨地借给我五十美元，亲朋好友们则帮我凑足了买一张单程飞往美国的机票的钱。

就在我正在福建探望祖父母的时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副校长打来电话，确认所有的手续都已经办妥。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父母、阿姨和叔叔们都围着我欢呼雀跃，“小明旭要去美国了！”我向他们保证，在美国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中国，为我们王家的荣誉而努力。看着他们满脸的骄傲，我知道我已经离我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我将要去美国了。回顾我此前的生涯，我感到惊奇：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幸存下来，我在中国历史上最难入学的一年进入了大学，现在，我即将有机会去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我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看着我家人脸上的喜悦，我知道这要感谢他们的爱和支持。我的父母一直致力于我们这些孩子的教育，他们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激发我们的学习欲望。他们无尽的鼓励支撑我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尽管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了折磨，但是我始终坚持不懈，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我才能变得更强，才能真正理解并珍惜教育和自由的价值。我意识到，是我内心的决心和我父母的不懈鼓励帮助我战胜了那些巨大的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将看到这种教养如何塑造我的性格，影响我在美国的生活。

1982年1月，我和家人在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新

年。2月初的一个清晨，一群亲朋好友陪我启程，开始了我人生中新的旅程。我坐在一个同学的自行车后座上，行李挂在两边，我的父母、亲戚和朋友们骑着自行车陪我们穿过杭州的街道，前往火车站。

我的父亲陪我乘火车去上海，我将在那里乘飞机出国。他和我紧紧地挤在拥挤的火车车厢里。我知道他为了陪我走这一程，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感动地看着他，心中充满了感激。

“你不必陪我走这么远，”我说。

“我知道，”他回答，“但是我想看你登上那架飞往美国的飞机。”

第二天在上海国际机场，我仰望着那架巨大的波音747，它是中国民航局的一部分。当我走上飞机的时候，我转过头，希望能在人群中找到我的父亲，向他挥手告别。但是，他们离得太远，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脸。我朝人群的方向挥了挥手，希望我的父亲能看到并回应我。当我感到失望地将手放下时，我看到有一个人也放下了手。我再次举起手，他也举起了手。我再次放下手，他也放下了手。我再次挥手，他回应了我的挥手。我明白那个人就是我父亲。虽然我无法在人群中找到他，但他却能在人群中找到我，他用这种方式让我知道他一直在注视着我。

我带着满心的兴奋和期待，踏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我哼着“小鸟”的旋律。在瞬息之间，我将飞向开阔的天空，开始我生活的全新篇章，生活在美国合众国。

第三部分 在美国的生活

第七章 三剑客

当飞机缓缓降落在旧金山机场的领空，我将额头紧贴在椭圆形的窗户上。深蓝色的太平洋在我下方展开，伸向远方，直至消失在淡淡的雾气之中。北加利福尼亚郁郁葱葱的丘陵延绵开去，形成一片广袤的绿色土地。我生平未曾见过如此绚丽的绿色，也未曾见过如此繁忙的车流！我瞪大眼睛看着数以千计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穿梭，我心中充满了激动，我即将踏上美国这片梦寐以求的土地。耳机中传来柴科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为我眼前的景色赋予了动人的乐章。如果说我对新生活的所有希望和梦想能够凝聚成实体，那么在我下方闪烁的海洋，也无法容纳它们的全部。

我们的航班从上海飞往旧金山，再飞往纽约，最后抵达我们的目的地。1982年2月3日，这个星期三，我与我的中国科技大学同学建新和际宏一同抵达华盛顿特区。这一天，将在我一生中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那时，我21岁。我所有的财产都随我而来，包括两个装满衣物的行李箱，一本破旧的中英文词典，以及五十美元的现金。

我们在机场叫了一辆出租车，心情既激动又疲惫。从华盛顿国家机场到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路途中，我们跨过了波托马克河，穿越了首都的郊区。我们三人紧挨着坐在后座上，互相用肘子顶着，指向窗外像托马斯·杰斐逊纪念碑那样金碧辉煌的圆顶，以及直插云霄的华盛顿纪念碑。

出租车司机是一位非洲移民。我好奇另一个移民

的生活，于是问他在美国驾驶是否困难。

“不，这里更容易，”他回答说，“因为这里的道路都有线和车道。”

这是真的。在中国，道路并没有像美国这样规整的白线或黄线划分，行车在中国的道路上，几乎就是一片混乱！我无法相信这座城市的整洁有序，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人行道清晰明了，街道上没有散落的树叶或垃圾。我甚至有种想在草地上翻滚的冲动。我在中国看到的美国的图片，与我从出租车窗户看到的现实之间的差距让我疑惑不解。我并没有看到被描绘的那种普遍的贫困和痛苦的美国。真正的美国，并不是我被告知的那个阴暗和不愉快的地方。我意识到我以前被灌输的观念现在都是有待商榷的。从此，我必须自己去寻找真相。

建新、际宏和我一样，对于新环境的惊讶之情溢于言表。那从机场到校园的十五英里的路程中，我们对周围环境的新奇感觉始终没有消减。当我们在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放下我们的行李时，我看着那些轻轻起伏的地面和那些优雅的红砖乔治亚建筑，这些建筑的入口都是庄重的白色柱子。虽然冬天使草坪和天空显得有些暗淡，树木也失去了叶子，但我仍然被我们的新学校那令人敬畏的美景深深吸引。建新、际宏和我提着我们的行李，向着化学楼走去，边走边用我们生硬的英语问路。每次当我们接近某人时，那些学生或者教员都会停下脚步，用耐心的态度反复解释给我们听，直到我们真正明白了去向。美国人对陌生人的同情和礼貌让我感到震惊。这种开放的态度在我家乡是如此的陌生，而我却被它所打动。

当我们最后走进那个大型的、方正的、砖砌的建筑群时，工作人员和教师们陆续离开，准备回家。我们走进去，向系秘书自我介绍，她告诉我们她叫Marsha。她是一位令人喜爱的女士，三十多岁，浓妆艳抹——我在中国从未见过女士们化这么浓的妆，她的眼睛在厚厚的金框眼镜后面闪闪发亮。

“欢迎！很高兴你们安全到达，”Marsha说，

“你们现在可以回家休息一天，我们星期五再见。”

她的口音对我来说十分新奇。我从未听过有人这样说英语。我盯着她脸上那一头流动的红发看。这种发色我也是头一回见。

“但是我们的家在哪里？”我问，“我们应该住在哪里？”

她皱起眉头，疑惑地看着我。“你们实际上需要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但我可以推荐一个酒店，并给你们一份附近公寓的名单。”

我们感谢了她，然后走出了门。“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际宏问。

我们并没有足够的钱住酒店。我们刚刚花了五十多美元坐出租车从机场过来。我们习惯于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原本以为我们的住房已经提前安排好，由大学负责分配。我们并没有准备好面对这种新的独立性和随之而来的责任。

我感到一种奇怪的、不熟悉的感觉，这是自由的第一次尝试。在那一刻之前，我的整个生活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而现在我已经来到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这种全新的独立感觉让我耳目一新，但也让我有些不安。我们该住在哪里呢？

建新掏出了一位名叫蔡老师的访问学者的电话号码，他也是从中国科技大学来的。我们很庆幸能很快联系上蔡老师，他慷慨地允许我们在他的公寓里住几晚，同时我们也在思考接下来的计划。

后来我和麦克内斯比教授交谈，他向我解释说，研究生需要自我管理。“你看到的，”他说，“我们的社会是整洁且文明的，同时也是高度个人主义的。你得学会自力更生。在这里，每个人都需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安顿好与蔡老师同住之后，我转向建新和际宏问道，“你们饿了吗？”

“我们去找些东西吃吧，”建新提议。

我们在校园周围寻找中国餐馆，但步行范围内并无此处。由于我们没有车，我们选择了一个近而价廉

的地方，一个我们这些贫困的学生能负担得起的地方。因此，我们在美国的第一餐，就是在校园边缘的麦当劳解决的。我饿得几乎能吃下一头牛。我点了四个巨无霸，但立刻意识到我不可能吃完它们。中国的饮食基本上不含乳制品，而我即将面临的，则是涂满蛋黄酱的双层芝士汉堡！

我预见到了最糟糕的情况……但我竟然喜欢上了它，真的！我疯狂地迷恋上了它，以至于我几乎每天都去麦当劳用餐，仅仅三个月，我就增重了三十磅。

到了周五，建新、际宏和我穿上了我们最好的衣服。我们希望在化学系的新同学和教授面前留下良好的印象。我的父母花了他们三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了一套漂亮的三件套西装，黑色的，搭配着白色的衬衫和红色的领带。我们三个人穿着全套的正装走进校园……立刻就感到格格不入。

所有其他的学生和教授都穿着非常休闲的衣服，像蓝色牛仔裤，T恤，和Polo衫。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穿着短裤和凉鞋。当我们走过的时候，人们都转头来看我们。我们可能穷的一无所有，但我们肯定是穿得最好的。我的脸因为尴尬而发热。我只带了两套休闲衬衫和裤子。我们必须尽快去购物。

一旦我们到达化学系，我向Marsha询问，“你能借给我们一些钱吗？我们需要买一些食物和衣服。”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会相信站在她面前穿着华丽的三件套西装的我们。

“你的第一份工资将在两周后发放，”她说。
“所以，现在没有钱？”我问。

她给了我一个奇怪的表情。

我再次意识到我们在美国是独立的。我曾渴望独立，但现在我真的拥有了，我感到有点迷失。在中国的大学里，我多年来一直依赖国家的支持系统。在美国完全自由和独立需要很多的适应。

在我们的研究生学习期间，建新、际宏和我做助教来支持自己。我们还没有被分配到隔间，所以我们在第一天就在系主任的会议室里露宿。我的眼睛因为

持续的时差反应而感到沉重，所以我靠在会议室的桌子上，用手撑起头，以免打瞌睡。但当Marsha走进房间，宣布我们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测试时，我立刻坐直了身子。这是我见到她以来的第一次，她不是坐在她的桌子后面，就是站在她的桌子后面。她穿的鞋跟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高的。

“这些都是专业知识测试，”她解释道，“将决定你们将参加哪个级别的研究生课程。”

我看着她在会议桌周围走动，惊叹于她能在那么高且接触地面的点如此微小的高跟鞋上，以如此优雅、毫不费力的平衡走动。

我们在那个会议室里度过了接下来的六个小时。我们在中国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学习为我们科学方面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而我的英文写作现在已经足够好，能够理解并回答问题，而不会遇到太多困难。这些测试涵盖了几个科目，包括分析化学、物理化学、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

Marsha会定期查看我们的情况。大约在下午五点钟，她最后一次回来收走我们的试卷，“你们准备好品尝披萨了吗？”她问。

我们跟随她走向走廊下的一个小派对。我对披萨一无所知，但我饿得肚子咕咕叫，对任何食物都充满了期待。当我再次面对一种陌生的食物时，我不禁皱起眉头。我不解地望着桌子上的那种面团，上面乱糟糟地堆满了肉和蔬菜，然后就这样直接烘烤了？这种做法看起来如此粗糙，甚至有些粗鄙。这些美味的配料如果交给中国的厨师，他们可以做出许多种口味的美食。然而，最后我还是爱上了这种食物。在披萨派对上，我得知Marsha其实是爱尔兰裔。又一个移民！这就解释了她的英语口语为何如此独特。当我向派对上的其他人介绍自己时，我发现他们在发“xu”这个音时困难重重，所以我决定放弃这个发音，让大家可以轻松地叫我，于是我取了一个新的美国名字——“明”。

几天后，我们的考试成绩在走廊的公告板上公布。

当我看到结果时，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分析化学：93，物理化学：91，有机化学：100，无机化学：72。这些专业知识测试本不应该容易，一般的分数是一百分之五十。我们三个人在有机化学测试中都得了满分。我们后来得知，我们的分数是过去二十年来该系研究生中的最高分。

我们的高分消息很快传遍了化学系……甚至马里兰大学。回到中国，全国各地的报纸都以大字标题宣称，“三名中国学生震惊美国大学”。我想象着我在家的家人读报纸，我很高兴知道我为王家的名字在全球范围内增添了光彩。我希望所有那些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帮助我通过几乎不可能的大学入学考试的老师也能看到这些头条。他们会为他们非凡努力的结果感到无比的自豪。而这么高的分数不仅仅是关于我；他们向世界证明，中国正在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崛起，将其学生置于世界最优秀的人群之中。我感到整个国家的自豪和感激在我身体中涌动。

“我们去庆祝吧！”我向建新和际宏提议。“去哪里？”他们问。“还有哪里？麦当劳！”

* * *

在我们到达帕克校区的第一个周末，我们开始寻找接下来几个月的住处。在Marsha给我们的公寓列表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名字“Knox Boxes”。我想象着学生们实际上住在盒子里，想知道这些盒子有多大。实际上，校园附近的街区充满了在Knox Road街上的小砖砌双拼房。我们最后在附近的一栋房子的地下室租了一个没有窗户的单间公寓，每月大约一百美元，我们三个人平分。

这个公寓对我们来说大小正好。在中国的大学宿舍里，每个单元都挤满了十三个学生，所以一个只有两个人的房间对我们来说感觉很宽敞。我们和住在相邻房间的一对夫妇共用地下室的浴室，当我们想做饭时，我们必须向楼上的租户请求使用他们的厨房。但总的来说，我们感觉就像在家一样。

“我们该如何配备家居？”其中一人问道。

在我们沿着Knox Road漫步的过程中，一个装满了别的学生丢弃物品的垃圾箱映入眼帘。几个双人床垫就堆砌在金属垃圾箱旁边。我们挑选了其中三个相对较好的带回了我们的房间。再加上找来的几把椅子和一卷用过的地毯，我们的家就准备就绪了。

在我们的狭小空间里，建新、际宏和我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我们形影不离。一位来访的中国学者洪静怡女士，她是世界文学的专家，她称我们为“三剑客”。

“就像大仲马的小说里那样！”我对她的评价回应道，想起我在中国科技大学读过的文学。

这个称号恰如其分，十分贴切。我们在外国的头两年里，我们三人的友情越发深厚。建新比我大三岁，他是我们三人中最为明智、最有策略的人。一旦我们有了冲突，建新就是那个能以冷静、逻辑的方式解决问题的人。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流放到中国西部的一个贫穷地区，这段经历赋予他艰辛而来的成熟。际宏和我同岁，他天生聪慧，是我们三人中的学术明星。而我独特的品质在于我的全面发展。我有着最多样的兴趣，总是能想出有趣的事情让我们一起做。

在我们第一次发工资的前两周，我们尽可能地节省每一分钱。我就反复穿着同样的两三套衣服。由于没有洗衣机或烘干机，我只能在浴室的洗手池里用手洗我的衬衫和裤子。我试图在我们的门外搭一条晾衣绳——一个像我父亲在杭州窗户里搭的那样的设施——但是房东笑了起来，说，“那是不可能的。”在我们工作的两周后，我收到了我的第一份工资，198美元，相当于中国的大约1600元。我开心极了，我无以言表。在短短两周内，我赚了和我父母一年多的工资一样多的钱。然而，虽然在中国这是一大笔钱，但它不足以支付我在美国的生活费用，这比在中国要高得多。因此我不得不做一些零工，比如辅导本科生，清理教授的房子，以及在汉堡王（Burger King）做夜班和在当地的最佳西方酒店（Best Western Hotel）

做周末班，每小时3.35美元。除了支付我的账单，我还必须存够钱购买中国政府允许海外研究生购买并免税带回国的八种高价商品。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努力工作，以便为我的家人购买这些物品。

一旦我们拿到了我们的第一份工资，建新、际宏和我立刻出去购物。我为购买衣服预留了五十美元的预算，但当我们到达救世军商店（Salvation Army Store）时，我发现我其实并不需要这么多。我只花了十五美元就带回了两大袋各种各样的旧衣服。

然而这次，我们比我们穿着三件套西装出现的那天更引人注目。显然，我们在旧货店购买的所有衣服都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风格——喇叭裤、鲜艳的衬衫、迷幻的图案。所以，我们一夜之间从雅皮士变成了嬉皮士。这让我们化学系的同事们拍案叫绝。他们觉得我们的正装打扮很古怪，但现在我们已经完全走上复古路线了。

作为一名助教，我职责之一就是每周两次为本科生主持晚间复习课。在这些课程中，我不仅要回顾教授所讲授的内容，更要确保学生们已经深入理解了相关概念，并助他们完成家庭作业难题。这些复习课并非必修，但由于实在是太有帮助，大多数学生都会选择参加。至少，我是这么被告知的。

在我首次主持复习课的前夕，我熬夜温习，一心想要做到最好。由于我的英语水平有限，我选择将整个两小时课程中需要讲述的内容一字一句地写下来，然后在课前的夜晚背诵。

第二天，我带着充分的准备和满腹期待走进教室，准备主持我的第一堂复习课。由于我这门课有一百二十多名学生，所以我预料会有许多人来参加。然而，当我踏进教室的那一刻，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当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时，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眼前的景象。整个礼堂只有两个人来了……是的，只有两个！

当时，我、建新和际宏是最早从中国大陆来到这里的交换学生，因此我们在校园里就像异类一样引人

瞩目。我们身着土气的衣服，口音重的初级英语让人捧腹。在学校的最初几周，我们三人被视为三个笨蛋，而不是所谓的“三剑客”。看来，这个名声已经在本科生中传开，他们听说新来的助教是个“中国佬”，口音难懂，所以纷纷选择不来上我的课。

那些人未能出席，让我感到自惭形秽。我对此感到失望，因为我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然而，我压制住了自己的不安，开始教起课来。那两个勇敢的学生，对于能得到个性化的辅导，他们感到无比高兴。

这次尴尬的经历激发了我做得更好的决心，我要成为一名更优秀的助教，并尽快提高我的英语水平。对我来说，大学提供的一个学期的英语课程进度太慢，为了在这个国家生活和交流，我需要更快速地掌握语言。于是，我采取了我和乐平在中国科技大学时的策略。我在华盛顿大道附近的乔治城区找到了一个破旧的电影院，叫做传记剧院，那里只需一美元就可以看两部电影。我每周至少去那里一次，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去，尽管偶尔我也会邀请其他两位“剑客”同行。我在那里看了许多经典的美国电影，如《飘》、《教父》、《热情如火》、《日瓦戈医生》、《码头风云》和《蒂凡尼的早餐》。

电影不仅帮助我提高了英语水平，也让我对美国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我最喜欢的电影是《生活多美好》。影片中，主角乔治·贝利面临重重困难，几乎要放弃生活，他的守护天使向他展示了，无论他的生活多么艰难，其实都对许多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我，它展现了我对美国文化的深刻理解。总的来说，美国人对生活充满了无限的积极态度。我想找到同样的自由和信心，我渴望让我的生活有意义。

我记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我对未来失去所有希望时，父亲曾对我说：“明旭，你必须始终保持希望。”在中国经历的所有那些年的剥夺和压抑，让我培养出一种战斗精神和对我所做的任何事情的关注。我深知在美国生活和学习的机会有多么宝贵，我知道

我必须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成功。我不能让那些未出席的人让我沮丧，但我很快就会发现，学生们并不是唯一看我不同的人。在这个新国家被接受和尊重是我永远不能掉以轻心的事情。我将被迫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

第八章 黄点

考试成绩揭晓后不久，我们三人——我、建新和际宏——成了化学系的热议焦点。麦克内斯比教授对我们的表现赞赏有加。那周稍后，在一个系部会议上，他向凑在讲堂里的大约一百名学生和教员们表示：“我们三位来自中国的优秀学生，他们为大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笑眯眯地在讲台上说道。

然而，我的指导教师却不这么看。“你只是运气好。”他叫杰瑞·米勒，是我研究生课程的指导教师。高大魁梧、面无表情的他，似乎不相信像我这样的少数族裔学生能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取得成功。我们初次见面时，他对我的成绩的淡漠回应，就清楚地透露出这个观点。他并不是我遭受的唯一一个对我带有偏见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因为我是少数族裔而排斥我的人。

然而，我对学术指导教师的这种偏见感到十分震惊。在美国，我以为我找到了在中国一直无法找到的公平与平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出身于一个医生和知识分子的家庭，我们被共产党视为“臭老九”，是社会秩序中的最底层。然而，我以为在美国会是不同的；我应该因为我的知识和教育而受到尊重。我无法理解米勒教授为什么仅仅因为我是少数族裔就对我如此轻蔑。我意识到，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生活也并非总是公平。

另一方面，许多其他教授非常高兴我们的学术成就，并争先恐后地希望成为我们的论文指导老师，希望我们能加入他们的研究团队。我至少和四位不同的

教授一起出去吃过饭，其中包括麦克内斯比博士，他在他的家中请我们三人吃过晚饭。而唯一一位邀请我到他家吃晚饭的是约翰·韦纳教授。

约翰·韦纳教授当时还不到四十岁，却已在化学和物理中的激光应用领域有着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一头深色卷发，眼神炯炯有神。他极具好奇心，专注而坚决。尽管我十分感激麦克内斯比教授帮我来到美国，但我对激光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对韦纳教授和他的研究深感吸引。

韦纳教授和他的妻子丹尼斯住在一个装饰着欧洲艺术复制品的优雅住所。丹尼斯是法国人，这对夫妇在国外生活了很长时间。他们活泼开朗，总是笑声不断，使我在他们面前感到自在。一顿丰盛的自制千层面餐后，韦纳教授邀我到客厅下一局国际象棋。他开始在棋盘的一边摆放红色的棋子，而我则拿到了黑色的棋子。我开玩笑说我们应该调换颜色，因为我来自红色的中国，他笑了起来。

“你可以挑选任何你感兴趣的主题来写你的论文。”他一边说着，一边熟练地在棋盘上移动着棋子。他身子前倾，手肘撑在膝盖上。“你为什么对激光这么感兴趣？”我向他讲述了在中国科技大学马教授的激光实验室以及在电影院看《星球大战》时的激动心情，我还告诉他我想将自己的人生奉献给这个令人兴奋的新兴科技。

“你准备好真正玩《星球大战》了吗？”他问。

“是的，绝对的。这就是我一直想做的。”我深信激光会改变世界。利用激光，我们可以更好地确定太空船、卫星所使用的最安全、最稳固的材料，以及电子和计算机部件的最佳元素。激光终会被视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虽然我当时能想象到许多激动人心的可能性，但我并未预见到激光会如何深刻地影响我的职业生涯和生活。

“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韦纳博士说，“我们将一起创造伟大的事业。”在马里兰大学的早期岁月，我主要的时间都在研究生课程或我担任助教的本

科课程中度过。我在学校、兼职工作和偶尔的实验室实验之间做着调度。尽管我非常忙碌，但我仍然找到时间去追求我最喜欢的爱好，比如弹钢琴、跳芭蕾和乒乓球。我结交了许多新朋友，甚至还第一次坠入了爱河。

她的名字叫陈淑。我们在我在马里兰的第二年底的一个圣诞派对上相遇，然后我们就聊了整个晚上。我发现她的家人在她上初中时从台湾移民到美国。她热爱科学，计划在完成本科学习后去医学院。我告诉她我的家庭有好几代都是医生，还有我在中国非法旁听的医学课程的事。她的个性可爱、活泼、聪明，我和她在一起感觉非常自在。

我们的第一次相遇不久后，陈淑和我开始了约会。在周末，她经常陪我去乔治城的破旧的电影院看电影。我是李小龙的大粉丝，所以我们一起看了很多老式的功夫电影。我小时候从未有过女性朋友，所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有了女朋友，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的关系蓬勃发展，等我们完成学业的时候，陈淑和我已经订婚了。我当时并未意识到，因为我们都还太年轻，无法理解在艰苦的职业和健康的婚姻之间找到平衡，我们的关系将会遭遇到困难的时期。

在学校成功对我和许多其他在美国大学努力证明自己的少数族裔学生来说至关重要。无论我在课程中得了多少个A，米勒教授都从未对我表示过支持或欣喜，但当我在一门难度极高的物理化学课程中得了B时，他问：“你确定要继续吗？你能应对剩下的课程吗？”当我需要构想博士论文的时候，米勒教授怀疑我能否构建和答辩论文开题报告，或进行实验。我无法理解他为何始终固执地看重我的种族，而对我的实际能力视而不见。

米勒对中国人的看法充满了对我们两国文化之间一个世纪的恐惧和误解。他所知道的唯一的中国移民，并不是访问学者或有能力的学生，而是那些最初从广东省来到美国的数十万贫穷的移民。这些人是为了淘金热而来，然后留下来建设横贯大陆的铁路，开设像

洗衣店和餐馆这样的生意，并且经历了几十年的极端的合法化的歧视。在米勒教授眼中，我并非以我自己的身份站在他面前；在他的心中，显然，我只是十九世纪初从广东省来到美国的众多贫穷移民之一。我无尽的挫败感在于，我无论做出多么出色的工作，都无法改变他的看法。

幸运的是，与米勒博士的偏见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大部分教职员工对所有种族的学生都怀着开放和支持的心态。让米勒教授失望的是，我成功地为我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进行了答辩，并在研究生课程的后半期开始了与韦纳博士的合作研究。完成基础课程后，我在韦纳博士的激光实验室里度过了更多的时光。

实验室是一个阔大的房间，厚实的混凝土墙和深棕色防腐瓷砖地板让人感到坚固而沉稳。房间的一侧设有窗户，但窗帘一直保持紧闭，不过房间内并不昏暗，因为各种激光束从不同角度反射镜子，为其带来光线。实验室的主要设备是一个不锈钢制成的气室，其规模庞大，与国王床的大小相当，高度达到胸口，设有玻璃窗板让我们可以观察到室内的情况。

韦纳的研究团队由我和另外两个研究生约翰·凯勒和雷吉娜·博纳诺，以及一个名叫马塔尼亚·德弗里斯的博士后组成。我们在这个巨大的激光设备中研究原子碰撞的相互作用。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创造最有利的环境，让一个原子与另一个原子结合。就像两个氢原子与一个氧原子结合可以产生水分子一样，结合成分子的原子创造了世界上的许多物质。我们选择钠原子作为实验模型，试图制造由两个钠原子结合在一起的二聚体。我们把自己比作“分子媒人”，因为我们正在探索孤独的原子在空间中的旅行，以及如何创造一个环境，吸引这些单身者相互结合，安定下来，形成更稳定的分子对。

如果说我们是分子的媒人，那么进行这些实验就如同举办一个原子的单身派对。我们将一块钠插入金属筒中，然后用绕在筒子周围的电线加热它们。随着

温度的升高，钠会蒸发成原子并开始迅速移动，直到它们从筒子一端的小孔喷射出来，进入一个大的反应室。这些原子的预定伴侣则从一个以90度角定向的第二个筒子中射入同一个室内。激光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能够增加单个原子对另一个原子的接受度。就像是让两个紧张的人放松，打开自己的怀抱。黄色激光的作用就是帮助孤独的钠原子“打开它们的怀抱”，使其更容易接纳另一个原子，这样他们就有机会成为一对钠原子。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以各种方式举办这些原子的单身派对，尝试看看每次的努力是否能够促成一对的结合。当新形成的一对发出特有的黄色光线时，我们就知道我们成功了。

每周的很多个晚上，我都在实验室里启动原子束，设置电磁组件，并启动激光。一旦一切准备就绪，实验的其余部分就在黑暗中进行。唯一的光源来自于穿越房间的激光，从一个镜子反射到另一个镜子。激光光束会脉动，发出嗒嗒嗒的声音，就像水滴不断滴落。我就像一个幽灵在黑暗中，盘旋在机器旁直到凌晨两三点，被那重复的节奏折磨。我记得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在工厂包装书籍时也经历过类似的节奏，但不同的是，那时我因为对未来没有希望而感到悲伤，但现在我却因为有更大、更激动人心的目标而感到快乐。这是一个漫长、乏味、常常令人沮丧的过程，但回想起来，我的东方教养和工作道德帮助我坚持下来。韦纳博士对我的努力感到满意。在他家举行的一次师生聚会上，他向同事们讲述了我在任务中经常表现出的勤奋和创造力。然而，我的指导教师米勒教授再次对我毫不留情。当他听到韦纳教授对我赞美的话时，他转过身来问：“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在做什么？”

“他们在做餐馆生意。”另一位教授回答。

“对啊，”米勒说，“韦纳只是找了个中国厨子帮他煮煮饭罢了。”

我讶然地看着他。一阵尴尬的沉默笼罩住了整个

群体，然后米勒教授开始独自地为自己的笑话捧腹大笑。

不论我表现得如何优秀，无论是测验的创纪录分数，还是精准至微的原子实验，米勒始终不肯承认我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价值。在他的眼里，我只是韦纳博士厨房里的一个帮厨。我看着韦纳博士的背影，看着窗户边的米勒。我忍受了他多年的轻蔑和侮辱，突然间，我有了一种冲动，想要像李小龙在他的电影里那样，狠狠地打他一顿。尽管米勒比我高大得多，但我还是想象着自己跳起，猛然一脚踹在他的下巴上，让他的身体破窗而出，落地发出一声巨响。我不愿像中国的红卫兵那样，攻击和侮辱他们的老师，于是我忍住了愤怒，硬生生地挤出一个微笑。

米勒教授对我的连环歧视，反而激励我更加坚定地追求成功。一个深夜，我们的研究团队已经工作了几个小时，当我们准备结束一天的工作时，却发现外面的温度在持续下降，电台里正在播报即将来临的冻雨天气。我们担心在天气变得更糟之前赶不回家。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调整筒子周围的电流，重新调整激光光线，但毫无进展。在关闭整个设备之前，我决定将电流提高到其极限，再试一次。

“明，小心点。”我的实验室伙伴约翰警告我，“如果你把它调得太高，线圈可能会熔化，然后我们就得花几个月的时间重建这台机器。”

我点点头，心里忐忑不安。我怕我会毁掉我们的整个项目，但我还是决定增加热量。我只是不想轻易放弃，因为我希望在更高的温度下，原子可能会飞得更快，我们形成原子配对的机会可能会增加。当电流增大，我感觉到线圈开始发热，发出嘶嘶的声音。我的胃在颤抖，呼吸短促。我知道我不能让机器这么高温运行太久，因为线圈可能在几分钟内就会熔化。

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竭尽全力，已经达到了我的能力极限。我感到无助，我渴望得到比我自己更大的力量的帮助。除了我在中国读过的世界文学，我对宗教和精神并没有太多的接触。信仰的概念对我来说

还是非常陌生，但在那一刻，我想如果宇宙中真的有一个上帝，这肯定是他出现的时候。

我凝视着反应室的窗户，低声说：“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请来帮助我们！”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当我再次透过玻璃看时，我看到了我从未见过的东西。在气室的中央，一个明亮的黄点正在发光。

“看那里！”我喊道。当约翰赶过来看时，我从实验室跑出去，直接跑到韦纳博士的办公室报告这个消息。他正准备回家，但他把包扔在地上，赶在我前面回到实验室。他俯身看到反应室中央的明亮黄点，我们第一次成功的原子配对。然后他跪下来，躺在地板上，手脚张开，大声唱歌。

我看着我尊敬的教授躺在地板上，像圣诞节的孩子一样快乐，我笑了。终于，在原子的欢快舞动中，一个钠二聚体诞生了，发出了光芒……我们也一样。历经两年的艰苦努力，我们终于让原子对撞机运转起来。我们不仅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机器顶部的探测器也证实了这个结果。我心中充满了敬畏，不仅因为实验终于取得了成功，更因为我感觉好像经历了某种超自然的事情。但我是一个科学家，科学的思维方式中并无超自然的容身之处。然而，我无法否认那种压倒一切的感觉，也许上帝真的存在，他听到了我的简单祈祷，在那个黄色的、明亮的光点中显现出来。我开始想象，这个上帝可能是真实的、强大的、无限的，从宇宙的壮丽到亚原子粒子的微小。

在回家的路上，我为着马路上空无一人的路况而感恩。我驾驶着我和室友买的一辆旧车，一辆1973年生产的白色AMC Matador，这车大得我们都给她起了个昵称——“M1”，就像美国军队的大型战斗车一样。M1的性格颇为古怪，每十分钟就会熄一次火。但那天晚上，我并不在意M1的咳嗽、颤抖和喷嚏。实际上，她似乎也在和我一起欢庆！我激动得在冰冻的挡风玻璃前狂呼乱叫，同时在冰雨中高歌。M1和我就在滑溜溜的街道上欢快地摇摆，蜿蜒着回家。

第二天，我们的团队记录下了这个分子奇迹的细节，并对机器进行了改良，使其能在更高电流水平下安全运行。现在我们已经制造出了一个最先进的对撞机，我在博士课程的剩余时间里将实验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我们仍需确定原子配对的最佳速度。如果原子相对移动得太慢，它们就无法靠得足够近，以形成键合；但如果它们移动得太快，那么它们就会直接飞过彼此。最后，我精心调整了一种新技术，利用多普勒效应来测量形成新的原子配对的理想速度和方向，这是一个将移动物体的速度和它所感知的光的颜色联系起来的物理原理。我成为了韦纳实验室团队在权威物理期刊《物理评论A》上发表的一系列创新性文章的第一作者。我们的工作被诸如李远哲、朱棣文和威廉·D·菲利普斯这样的科学家引用，他们都因为进行了与我们类似但更精细的原子束实验，而赢得了化学和物理学的诺贝尔奖。我在《物理评论A》上的每一篇论文都成为了我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我大约用了四年半的时间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但我又以博士后研究员的身份在实验室多待了一年，以便继续我们团队的研究。

当我研究生生涯即将结束时，我开始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看着淑准备进入医学院的过程，重新点燃了我儿时的医生梦。我记得自己还是个少年时，站在杭州医学生的圈子里，看着父亲在医院带领查房。那时的我充满了自豪和希望，而在美国的岁月则帮助我找到了我一直渴望的自由和自信。也许现在我终于可以去追求那个我一直有的，但曾经认为永远失去的那个美好的梦想。

正如我在团队实验中的钠原子对，我也与某人建立了深厚的联系，计划安定下来。在淑离开去西弗吉尼亚医学院之前，我们已经结婚了。我或许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分子调控者，但实验室中的工作方式在生活中并不适用。淑和我最终发现，我们的婚姻并未如我们预期的那样稳定。多年来，我们在不同的州生活、学习和工作。这种距离最终成为了我们的破裂点，因

为我们的职业道路推动我们走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轨道。

第九章 白宫之行

“王明先生？这里是美国总统的行政办公室。”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说。“我们希望与您商议安排您访问白宫，与总统见面的事宜。”

我不敢肯定我是否听错了。那是1984年的春季，距离罗纳德·里根总统正式访华的日子还有几周。他的团队告诉我，总统希望在他的这次行程之前能见到几位从中国精心挑选出来的学生。

“我能邀请多少学生？”我询问道。“最多七个。”协调员回答，“我们真的能见到总统吗？”

“有可能，但是现在还无法确定。”

由于安全的考虑，我们无法保证一定能够见到里根总统，但至少我们八个人能近距离地感受到这个国家最具标志性的建筑——白宫。我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十多年前我站在杭州西湖边，欢迎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那一刻。而现在，我可能要见到另一位美国总统。我的思绪一片混乱，几乎不敢相信这真的在发生。

一年前，在我到马里兰大学的第二个学年，我加入了中国学生和学者协会，这是一个每季度举办一次活动的团体。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欢迎新来的中国学生，并每年举办一次中国新年庆祝活动。海外的学生交流持续繁荣，我们希望支持新来的人们更好地适应在美国的生活。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我和建新以及际宏第一次来到帕克校园时的无知和毫无准备，所以我渴望帮助其他人更容易地适应新环境。

建新、际宏和我会驾驶我们的M1去机场接新来的

学生，并在城里接送他们。我们还帮他们找到并搬运他们公寓的二手家具，以及做任何必要的差事。经过一年的全力投入，中国学生和学者协会选我为马里兰大学分会的主席，我告诉他们我对我们的组织有很大的计划。

到那时为止，我们的团体一直相当封闭，但我有一个愿景，那就是向外拓展，欢迎我们的美国朋友加入中国社区。作为协会主席的我最早的项目之一就是策划和主持一个中国电影节。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允许我借用大量的电影胶卷，我把它们带回到帕克校园的学生会剧院。这些电影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典型方面，包括京剧、古代王朝、历史上的重大时刻，以及中国第五代电影制片人描绘的文化大革命艰难故事。我在中国看过的美国电影把我带到了一个以前未知的世界。通过展示伟大的中国电影，我想为美国人提供一个通道，让他们也能体验中国的未知世界。

电影节每月放映两次电影。美国学生和教职员工占了每次放映的观众的一半。我很高兴电影产生了影响。看过这些电影后，我们的美国朋友和同事说：“我从未见过如此丰富多彩的服装，”或者“我不知道中国有这么多的少数民族。”我们之间的理解更多了，友谊就能更容易地开花结果。电影院成为了我们的会议地，这些故事帮助我们相互交流。这些新建立的联系正是我希望培养的。我不仅希望美国人更多地了解中国，我也希望我的中国同学们能走出他们的舒适区，接受美国的文化。我也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个伟大的国家，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它的公民。

1984年的二月，我们策划了一场向公众开放的中国新年庆典，吸引了大约四百人齐聚马里兰州银泉市的一所高中礼堂。整个礼堂被鲜艳的红丝带和飘扬的横幅装点得如同热闹的庙会，演员们身着华丽的传统中国服装穿梭其间，许多美国观众也特意换上了应景的衣服。女性们身穿旗袍，这种由精致绣花丝绸制成，贴身而又长至脚踝的礼服；男性们则身着圆领的唐装，整个场景让我情绪激昂，我觉得我找到了我的使命一

—那就是在我出生的国家和我现在安家落户的地方之间架起一座文化的桥梁。那个晚上，我手中的二胡弹奏出的，不再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生存而学习的盲人阿炳的忧郁的曲调，而是欢快的民谣，它们的旋律庆祝着新的一年，庆祝着我生活中新的自由时期的到来。

由于我们协会在促进这种文化交流方面的成就被全国各地的分会所认可，我被推举为中国学生和学者协会的全国主席。不久之后，我便收到了一个特别的邀请，作为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和学者的代表，应邀访问白宫，与里根总统见面。

我将这个殊荣的邀请扩大到了附近大学的其他七位中国学生和学者领导人。活动当天，我驾驶着我们的M1在华盛顿的街道上轰鸣，直至停在离宾夕法尼亚大道只有几个街区的地方。在那一刻之前，我离白宫最近的时候，就像其他游客一样，站在高大的铁栅栏外，而现在，我即将有幸进入其中。这座宏伟而熠熠生辉的白色建筑在我眼中是美国开放、文明和公正的民主的完美象征，与我过去所知的压迫的黑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的团队在西翼的入口处通过了安全检查，一名工作人员在大厅里迎接我们。“总统可能会出现，”他说，“但我不能保证。副总统布什会先和你们见面。”我对这两位领导人都抱有极高的敬意。乔治·H·W·布什在中国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因为他在1974年在北京的美国联络办事处工作了一年多。我也知道罗纳德·里根在成为总统之前是一名演员。他从好莱坞明星到白宫领导者的身份转变让我感到惊讶。我惊讶于这样的机会，从演员到总统，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存在。但我也欣赏里根总统的成就，他如何恢复了对美国梦的信心，并在国内外推动自由。

我们被引导进入罗斯福房间，这是一个大会议室，就在椭圆形办公室的走廊对面。我们八个人在这样一个庄重的场所保持着沉默。我们坐在厚实的高背椅上，围着一张长而光滑的桌子，桌上放着用中国瓷器杯盛

着的绿茶。我坐在桌子的一边中间，我的同胞们坐在我两边。每次门开的时候，我们都期待地抬起头来。

在大厅里迎接我们的工作人员探头进门。“我们还不知道总统会不会出现。”

下一次门开的时候，副总统乔治·H·W·布什和几个助手走了进来。他坐在我对面的桌子的另一边，开始向我们分享他和他的妻子芭芭拉在北京的愉快生活经历。

“我真的很喜欢那种随处可骑的自行车生活，”他说，“如果我在这里这样做，我可能会被赶下马路。”我想象着乔治和芭芭拉·布什在中国骑着自行车的场景，我敢肯定他们骑的自行车比我十几岁时骑去纸厂工作的那辆破旧车要好得多。

“我们对您对中国学生项目的支持表示感谢，”我说。那时候，大约有一万名中国学生已经在美国的各大学里学习。我问副总统他是否知道有多少美国学生在中国，他们在那里学习什么。

“你知道，我真的不确定。但我们会查明的，”他说。

在与副总统布什进行了近半小时的轻松友好的交谈后，房门突然打开。近五十人涌入房间，他们的速度之快，仿佛带来了一阵微风。首先进来的是一群带着闪光灯的记者，他们走到房间的四周。然后，就在下一批人的中间，里根总统高高地站了起来。他直接走向我们，弯下身子与我们每个人握手。

“我们很期待能去中国，”他说，“近年来，中国和美国建立起了非常强大的关系。我对我们能一起完成的事情充满了希望。”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像活在我在校园电影节上播放的电影里。我只是一个来自杭州的贫穷孩子，本来几乎没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现在我却在这里，面对面地与美国总统在西翼的会议室见面。这真是太神奇了！

里根总统谈到了两国在教育合作方面的历史。他描述了十九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以及美国如何要求

中国政府将本应支付给美国的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赔款，用于资助学生赴美留学。这导致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第一批赴美的交换学生的出现。

与我们交谈了几分钟后，里根总统说：“我很高兴能与你们每个人合影。”

作为美国中国学生和学者代表团的团长，我是第一个被引导到另一个小房间的人。里根总统在那里等着我，他的摄影师和其他工作人员也在场。他欢迎我，并再次与我握手。我对这位领导人非常尊敬，因此他的热情和友好让我感到惊讶。他询问我过得如何，我来自哪里，以及我在研究生学校学习什么。他非常接地气，我们有了一次愉快的交谈。和他聊天就像和我自己的爷爷在一起。

我们在墙上一个椭圆形镜子前拍了照，我的年轻面孔在镜子的花金框架下显得格外明亮。虽然我很难相信，但事实是我并不在电影拍摄现场，里根也不再是演员。那天我们八个人见到了副总统布什和总统里根，离开时我们都非常兴奋。不久之后，总统和我合影的照片就寄到了我家，上面还有总统亲笔签名。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事件以及接下来的许多事件，将激发我对在美国参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兴趣。

自那天以来，我一直珍藏着和里根总统的合影，我的家人也一样，因为在中国，世界领导人被尊为国王。我将照片的副本寄给了杭州的家人，他们把其中一张装裱起来挂在墙上，就在前门旁边，访客肯定能看到。我的一个叔叔把他的照片副本给他的经理看，很快就因为显然有很好的关系而得到了提升。尽管我离家很远，但我仍然在履行我初来美国时对家人的承诺——为王家的名誉增光添彩。同时，我也感激那些给我机会在中国和美国大放异彩的人。

第十章 重燃梦想

安德森博士迈步走进他的办公室，我已经在那里静候良久，耐心地坐在门口的沙发上。他瞥了我一眼，随即停下脚步，伸手与我简洁地握了一下，然后径直穿过宽敞的房间，走向远处墙边的一张巨大的橡木桌。他背对着我，开始翻阅手中的一些文件。

“先生……嗯……王，你找我有何事情？”他边整理文件边问道，目光始终未曾离开过手中的材料。

“我想咨询一下如何申请医学院的事宜，”我开口说道。“我希望你能指点我申请的流程。”

我尾随他穿过房间，期望他会让我坐在他办公桌边的椅子上。然而他并没有。整个面谈过程，我们都是站着进行的，而且这次面谈的时间并不长。

那是1986年的春天。我预约了与安德森博士的面谈，他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招生副院长，我想知道医学院的录取要求。安德森博士身形魁梧，身着一件白色的实验室大衣，大衣几乎包裹不住他壮硕的身躯，扣子仿佛随时都可能被撑破。

他抬起头，直勾勾地盯着我。“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来自中国，”我回答。

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已经揣测出了我的种族来源。我告诉他我来到马里兰州学习激光与原子物理。我递给他一份我的简历，但他只是草草翻阅了一眼。

“我不清楚你在中国接受了怎样的教育，而现在你又想在美国这里上医学院，”他带着一种傲然与轻蔑的语气说。“你可知道，就连我们美国的学生想进

入这个国家的医学院都有多么困难？”

我盯着他，完全被他的话语震撼到。

“约翰霍普金斯是美国最顶尖的医学院之一。”
他接着说。“你在这里只是在浪费时间。”

我的脸颊似乎瞬间烧红。我无法相信自己刚刚听到的话。安德森博士甚至没有好好看我的简历，也没有询问我过去的经历，他就已经质疑我的学术准备和能力。他仅凭一眼就对我做出了评判吗？我的种族和肤色就是他需要知道的全部吗？

我努力压抑住自己的愤怒，保持礼貌。“你真的认为我做不到？”我问道。

“是的。考虑到你的出生地，你对进入本国医学院的期望并不现实。”他合上我的档案，将它还给我，然后向门口走去。“你自己离开吧？”

他把我留在了他的办公桌旁。

我步履沉重地离开了那幢大楼，内心感到无比屈辱。每当想起米勒教授对我的族裔反复的轻蔑，胃中就会翻江倒海。我回忆起那第一天走进空荡荡的教室，那种因为身为外国人而被疏远的刺痛再次萦绕心头。然而，尽管最初的那些痛苦时刻，我在美国的经历大部分都是非常积极的……直到现在。

在前五年里，我享有自由生活和学习的权利，不再有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经历的那种恐惧和束缚。我以为我找到了一片自由和机会的净土。我以为我已经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然而，我在安德森博士的办公室里感受到的偏见，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中国那个臭名昭著的阶级歧视。也许美国并不比中国好多少。

虽然我深知安德森博士的行为并不能代表大多数美国人，但我仍然震惊于一个人的行为如何能深深影响对一个文化的看法。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们每个人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要明白，作为社区的一员，我们的行为可能会影响他人对我们整个社区的看法。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整日沉闷，心情低落。或许医学院并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因为尽管我可以

改变自己的许多方面，但种族却是一个无法更改的事实。若安德森博士所言非虚，或许我应该放弃成为医生的梦想，无论我曾经为此付出多少努力。也许我应该满足于拥有激光物理学的博士学位——其本身就是一项显著的成就——并寻求在激光技术研发领域有前途的职业。在我人生的漫长旅途中，也许我应该对自己已有的成就感到满足。这条路或许更舒适，因为至少可能不会再有更多的失望，也许也不会有更多的歧视。但是，每当我想到放弃，我就会听到我父亲的声音在耳边回响：“不要放弃。继续前进。”在我一生中，我一直被成功的驱动力推动，尤其是当我遇到一些困难和压抑的事情时。我想要挣扎，我想尽可能远离我在生活中遇到的幽灵——人生的污点，被下放的威胁，棺材里的尸体，以及现在的种族歧视——并向更高的地方前进。

安德森博士说的一件事是真的；进入医学院确实非常困难，即使是对于有语言、文化和预医学准备优势的美国人来说。对于像我这样没有这种优势的外国学生来说，进入医学院将会更加艰难。

但我深知，如果放弃我的梦想，就等于默认了安德森博士的偏见，即少数族裔的学生不具备成功进入医学院的能力。这个想法让我深感反感。

当我从绝望的迷雾中走出来，我开始清晰地看到我接下来该做什么。偏见只是激励我更加努力地工作，以证明偏见是错误的。我把对安德森博士的所有愤怒都倾注到准备医学院入学考试上。十年前，我曾在所有的困难中奋斗，赢得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参加第一次大学入学考试的竞争激烈的名额。但那时，我只关心我的未来。这一次，我觉得我不仅是为了自己而战，也是为所有遭受偏见和歧视的少数族裔而战。我要进入医学院，向米勒教授和安德森博士这样的人证明，他们仅仅根据一个人的肤色就全盘否定一个人是完全错误的。

遗憾的是，在这场对荣誉的追逐中，我倍感孤寂。因为妻子淑在另一个州的医学院深造，我更像是个单

身汉，而非有家的丈夫。这种地理上的隔离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使我们的关系逐渐变得岌岌可危。我感激无比的是，1986年的夏天，我的母亲远赴马里兰州，与我团聚。她和我父亲都深感，尽管我和弟弟已经长大成人，开启了各自的职业生涯，但家庭的凝聚力仍不可或缺。随着1980年代中国经济的繁荣，父母的收入也有了显著的提升，他们终于有能力承担起环球旅行的费用。他们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美国，通过科研工作来维持生活。我的弟弟在杭州医学院就读——这是浙江医科大学的一个分校，父母都曾在此任职。他在1990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也来到美国，加入了我们的生活。

我的母亲比父亲早两年来到美国。她在马里兰大学大学公园校区从事传染病研究。她住在我公寓里，每晚为我精心烹饪晚餐，而我则全身心投入到申请医学院以及激光物理学的博士研究中。我回忆起在杭州的那些艰难日子，妈妈如何在我熬夜备考看似无望的入学考试时鼓励我。如今，她又一次在我人生中的一个充满挑战的阶段，默默陪伴在我身边。

我给自己预留了大约六个月的时间，去准备那年秋季的医学院入学考试（MCAT）。我已经修了许多化学和物理课程，但我在生物科学方面一无所知，而这正占据着医学院入学考试的一半内容。我没有时间去修读几个学期的生物课程，因此我选择了一个暑期加速课程，力求尽快掌握必要的知识。除了预医课程，我还需要提升我的逻辑思维、阅读理解和写作能力，以便在考试中表现出色。那时，虽然我的英语水平已经大幅提升，但它仍是我的第二语言。我找到了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杜邦圈路的卡普兰测试准备中心。为了支付预备课程的费用，我在最佳西方酒店接受了晚班和周末的工作，只要我不在实验室做研究，我就在那里工作；每周有三个长夜，我都在卡普兰中心学习，准备医学院入学考试。

我全身心地投入学习，抓住每一刻时间，力求精进。白天，我沉浸在实验室的激光光谱学博士研究中；

晚上和周末，我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准备医学院入学考试，同时还要做两份兼职以支付学费。我回想起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必须以顽强的毅力来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如今我必须再次付出同样的努力，不仅为了实现我一生的梦想——成为一名医生，而且还要证明那些像米勒博士和安德森博士这样的人，他们的种族或种族歧视观念是错误的。经过几个月的密集准备，我在那年八月的校园里参加了医学院入学考试。我和其他有志于医学的同伴们一起，在一个房间里度过了近五个小时，我们仔细审阅一道道题目，祈祷自己能够答对足够多的问题。一个月后，我接到了马里兰大学预医咨询办公室的电话，告诉我可以去领取我的成绩。

那是一个初秋的日子，阳光温暖，树叶金黄，一切都显得如此明亮。我跑过整个校园，来到预医顾问的办公室。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一直试图不去想考试的结果，因为每次我一想到，我就会感到焦虑。但今天是那一天，真相即将揭晓。我的童年梦想要么活下来，要么死去。

一位顾问递给我一个信封，但我并没有立即打开它。我回到室外，躺在草坪上，信封放在我的胸口。我无法预测我能得多少分，因为这个考试并不是设计为完成所有题目的，也不是要完美地回答每一题。这个考试分为六个部分，每个部分的满分是十五分。全国平均每科约七分。如果我能得到十分，我有信心我能进入医学院，如果我能得到十一分或十二分，我就有机会进入顶级学校。得到十三分或十四分是非常罕见的。而在任何科目中得到完美的十五分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结果会是什么？”我问向湛蓝的天空。跟随家人的脚步一直是我从小就有的梦想，我总是带着我的小药箱，里面装满了药膏和绷带，虽然这个梦想在中国被打破，但我觉得我现在终于有了实现梦想的真正机会。

我深吸一口气，手指轻轻撕开信封。我的手在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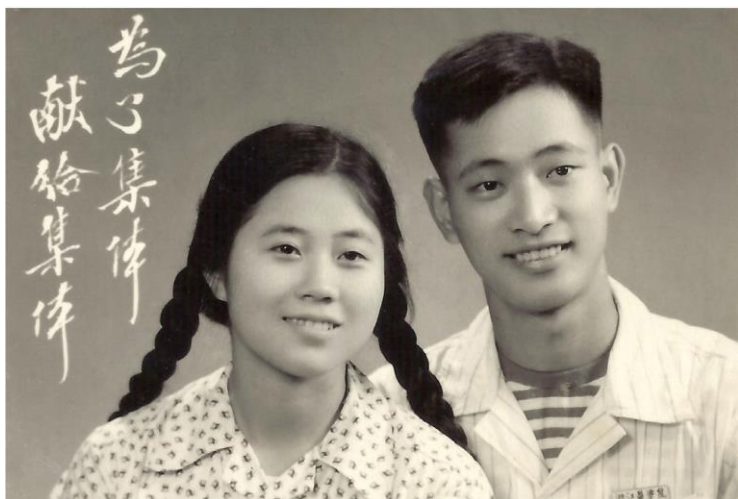
微发抖，这种感觉让我想起了十年前在中国收到教育部的信那一刻。信里面夹着的一张纸上，印着我的成绩和相对于全国考生的排位。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手中的纸张。

我的阅读理解得分只是平均水平——七分——但是每一门科学科目我都拿到了满分十五分，并且在全国的排名高达99.999%。我震惊了！这怎么可能？我从草坪上蹦了起来，冲进顾问的办公室，把我的成绩单展示给他们看。他们都从未见过有人能在所有科学科目中获得满分的医学院入学考试成绩。

显然，卡普兰也是第一次见到。卡普兰组织创始人斯坦利·卡普兰的侄女罗莉·卡普兰·斯波恩打来电话祝贺我。

“你创造了历史，”她说，“我们从未有过任何一位学生在所有科目中都得到满分十五分。你愿意考虑为我们教课吗？”

罗莉是华盛顿地区卡普兰中心的管理人员，她雇用的教师都是在医学院入学考试上表现优秀的人。她提供给我的时薪几乎是最低工资的六倍。我在最佳西方酒店和汉堡王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除了额外的收入，我还对教书充满了兴奋。我尽可能地改进教材，使我的卡普兰学生在医学院入学考试上取得更高的成绩。与我刚来到美国那几年，举办的那些影响力有限的辅导课程不同，我的卡普兰课程现在经常座无虚席，许多人都选择了我作为他们的教师。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在医学院和临床培训的间隙，我会时不时地去卡普兰教书。



爸爸妈妈在浙江医科大学毕业后立即结婚，杭州。（1958年）



我小弟弟明宇出生。（1968年）



一岁时，我学会了如何摇晃我的高脚椅来移动它，这样我就可以探索世界。（1961年）



妈妈与我们分开两年，面临去国家偏远地区进行强制劳动和再教育之前，我和我的父母以及明宇（右）在一起。我们三个人都戴着毛主席的像章。（1970年）



和明宇一起演奏二胡，他并不知道我不断的练习是为了避免被下放的灾难。（1974年）



学习舞蹈是我希望结束似乎不可避免的下放命运和艰苦劳动生活的另一项技能。（1974年）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作为一个工厂书籍包装工，我每天只能赚到10分钱，我每天都骑自行车上班。（197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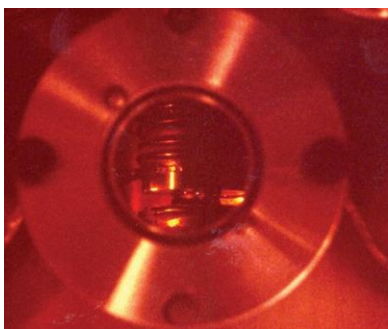
作为中国科技大学的新生，在校园前。（197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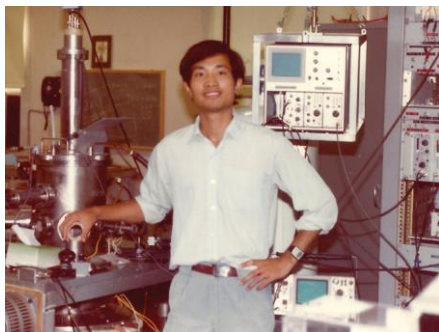
三剑客（建新，我，和际宏）来到美国，几乎一无所有，但却穿着正装。（1982年）



三剑客和我们的第一辆美国车——一辆1973年的AMC Matador——我们因为她的巨大尺寸而给她取名为“M1”。（1982年）



黄点！在激光原子碰撞器的中心，钠二聚体终于形成，散发出原子的快乐。（198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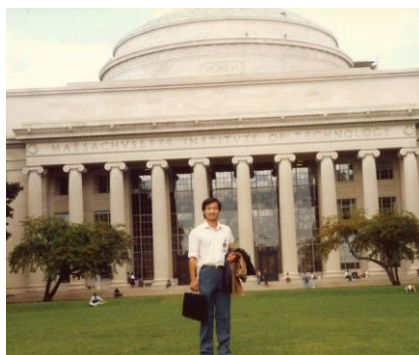
在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维纳实验室，我和我的激光和原子碰撞器一起进行博士论文的实验。（198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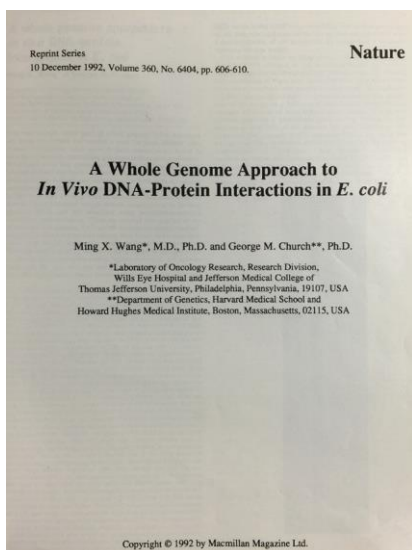
和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约翰·维纳教授，站在我们的激光原子碰撞器旁。（1986年）



和哈佛医学院遗传学系的乔治·丘吉尔教授在一起。（1987年）



在哈佛-麻省理工健康科学和技术（HST）MD项目的学生，在MIT校园。（1987年）



我和乔治·丘吉尔教授一起写的关于在活细胞中研究DNA-蛋白质相互作用的新方法的Nature论文。（1992年）



作为美国中国学生和学者协会的主席，我很荣幸能在
白宫与罗纳德里根总统会面。（1984年）



在白宫与罗纳德里根总统的私人照片。（1984年）



在华盛顿特区的中国大使馆
前，抗议天安门广场的暴行。
（1989年6月）



和参议员比尔·弗里斯特，医学
博士。（2006年）



我的母亲，丹尼斯，和淑在波士顿。（199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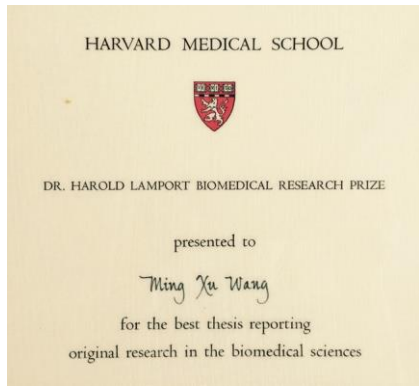
在哈佛毕业典礼上，丹尼斯在我还没来得及看它自己就抓住了我的MD文凭。（1991年）



从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magna cum laude），并获得医学博士毕业论文的第一名奖。（199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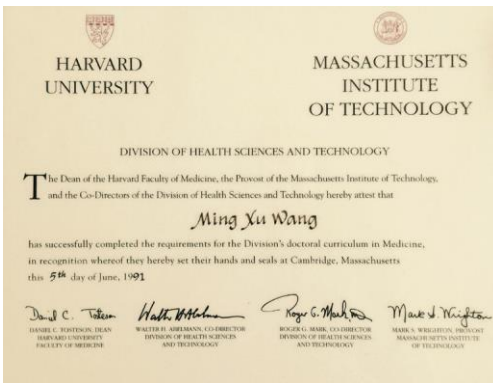


和我的父母以及明宇在我从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时候。（199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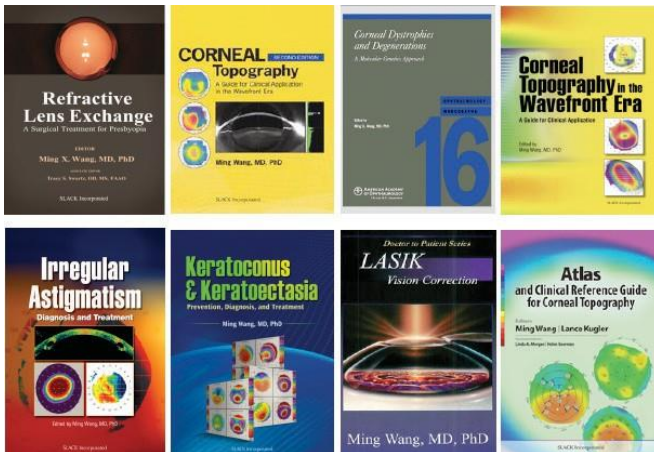


我的哈佛医学院文凭。（医学博士，
magna cum laude，199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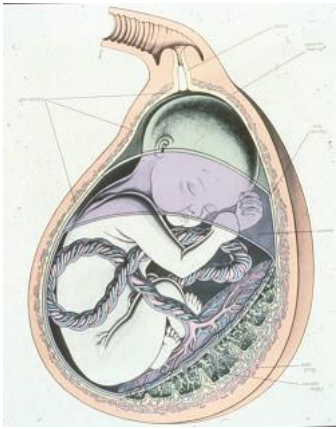
我从哈佛获得的医学博士毕业论文的第一名
奖。（1991年）



哈佛和麻省理工联合医学博士项目的毕业文凭。
（199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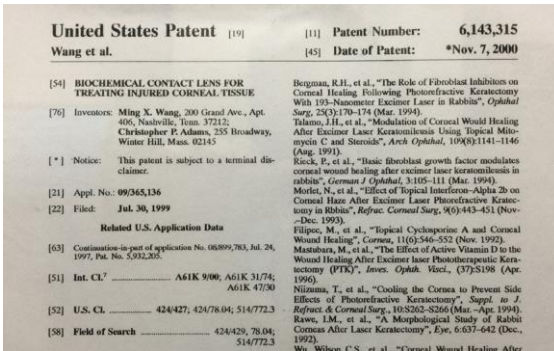
我的八本眼科教科书。（201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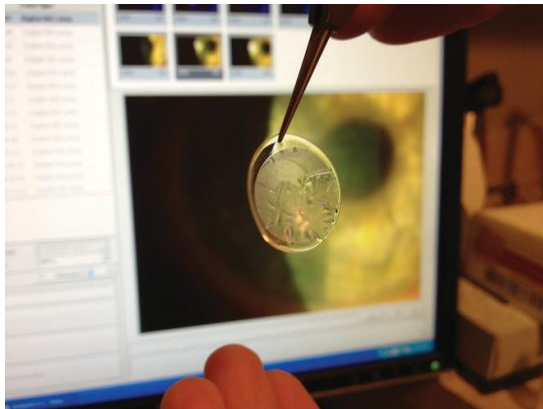
胎儿在羊膜囊中，显示出羊膜。
(1996年)



在巴斯科姆·帕尔默眼科研究所进行角膜研究期间，我在兔子身上进行了涉及激光的羊膜移植实验。(1996年)



我的美国羊膜接触镜专利。(199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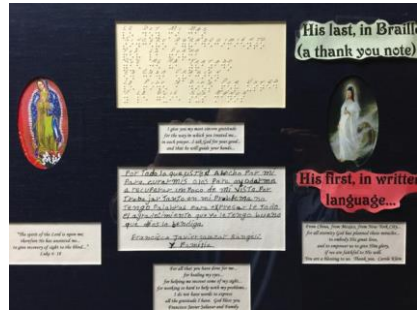
基于我1999年的美国专利的世界上第一款羊膜接触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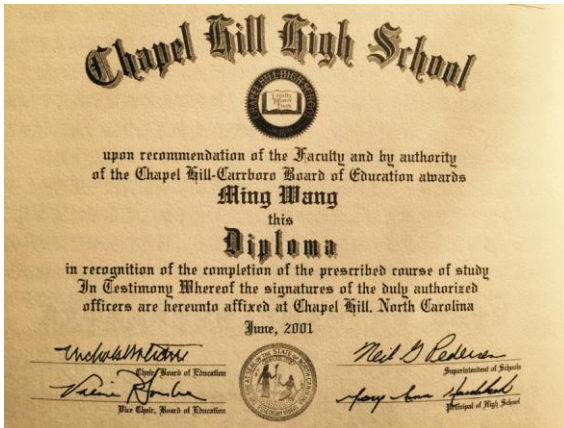
我们祈祷，就在我们从弗朗西斯科的眼睛上取下眼罩之前，经过两年多的手术，包括一次前所未有的四重手术。（2001年）



十七岁的墨西哥盲人患者弗朗西斯科，七年来第一次看到自己！（2001年）



上面的面板是弗朗西斯科最后一次使用盲文；下面的面板是他七年来第一次能看到写作（西班牙语）。（2001年）



二十四年后，我在中国完成了高中，但没有文凭，北卡罗来纳州的教堂山高中给我颁发了这个荣誉文凭，这是弗朗西斯科的礼物。（2001年）

Wang Foundation for Sight Restoration From Darkness to Sight

Mission

The Wang Foundation for Sight Restoration is a 501(c) (3)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that helps blind pati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over 55 countries to date) in their quest for sight.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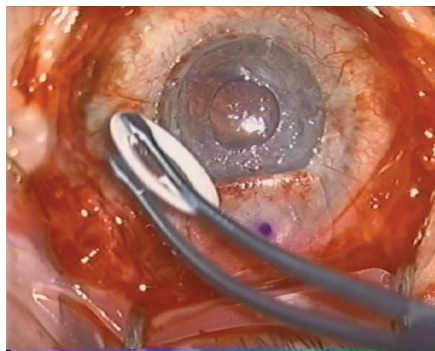
The foundation doctors performed the world's first laser-artificial cornea implantation, a new technology developed to restore vision in terminally corneal blind patients. They also published the world's first scientific paper that demonstrated the reduction of corneal scar and apoptosis after amniotic membrane graft.

Your help

Although these surgeries are performed free of charge by our doctors, we need your help in aiding travel, lodging and hospital expenses so that these patients' world will no longer remain in darkness. All proceeds from the Eye Ball will go to help give these blind patients the chance to see again.



我们的501(c)(3)非营利慈善机构已经帮助了来自40个州和55个国家的患者，所有的手术都是免费进行的。（2015年）



在王氏基金会的第一位患者，鲍比·乔尔·凯斯身上进行的世界第一次激光人工角膜植入手术。（2004年）



和鲍比·乔尔·凯斯以及他的母亲安娜在第一次眼球晚会上。（2005年）

中国首例



和中国的第一位无刀全激光LASIK患者，这是14亿人口的国家的第一位。（2005年）



布拉德，失明13年，第一次看到我，问我，“这是你的脸吗？是的，我可以看到你的脸在那边！”
(2007年)



“是的，那就是我！”布拉德在13年后首次看到了自己。(2007年)



“我现在能看见你了！”布拉德首次看到了他的妻子杰基。(2007年)



与杰基和布拉德合影，他是全球首位接受唾液腺移位和激光人工角膜植入手术的患者。(2007年)



卡贾尔，一个四岁的孤儿，被继母在睡梦中向她的眼睛倒酸，以此将卡贾尔变成“盲童歌手”来赚钱。（2006年）



与卡贾尔和她的照顾者格雷丝在卡贾尔手术前合影。（2006年）



卡贾尔在基金会年度眼球晚会上唱了一首歌。（2007年）



卡贾尔和我在眼球晚会上跳了第一支舞。（2007年）



与格温、艾丽莎、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和帕里什合影。（1995年）



在斯坦福大学校园与丹尼斯和我的父母合影。（200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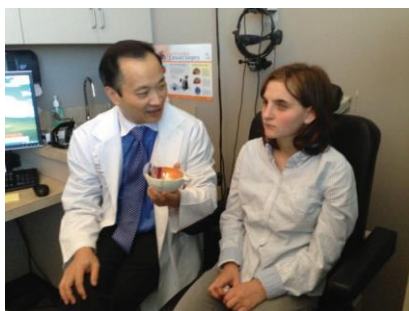
与我的义父母，琼·鲁道夫和米沙·巴特诺夫斯基合影。（1998年）



与多莉·帕顿合作，为她的乡村歌曲《残酷的战争》创作、演奏并录制二胡部分，该歌曲收录在她的专辑《那些年的日子》中。（2005年）



在一次前往摩尔多瓦的宣教旅行中，琳恩·亨德里希遇到了玛丽亚，一个因为从出生就失明而变得羞涩和内向的孤儿。（20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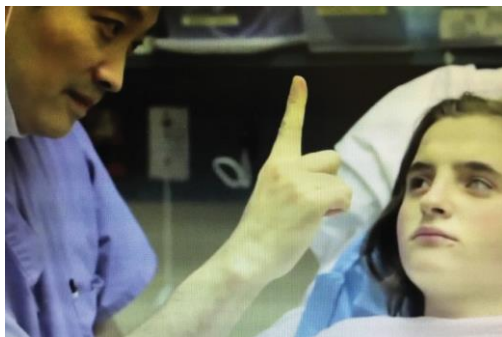
首次为玛丽亚进行检查。她长途跋涉，带着重见光明的希望来到我们的复明基金会。（2013年）



玛丽亚极其困难的复明手术前的瞬间。（201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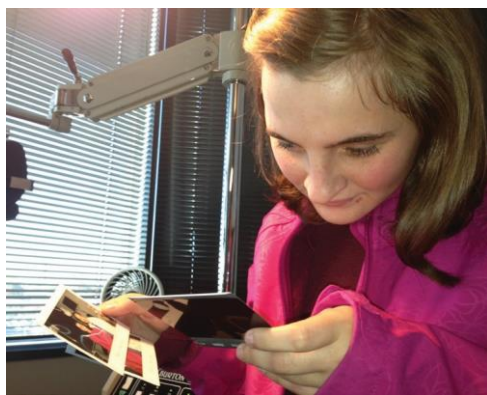
“我们做到了！”上帝成功地帮助我们完成了玛丽亚几乎不可能的手术。（2013年）



“我举几个手指？”“一个！”玛丽亚能看见了！（2013年）



“我好漂亮！”这位15岁的，曾经失明的摩尔多瓦孤儿在首次看到自己时用罗马尼亚语惊叫道。（2013年）



玛丽亚从一个处于人口贩卖和卖淫边缘的盲童，变成了一个能看见世界，现在和亨德里希家人在田纳西州的弗兰克林一起生活的快乐少女。（2013年）



与安乐和玛丽亚合影。（2015年）



与我的老师沙琳·阿彻参加职业-业余联谊舞比赛。（2007年）



全家福（从左到右）：小华，丽丽，佩吉，明玉，艾丽莎，丹尼斯，爸爸，永永，我，妈妈，安乐。（感恩节，2014年）



在特雷韦卡拿撒勒大学获得荣誉博士学位，与理查德，托尼，安乐，吉姆，托尼，克里斯汀，梅根，和大卫合影。（2015年）



获得年度纳什维尔人奖，和王氏视觉3D白内障和近视眼激光中心的团队：
前排：艾布拉欣医生，齐默曼医生，康诺利医生，王医生，和洛克医生。第二排：香农，贝丝，希瑟，莉奥娜，安乐，安娜，塔米和克莱尔。第三排：卡梅伦，斯凯勒，克洛伊，詹姆斯，苏珊和赵医生。后排：克里斯特尔，阿曼达，阿什利，凯拉，艾丽卡，海莉，埃里克，斯科特，和姜医生。

有人曾经建议我，我应该申请多达三十所医学院，但这意味着我需要支付数千美元的申请费用。可我并没有那么多的钱，因此我最终选择了包括哈佛医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在内的几所顶尖学府。1987年1月，我收到了它们的录取通知。

不久后，我接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电话。

“请问是王明先生吗？”电话那头的声音询问道，“你收到我们约翰霍普金斯的录取包裹了吗？我们为你准备了学校历史上最丰厚的奖学金。我们非常期待你能接受我们的邀请。”

那个声音，似乎有点熟悉。“我现在还在斟酌中，”我回答说，“哈佛也给我发来了录取通知。”

“我明白。这两所都是非常优秀的学校。”他说道，“你可能会发现，不同的学校会有不同的待遇。但请记住，在约翰霍普金斯，我们极其尊重才华和学术成就。我们希望你能考虑加入我们。”

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打电话的这个人，正是几个月前因为我的种族而对我持有偏见的那个人——诺曼·安德森博士。他曾经不相信一个少数族裔的学生，能够成功地步入医学院的大门。我差点就直接告诉他，我正是那个他曾轻蔑过的学生，他对种族和肤色的偏见是错误的，而这种偏见并没有阻止我，反而成为了我备战医学院入学考试，证明他错误的动力。我觉得这个消息可能会敲响他的警钟，但我最终还是没说出口，因为我来自一个尊重和重视长者的文化，我不能反驳一位教师，即使他是那样的人。

我选择了哈佛。

* * *

回顾过去，我庆幸我并未被他人的偏见行为阻挠，反而把握住了美国给予我的难得机会。我看清了，问题并非出在美国这个国家，而是在于如安德森博士这般的人，美国值得拥有更好的。我对美国的深深热爱，以及我自身的努力与成就，都来自于我坚定的信念：我们绝不能让如米勒博士和安德森博士这样心胸狭窄

的人阻碍我们追逐梦想。我决心竭尽全力，捍卫这个伟大国度最珍贵的基石——所有人，无论男女，都应平等对待的信念。

虽然我很想说我选择哈佛是为了给安德森博士一个甜蜜的报复，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哈佛不仅是全国顶尖的医学院，而且我还被接纳进入了一项竞争激烈的与麻省理工学院（MIT）联合的医学博士项目，名为“健康科学和技术”（HST）。作为联合项目的学生，我不仅在哈佛接受医学教育，还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生物科学和工程。

1980年代初，眼科医生们正在研究如何利用激光技术大幅提升眼科手术的精准度和效益。我在博士论文中所研究的微电子学——如计算机芯片和原子对撞机——如今可以用于进行精准微妙的眼科手术。作为一个入读医学院的激光物理学家，我意识到我有独特的机会，可以为这种新的生物技术如何应用于眼病治疗的进步做出贡献。在那个时期，使用激光而非手术刀进行眼科手术还是一项崭新的概念，我希望能成为这场即将到来的创新浪潮的一部分。

几个月前，我曾去波士顿参加哈佛的入学面试。面试结束后的某个寒冷夜晚，我在医学院附近漫无目的地闲逛。我将双手深深地插进大衣口袋，沿着那些气势磅礴的建筑前的人行道慢慢走着，这些建筑围成了一个长方形的草坪，被称为“四合院”。月亮圆而明亮，白色的大理石建筑在黑暗的背景下熠熠生辉。我想起小时候与父亲在杭州的树林中夜行，对月亮的敬畏之情涌上心头。回想起十年前，我一无所有，甚至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而现在我站在即将被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医学院录取的边缘。我是如何跨越如此巨大的困难，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

那时，我深信，我之所以能够度过文化大革命恶劣环境，以及作为一个贫困学生在美国的挑战，是因为我父母的援助，我自身的坚韧不拔，以及这个伟大的美国，它给了我选择的自由，重新燃起了我对医

学的热切梦想。像米勒和安德森这样的人寥寥无几，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对所有的文化和种族都充满了爱、公平和支持。中国和我的家庭给了我文化的根，塑造了我的性格，而美国——我的领养国家——给了我积极的人生观和宝贵的机会。然而，后来我意识到，在所有我的成就中，有一些更为重要，更为深刻的东西应得到荣耀。是的，我一直努力奋斗，抓住了不少机会，但在一些场合上，结果让我感到惊奇不已。我想起曾在实验室的原子对撞机前祈祷寻求帮助，当我已经竭尽所能，甚至无法再前进时。那一刻，当我祷告之后，看到那个明亮的黄点神奇地开始发光，我第一次体验到了精神力量。

这次神圣的遭遇打开了通往奇迹之地的大门，引发了我对超越物质领域存在的东西的疑问。我开始相信，也许确实有一些超越我自己的东西；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在起作用。

我站在四合院庄严的主楼前，仰望着巨大的希腊柱子和上方横梁上醒目刻着的“哈佛医学院”字样。超越所有逻辑，我感觉这股力量可能正在引导我的生活，原因我还无法理解。我过去的生活没有信仰的根基，只是被逃离持续的黑暗和幽灵的需要所驱动。现在，鉴于我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其中许多超出了我自己的期望和能力——我意识到，也许我的生活确实有一个目的。但如果是这样，那是什么呢？

尽管我永远不会忘记米勒和安德森说过的严厉话语，但他们的偏见不再是我努力工作的唯一动力。是的，我仍然会努力证明他们的歧视是不道德的，但如果上帝确实存在并且为我的生活设定了一个目的，那么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得失或利益，其重要性必定远超这些。发现这种更深层次的意义和我生活的目的成为推动我前进的最终动力。

第十一章 更高的力量

房间空寂无人，冷得让人心悸。一排排钢制桌子，反射出头顶灯光耀眼的光芒。通风口中喷出的空气，试图驱散空气中的异味。我知道这一刻的来临在所难免，我无处躲藏。我们围坐在桌子旁，形成一个个小团队，静默不语。这像是一个庄重的仪式，但我们也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心有余悸。钢制桌子上铺着白色床单，上面是捐献给科学的遗体。除了在杭州医学院罐子里的身体部位，我以前从未离死者如此之近。现在，我不仅站在他们身边，手中还握着手术刀，准备下刀。我的手在抖动，我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那是1987年的9月，我刚刚搬进哈佛医学院的范德比尔特大厅。我很喜欢波士顿。报摊上琳琅满目的报纸，来自世界各地，语种繁多。附近的剑桥的哈佛广场洋溢着思想、历史、书籍和诗歌的气息。世界各地的文学作品的丰富程度，与我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乏善可陈的阅读材料形成鲜明对比。我想起了十年前我和父亲在中国偷偷藏在书架上的唐诗秘书，那时知识和教育被剥夺了。而现在，我生活在这个教育和智力驱动的国家中心。这无疑是一段难以置信的旅程。

早晨，我们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健康科学和技术（HST）联合项目的学生们去哈佛医学院上课；下午，我们被送往查尔斯河北岸的麻省理工学院校园，参与生物医学工程的课程。例如，早晨我们会在哈佛学习心血管系统的解剖和生理学，以便进行医学博士

课程。然后下午，我们会在麻省理工学院以生物工程的角度去学习心血管系统，把心脏视为电池，动脉视为电阻器，静脉视为电容器。作为HST项目的学生，我深深被超越解剖描述的人体机制吸引，对于工程原理如何应用于人体理解和新的医疗治疗的开发，我充满了好奇与向往。

我以激光物理学家的独特身份，踏入医学院的大门，决心从事眼科医学，并运用激光改善眼病的治疗方式。我在哈佛的早期岁月，美国和欧洲的顶尖医学研究者，是最早使用准分子激光进行人眼视力矫正手术的人。准分子激光器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是“激发二聚体”的产物，这与我在马里兰州研究生学校的激光原子物理学项目中研究的钠二聚体非常相似。激发的二聚体产生紫外光，在这个波长下，激光可以去除微小的组织，而不会损伤周围的组织。我对这种新兴激光技术在物理学和工程学中的应用非常好奇，这是在我开始医学院之前的事情，但我很快就看到了这个领域的人性化一面。

在我第一个学期的某一天，我有幸参加了一场特别的讲座，邀请了几位失明的人士来分享他们的生活经历。其中，一位女士的身影特别引人注目。她是一位年过半百的意大利裔美国人，来自波士顿的城北，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散发着吸引人的魅力，唯一的遗憾是她的双眼。她的眼睛因为一种遗传病而畸形和萎缩，从出生起便没有过光明的世界。

“你会如何理解红色和蓝色？”教授对她提问。

她稍微沉思了一下，答道：“红色，在我心中是暖洋洋、柔软舒服的；而蓝色，嗯，应该是冰冷且光滑的吧。”

我对她将颜色以触觉的方式来描述感到惊讶。尽管她看不见周围的世界，但她能以自己的方式感知它。我猛然意识到，她其实错过了人类体验的一个重要的维度。她的遗传病虽然剥夺了她的视力，但她失去的却是更多。她本该享受丰富多彩的生活，却只能在孤独和阴郁中度过。她的成长经历充满了痛苦；失明使

她无法像其他孩子一样出门玩耍，享受自由自在的童年。长大后，她独居生活，没有婚姻，没有孩子。为了填补内心的孤独，她将自己投入到音乐的世界，热衷于吉他演奏。我想起了我年少时喜欢的二胡曲《二泉映月》，那是盲人阿炳倾尽一生的创作。这位女士也是如此，通过音乐寻找出口，表达内心的悲苦和孤独，因为她的世界始终是一片黑暗。

她的遗传病是永久的，她的失明是无法逆转的。我开始思考，如果有一天，我们能通过突破性的医疗手段，比如激光技术，让这些失明的人重新获得光明，那将是多么美好。如果我能成为这个生命转变过程的一部分，那将意味着什么？当我沉浸在这些可能性中时，我对视觉科学的理解从简单的技术应用转变为对失明的深深同情和对人的关怀。那天早上的讲座之后，眼科医学对我来说不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像是一项使命。于是，在我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习期间，我每周都会花几个晚上在研究实验室，既是一名医学生，也是一名博士后研究员。我希望能深入研究像那位女士一样的遗传病的分子基础。

我选择了在分子遗传学家乔治·丘吉尔博士的指导下进行研究。丘吉尔博士是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家，自身具有物理化学背景，身材高大，胡子蓬松。他正在和一位华裔美国女教授吴婷约会，后来她成为了他的妻子，所以他对我的文化背景非常欣赏。我第一次在他的办公室见到他，他的办公室在一个离四合院不远的建筑的八楼。墙上挂满了人类基因序列的图表，G、A、T和C的彩色图案，这些字母代表DNA中的四种核苷酸。看着这些简单的字母组合，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生命形式便呈现在眼前。这让我想起了我儿时在杭州天马的卧室墙壁上的画作和诗篇。在这里，我看到了另一种诗歌，它以不同的方式描绘了人性的美丽。

我进入哈佛的那一年，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非常有趣的时期。人类基因组计划刚刚启动，丘

吉尔博士是其中的发起人之一。短短的几年内，来自16个机构和6个国家的超过一千名研究人员将参与这个全球性的努力，对人类DNA的三十亿个碱基对进行全序列测定。每一个参与的科学家，包括丘吉尔博士和我自己，都渴望更深入地理解遗传学如何影响人类疾病，然后利用这些发现开发出更有效的治疗方法。

对整个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尽管是一项关键且大规模的工程，但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正如中国的谚语所说。一旦Gs、As、Ts和Cs的排列模式被测定，科学家们便需要去揭示这个序列所代表的实际含义。犹如走进一座图书馆，翻开一部厚重的编年史，眼前所见却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字母。要理解这些字母的意蕴，我们需要学习这背后的语言规则，也就是：基因的功能是什么？基因是如何被激活或关闭的？为何有些人携带某种疾病的基因却没有发病，而其他人却病发了？

在我初次与丘吉尔博士的见面中，我向他介绍了我过去在化学和物理学方面的研究，以及我希望能在分子层面更深刻地理解疾病。

“我看得出你对医学技术领域的热情，”他对我说，“我很高兴能与一位物理化学家一同工作。”

丘吉尔博士与我共同开启了一项独特且雄心勃勃的项目。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推进，DNA的更大片段被测序，发现了更多的基因。接下来主要的挑战是开发更先进的技术来研究这些基因的功能和他们是如何被调控的。有些基因和突变的存在或缺失并不一定会引发疾病。更常见的是，这些基因的激活或抑制导致了如癌症等疾病。由于大分子复杂的蛋白质是调控基因活性的分子，丘吉尔博士和我设想开发一种新的技术来研究DNA-蛋白质的相互作用和基因表达的调控，我们计划在活细胞内进行这项研究。

在此之前，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在体外环境中，比如试管或培养皿中，探索蛋白质与基因的相互作用。我们希望开发的技术能够探索DNA和蛋白质在活细胞内的相互作用，也就是在体内。我们将大肠杆菌作为

我们的模型基因组系统。如果我们成功了，那么我们开发的这个方法在接下来的十年内可能会应用到人类基因组，一旦它被测序，这将对医学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丘吉尔博士的实验室外，我在个人生活中也亲身体验了生物学和遗传学的奇迹。1988年春季，丘吉尔博士和我刚开始我们的项目不久，淑从西弗吉尼亚打来电话告诉我，她怀孕了。

“我要当爸爸了！”我兴奋地告诉我的同学们。

淑和我都对即将迎来的新生命充满了期待，但这份兴奋却被焦虑所消耗。我们都在医学院学习，住的地方相距六百英里。在我们的婚姻的最初两年，我们只在学校的假期和节假日相聚了两周。我们深陷于课程、研究和轮换实习中，几乎无法维持我们的婚姻，那我们又如何能照顾一个新生儿呢？

我们的儿子丹尼斯在1988年12月5日出生。当他降生时，产科医生让我剪断了他与母亲相连的脐带。参与到新生命的诞生，这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体验。我接受过充足的训练，可以为他评估阿普加评分，这是一种评估新生儿健康状况的方式，我给他打了9.5分。也许我有父亲的偏见，但他确实是活泼健康、哭声响亮而且头发浓密的新生儿……我从未见过一个婴儿的头发那么多！

淑休学一个月，我和她以及丹尼斯在一起待了两周，我们忙于制定一个照顾新生儿的计划。当我们回到各自的医学院后，我的父母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因为我的父亲那年早些时候终于从中国来到了这里，所以他与我的母亲和我住在一起。丹尼斯在我们在波士顿的家和淑的父母在马里兰州的家之间来回穿梭，直到淑和我完成学业。在这期间，丹尼斯的祖父母对他的照顾更像是父母，而不是淑和我。我后来会后悔在丹尼斯成长的早期阶段没有扮演更大的角色，但当时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医学院的学习是一项全身心的投入，成败将决定我们的职业生涯……以及我们的生活。

* * *

成为父母是许多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然而，大约在我儿子丹尼斯出生的一年前，我经历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阶段，这是每一个医学生都无法绕过的。在我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之前，我首先要面对的，是死亡。就如同过去几百年来来的医生在训练中必须经历的那样，我在解剖实验室，遇见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具尸体。当我走进这个冷峻、临床的环境，心中不禁回想起小时候在杭州，我父母所在的医学院的解剖实验室，那里充斥着浮在玻璃罐中的身体部位，书架后面的棺材，以及我曾因寻找他们失去的器官而做的那些令人生畏的噩梦。这一次，我无法再像在青少年时期的噩梦中那样逃离这些尸体。站在那个冷硬的钢制桌前，我被深深地震撼了。

然而，这并未能比我即将做出的第一次切割带来的震撼更大。

我和我的实验室伙伴被分配到了一具女性的尸体。我一直在告诫自己，“这不再是一个人。只是一具尸体。”她那无生命的脸孔，仿佛死亡正在凝视着我。到了学期末，她的身体被切成了数百块，被放入标有骨头、肌肉或韧带的盒子中。这位女士，她捐献了自己的身体供我们学习。我对她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但我不禁要问：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终点吗？生命本身有什么意义？或者，它一开始就存在吗？

许多医生将解剖尸体视为对疾病和死亡麻木不仁的开始，但对我来说，却恰恰相反。我对生命的敏感度在不断增加，对生命的起源，人体的复杂性，以及是否存在任何意义，我变得越来越好奇。我曾经深信，只有科学才能揭示生命的秘密。它告诉我们，生命是随机发生和发展的，这意味着生命本身并没有任何内在的意义或目的。然而，当我对生命的奇迹和复杂性的探索越来越深，我开始质疑我曾经的信仰。

我父亲总是告诉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带着物理和数学的独特见解进入了医学院，因此，当其他同学在记忆事实，学习人体解剖和生理

学时，我用一个数学家的视角来看待医学，运用数字和概率进行思考。我对人体器官的复杂性，如眼睛，了解得越多，当数字无法合理解释时，我就越感到困惑。我了解到，人脑中的神经元数量是银河系中星星数量的两倍。人眼是另一个工程学的奇迹，有数十亿的光感受器和神经连接。我的数学计算表明，这样复杂的器官需要数万亿年才能随机演化，但宇宙被认为存在的时间不到一千四百亿年。

这使我深深困扰于生命能否随机形成的可能性。然而，大多数科学家似乎并不认为上帝的存在有任何可能。这个职业要求对实证主义的忠诚，这种哲学认为，只有可以被测试的东西才是真实存在的。科学家会争辩说，尽管眼睛的内在复杂性，但它仍然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随机演化。然而我发现，对我来说，相信眼睛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随机形成，需要更多的“信仰”，而不是相信可能有其他力量在起作用。生命似乎被安排得太过完美，不可能没有被设计出来的目的。

在我的学习中，我做了一个在外的轮换，我跟随一个名叫斯坦利·汉德的儿科眼科医生。我们在当地的儿童医院的年轻病人有先天性眼疾，如白内障和青光眼。我告诉汉德医生我正在和丘吉尔博士一起做的研究，以及我对DNA复制和遗传疾病的复杂性如何着迷。汉德医生和我谈论了在胚胎形成过程中，细胞中的三十亿对DNA碱基对需要分裂和复制多少次。当胚胎的细胞变成组织、器官和肢体时，有很多出错的机会，即使是最微小的错误也可能导致重大的先天性缺陷。

“任何人能够正常健康地从子宫中出来，这真是太神奇了。”我在走向另一个病人的房间的走廊上说。“从统计学上来说，怎么可能怀孕的过程这么井井有条、完美无瑕呢？”

起初，汉德医生只给我科学的解释来回答我的不断询问。我继续向他提问，不仅是关于生物学和医学，

还有关于所有这一切的潜在意义。最后他意识到我正在寻找的答案不会在任何教科书中找到。我正在寻找比科学更大更深的东西。

“如果人类的存在是偶然的，那么目的是什么？”我问。“如果地球上最复杂的生物是随机机会的结果，生命如何才能有意义？”

“我不认为生命是毫无意义的，”他最后说，“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

到这个时候，还没有人向我介绍过他或她是基督徒，我很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在中国的大学时期读过西方的伟大文学中关于基督教的内容，但我还没有探索过这个信仰的教义。我当时知道的只是，也许上帝确实存在，可能他正在引导我的生活。这种召唤的感觉一直在慢慢增长，并在我在哈佛的那些年里逐渐明确。也许汉德医生最终能帮我找到我正在寻找的答案。

有一天下午，汉德医生带我去医院的食堂吃午饭。

“你看到外面的那辆车了吗？”他问，指着一个靠近窗户的地方，外面是停车场。

我点点头。

“车和人脑有什么区别？”他问。

“人脑无比复杂。”我说。

“你认为一堆随机的废金属能自己组装成一辆车吗？”

“当然不可能！”

他靠近我，认真地看着我。“那人脑呢？”

我无言以对。如果一台复杂的机器像汽车不能自我创造，我怎么能相信一个复杂的器官像人脑能呢？尽管大脑由活组织组成，但两种材料都由相同的分子片段组成。在原子粒子的层面上，没有根本的区别。

“那么，这一切的答案究竟是什么？”我问道。我已经被科学的局限性困扰得不堪重负，我渴望找到更有意义的解答，来回答我对生命本质和价值的疑问。

汉德博士递给我一本圣经，之后的几周、几个月里，我全身心地投入阅读。起初，我并不确定我能否

在这些篇章中找到我所寻找的答案，但我对其可能揭示出科学无法提供的答案持开放态度。生命并非偶然，有一位创造者为人类设定了目标，这个想法让我从困惑中得到了巨大的解脱。这个永恒和永生的存在填补了科学无法填补的空白。

我和汉德博士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但最后我们失去了联系。多年后，在一次基督教眼科学会的会议上，我们再次相遇，我告诉他他对我的生命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我信仰之旅是如何从他的智慧分享开始的。

同时，我在丘吉尔博士的实验室里对大肠杆菌DNA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了我这样的信念：在显微镜下所见的这些复杂结构背后，必定有一位超自然的设计师。据我们所知，没有其他人在研究蛋白质和DNA在活细胞中的相互作用。我们很快发现了阻碍任何此类项目成功的根本难题，即，一旦我们破坏一个细胞，或者打开它以查看其内容，相互作用的蛋白质和DNA分子在过程中会被破坏。那么，如果每次暴露时这两个组件都被分开，我们又如何研究它们在活细胞中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呢？这似乎是一个科学的僵局，一个逻辑上的无法破解的难题。然而，我和汉德博士的交谈扩大了我的视野，包括了超越逻辑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我受到启发，不因科学上的难题就放弃。我坚信细胞背后的设计智慧超越了科学家目前的理解。

我们坚持进行实验，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最后，我们意识到，也许评估蛋白质和DNA在活细胞中如何相互作用的一种创新方法是观察第三个组件，即甲基化酶，一种在DNA上巡逻以保护和稳定其结构完整性的酶。

我们推测，由于甲基化酶不断地在整个DNA分子上来回移动，如果DNA的任何部分没有被甲基化，那么可能意味着有蛋白质结合到那个DNA区域，阻止了甲基化酶的接入。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搜索了整个大肠杆菌基因组，发现确实有几十个DNA区域没

有被甲基化酶触及，这表明这些可能是蛋白质结合的位点。我计算出这个结果偶然发生的概率是一千分之一。

为了进一步确认我们的理论，即这些未经甲基化的DNA区域实际上就是被蛋白质占据的区域，从而使甲基化酶无法接触，我们选择了一个我们知道缺失某种蛋白质的细胞进行实验。结果发现，那些之前未经甲基化的DNA区域现在已经被甲基化，这说明甲基化酶现在可以自由地接触那些DNA序列，因为没有蛋白质在那里进行阻挡。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性仅有千分之一。

随着实验的深入，我们观察到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其可能性已经降低到百万分之一。然后我们来到了这个创新性项目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如果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所有理论都是正确的，那么还有一个最终的测试将会证实它。假设我们在需要蛋白质结合到DNA区域的环境中培养细胞，那么甲基化酶应该再也不能接触到那个DNA区域。我们进行了最后的实验，结果确实证实了这个发现，这种情况的发生，其可能性仍旧只有千分之一，看来这并非偶然。因此，三个测试阶段都证实了，利用甲基化酶来评估DNA-蛋白质在活细胞中的结合是一种巧妙的方法。我们观察到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其最终的累积概率是十亿分之一，微乎其微。

这个由甲基化酶、蛋白质和DNA组成的化学三位一体是自然界的真正奇迹，是一个超凡的生物系统，其组成部分以完美的同步进行互动。它在复杂性上如此绝美，在协调性上如此无暇，我现在深信这并非偶然，而是神圣的设计。汉德博士是对的；必定有一个创造者在这如此精致、完整、完美的设计背后，让从细菌到人类的生命得以延续。

通过这个项目，丘吉尔博士和我成功地开发出了一种在活细胞内研究DNA-蛋白质相互作用的新方法，这是我一生都珍视的科学成就。我们的发现对医疗治疗有广泛的影响，因为研究者可以利用这种方法研究

基因在活细胞中是如何被开启和关闭的，以及这是如何导致疾病的。我们关于这种新方法的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这是全球最具声望的科学杂志。丘吉尔博士和我对论文的影响深感惊讶，我们收到了来自80个国家的科学家请求复制论文的请求。我们受邀在全球各地的会议上介绍我们的发现，并通过哈佛大学申请了美国专利。我们在丘吉尔博士的实验室进行的研究是我职业生涯中许多成功的生物医学探索的开端，这些探索不仅让我对科学的奇迹感到兴奋，更重要的是，它们揭示了更多创造者的荣耀。

* * *

1991年6月6日，我在哈佛的时间结束了。那天早上，近两万名学生、家庭成员、教授和校友聚集在哈佛大学院。大学校长发表了毕业演讲，并向本科和研究生授予学位。学生们按照他们的学校坐好，形成了一排排的黑色和红色的毕业帽和袍子。医学生区域喧闹有趣。我们把手术手套吹成五指气球，当我们的学校被宣布时，我们把它们扔到空中，看着它们在观众中弹跳。我们旁边是法学院的研究生，他们比我们安静得多，更加温驯。在法学生中有一个人，那时被称为……贝拉克·奥巴马。

那天下午，哈佛医学院的毕业生们在横跨校园的遮篷下举行了我们自己的私人仪式。我的父母和弟弟坐在一排，旁边是淑和她的家人，我们的儿子丹尼斯从一膝跳到另一膝，快乐地跳跃。我听着舞台上叫出的名字，凝视着校园，回想起我面试后的深夜漫步。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定为社会的最底层，没有未来的希望，现在我即将从地球上最有声望的大学之一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这样一个奇妙的不可能性再次暗示我的生活有一个精神目标，现在我知道那个目标将在眼科领域找到。

“王明，医学博士，优等生，”院长宣布，“并且是1991年哈佛医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医学科学最佳毕业论文的获得者。”

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我带着丹尼斯走上舞台，握着他的的小手。院长递给我文凭，但我只握了一会儿，丹尼斯就抓住它并把它带下了舞台。多年后，丹尼斯吹嘘说这一刻是他的名声，因为他也从哈佛获得了学位！我的父亲准备好拍照，从相机的另一边向我灿烂的笑容。我知道他有多么骄傲，因为他带领我们的家庭度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并看着他的儿子的生活几乎被毁掉。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和我妈妈为我做了多少，他们的努力使我能够从世界顶级的医学院毕业。

我们的毕业演讲者，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早些时候说过：“如果哈佛只是吸引最聪明的学生，而我们在使他们成为关心他人、积极、开明的公民和公民领袖方面并不出色，那么这就足够了吗？……我们必须教导我们的学生去深刻理解并珍视圣经中的警示，‘给予的多，期望的也多。’”

他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我得到的比我曾经想象的可能更多，我希望找到一种方式，回报的比我收到的更多。我跪在丹尼斯旁边，露出灿烂的笑容，当我爸爸数到三，又拍了一张照片。

第十二章 收养之国

“我现在是美国公民了！”我在电话中高声宣布，仿佛我自己就像春天的空气，轻盈且充满活力。在美国生活了整整十年后，我刚刚完成了成为美国公民的宣誓仪式。

电话的另一头是我的父母，他们从遥远的波士顿向我送来祝贺。我的母亲是哈佛大学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系的工作人员，父亲则是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病理学系的访问学者。我的兄弟明宇在1990年来美，开始了马萨诸塞州大学的遗传学和微生物学研究生课程。在我哈佛生涯的最后几年里，我和父母、兄弟一同居住在医学院附近的沃辛顿街上的一个两居室公寓。这是我们全家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首次聚集在同一个屋檐下，尽管我们与故乡杭州的距离仍有七千多英里。

完成医学院的学业后，我搬到了新泽西州的西橙镇，在圣巴纳巴斯医疗中心开始了为期一年的临床实习。刚到西橙镇的那几个月，我和淑、丹尼斯在我们五年婚姻生活中首次真正地住在一起。我们的生活各自独立，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和工作中度过，但我们希望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真正地成为一个完整的家庭。然而，到了那个夏天，我们意识到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婚姻的裂痕无法修复。那个秋天，我们提出了离婚。只有三岁的丹尼斯又一次被他的祖父母照看。我对于我年轻的家庭的破裂感到深深的挫败感。也许淑和我结婚时年纪太轻，或者我们曾天真地认为我们能够在距离如此遥远的两地维持婚姻。无论原因是什么，我

对不能为丹尼斯创造一个像我小时候一样的家庭生活感到深深的失望。多年后，我深深后悔错过了他成长的大部分岁月。为了逃避对失败婚姻的痛苦，我将自己更深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在面对我自己的家庭破碎的同时，我十分感激有父母和兄弟在我身边。从中国搬到美国，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地理和文化转变。但我也注意到，多年来，我内心深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美国人并不仅仅是身体跨越大洋，也不仅仅是一个官僚程序的完成。这是我在美国生活的十年中渐渐发生的内心转变。

我1984年第一次回中国之后回到马里兰时，首次隐约感觉到了这种蜕变。那时，我在马里兰大学读研究生已经两年半，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答辩了我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这是一个自然的休息，对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机会去看望我在杭州的家人。我通过兼职工作攒够了买往返机票的钱，以及我可以免税进口的八大商品。

我的家人在上海的机场接我。我离开中国时，我的弟弟只有十三岁，但现在他已经十六岁了，已经长得和我们母亲一样高。我几乎没能认出他！我们从上海坐火车回杭州，除了我弟弟的突然长高，其他的一切似乎都没有太大变化。虽然国家最近进行了经济改革，但我的家乡仍然很贫穷，因此即使我父母一生都在从医，他们也买不起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家电。我给父母买了他们的第一台冰箱、彩色电视、洗衣机、烘干机、家庭立体声、现代自行车和佳能相机。在来美国之前，我从未想过我有一天能买得起这么奢侈的东西。

我还为朋友们、昔日的同窗以及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动荡年代中曾经帮助过我的诸多尊师带回了精心挑选准备的小礼物。为了既省钱又节省行李空间，我带回了大约四十瓶旅行装的洗发水，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独特的美国产品，别具新奇。这些印有英文标签的小瓶子在我的长辈和朋友中间引起了极大的热议。

在我回国的那两周里，我的老师和昔日的同学们对我在美国的生活提出了无数的问题。他们对这个遥远且神秘的地方充满了好奇。我发现我在中国和在美国的地位截然不同。在美国，我是社会底层的一员——一个贫穷的学生，一个在汉堡王和最佳西方酒店做夜班的最低工资工人，清理油脂。在富裕的美国社会的眼中，我是穷人，但在中国，我是富人。他们注意到我因为吃的都是快餐而增加了体重。在中国，很多人仍然无法获得肉类和营养食品，我的体重对他们来说是另一个繁荣的标志。

每当人们问我在马里兰州做什么，我会说，“我在一个空气清新、道路干净到可以躺在上面的美丽的大学校园里学习。我住在一个豪华的公寓里，只有两个室友，而不是像在中国科技大学那样有十三个。我可以便宜地买衣服，看电影只要一美元。”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必须多么努力地工作，也没有告诉他们我面临的偏见。我的邻居和家人都期望我做得好，所以我只分享了在美国生活最光鲜的一面。中国，我的出生地，不再感觉像一个几乎剥夺了我渴望的生活的严酷的地方，相反，我感到重新连接了我的种族起源，并感到感激，因为我意识到，是我的东方教养、家庭价值观和工作道德帮助我克服了生活的挑战，使我能在美国成功。

当我回到马里兰州时，我意识到我内心的某些东西已经改变了。我的根在中国，但我在美国非常舒适，已经将自己的利益与我收养的国家的利益相结合。我感觉自己是两个国家的公民，是它们之间的中介。但我的两个家有不同的价值观、历史和文化，所以我有身份危机。我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我在这两个文化之间的边缘地带徘徊了几年，期间我对美国的欣赏增加了，我的英语也不断提高。最终我发现自己甚至开始用英语思考。在那之前，我会用中文思考，然后把思想翻译成英语才说出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英语对我来说变得更自然了。我不仅

开始用英语思考；我也开始像一个美国人一样思考。我全心全意地接受了美国的价值观，如自由和民主。

1989年6月，我对美国的忠诚感的体验可能是最强烈的。我在哈佛的第二年结束时，北京的中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已经达到了高潮。几个星期以来，学生们一直在中国的城市中心和平地示威，呼吁进行民主改革。6月4日的晚上，我回到宿舍，心里沉甸甸地思考着这些事情。前一天，学生们被下达了一个最后通牒，要么清理天安门广场，要么被政府军队强行驱逐。那天我很难集中精力学习。当我回到家，我打开了新闻，听到CBS的丹·拉瑟在现场报道，我简直心惊肉跳。

我猛地抓住电话，飞快地拨着号码。

“他们在屠杀人民！”我大声呼喊，声音充满了恐慌和震颤。电话那头是马里兰大学中国学生和学者协会的一位同胞。

在新闻报道中，我可以听到枪声，可以看到亡者和伤者被抬走。据推测，已经有数百人被杀。我无法想象任何一个国家会对自己的人民做出这样的事情。

“华盛顿将有一场抗议活动，”我的朋友说。

“我们正在请求国会保护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你能加入我们吗？”

“我会在国会山和你们汇合。”

几周后的一个清晨，我和一群中国美国学生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举行了一场抗议集会，抗议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的残暴行径。集会结束后，我们得到了与国会领导人会面的机会，包括当时是旧金山的新任议员南希·佩洛西。我们告诉她和其他代表，支持抗议活动的在美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如果在学生签证到期后被迫返回中国，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危险。

在此之前，我从未在政治上活跃过。尽管我曾是美国华人学生学者协会的主席，并在白宫见过一位美国总统，但我从未为任何政治目的呼吁过国会行动，因此，积极参与民主政治对我年轻的生活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我来自一个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正

如六四事件所揭示的那样，这个体制不容忍任何反对。能够在国会山大厦的走廊里自由地与代表普通美国民众的各界人士交流，让我感到自己被赋予了一种权力。我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少年时代因政治压迫遭受了深重的心理创伤，因此当我在美国品尝到年轻人所拥有的民主自由时，就再也无法回头了。

我真正成为了一个美国人。

由于这种内心的转变是在很多年的时间里发生的，所以入籍过程本身只是一个形式。在我完成了所需的文件工作并通过了背景调查后，我收到了通知，可以去美国海关和移民局的一位官员那里进行面试。我在英语、历史和政府的基本知识上进行了测试。这无疑是我一生中压力最小的一次考试，但同时，它也充满了意义。最后一步就是回去参加宣誓效忠的仪式。

1992年春天，正式仪式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把车停在纽瓦克市中心，走向位于布罗德街的彼得·W·罗迪诺联邦大楼。冬天很严酷，但现在空气感觉轻盈，充满了新的开始的兴奋。我走进前门，乘电梯上楼，来到一个平淡无奇的灰色办公室，我和其他二十个外国人一起，有些人在说西班牙语，有些人穿着色彩鲜艳的纱丽，有些人戴着头巾，我们都准备向美利坚合众国宣誓忠诚。

我们站在一面大的美国国旗前，红、白、蓝三色的旗帜围绕着一根高高的旗杆，旗杆顶部是一只鹰的标志。一位联邦法官带领我们进行了对美国的正式宣誓效忠。我们举起右手，庄重地承诺放弃对所有外国国家的忠诚，支持和捍卫美国宪法和国家法律。

站在那面鲜艳的旗帜前，我深感自己的幸运。整个世界，又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愿意接纳如此多的外国人，让他们把这块土地当作自己的家园？我从一个差点摧毁我未来的共产主义国家，来到了一个能让我与全球最优秀的人一起深造的自由之地。正是在美国，我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医生——如同我父亲和祖父一样的医生——的梦想得以实现。美国也是我精

神觉醒的摇篮，是我继续寻求信仰的温床。我在这个国家的经历，以及我遇到的信仰之人，唤醒了我对上帝的初次认知和我生命的初步目标。

我从中国带来了一种严谨的工作态度，以及一种由文化熏陶和人生苦难塑造的性格。在美国，我得到了自由、教育和有前途的职业。我对两国，尤其是美国，感恩在心；因此，有机会最终成为美国人对我来说意味着，我有责任去服务、捍卫这个伟大的国家，帮助保卫美国社会的基石——男女平等，这是一个在上帝庇护下的国家。

“当我完成医学训练后，”我对自己承诺，“我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以表达我对这个收养我、滋养我的国家的感激之情。我会忠诚地为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服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美国现在是我的家，是我的国家。我的父母和兄弟也最终入了美国籍。直到2006年退休，我的父母一直致力于改善在美国的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帮助那些饱受疾病折磨的人。就像在医学领域一样，回馈我们收养之国成为了我们家庭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也渴望在美国找到一个人，与她共同携手走向未来。尽管我的第一次婚姻并未如愿，但我不会让这个阻碍我继续扩大我的家庭，尤其是一个建立在爱情和基督教信仰之上的家庭。

第十三章 格温

当电梯门缓缓打开，我看见了她的身影，不由得挺直了腰，努力让自己看起来自然。她与另一位住院医师边走边笑着进入电梯。我之前只在远处瞥见过她几次，她身材高挑，引人注目，一头浓密的金棕色秀发，一双大大的绿眼睛。除了她的美貌，我还被她活力四溢的举止所吸引，每次遇见她，她总是笑容满面，开怀大笑。这个光彩照人的年轻女子是谁？我决定一探究竟。

1992年7月，我搬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为了在威尔斯眼科医院进行眼科遗传学研究的奖学金项目，这是美国的首家眼科医疗机构。一年的奖学金项目结束后，我将在同一家医院完成三年的眼科住院医师培训。我的目标是将我在激光领域的专业训练与顶尖的眼科训练相结合。我很幸运能被威尔斯眼科医院录取为住院医师，这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眼科机构之一。

在六层楼的大楼的四楼实验室，我在眼科临床研究主任、眼科教授拉里·多诺索博士的指导下工作。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找出导致眼部黑色素瘤和视网膜母细胞瘤的DNA突变。多诺索博士五十出头，是一位极其亲切的犹他州人，他一直是许多年轻医生的导师。有一天，我向多诺索博士询问那个年轻女子的身份。

“她叫格温，”他说，“她是三年级的住院医师。几年前，她在杰斐逊医学院求学时，曾在我的实验室工作过。”

“她是个怎样的人？”我问。

“她聪明且能干，”他回答，“她做实验极其高效，总是充满干劲。”

多诺索博士自然而然地谈到了她的工作，但我却想更深入地了解她的性格。

“她总是那么快乐吗？”我问。

“是的，她是，”他说，“你为什么想知道？”我耸了耸肩，“只是好奇。”

多诺索博士对我笑了笑。“她总是笑容满面，充满喜悦，”他继续说，“她对每个人都很和善。她的好脾气有时候似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这却是事实。当我凝视那双大大的绿眼睛时，它们就像一片清澈的湖水，纯洁而真诚。我有几次机会和她聊天——在食堂，医院的走廊，演讲结束后的讲堂外。她就像一道阳光，我被她的魅力深深吸引。当我完成我的奖学金项目，加入其他住院医生的行列时，她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住院医生培训，离开了费城，去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做角膜专科的奖学金项目。

过了一年，我仍在过着熟悉的生活。有一天，我在医院的邮箱里意外发现了一封信，回信地址上赫然写着格温的名字。

“我刚从中国的一次宣教之旅归来，”她在信中写道，“我有些照片想要与你分享。”

尽管当格温在威尔斯的那段日子里，我们并没有太多接触，但我对她的信感到十分惊喜。我一直很敬佩这个女孩，她的才华和魅力深深吸引了我。我们在费城中心的唐人街约了一次晚餐，她分享了她在坦帕完成奖学金项目、出国旅行以及重返费城求职的经历。她向我展示了她在中国湖南省的两个月期间所拍摄的照片，她与其他基督徒一起在当地医院提供救助。

“我喜欢那里的食物！”她说，“我现在一直想吃中国菜，我真的想学中文。这是一种非常美丽的语言。”

“我很乐意教你中文，”我热忱地回应。我们都笑了起来。

虽然我不确定格温是否因为对我有感情才联系我，但她的信无疑激发了我对她的好奇。那时我已经单身一年多，尽管作为住院医生的日程繁忙，我还是尽量抽出时间在费城唐人街的各种餐馆与她见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成为了好朋友。我试图理解她为何总是那么快乐和积极，很快我就明白了她的基督教信仰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她来自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对圣经的熟悉程度超乎我的想象。她毕业于著名的福音派学校惠顿学院，聪明且博学，所以虽然她希望我教她中文和中国文化，但我也从她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基督教信仰的知识。

自从汉博士向我介绍基督教以来已经过去了几年，我对生活和精神的许多问题仍然在寻找答案。我开始研读圣经，参加沃尔纳特街的第一长老会教堂的活动，那是一座在费城市中心已经屹立了二百多年的哥特式建筑。我对信仰充满好奇和敞开。我希望更多地了解上帝，探索我生活中的这种召唤感。同时，我希望接受信仰会帮助我更接近我新接受的这个有着强大基督教传统的国家。

有一天，在沃尔纳特街的教堂，牧师讲述了一个关于苦难及其隐藏的祝福的故事。苦难是我深深熟悉的东西。我坐在木质的长凳上，抬头看着从彩色玻璃窗户洒下的光束，蓝色和绿色的光芒。在我头顶上闪烁的色彩，与我们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笼罩着的灰暗色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我回想起那些年我在恐惧和黑暗中度过的岁月，我不禁想，为什么我要经历那么多的苦难？为什么我被迫承受那么多无休止的噩梦？这一切是否有原因？

“苦难使我们更接近上帝，”牧师说，“通过生活中的痛苦时期，我们的心会对他人变得更加柔软，我们的同情心会增长。”

我意识到，尽管上帝让我遭受苦难，但他也一直支持我。我所经历的困难使我对随后的机会充满了深深的感激。我所克服的并没有使我耗尽，相反，我

的杯子现在溢出了，我想从这个丰盛中给予他人。

格温和我并没有去同一家教堂，但她经常带我去基督教医学会的会议，那里的医生们因为信仰而汇聚一堂，共同研读圣经，听讲座，分享团契。这些各具专长的医生们，性格宽厚，为人善良，生活快乐，无比热爱他人，他们如格温一般过着正直的生活。在这个医学专业人士的群体中，我看到他们对科学的敬畏与他们对耶稣基督的坚定信仰之间，取得了极好的平衡。这个环境使我得以提出一些复杂的问题，并从我所敬仰和信任的人那里寻找答案。

在和格温重逢不久后的一天，我们一同参加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举行的基督教医学会的一个周六研讨会。在那一整天的活动中，一位名叫西姆斯的牧师博士，以其雄辩的口才，向聚集在会场的约一百名医生发表演讲。西姆斯博士分享了他的真实情感，包括他的妻子遭受一次严重的中风，她变得无助，完全依赖他的照顾，使他感到了强烈的愤怒和挫败感。这如同我在教堂听到的关于苦难的讲道，另一个信仰者的人性和诚实使我得到安慰和鼓舞。

“耶稣是一个熟悉悲伤，面临许多苦难的人，”西姆斯博士说，“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上帝，他化身为肉身，和我们一起承受痛苦，为我们承受痛苦，通过他的伤痕，我们得到了医治。”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上帝有了名字，有了面孔，有了性格，有了对人类的目标。基督教的上帝是真实的，是可以接触的。那天结束后，我感到了深深的召唤，准备把我的生命交给他。

“我怎样才能成为基督徒？”我问格温。

“一旦你接受了基督，你就要接受洗礼，”她说，

“你觉得我们能不能请西姆斯牧师现在给我洗礼？”

时间已经很晚了，其他的参与者已经离开，所以我们最后和西姆斯博士单独在一起。当格温向他转达了我希望接受洗礼的愿望，他立刻拿起一杯水。

我们三个人在讲堂里聚在一起。我低下了下巴，

西姆斯博士在我头顶倒下一些水。我能感觉到一股水流从我的耳朵流过，流到我的脖子上。虽然水是室温的，但我感到一阵寒意。在大学的讲堂——曾经是我努力拼搏、追求卓越的舞台——成为上帝的灵与与我的灵魂相融合的地方，这是多么的恰当。

西姆斯博士把手放在我的头上，开始祈祷。

像成为美国人一样，成为基督徒对我来说是一个长达多年的内心转变的过程，最后在一个只花了几分钟的仪式中达到高潮。我感到一种深深的平静。虽然洗礼并没有在传统的教堂里进行，但那一刻仍然有一种深深的神圣感。我知道上帝与我同在，他一直在引导我度过中国和美国的所有困难和挣扎，他将继续这样做……但我还有很多要学习的东西。

* * *

我与格温的交往日渐频繁，我们拥有许多共同之处，同为眼科医生，对角膜疾病以及其治疗方法都怀有浓厚的兴趣。每次相聚，我们的话题犹如磁针，总是指向角膜。她已经研究出了角膜专科的秘诀，因此总能教给我许多知识。同时，她热爱中国的文化和语言，我也乐于成为她的私人中文老师。每当她的发音出错时，她总会露出一个淘气又可爱的笑容，让我心生欢喜。我们俩都喜欢美术和古典音乐，常常在城南南街的一家小而满是艺术气息的餐厅用餐，那家餐厅叫做“维克多咖啡馆”，所有的服务生都是歌剧演唱者。每次用餐过程中，总有一名服务生会停下手中的工作，走上台阶，唱出美妙的咏叹调，格温和我都对此赞不绝口。她对学习交谊舞也充满兴趣，于是我每个周末都陪她去舞蹈工作室，我们在舞蹈的快乐中度过了许多美好时光。虽然我们在地理上相隔遥远，成长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但格温和我发现，我们的性格如此相似，有很多共同的兴趣，对家庭和工作的价值观相同，我们都热爱阅读圣经，都对生活抱有深深的热爱和欣赏。每次与她在一起，时间仿佛在瞬间流逝，我们总是在分别之前就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次的相

聚。

在感恩节前的几周，格温邀请我去她父母的家做客，她和她的妹妹还住在那里。她的母亲把我介绍给她的父亲，称我为“格温的中国朋友”。她的父母都是退休的医生，专门从事妇产科。格温的母亲待人礼貌，虽然没有过分的热情，但她的父亲是个科学迷，所以他立即对我产生了好感。他充满好奇，精神充沛，问了我许多关于眼科的问题。

他在递给我一大碗土豆的时候问我：“是什么吸引你选择眼科的？”

我回答说：“我在马里兰州研究过激光，我相信它们可以在改善视力方面创造奇迹。”

他问：“怎么说？”

我解释道：“我们可以用激光重塑角膜，这样患者就再也不用戴眼镜或隐形眼镜了。一旦这些设备得到FDA的批准，人们的生活将永远不会再是以前的样子。”

激光眼科手术的原始方法是准分子角膜切削术，或者叫PRK，它通过重塑角膜的外层来矫正视力。一种新的手术方法叫做激光辅助原位角膜磨镶术，或者叫LASIK，首次在1990年的希腊进行，然后在我1993年开始在威尔斯眼科医院做住院医生的时候，美国也开始进行这种手术。眼科医生首先会用刀片在角膜表面创造一个瓣膜，然后激光会重塑下面的组织，以便更好地将光聚焦到视网膜上，从而改善视力。LASIK比PRK带来的不适更少，恢复也更快。

我笑着说：“我们把新的方法叫做‘掀瓣照射’。”

格温的父亲对我们的科学谈话非常着迷，当我那天晚上离开的时候，他对我说：“随时回来，明。你在我家总是受欢迎的。”

我确实经常回去，尤其是对格温的兴趣越来越浓。虽然她的父亲热衷于问我关于激光物理和眼科的问题，但我想问他关于我新发现的基督教信仰的问题。格温的家庭一直是虔诚的基督徒。作为一名产科医生，她

的父亲接生过很多婴儿，所以我特别好奇他对科学家们面临的干细胞和胎儿组织研究的最新伦理问题的看法。

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告诉他，在哈佛医学院的时候，我在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眼科急诊室轮值。我帮助治疗了一个男人，他因工厂内磷炸药爆炸，全身遭受严重烧伤，面部肌肤被烧至焦黑，角膜前部更是被彻底剥离。在他住院的那几个月里，我一直照顾他，亲眼看着他的眼睛一点点地愈合。然而，角膜上那厚厚的白色疤痕让他彻底失去了视力，甚至连微弱的光线都无法感知。他眼睛上新生的疤痕组织和血管也意味着，想要通过手术恢复他的视力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询问主治医生，我们是否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医生却回答我，疤痕不幸的是伤口愈合的自然结果。免疫系统在成人伤口愈合过程中似乎过度工作，导致疤痕的形成。在那一刻，我深感无助，现代医学的力量实在太过有限，而我们所照料的这位患者将会在完全失明的状态下离开医院。

在遇到这位受伤男子后，我开始研读关于胎儿再生的文章。在母体子宫内，受伤的胎儿几乎无疤痕地愈合，那么为什么成人的身体愈合会留下如此明显的疤痕呢？我想，可能是因为子宫提供了一种无菌的液体环境，未出生的孩子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伤口愈合。在子宫内，愈合的过程不那么仓促，更加有序，结果是层层再生，而不留疤痕。而相反，成人的身体暴露在干燥、肮脏的环境中，伤口必须尽快闭合，以减少出血和感染的风险。我们作为成人，为这种快速愈合付出的代价就是无序的疤痕，也就是纤维化。

多年以来，医学研究人员一直在研究胎儿组织和干细胞——新受精胚胎的未分化细胞——试图将子宫的愈合特性带入成人的临床治疗中。在20世纪90年代初，科学家们还无法完全掌控干细胞，但一旦他们能够做到，将会在治疗各种人类疾病方面取得重大进步。然而，这无疑也会引发大量的争议，因为提取干细胞

用于治疗会破坏胚胎。

我对这个问题的两面性感到矛盾。胎儿组织和干细胞研究对治疗创伤性伤害和与衰老相关的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糖尿病、青光眼和黄斑变性，无疑具有巨大的潜力。然而，我不能接受以任何理由去伤害未出生的婴儿。但如果我们不继续这样的研究，我们又能给我们受伤和衰老的病人带来多少希望呢？我还能做什么来防止眼睛受伤后的疤痕和由此导致的失明呢？

我向格温的父亲分享了我的内心挣扎。“我们怎么才能研究胎儿组织来造福成人病人，而不伤害胎儿呢？”我问。

“我现在也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困境，”他承认，“但我相信我们会找到方法来进行研究，而不会涉及到麻烦的道德和伦理问题。明，不要放弃你的追求，保持信念，我相信上帝会在适当的时候赐给你智慧。”

作为一个新基督徒，我对他的指导感到深深的感激。他和格温一样，总是充满乐观和快乐，面带笑容。他没有将信仰和科学对立起来，而是以一种平衡的方式，在冲突中保持耐心。他培养了我对信仰和科学的好奇心，他确认了我的信念，我们应该能够接受和推动科学的突破，同时保持与我们的基督教价值观一致。我们永远不应该为了受伤或生病的成人的利益而伤害未出生的孩子，但也许上帝会向我们展示一种无需道德困境就能利用子宫的愈合力量的方法。看着那个因疤痕而失明的受伤男人，我深受触动，并决定继续寻找解决方案，这将是未来许多年的追求。

* * *

转眼间，我似乎已经成为格温的家庭中的一员，感恩节和圣诞节前夕，我都在他们家温馨地度过。圣诞节前夕的晚餐后，格温的父亲热情地问：“明，你愿意留下来过夜吗？”

“我非常乐意！”我答道。在美国生活了十二年，我尚未体验过传统的美国圣诞节。心中充满了欣喜，因为我知道我将与一家疼爱我如同亲人的美国家庭一

起度过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圣诞节。

他们在舒适的客厅沙发上为我铺设了床铺。翌日清晨，我发现壁炉架上挂着的袜子里塞满了礼物，而树下则摆放着用鲜艳的彩纸包裹、上面还装饰着卷曲的丝带和蝴蝶结的礼物。

格温递给我一个礼物，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件鲜艳的红色毛衣。我把它套在头上，感受到自己已经被这个家庭视为他们的一员，内心充满了被珍爱的感动。

新年前夕，我陪着格温和她的家人去长木花园观赏节日装饰的树。我身穿他们在圣诞节送给我的红色毛衣。“来，我们一起拍照！”她的父亲对格温和我挥手示意。

格温和我向对方靠拢，我轻轻地把手搭在她的肩。当她靠近我时，我感到心跳突然加速。我从未认真思考过我们是否可能有更深的关系，但在那一刻，我感到了一股强烈的感情在心中萌发。也许，我不仅可以做她的中文老师，还可以做她的……？

照片拍完后，我们稍显局促地彼此看着对方，她似乎也感受到了这种微妙的情感变化。我瞥了一眼她的父母，他们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疑惑的神色。他们是否察觉到了我们之间刚刚发生的小变化？我无法确定，但如果他们真的注意到了，他们在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并没有提及这个事情。

然而，不久之后，格温的父母对我态度明显变冷。他们变得更加客气，但却没有了之前的热情。而我，对格温的好感日益加深，我渴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和她在一起，尽可能多地待在她家里。然而格温的母亲，从一开始就对我不那么热情，现在变得更加冷淡，告诉我家里太忙，不能再接待我了。她认为格温最好和我保持距离，而不是让我们有更多的接触。就这样，我从被深爱变成了被拒绝。

我感到非常困惑和沮丧，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突然对我改变态度。

尽管她母亲反对，但在1995年初，格温和我还是开始了恋爱。她从未有过男朋友，她希望能和我在一起，但她也担心这会让她的父母不高兴。

“我妈妈说我们太不同了，我们不应该在一起，”格温向我解释道。“她告诉我圣经说，完全不同的人不应该在一起，我们不应该‘不平等地结合’。”

我第一次听到“结合”这个词。

“她说我们不同是什么意思？”我追问。格温没有回答。难道是因为我是一个新信徒？或许她的母亲只是需要时间来了解我，看我如何实践我新接受的基督教信仰。我充满希望和信心，我相信我能改变她的想法。

另一方面，我父母对格温宛如一见倾心。当她来到波士顿拜访他们时，他们热情地拥抱她，带她参观了他们在哈佛大学的研究实验室，我父亲还详细地解释了他的研究课题——中草药及其对心血管系统的益处。虽然格温不是中国人，但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尊重家庭，这在中国父母眼中都是无比重要的品质。格温也深爱我，她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所以我父母对她非常满意。

我只希望格温的父母也能对我同样的接纳。我开始尽力去赢得他们的喜爱。我甚至为他们举办了一个特别的中国新年派对。我想向他们展示我对他们女儿的深深热爱，我是一个深情，负责任并且有爱心的男人。我也想向他们展示我对美国和我的出生国家的热爱。我用红灯笼、丝带和放烟花的小男孩的雕像装饰了我的高层公寓，我计划在他们和一些朋友面前弹钢琴表演。

派对刚刚开始，我的朋友们就催我弹钢琴，因为我之前答应过他们，但我的目光始终停留在门口。我不想在格温和她的父母到来之前开始弹奏。整整两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没有出现，我心中开始失望。然后，我终于听到了敲门声。

我打开门，看到格温穿着我在旧金山旅行时为她买的美丽的翡翠绿色旗袍，这是中国的传统晚礼服。

这个颜色和她的眼睛很配。她开心地对我笑，她的父亲对我和我们初次见面时一样友好和热情。他为迟到道歉，然后犹豫地看了一眼格温的母亲，她站在那里强忍着皱眉。显然，她是主导者。

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高兴他们终于来了！我带他们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向他们介绍我的朋友，并解释1995年是中国农历的猪年。我分享了每个装饰品背后的含义，并告诉他们我会在钢琴表演结束后提供传统的中国汤。

我刚弹完第一首曲子，格温的母亲就突然站起来，急切地想要离开。他们甚至还没有品尝过我特制的中国汤呢！格温恳求她的母亲留下来享受剩下的晚上，但她只是假笑一下，然后朝门口走去。

不顾一切礼仪，我让我的其他客人在公寓里自己待着，我陪格温和她的父母乘电梯下到大堂。我看了一眼格温，想起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那是在一个与这个颇为相似的电梯里。她依然那么美丽，充满活力，快乐。然而，无论格温和我从一开始就变得多么亲近，她的父母对我的态度使格温似乎仍然如此遥不可及，无法接近。我感到非常沮丧，因为我仍然不知道我为什么从被爱变成被拒绝。我们在下降的过程中谈话——格温对派对兴高采烈，她的父亲快乐而感兴趣——而她的母亲仍然冷淡而沉默。

下次格温见到我时，她为发生的事情道歉。她含着眼泪，不情愿地解释了她的母亲完全拒绝我的真相。问题不是我是一个新信徒；问题是我是中国人，不是他们的同族——盎格鲁-撒克逊人。这才是她母亲所在乎的全部。

我意识到我的中国新年派对实际上是一个大错误，因为它只是加剧了情况！尽管我有好意，但派对只是强调了我的文化和种族起源……和我们的文化差异。

我感到震惊和不解。当我还只是格温的朋友，他们对我满怀爱意，现如今我们正在谈恋爱，我为何会因种族问题而受到质疑？基督教不是一种接纳所有种

族和国籍的信仰吗？那么，这些基督徒为何仅仅因为我并非白人，就拒绝我融入他们的家庭？

那时，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十二年。我接纳了这个国家，成为了公民。虽然中国是我出生的地方，但我如今已是美国人，我一直尽我所能为这个接纳了我的国家尽献心力。初来美国的那几年，我曾经遭受过米勒博士和安德森博士般人士的歧视和偏见，他们从未尝试去了解我，超越我的种族身份。相比之下，格温的家庭确实花了时间去了解我，他们开始对我生出了喜爱和关怀。然而，我却仿佛横越了一道无形的界限；我可以作为他们女儿的朋友，却不能作为他们的女婿。我无从应对这种情形！这个打击无比猛烈，我开始意识到种族歧视往往存在于人们最深处、最私人的领域。即使一个人可以接纳另一个人作为朋友，甚至是最好的朋友，但他可能仍然不愿意全心全意地通过婚姻接纳他进入自己的家庭。

格温的母亲用尽所有办法来说服格温不再和我来往。“你能想象有一个混血儿吗？”她的母亲问她。

“我不认为你会快乐。”

“你知道我并不同意她的观点，”格温对我说。

“我爱你，我爱你作为一个华裔美国人的事实。我并不认为你的种族是问题。”

问题的真正所在，如果不是我的种族，那就在于格温如何忠实地服从她父母的意愿。她已经三十一岁了，但她的父母仍然掌控着她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她晚上回家的时间，到她工作的地点。由于我还在费城完成我的住院医师培训，她的母亲的策略是尽可能地让她远离这个城市找工作。

“你离开费城简直是疯了，”我说。“你的家人，你的学校，你的住院医师培训，你的医生联系人，你的病人都在这里……我在这里！你有所有的理由留下来。”

“她不希望我在费城工作，或者在宾夕法尼亚州，或者在任何邻近的州。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明。”

我们坐在我们最喜欢的一个中国餐馆里。我沉思

片刻，她的绿眼睛在墙上的翡翠龙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美丽。那条雕刻的龙正在追逐一颗近在咫尺却又触之不及的宝石。我感到自己也被困在同样的永恒追求中，无法保证我能抓住这个只有一臂之遥的珍珠。这个曾经深情地拥抱我，鼓励我基督教信仰之旅的家庭，现在却因为我的种族而称我不够格，不能成为他们家庭的一员，这让我如何能接受？

三个月后，格温做出了我既期待又害怕的决定。

“我要去俄亥俄州工作。我两个月后离开。”

“至少俄亥俄州是一个邻近的州，”我试图开玩笑地说。但我看着她，满是悲伤。“你知道你讨厌寒冷。你在那里会冻僵的。那里比费城还冷！”

格温喜欢温暖。每当天气低于五十度时，她几乎会冻僵。她在阳光明媚的佛罗里达州做研究员时，她更快乐。我们都知道她会很痛苦。她无法回答，所以我们沉默了几分钟，直到格温深深地叹了口气。

“爸爸想念和你在一起的时光，”她最后尴尬地嘟囔道。

“我也很想他。”

1995年的八月，格温离开了费城，前往俄亥俄州。我尽可能多地去看她，但在我的访问中，我能感觉到，她的母亲即便身在费城，却仍对她施加着遥远而深刻的影响。格温从未让我进入她的公寓，甚至连大楼的大堂都不让我进入。

次年夏天，我在威尔斯眼科医院完成了住院医师的实习后，我自己也去了迈阿密的巴斯科姆·帕尔默眼科研究所做角膜专科的进修。格温对我能够去更温暖的地方生活感到羡慕，我希望我在永恒的阳光下的生活能最终吸引她来到我身边。我们继续着我们的异地恋，忍受着她母亲的冷淡，同时坚信只要我们彼此相爱，地理和文化上的距离最终都会被逐渐拉近。

第十四章 两封信

我一大早就离开了公寓，踏上了通往南方的A1A公路。在我驶过的迈阿密海滩，左侧是大西洋蓝绿色的波涛汹涌，右侧则是色彩斑斓的艺术装饰风格建筑，在黎明的静谧中矗立。路边的棕榈树叶在清晨的寂静中轻轻摇曳，日出的色彩洒遍地平线，照亮了海面。迈阿密海滩的美景令人屏息，这里充满了各种令人振奋的活动。然而，我却几乎无暇去享受这一切，因为我整日忙于看病人，晚上的大部分时间又被一家兔子公司所占据。

我非常乐意走过1200多英里的路程去拜访格温，她正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附近的一家眼科诊所忙碌着。但她更希望逃离那里寒冷的天气，来到阳光烂漫的佛罗里达。每次她来到迈阿密，我们都会去海滩，享受阳光的温暖和沙滩的舒适。尽管她的母亲一直反对我们的关系，但格温似乎对我们的关系更加坚定，所以我深信，只要时间到了，我们就能赢得她父母的支持，最终能够在一起。

在格温的访问之间，我投入到研究中，试图找到一种防止角膜受伤后形成疤痕和失明的方法。在马萨诸塞州总医院遇到那位因角膜创伤后疤痕形成而失明的病人七年后，我终于可以深入研究这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因为我现在正在做角膜研究，并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角膜创伤和伤害。我仍然希望能找出如何利用干细胞和胎儿组织来改善人类角膜受伤后的愈合过程，但又不妨碍胎儿的生存。多年来，我一直找不到解决干细胞和胎儿组织研究与生命神圣性之间冲突的

方法，几乎要放弃了。但我感到自己因新发现的基督教信仰而感到强大和转变，得到了格温的支持和鼓励。我也记住了格温的父亲在早些时候的一次晚餐上对我说的话——只要有耐心，上帝会在适当的时候赐予我们智慧。

那次谈话后，我口袋里总是带着一张纸，上面写着《雅各书》第一章第4节的经文：“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的人生旅程一次又一次地教给我，没有什么值得拥有的东西是可以轻易或快速得到的。只是因为科学研究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冲突难以解决，并不意味着解决方案不存在。我需要坚持下去，相信上帝会在他完美的时间里指明道路。

在巴斯科姆·帕尔默眼科中心，我选择了世界知名的眼表疾病和重建专家谢弗·曾教授作为我的研究导师。我向曾教授分享了我的疑虑、冲突和困惑，就像我向格温的父亲做的那样。

我说：“我不明白我们如何能避免这项研究，因为胎儿组织具有神奇的无疤愈合能力。但我不想像伤害胎儿。我已经为这个问题纠结了好几年。我们如何能在不伤害未出生的孩子的情况下，让我们的成年病人受益呢？”

他透露给我，他的实验室其实最近已经开始重新探索使用羊膜的可能性。

他说：“羊膜囊的生化性质与胎儿组织相似，正因为此，我们在探究它在体外是否也有着同样的愈合能力。”

曾教授的话让我欣喜若狂。我迫不及待地开始寻找关于羊膜在医疗治疗中应用的资料。羊膜是坚韧而透明的羊膜囊的一部分，婴儿就在这个囊中在母体内生长。在二十世纪初，医生们开始尝试使用胎盘中的羊膜来减少胃部手术等手术所产生的疤痕。在20世纪50年代，医生们又一次尝试用羊膜来减少一般手术中的纤维化。然而，由于当时羊膜组织生物工程的技术

限制，此类应用并未得到广泛推广。

在首次使用羊膜进行实验近一个世纪后，曾教授将这个理念引入了眼科领域。我对终于找到解决我多年困扰的问题的可能性无比兴奋。我感谢上帝，让我经过漫长的旅程，来到了佛罗里达南部的曾教授的实验室，离我在哈佛医学院最早提出的问题有数百英里之遥。

曾教授和我收集了通过剖腹产生下的宝宝的母亲捐赠的羊膜囊，这是在分娩后唯一能保持羊膜囊完整和可用的方法。我们开始在实验室的兔子上测试羊膜，想看看我们是否能模仿胎儿的环境，复制羊膜的快速再生以及无疤愈合的特性。我在每只兔子的眼睛上进行激光治疗后，用羊膜覆盖一只眼睛一周，另一只眼睛则不覆盖，以便进行实验控制和结果比较。在观察了兔子的角膜几周后，我邀请了曾教授和巴斯科姆·帕尔默的角膜专家们——包括理查德·福斯特教授、威廉·卡尔伯森教授、安德鲁·黄教授、卡罗尔·卡普教授、爱德华多·阿方索教授、哈利尔·汉纳教授和斯蒂芬·普夫格费尔特教授——来检查角膜疤痕，并记录他们对结果的印象。

我告诉他们：“没有人知道哪只眼睛接受了羊膜治疗。只需要仔细看看，然后评估每只眼睛的角膜疤痕的数量。”

这个双盲试验证实了我自己的发现，即被羊膜覆盖的眼睛的疤痕数量比未被覆盖的眼睛少了75%。我欣喜地发现，子宫的愈合能力实际上仍然存在于羊膜囊组织中，而且由于胎盘在出生后被丢弃，使用这种组织对宝宝来说是完全无害的。

我对羊膜如何减少疤痕的分子机制非常好奇。在仔细观察之后，我发现接受羊膜治疗的眼睛炎症较少。羊膜在激光治疗后的24小时内覆盖角膜，从而抑制了自然的、过度的伤口愈合反应。炎症减少意味着细胞死亡减少，这最终导致了疤痕的减少。我们在科学文献中发表了第一篇证明羊膜移植在减少角膜疤痕和细胞死亡方面取得了实验室成功的论文，并解释了这种

治疗如何帮助恢复视力。

在努力捕获子宫愈合奥秘的过程中，我们取得了瞩目的突破。但是，当我们试图将这些发现应用到临床实践中时，我们却面临了一道巨大的难题。在实验室里，我们可以在完全控制的环境下与麻醉下的兔子进行操作，但在现实的创伤场景中，把羊膜缝合到病人疼痛的受损角膜上将面临极大的困难。受损的眼睛组织容易在缝合过程中被刺穿，这可能会使眼睛处于感染和失明的风险之中。此外，将羊膜精确缝合到部位所需的精细技术也需要高度专业的外科医生，而他们可能无法在关键时刻到场。而且，羊膜也必须随时准备好，以便病人在受伤后的24小时内接受治疗。

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法，能够更安全、更有效、更及时地将羊膜应用到新鲜的眼睛伤口上。

我们已经如此接近利用胎儿组织治疗角膜疤痕的道德解决方案，但现在却面临着新的挑战。我对我们的进展被打断感到沮丧，但我仍坚信，我们可以在坚守道德原则的同时推动医学的进步。我不能让这些困难阻挡我前进的步伐。我一直在回想格温的父亲曾经说过的话，我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找到一种方法，让子宫的愈合能力广泛地应用到眼睛受伤的病人身上。我只需要一个正确的想法，而这个想法在恰当的时候出现了，部分归功于我的弟弟明宇的帮助。

1997年的7月，明宇从波士顿飞到迈阿密，帮我搬到了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我在那里接受了范德堡大学的一份工作。我们将我的所有物品装满了一辆U-Haul拖车，挂在我的车后面。格温没有时间陪我长途驾驶，但她计划在我安顿下来后不久就来看我。我很感激我弟弟陪我一起驾车旅行，因为我在他小时候一直照顾他，现在他来帮助我。

明宇砰的一声关上拖车的门，用力拉紧挂锁，确保它牢不可破。然后他滑进副驾驶座，我驾车驶上了通往迈阿密北部的95号州际公路。

他正在调高空调的时候问我：“你的羊膜研究进

展得怎么样？”

“在兔子身上，羊膜移植已经取得了成功。但如果要在真正的病人身上应用，我们还需要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把羊膜送到受伤的眼睛上，最好不需要把它们缝合到角膜上，因为缝合带来的风险太大，而且通常不能立即进行。”

我紧握着方向盘，游走在繁忙的车流中，看着高速公路上的白线飞速地从我们身边掠过。我一直在思考羊膜的优点，我一直在寻找我需要的解决方案。我告诉明字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向上帝祈祷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并相信上帝会再次赐予我智慧。

我看到明字拿出一瓶眼睛润滑液来滋润他的隐形眼镜，那一刻我灵机一动：“就是这个！”我大叫起来。

“什么？”明字问。他的头向后倾，向每只眼睛挤了几滴液体。

“隐形眼镜！”我兴奋地说。

这个想法如此直接，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之前没有想到。人们已经将隐形眼镜放入眼睛几十年了。我们可以将羊膜融合到隐形眼镜的底部，将它们装在瓶子里，存放在世界各地的急诊室。任何具有基本医疗训练的人都可以将隐形眼镜滴入病人受伤的眼睛。我意识到明字的问题和我对上帝的信任带来了这个简单而美丽的想法的灵感，这是我长期寻找一个符合信仰和科学的解决方案的答案。

我大笑起来，然后伸手在前座打了明字的肩膀一拳。

“谢谢你，明字！”

“我其实没说什么，但是不客气。”

我刚抵达纳什维尔，便与一位朋友共同向美国专利和商标局递交了两项关于羊膜隐形眼镜的专利申请。一项针对的是化学伤害，另一项则是针对激光角膜治疗。由于专利审批流程可能要耗费一两年的时间，我在此期间继续以传统方式进行研究，将羊膜缝合到病人的角膜上。羊膜移植将在我未来几年进行的眼睛重

建手术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我在巴斯科姆·帕尔默眼科研究所的学习期间，我全面掌握了角膜手术和激光屈光手术的技术。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LASIK手术进行了一系列批准，开启了屈光手术的新纪元。为了迎接即将在研究所进行的首次LASIK手术，巴斯科姆·帕尔默购置了第一台激光器。我利用自己在激光物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协助工程师安装激光器并为手术进行校准。在我们招募了第一批病人之后，我在巴斯科姆·帕尔默进行了首次LASIK手术，创造了研究所的历史。

经过近二十年的激光物理和医学训练，我现在正在我选择的医学领域工作，为其做出贡献，就像我的父亲、母亲和我们家族中的一长串医生所做的那样。我深感荣幸，我正在继续这个备受尊敬的家族传统——医疗。

我作为新任的范德堡激光视力中心主任来到了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我的工作就是从零开始建立这个中心。在我在范德堡的任期内，我进行了学校历史上的第一次LASIK手术。在大约五年的时间里，我担任FDA眼科设备小组的顾问，为美国的第一次LASIK批准提供咨询，并为FDA批准一系列创新的屈光手术技术工作。后来我开设了自己的诊所，成为该州第一位进行全激光LASIK手术，然后是激光白内障手术，最近是激光KAMRA手术的医生。

在我搬到纳什维尔之前，我对这个城市除了它的乡村音乐声誉之外，知之甚少，但当我适应了我的新生活，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田纳西州中部的风景让我想起了我家乡杭州，那里有起伏的山丘，深深的山谷，河流和湖泊。当我刚到达时，纳什维尔还是一个几乎完全围绕西区中心的小城市，而当它延伸到市中心时，西区便逐渐融入了充满霓虹灯的百老汇街，那里有着浓厚的市井氛围，到处是酒吧和纪念品商店。但我喜欢的是，似乎每个角落都有教堂。在我在范德

堡的工作和我在这个基督教社区的生活中，我看到的不仅是专业发展的机会，也是个人和精神成长的机会。现在我只需要说服格温搬到纳什维尔。

到1997年，格温和我已经在一起三年了。我确信她会喜欢纳什维尔的温暖天气和基督教社区。她可以找到一份眼科医生的工作，也许在我在范德堡的部门，我们可以终于在没有人父母控制的情况下在一起。

当我试图说服格温搬家的时候，她正在和她的父母进行重大的讨论。她没有提到所有的细节，但我知道这些争论是很激烈的。无论我们的关系如何稳固，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我永远不能不再是中国人——只要我不是白人，她母亲对我们的态度就不会改变。尽管她母亲一直反对，格温和我还是想结婚，我们继续慢慢但肯定地向那个方向前进。

1998年10月，我搬到纳什维尔一年多后，格温和我决定订婚。我们在芝加哥的一次眼科会议期间去购买戒指。我们最喜欢的那个有一个美丽的圆形钻石，重量稍微超过一克拉，镶嵌在白金上。不幸的是，它远远超出了我当时的负担能力，因为我刚刚开始我的第一份工作，而且正在偿还大量的学生贷款。

我们站在那里，盯着一排排的钻石戒指，它们在黑色天鹅绒衬里的玻璃盒子的黑暗中闪闪发光。

“我先买，你以后再还我！”格温建议。

我看着她，部分震惊，部分好笑。“什么？你确定吗？为什么我不先存钱呢？你还没有向你的母亲宣布这件事。”

“我知道你刚刚开始，但我已经工作了几年，所以我可以做到。”

“这让我感觉不太男子汉。”

然而格温显得异常迫切。她对这段婚姻的渴望显然与我无异。她的这番举动深深打动了，让我坚信，她对我们的共同未来投入了同样的热情。格温购买了戒指，我应允她我会尽快还钱给她。我们俩都为即将步入订婚的大门而欣喜若狂。我回想起在威尔斯眼科医院的电梯里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她从中国回来后

的重逢，以及我们在国家的两头维持的长距离恋爱。历经近五年充满爱与痛，笑与泪的磨砺，我们终于能够触摸到成功的曙光！

在去芝加哥的旅行之后，我想给Gwen一些空间，让她和母亲好好谈谈我们即将订婚的事情。我知道这对她来说是一次重大的考验，尽管我们已经买了戒指，她仍然不会全然承诺，除非她的母亲给予我们她的祝福。

直到十一月的一个月后，我才再次见到格温。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我们为了一场舞蹈表演而再度相聚，我告诉她这绝对是一场不容错过的演出。在哥伦布机场，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然后我回到纳什维尔。我差点误了飞机，但她舍不得放我走。她的脸上挂满了泪水，破坏了她精心打扮的妆容，迹象着她的睫毛膏沿着脸颊流下。我无法理解她为何如此动情，但她在那一刻看起来无比美丽——尽管有些滑稽，因为她的妆已经被弄乱了。我停下来给她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匆匆赶去搭乘我的航班。

那是我最后一次为她拍照。

那次相见之后，她不再和我说话，也不回我的电话。我想去俄亥俄州找她，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但我选择等待。我想给她一些时间，但我也深感恐惧，害怕真相的揭示。在沉默了几周之后，正如我深感担忧的那样，格温终于联系了我。

1999年1月的一天，我收到了一封厚厚的信。当我打开它，我发现了一封长长的，皱巴巴的信，是格温的手迹，每一页都被泪水湿润。她写道，她终究不能嫁给我——没有家人的祝福——她的母亲就是不会同意。她不想再让我为此停滞不前，也不想再给我或我们带来更多的伤痛。

一切都结束了。

我在1994年收到的格温的第一封信充满了希望……她的最后一封信彻底打破了所有的希望。

五年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五年来，我一直忍

受着她父母对我们的反对，因为我是中国人，不是白人。我感到如此的挫败。在那些年里，格温和我曾多次考虑向她的父母屈服，结束我们的关系。但我们的爱情比所有挑战更强大，我们一起抵抗了她父母的反对，并坚持度过了所有的难关。当我们买下戒指，我以为我们终于解决了问题。我以为格温已经决定不顾她母亲对我的偏见，嫁给我。

我们曾近在咫尺，近得那么真实，那么强烈。所有的期待，所有的希望，就在那一刻化为乌有，我深深地陷入了悲痛之中。

几日后，又一封截然不同的信件送到了我手中，那是来自美国专利和商标局的通知，我的羊膜接触镜发明获得了第一项专利。这个构想源于十多年前的医学院，如今终于实现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未来的病人们。我向范德比尔特大学提出了创建EyeVU——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构想，以期制造出镜片的原型，最终实现商业化。

这两封信，一封来自专利局，一封来自格温，摆放在我桌上，像两端的天平，挥动着欢喜与绝望。我追溯着记忆，回到那个和格温的父亲共享晚餐的时刻，他鼓励我在科学和信仰的道路上坚持前行。上帝终于赐予了我所需要的智慧，但这份智慧却是苦乐参半的，因为我渴望再次坐在格温家的餐桌旁，作为她父亲的女婿，与他面对面地坐着，分享我们是如何坚持不懈，直到找到了解决胎儿组织研究道德困境的办法的好消息。而现在，我们正因为获得了羊膜接触镜专利而享受着胜利的喜悦。

但是这一切都不可能再发生了。我永远无法告诉格温的父亲，他始终是对的。

我没有回复格温的信，也没有给她打电话，尽管我无比地想念她。我知道，她的母亲永远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我无法理解，作为基督徒，她如何能如此歧视他人。基督教应当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这种明显的偏见似乎完全违背了神的旨意。然而，当我和格温的关系破裂的时候，我痛苦地意识到，信仰本身和

人们实践信仰的方式，往往是两回事。格温的母亲的控制欲和缺乏爱，并不能否定我和她家人共享的基督教信仰。学会把信仰本身和信徒的行为区分开来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但这也激励我更真诚地过基督徒的生活，更开放地去接纳那些和我不同的人。我决定，无论一个人的种族背景如何，我都不会以这种歧视和缺乏爱的方式对待任何人。

虽然我和格温的关系并未以婚姻告终，但那份失败的感觉和我第一次婚姻结束时一样深沉，一样痛苦。虽然这两段关系的失败原因截然不同，但我的应对方式却是一样的——我选择了回归到工作中，寻求避风港。我的研究和临床实践更可衡量，更可控，相比起感情的混乱，让人少了些许失望。

虽然我的爱情总是以心碎告终，但我的工作却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持久和积极的影响。正是通过我的病人，我找到了真正的使命和无私的驱动力，这最终会引导我走向爱。一个特别的病人，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的墨西哥少年，改变了我的职业轨迹，他给了我一个我以为我永远无法接受的礼物。

第四部分 回馈

第十五章 复明基金会

“他从十岁开始就失明了。”电话那头的女士说，“一次化学烧伤严重损害了他的双眼。这真是太悲惨了。他已经在几个大型医疗中心做过手术，但都失败了，医生们都说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但我听说了你们的开创性工作，我想你们可能帮助他。”

1999年的夏天，我接到了来自卡罗尔·克莱因的电话，她曾是北卡罗来纳州教会山一所高中的修女，现在教授视力受损的学生们。她告诉我关于她的一名学生——弗朗西斯科·萨拉查，一个来自墨西哥的17岁少年。他的母亲克莱门蒂娜带着他来到美国，希望能找到恢复他视力的奇迹。在经历了多次失败的手术后，许多医生都告诉他们弗朗西斯科的眼睛已经无法恢复，但克莱门蒂娜坚决不肯放弃。

卡罗尔向我娓娓道来弗朗西斯科的经历。七年前，在墨西哥蒙特雷附近的家乡，弗朗西斯科和他的表兄弟在一家工厂附近的排水沟中发现了一个闪闪发光的玻璃瓶，像垃圾堆中的一颗璀璨宝石。当弗朗西斯科从瓶口拔出塞子时，硫酸流了出来。当酸液碰到沟里的水时，它爆炸成一团烈火，灼伤了弗朗西斯科的双眼。他立刻陷入了永无止境的黑暗。

几个月后，墨西哥城的一位眼科医生在弗朗西斯科的左眼上进行了角膜移植手术，但他所恢复的视力只维持了两天，角膜很快就变得朦胧起来。他的右眼被认为已经损坏得无法修复。失去视力的弗朗西斯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从一个活泼外向的男孩变得越来

越内向。克莱门蒂娜，身为一位有着深厚信仰的女性，她决定要挽救儿子的视力。于是在1998年的春天，她带着弗朗西斯科来到美国寻求医疗援助。她们的情形与我1982年初次抵达美国时如出一辙，同样的行李，同样的现金，她们加入了北卡罗来纳州教会山的亲戚。听到她们的故事，我回想起我在美国的早期日子，那时我正试图在一个陌生的国度中找到我的方向。我在内心深处，对弗朗西斯科的挣扎产生了共鸣，我被他母亲的爱和决心所感动。

在北卡罗来纳，克莱门蒂娜遇到了卡罗尔·克莱因。卡罗尔被弗朗西斯科的遭遇所触动，开始帮助他的母亲寻找可能恢复视力的医疗途径。一位当地的外科医生检查了弗朗西斯科，表示他因化学烧伤导致的伤害太严重，无法进行任何恢复性手术。他们被推荐到了杜克大学的一位外科医生那里，但那也是一条死胡同，因为他同样认为弗朗西斯科的眼睛已经损坏得无法修复。左眼已无希望，右眼受损严重，如果他接受角膜移植，很快就会因为血管的过度生长而形成疤痕，变得和他在墨西哥城的左眼一样失明。

“他需要的是一种罕见而特殊的微创手术，”杜克的外科医生建议说，“但全国只有三位医生能做这个手术。我们推荐你去纳什维尔的那位。”

这时卡罗尔给我打电话。“你是我们的最后希望，”她语气中充满了期望。

我告诉她，我会竭尽全力来帮助他。我急切地期待着与这个年轻人的会面，因此我让他们尽快来纳什维尔。

他们在一周后抵达。我检查了弗朗西斯科的眼睛，发现他已经接受过失败的角膜移植的左眼已经萎缩，已无光感，无法再度恢复。因此，我们唯一的希望便是尝试恢复他的右眼视力，然而由于严重的疤痕和血管生长，他的右眼只能看到光。杜克医生提到的特殊微创手术，涉及到复杂的干细胞移植。然而，对于弗朗西斯科来说，这将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如果失败，他的右眼也将如同左眼一样萎缩，弗朗西斯科将会在

余生中完全陷入黑暗。当卡罗尔为他们翻译时，我向弗朗西斯科和他的母亲解释了手术的困难，有限的好处和风险。经过一起祈祷，弗朗西斯科和克莱门蒂娜决定继续。

面对弗朗西斯科，我决定尽我最大的努力，作为一名眼科医生，竭尽全力帮助他。我诚实地告诉他，“你的复明过程将会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旅程，就像从纳什维尔步行到纽约市，但我将陪你走完每一步。”在我这个年纪，我已经非常熟悉长途跋涉，所以我知道我会履行我对弗朗西斯科的承诺。

1999年8月11日，弗朗西斯科在我这里进行了初次眼科检查三周后，他回来进行了右眼的第一阶段手术。我去除了在他的右角膜上形成的疤痕和血管，并缝上了羊膜，以防止他的眼睛在组织愈合时再次形成疤痕。

弗朗西斯科接着在几个月后返回纳什维尔进行角膜移植和成人供体组织的干细胞移植。然而，在我们有机会进行手术之前，事情出了大问题。化学伤害使他的右眼受损严重，以至于角膜实际上穿孔，产生了微小而危险的液体泄漏。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几个月内对他的右眼进行两次紧急的角膜移植，只是为了挽救眼球本身。正如我们预期的，血管疤痕组织很快就在眼睛上再次生长，无序的疤痕形成过程使无数患有严重角膜损伤的病人反复失明。

此时，我们唯一有可能恢复弗朗西斯科右眼视力的方法是进行复杂的角膜干细胞移植手术，这种手术只在全国几个中心进行。干细胞位于环绕角膜的组织环中，它们是眼睛愈合能力的关键。弗朗西斯科右眼的化学烧伤非常严重，以至于破坏了所有弗朗西斯科自己的角膜干细胞，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眼睛以如此激进、反复形成疤痕和血管的方式异常愈合。尽管机会渺茫，我们还是成功地进行了手术，几个月后，他的眼睛似乎真的可能愈合，他的视力终于可能恢复。

然而到了2000年11月底，弗朗西斯科的眼睛又开

始迅速恶化。11月24日，星期五，我告诉卡罗尔和克莱门蒂娜把他带回纳什维尔，我们可以尝试一个前所未有的四步手术，包括另一次角膜移植，另一次角膜鳞状干细胞移植，白内障去除和人工晶状体植入。弗朗西斯科和他的家人在下周五到达，我们把手术安排在下周二。

“供体组织从哪里来？”卡罗尔问。

当我深思她的问题时，一阵惴惴不安席卷而来。

“我还不清楚，”我坦白地说，“因为角膜移植手术定在周二，我们会在周一收到新鲜的组织，这意味着预定给弗朗西斯科捐献眼睛的人此刻还在人世间。”

到了周二，弗朗西斯科准备手术的同时，我焦急地等待供体角膜的送达。早上8点，空运的包裹终于到了手。看到回邮地址，我再次感到一阵寒意。供体竟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教会山的一个12岁男孩，与弗朗西斯科的故乡是同一座城市。那一刹那，我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复杂情绪。我为能用这个年轻组织恢复弗朗西斯科的视力感到庆幸，然而又对于这份希望是建立在他自己社区中另一个人的悲痛失去上深感痛苦。

有了供体的角膜组织，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启动这个创新的四步手术。手术初期一切顺利，然而进程中却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情况。手术室的助手和护士们看着大屏幕上即将发生的危机，变得异常安静和紧张。当我试图取出旧的角膜移植物时，弗朗西斯科的眼睛内部的物质却顽强地粘附在上面，威胁着要溢出。如果真的发生，就没有可能再重建他的眼睛，他右眼的任何视觉都将永久消失。

面对这个严峻的情况，我全身大汗。我必须竭尽全力阻止这个灾难的发生。我的心跳急速疾驰，我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判断。在那一段紧张至极的时刻，我感觉自己几乎忘了呼吸。然而，最终，我成功地将那些溢出的物质重新放回眼睛里。

我停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眼球暂时得以保全。我让一位护士帮我擦去额头上的汗水，给我递了一口水。弗朗西斯科仍在全麻中沉睡。看着他年轻的

脸庞，我脑海中闪过自己挣脱文化大革命黑暗的漫长旅程。经历了几十年的医学训练和信仰的增长，我毫无疑问地知道我被召唤并被赋予能力，来帮助像弗朗西斯科这样的盲童。我在他这个年纪时也曾经经历过自己的黑暗，现在我倾尽全力，想要将他从黑暗中引向光明。

稍作休整，重新振作精神，我继续进行弗朗西斯科的手术，开始了尝试移除旧的移植物的风险过程，同时尽我所能避免重复上次尝试时遇到的问题。我小心翼翼地、慢慢地挪动旧的移植物，就像古代中国的微雕大师在一根头发上刻画字句那样，轻轻地提起并拉扯它。经过漫长的等待，旧的移植物终于从下面的组织中分离出来并被取出。然后我移除了白内障，植入了人工晶状体，将新的角膜缝合到位，并在新的角膜周围移植了成人干细胞。经过四个小时的漫长时间，前所未有的、强度极大的四步手术终于完成，弗朗西斯科的眼球得以保全。我让肩膀松弛下来，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第二天早上，弗朗西斯科和卡罗尔、克莱门蒂娜一起回到我的诊所，了解他的手术结果。卡罗尔和克莱门蒂娜都显得异常安静，看起来好像他们已经承受了整个七年旅程的重担，超过了他们力所能及的极限。我感到焦虑，不知道我竭尽全力的努力是否足以挽救这个青少年的视力。

在我从弗朗西斯科的眼睛上移除绷带之前，我们手拉手围成一圈——一位多米尼加的前修女，一对墨西哥的母子，和一位华裔美国医生——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上帝，我们深知，你有力量让这个过去七年深陷黑暗的小男孩重见光明，”我轻声祷告。我已经尽我所能，我无法预知上帝是否会让弗朗西斯科再次看见，但我坚信他。“感谢上帝引领我们走到这一步。感谢弗朗西斯科的勇气。感谢卡罗尔和克莱门蒂娜为他付出的一切。上帝，请帮助我们接受你对这个结果的安排。阿门。”

我伸手，小心翼翼地撕去胶带，轻轻解开弗朗西斯科的眼罩。

他缓缓睁开右眼，眨了眨眼，茫然四顾。然后他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你能看见吗？”我问。

他点了点头。“你能认出房间里的人吗？”我又问。弗朗西斯科环顾四周。他并没有认出我或卡罗尔，因为过去几年里，他只是听过我们的声音。在房间里的众人中，只有一个人是他在七年前失明之前就认识的。

“我妈妈，”他说。

我转向站在一旁的克莱门蒂娜，她泪流满面，走向弗朗西斯科，紧紧地抱住他。

卡罗尔欣喜若狂，双手举向天空，不断地感谢上帝。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默默地祷告感谢。我们成功了！

弗朗西斯科现在能看见了！

经过多年的失败尝试，这最后一次关键的微创手术终于成功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弗朗西斯科的右眼视力提高到了20/40。他放下了他的盲文书籍，转而阅读普通的教科书。他现在可以比以前更独立地生活了。

经过七年的黑暗生活，弗朗西斯科终于重见光明。他找回了人生，他欣喜若狂！

尽管我帮助恢复了弗朗西斯科的视力，但他也给我回赠了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在教堂山，弗朗西斯科用他新找回的视力，在网上阅读了我的生活故事，关于我在他这个年纪时，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和危险威胁着要摧毁我。然后，弗朗西斯科向他的高中校长分享了我如何在14岁时被剥夺了教育，如何面临被下放、贫穷和艰苦劳动，如何在多年没有教育后努力进入大学，以及在所有的混乱中，我如何从未在中国真正收到我的高中文凭。

“王医生帮助我从长久的黑暗中醒来，”弗朗西

斯科对校长说。“作为回报，我们能否给他一件他应得但从未得到的东西，一份高中文凭？”

因此，在2000年，我在中国完成高中学业23年后，我终于收到了我的文凭，一个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高中的荣誉毕业证书。

现在它挂在我的办公室的墙上，就在我的本科和研究生学位旁边。这些证书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张纸，它们代表了我在此如此多的困难中所经历的祝福。从中国的大学到美国的医学训练，东西方的影响使我成为了今天的我。我意识到，生活就是一个给予与接受，帮助与被帮助的循环。

在王氏视觉研究所的墙壁上，显眼地挂着一块弗朗西斯科赠送的珍贵纪念品。那是一块精致的牌匾，上面铭刻着他用盲文写就的一封感谢信，也是他最后一次使用盲文。而在下方，是他在七年前遭遇事故之前，用西班牙语写的一封感谢信。我对这个国家给予我无数机遇心怀感激，因此我放弃了所有的医生费用，而弗朗西斯科则以帮助我填补教育中的空白来回报我，他的这份礼物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每当我看到它，我总会想起七十年前在中国，那些满怀感激之情的病人送给我祖父木制的牌匾，我为能跟随他的脚步，走上这条有意义的道路而感到自豪。

* * *

照顾弗朗西斯科的过程，给了我深刻的启示。我发现，没有什么比见证一个病人告别黑暗，重见光明更让我感到欢欣鼓舞。这种有能力改变人生的力量，既是我肩负的沉重责任，也是我每天工作中的巨大幸福。

在弗朗西斯科之后，我接触到了许多类似的病例，但保险公司却不愿意支付这些实验性的复明手术的费用。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像卡罗尔这样的人，她已经超越了自己的能力，为弗朗西斯科的治疗筹集了资金。尽管我放弃了所有的外科医生费用，但还有其他的费用，如实验室测试、供体组织、手术设施以及旅

行和住宿费用。在范德比尔特大学工作五年后，我退后一步，审视了更大的画面。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上帝在我早年在中国的困苦背后有一个目的，以及我从那时起的职业生涯的惊人轨迹。经过二十五年的教育、训练和临床实践，我现在处于一个位置，拥有一套独特的技能，可以在其他人的生活中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些人曾被告知已经没有更多的办法来恢复他们的视力。

我想为更多像弗朗西斯科这样的病人提供我的医疗护理，但在大学工作意味着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我并非业务的所有者——我只是一个雇员——所以我不能随意免除那些需要帮助的病人的费用。只要我受雇于一个更大的机构，就限制了我能提供多少慈善护理。然而，如果我开始我自己的私人诊所，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因此，在2002年4月1日，我离开了大学，开设了我自己的业务——王氏视觉研究所（WVI），位于帕尔默广场的西端大道，靠近纳什维尔市中心。我们的诊所专注于高度定制的激光视力矫正、白内障手术和复杂的复明手术，始终使用最创新的技术。2002年，王氏视觉研究所成为田纳西州第一个提供无刀全激光LASIK的中心，这将LASIK的准确性和精确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此后，王氏视觉研究所一直是许多其他开创性眼科手术的地点，包括世界上第一个3D LASIK手术和激光辅助人工角膜植入，美国第一个激光Intacs手术用于治疗晚期角膜锥形变，以及田纳西州第一个3D激光白内障手术、3D激光KAMRA手术和3D永远年轻镜片手术。除了我在世界知名的杂志《自然》上发表的论文，我还出版了八本关于角膜和晶状体手术的教科书，并持有几项关于发明新的生物技术恢复视力的美国专利。我的工作得到了美国眼科学会的成就奖和美国华人医师协会的终身成就奖的认可。

创立私人诊所，不仅仅是为了追求更大的自由，更是我内心深处的一种呼唤。我坚信，我所得到的这一切——我在激光物理和眼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都是

为了实现一个更大的目标，那就是帮助那些最需要的人。我很幸运，我的专长让我有机会进行研究，为重病患者开发新型的激光眼科治疗方法。

随着诊所的发展，我开始接到来自全美各地，甚至全世界的求助信。至今，我已经进行了超过55,000次手术，其中包括对4,000多名医生的手术，这使我有幸获得了“医生的医生”的美称。很多重伤患者曾去过其他医生那里，被告知他们再也看不见了，我是他们最后的希望，这是我不能忽视的。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保险，也没有财力支付高级护理的费用。我私人诊所的成功让我有了更大的自由，可以提供这样的护理，但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我需要一个团队，一个组织来帮助我实现我的愿景，为那些最需要但却无法负担的人提供免费的复明手术。

于是，在我开设私人诊所一年后的2003年，我创立了王氏复明基金会，这是一个501(c)(3)非营利组织。这个基金会使我能够组织一群医生，他们可以抽出部分时间来照顾慈善病人，这种工作只占他们总工作时间的五分之一或更少。近三十名医生签名表示愿意帮助，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受到自己的信仰的启发，对复杂的复明病例以及可用的技术感到好奇。除了志愿医生，还有医疗器械公司的捐赠，以及由社区慈善领导构成的基金会董事会，他们帮助确保我们的活动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王氏复明基金会的第一位患者是来自田纳西州克罗斯维尔的乔尔·凯斯。乔尔四十多岁，自小就失明。他在母亲子宫内时感染了风疹，两只眼睛的角膜都被严重疤痕覆盖，视线模糊，好像是在蜡纸后面看世界一样。他的视力在他小时候还可以看见视力表上的大“E”，但到他八岁的时候，他只能感知到光和影子。他的母亲安娜带着他跑遍了美国的大医院，乔尔在他的两只眼睛上进行了几次移植手术，但都没有成功。乔尔的医生告诉他，他再也看不见了。尽管他一生都被剥夺了视力，他还是独立生活，并在家庭售货机业

务中与父亲一起工作。

乔尔在1997年第一次来找我。他的眼睛被白色的疤痕组织覆盖，布满了细小的血管。他的右眼已经发生了视网膜脱落，所以恢复视力的唯一希望就是治疗他的左眼。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在那只眼睛上进行了三次大手术，包括角膜移植和两次羊膜移植，但乔尔的免疫系统拒绝了移植的角膜。然而，我仍然抱有希望，因为近年来我亲眼见证了医疗治疗的巨大进步。到了2003年，人造角膜已经被发明出来，我急切地想知道这项新技术是否能够帮助乔尔。

2004年初，也就是我开始照顾乔尔八年后，他来进行检查，并宣布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我找到了我的生命中的爱人，”他说。乔尔向我介绍了贝丝·安·达尔，一个可爱的年轻女士。“我爱她，我要娶她。”

我意识到乔尔事实上从未真正见过贝丝·安。他们之间的爱情深深地打动了我，尤其是乔尔对贝丝·安的爱，因为这份爱情并不基于任何物理美感——他从未见过她。我为乔尔找到了一个能与他共度余生的人感到欣慰。他们的婚礼定于2004年9月，也就是8个月后。我开始想象，如果我们能在他的婚礼前让乔尔恢复视力，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希望他能看到他的新娘贝丝·安，穿着美丽的婚纱，满面笑容地走下通道。现在我们有了人造角膜技术，这是否可能实现呢？

我兴奋地告诉乔尔，经过多年的测试，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终于批准了AlphaCor，这是一种新型的人造角膜植入物，专为那些眼睛无法接受传统角膜移植的患者设计的……正如乔尔一样。人造器官能大大降低身体免疫系统对它们的排斥反应，这是器官移植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乔尔所有以前的角膜移植失败的原因。人造角膜植入物清晰而灵活，就像一个小型隐形眼镜。乔尔将成为我们基金会的第一位患者，也是田纳西州接受这种新型人造角膜的第一位患者。如果手术成功，乔尔可能最终能看到他周围的世界，最

重要的是，他将会在他们的婚礼上看到他的新娘，贝丝·安！

我们讨论了手术方案：在他的角膜中创建一个口袋，然后嵌入人造角膜。接下来我们会等待三个月，让他的眼睛围绕植入物愈合，然后去除角膜口袋的外瓣，这样乔尔就可以通过新的角膜看到了。乔尔和贝丝·安都非常兴奋，决定进行人造角膜手术。

但是，不幸的是，我无法完成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我去除了疤痕组织后，我可以通过显微镜看到他的角膜太薄，形状不规则，无法承受任何刀片切割以创建人造角膜的口袋。不规则且不均匀的薄角膜意味着我必须完全放弃刀片口袋切割。我不敢再切，因为我害怕会穿孔他的眼睛，可能导致他失去他剩下的唯一一只眼睛。

在手术失败后，我与乔尔、贝丝·安和安娜见面，解释了情况。

“我很抱歉，但我不能按照我原来的计划进行手术，因为乔尔的角膜太薄，形状不规则，所以进行刀片切割以创建人造角膜的口袋是不安全的，”我说。

我们都非常失望，但没有人比乔尔更失望，他意识到，尽管现在有了新的人造角膜技术，他仍然无法从中受益，因此仍然无法看到，这已经超过四十年了。“我有另一个想法，”我说，“但这可能是一种冒险。”

我向乔尔和他的家人详细解读了，我在田纳西州拥有一台独一无二的无刀激光眼科手术设备——飞秒激光器，它独特的超短脉冲，可以取代通常用以切割角膜的微刀。我坚信，飞秒激光在创建角膜口袋的过程中，精度会更高，能让我更安全地控制切割深度。

这个设想听起来不错，但有一个问题——还没有人尝试过用飞秒激光来创建角膜口袋并植入人造角膜！

因此，如果我们选择使用这款强大的新型激光设备，而非传统的刀片，乔尔将会成为世界上首位接受激光辅助人造角膜植入的患者。我对于能够如此创新

地使用激光，有望帮助乔尔恢复视力，深感欣慰和充满希望。回首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日子，我从未想过，我在激光领域的多年研究，竟会在医学上发挥出如此大的作用。我现在明白了，为何上帝在我年轻的时候，让我历经艰辛，求学不息。我坚信，他希望我不仅塑造出坚毅、果敢、机智的性格，更希望我学习到治疗像乔尔这样的患者所需的双重知识——技术与医学。我意识到，治疗这些无法被所有传统技术解决的患者，是上帝对我生命的召唤。我现在有可能将我花了几十年时间学习的激光技术与医学相结合，帮助乔尔和其他患有末期失明的患者。29

我向凯斯一家解释了这种激光人造角膜手术的高风险，因为这个手术前所未有的，即便乔尔对此充满热情，我仍然让他回家慎重考虑。那个周末，我自己也在反复思考乔尔和手术的问题。他的左眼是他唯一的希望，但是由于我们新发现的他的角膜薄度和畸形，手术风险比我最初预计的还要大。如果有任何意外——无论是新型激光还是手术本身——乔尔可能会失去他在那只眼睛中已经极为有限的感光视力，也就是他的全部视力。手术只有两种可能的结果——要么成功，然后乔尔可能在四十年后能看到，能在他们的婚礼当天看到贝丝·安，要么失败，然后乔尔将陷入黑暗，度过他的余生。这份责任的沉重让我感到压力巨大。但就像我生活中的其他关键时刻，当我自身的能力似乎不足以应对时，我寻求上帝的指引和力量。

“上帝，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让乔尔冒这个险吗？”我在那个周末反复祈祷。

到了周一，我心中平静下来，我感觉到上帝回应了我的祈祷。我确信激光人工角膜手术是正确的选择。乔尔回来后决定接受手术，他完全理解其中的风险。手术中的飞秒激光部分进行得非常顺利。然后，乔尔立即被转送到圣托马斯医院进行人工角膜植入，这部分也进行得很顺利。

因此，世界上首次激光辅助人工角膜植入的前两步完全成功。三个月后，乔尔回来进行手术的最后一

步——移除角膜口袋的外瓣，我们希望他现在能通过新的人工角膜看到东西。

手术后的第二天，乔尔、贝丝·安和安娜回到我的办公室进行乔尔的术后随访。就像我们对弗朗西斯科做的那样，我们站在一起，手拉手祈祷，然后再移除乔尔的绷带。我感到单靠我内心的力量不足以应对手术结果的后果，所以我再次请求上帝帮助我们所有人接受他的旨意，无论那会是什么。我将我的意志交给上帝，我心中平静了下来。

我慢慢地撕下乔尔的绷带，既紧张又兴奋。那时我已经治疗乔尔超过八年了，但我知道他自己走出黑暗的旅程已经持续了四十多年，现在，真相即将大白。乔尔犹豫地睁开左眼，然后四处看看，快速地眨眼。突然，他的脸上绽放出笑容，他用手捂住眉毛，朝窗外看去。

他能看见了！我急切地把贝丝·安推向他。他转过身，看到了他未来的妻子……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她。

“啊，你有棕色的头发！”他尖叫道。“你真漂亮。”他们拥抱在一起，喜悦地哭了起来。

当乔尔环顾房间时，当他终于认出他的母亲时，他深受感动。安娜走过来，把手臂搭在他身上。自从失明以后，他已经超过三十年没有看到她了。在他被黑暗笼罩的所有这些年里，她已经老去，但爱超越时间，此刻，乔尔无比欣喜，他终于能再次看到母亲那充满关怀的脸庞，看到她眼里溢出的爱意。

四个月后，乔尔与贝丝·安喜结连理。可惜的是，他们的大喜之日我在异国他乡，只能通过他们寄来的照片分享这份喜悦。在每一张照片中，乔尔都深情地凝视着他的新娘。我深感荣幸，上帝赐予我这样特殊的荣誉，让我在乔尔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帮助他恢复视力。

第十六章 世界首例

“明天你可以尝试穿一些可爱的衣服，因为你的丈夫或许将首次目睹你的风采！”我这样告诉杰基·巴恩斯，她的丈夫布拉德却从未真正见过她。从他们数年前的婚姻开始，杰基就全心全意地照顾着她的盲眼丈夫，倾尽全力寻找全美的最优医疗资源，但都并未能带来改变。如今，经过王氏复明基金会长达两年的治疗，她期待着她深爱的男人终于能看见，首次看见她。

我在2004年的秋季首次与布拉德和杰基·巴恩斯相识。布拉德四十有余，十二年前在一场工业事故中失去了视力。他的墨镜背后，是那双饱受创伤的眼睛，眼睑仿佛被熔铁融化。十年前，也就是他三十二岁生日前的十五天，布拉德的生活在一瞬间被改变，他所在的工厂里，一个装满熔融铝的容器突然爆炸。一千一百磅的燃烧金属液体，以1550华氏度的高温向上喷射，涌向他的身上，瞬间击碎了他的防护眼镜，严重烧伤了他的双眼。

他几乎完全失明，只能勉强感知到光线。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在包括哈佛、梅奥诊所和华盛顿大学在内的主要医疗中心进行了许多大型手术，但都没有成功。

布拉德投身于与“神之队”一起的工作，这是一个由男士组成的团队，他们通过展示惊人的力量来与年轻人分享他们的信仰。失明并没有阻止布拉德砸砖头、弯曲金属棒、撕开电话簿。然而，支撑他坚持下去的不仅仅是他的体力，他还有他忠诚的妻子杰基的爱和强大的支持。尽管他的状况如此，布拉德在2000

年四年前恋爱并结婚了。他的妻子全心全意地照顾他，她的信仰激励她继续为丈夫寻求医疗帮助。

四年后，布拉德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医生们将他推荐给了王氏复明基金会。我们基金会的工作传开了，包括我为乔尔·凯斯进行的世界首例激光人工角膜手术。华盛顿大学的医生们听说了那次手术的成功，这就是他们把布拉德推荐给我们的原因。

尽管我们有新的激光技术，我还是担心我们实际上可能无法帮助布拉德，因为他的伤势太严重了。虽然我专门从事困难的复明手术，但对我来说，布拉德的病例是最极端的。他已经被宣布为不可逆的盲人，他之前的多次失败的手术使得任何后续的手术都成为不可能。

他的角膜被皮肤和疤痕组织覆盖得厚厚的，我根本看不到他的眼球。此外，他的结膜——覆盖眼球表面和内眼睑的组织——由于严重的干燥而急性炎症，因为布拉德的泪腺在事故中被完全破坏。没有这些腺体正常分泌的泪液，极度干燥的眼睛在任何手术后都无法正常愈合。此外，布拉德的右眼受伤太重，无法进行任何手术。所以他的左眼，只能勉强看到光，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人工角膜植入手术，需要眼部环境保持湿润与稳定，以确保术后的恢复。”我向布拉德解释，“除非我们能找到某种办法让你的眼泪重新流淌，否则我们很遗憾，无法为你的眼睛做重建手术。因为在手术后，角膜永远无法达到愈合的状态。”

布拉德和杰基从圣路易斯赶到纳什维尔，而咨询的结果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极度的打击。更严重的是，布拉德的干眼症，让他不堪疼痛。他形容那感觉，就像有玻璃片不断切割他的左眼。所以，如果我们无法找到方法，为他的左眼提供持续的润滑，以便尽快减轻他的疼痛，他唯一剩下的左眼，可能就全部移除，让他在余生中永远陷入无法逆转的全

盲状态。

由于布拉德的泪腺已经全部死亡，我们立即开始了一种治疗，试图通过药物、阻塞泪液排泄管、以及全天候的人工泪液滴入，尽可能地保持他的眼睛湿润和舒适。

“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办法，让你的泪腺重新开始分泌泪液。”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不仅不能进行任何重建手术，而且，你的左眼也可能需要被移除。”

2004年冬天的纳什维尔，特别冷。一场冰雹暴风雪封锁了道路好几天，但我内心的冷和绝望，远超过了这个。再一次，我病人即将全盲的威胁，深深地震撼了我。我对那种黑暗感到熟悉，那是我作为一个青少年时曾经感受到的，而且差点就无法逃脱。我反思了是什么帮助我从那个黑暗中走出来，活了下来。

“永不放弃。”我父亲的声音再次在我耳边响起。我意识到，我通过自己的决心和他人的持续支持，度过了我生活中最黑暗的日子。

我不想放弃布拉德。我永远不会放弃。

几个月来，我花了很多个夜晚研究科学文献，看过去是否有过对布拉德这种严重的干眼症的治疗，但我什么也没有找到。接着我打电话给世界各地的许多同事，包括我的导师曾博士，寻求建议和帮助，但都没有结果。我依然不想放弃，所以我继续寻找，并向上帝祈祷，帮助我保持希望，让我的努力最终指引我走向正确的方向。

2005年春天的一天，布拉德打电话给我，激动地告诉我他自己可能找到了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答案！他找到了华盛顿大学的一位耳鼻喉科专家，就是最初将他推荐给我的机构。这位开创性的耳鼻喉科医生，兰德尔·帕尼埃洛博士，进行了世界首例将唾液腺从病人的下颌取出，重新引导到太阳穴区域以润滑眼睛的手术。唾液和泪液的化学成分相似，所以如果我们能移植布拉德的左侧唾液腺来润滑他的左眼，我们就有机会进行恢复手术，让他恢复视力！

我对这个想法非常着迷。我打电话给帕尼埃洛博士，询问他是否可以对布拉德进行评估。帕尼埃洛博士同意，并在评估后告诉我，对布拉德进行唾液腺移位手术会非常困难，但他愿意尝试。这个手术是全新的，没有成功的保证，但布拉德几乎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2005年3月，帕尼埃洛博士进行了这个新颖的手术。这个持续十三个小时的手术成功了，布拉德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接受这种唾液腺手术的人。这个手术的有趣之处在于，唾液腺仍然会对嗅觉刺激产生反应，而不是眼睛中的碎片或干燥。所以如果布拉德走进麦当劳，薯条的味道可能会让他的眼睛流泪！

当我在纳什维尔的下一次预约中看到布拉德时，我看到他的左太阳穴上方鼓出一块，大如高尔夫球。消肿需要一段时间，同时也需要等待腺体重新产生湿气。如果不能顺利进行，我们就无法进行眼睛重建手术。我们都在紧张地等待，期盼腺体手术能圆满成功。终于，在等待了将近一年后，腺体缩小并开始再次产生唾液，这大大缓解了布拉德眼睛的疼痛。

于是，到了2006年的夏天，世界上第一例结合唾液腺移位和人工角膜植入的眼睛重建手术已经准备就绪。我的计划是使用飞秒激光在他的左眼中创建一个“口袋”，就像我之前为乔尔·凯斯所做的那样。在角膜内创建一个小口袋，然后放入植入物，就像在藏着一份宝藏。我们会让这个植入物在口袋里待上几个月，然后移开角膜瓣，揭开可能会让布拉德重获视力的“宝藏”。我们的目标是让他从几乎全盲的状态，恢复到有足够的视力，可以更独立地生活，自己在家照顾自己。

其实，能成为这样一种创新手术的一部分，并非源于自己的自信满满，而是出自于一步步地寻找最能帮助病人的解决方案。我真的不知道这种组合手术方法是否会奏效，这种不确定性的压力从始至终，都影响着我为布拉德提供的超过两年的帮助。

第十七章 舞动的医生

一对耄耋舞伴步入了舞池，尽管他们的肩头已经积蓄了八十个寒暑，经历了无数的世事沧桑，但他们的神态却依旧洋溢着活力和自信。男士身着深黑色的燕尾服，昂首挺胸，他以娴熟的技巧和敏锐的感觉引领着他那灵动的伴侣。女士身穿淡粉色的长裙，随着他们在光滑的木地板上滑行，裙摆如风般摇曳。他们跳的是狐步舞，轻飘而自如，仿佛在舞池上飘浮。

那是我在哈佛医学院的第一个学期，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正在参加由麻省理工学院舞蹈俱乐部在查尔斯河畔一座雄伟的美术建筑——沃克纪念馆举办的社区交谊舞蹈活动。我看着这些年迈的舞者们优雅地移动，他们让交谊舞蹈看起来完全不受年龄的束缚，我渴望成为这种超越时间的精致艺术形式的一部分。

跳舞的伴侣们散发出的平静和优雅，与我多年前因恐惧和慌张而跳舞的情景完全不同。

当我六岁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我会看着父亲在他的医院的共产主义歌舞团表演。他是一名出色的舞者，庄重而自然地散发出优雅。他身穿色彩鲜艳的中国少数民族舞蹈服装，表演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父亲被选中在中国新年游行和一年中的其他节日表演。他是我在舞蹈艺术和纪律方面的第一位导师，我向往成为他那样的人。我甚至加入了我自己的小学舞蹈团，在杭州的公共场所频繁地表演。当我在14岁的时候被迫在九年级辍学后，我更加热衷于舞蹈，试图加入共产主义歌舞团，以避

免被下放和生活贫困、艰苦劳动的命运。我会一连几个小时地练习舞蹈。我没有舞蹈工作室，也没有八个允许的中国模范戏剧的录音。在我父母的医学院附近的一片开阔地上，我练习我在舞台和电影上看到的舞蹈。由于我没有录音音乐，我在跳舞的时候自己唱歌。我常常因为试图同时唱歌和跳舞而喘不过气来，所以我练习一会儿就需要休息。但是因为我的生活在危险之中，我被迫不停地跳舞。就像在芭蕾舞剧《吉赛尔》中，那个年轻人被判定要一直跳舞，直到他倒下死去，我也是不停地跳舞，我被如果不能成为一个足够好的舞者进入共产主义歌舞团就会被驱逐的恐惧所吞噬。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终于有机会去追求教育，直到1987年我抵达哈佛医学院后，我才重新开始将舞蹈作为一种爱好。

那天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活动中，看着那对老年夫妇的永恒舞蹈，激发了我重新燃起对舞蹈的热情。在我医学院的第一年，我帮助创建了哈佛舞蹈俱乐部，该俱乐部由来自美国、德国、越南、中国和南美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在加入俱乐部之前，很少有学生有交谊舞蹈的经验，但我已经经历了足够的舞蹈基础，可以帮助我们开始。

我们必须掌握所有十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交谊舞蹈，其中包括五种标准舞和五种拉丁舞。国际标准交谊舞蹈——华尔兹、狐步舞、探戈、维也纳华尔兹和快步舞——展示出的是无与伦比的美感、雅致、风格和纪律。而另一方面，国际拉丁舞——恰恰、伦巴、桑巴、斗牛舞和吉普赛舞——则突出了速度、节奏、力量和激情。这十种舞蹈共同描绘出了人类情感的全貌。

哈佛舞蹈俱乐部经常练习，常常与麻省理工学院的队伍携手同行。我们这个初级队伍就像是一道奇异的风景区——脚踩在彼此的脚趾上，肚子相互撞击，四处乱窜，却总是朝着错误的方向行进。有时候，舞伴之间甚至会发生争吵或打斗。最后，我们意识到，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队伍中的男士们根本不懂

如何领舞，女士们也不能很好地配合。舞者们有时甚至会因为男性希望女性能够猜到他们的想法而与舞伴发生争执，而女性会反驳说，“在你没有正确完成自己的舞步之前，我怎么可能知道你希望我做什么呢？”

我们每个月都会邀请一位专业教练，其中有一次舞蹈课程最为珍贵。

“先生们，你们是领舞者，”教练宣布。她的名字叫黎明，身材匀称，苗条，头发是一头炽热的红色。

“所以，如果女士不能很好地跟随，那就全是她的错，对吧？”我提问。

队伍里的男生们都笑了出来。

“不，如果她不能跟上，那很可能是你的错，”黎明回答道。

“怎么可能？”我反驳道，“我是领舞者，如果她不能正确地跟随，那么按照逻辑，责任应该在她。”

“实际上，这可能是你的责任，因为你应该在真正开始领舞之前与她进行沟通，我们称之为预领舞阶段。”

“预领舞，”她细致地阐述，“是在男士真正挥动起舞步的那一刹那之前发生的。例如，如果你想退后，你不能只是简单地往后退。你首先需要稳住脚步，然后向你想要移动的方向做出暗示，这样你的舞伴就能感受到你的动向，”黎明如此解说。“你的舞伴将有时间去解读你的意图，并反馈她的动向。她可能有另一个方向的想法。因此，你们需要感应彼此的动向，并形成一個协同一致的行动计划，共同进退。”

根据黎明的解说，交谊舞蹈最美的一刻并非每个人都能察觉的舞步或动作。真正神奇的部分，是每一个舞步之前的预领舞时刻，也就是通过舞者们间的默契，协商并决定接下来的舞步的节奏、音乐性以及幅度。

然而，我们团队对这节课的初步反应并不热烈，主要是因为真的难以理解它。对我们而言，那一瞬间似乎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如此多的事情。此外，

男士们更不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尊，去妥协。我们只想要领导，而不想改变我们原有的计划。因为不愿意去学习这种预领舞的技巧，我们便继续踩着自己的脚趾，撞击舞伴的肚子，经常处于混乱之中。

几个月后，我们哈佛舞蹈俱乐部的队伍参加了在麻省理工学院校园举行的一个小规模的地区比赛，汇集了诸多学校和一百多名舞者。在比赛中，标准舞的人们身着燕尾服和飘逸的礼服，而拉丁舞者们则穿着黑色的衬衫和裤子，性感的裙子几乎无影无踪。我们从清晨到黄昏，尽情舞动我们的内心，然而哈佛队因为我们的表现不佳，竟然位列倒数第一！队中的男性成员坚守着他们的信念，认为哈佛男生有能力完成任何事情，不需要妥协领导。然而，当我们在每个舞蹈类别中都名列倒数第一，我们走出体育馆，沮丧地低着头。

然而这次失败却成了我们队伍的转折点。男生们开始意识到，接受预领舞技术——给我们的舞伴时间去理解我们的意图，并在我们真正一起移动之前作为一对伴侣协商一个联动的计划——是在舞池上建立伙伴关系的唯一途径。男生们勉强放下他们的骄傲，开始认真练习真正的伙伴舞蹈。

我们将哈佛的职业精神投入到交谊舞蹈中，就像它是一门数学或科学课一样，我们开始更频繁、更虔诚地练习。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我们的团队从最初的几个学生增长到了五十多对舞蹈伴侣。每个学期，我们在业余交谊舞蹈比赛中的成绩都越来越接近顶尖。到我大四的时候，我们在美国业余交谊舞蹈协会主办的美国全国大学生锦标赛中获得了第一名——这对于哈佛来说是一次意想不到的胜利，因为我们只是知道我们的学术成就。

从哈佛毕业后，以及在我进行临床培训的几年中，我继续为了乐趣而跳舞，偶尔我甚至会教我的同事和朋友跳舞……但总是免费的。我只是想鼓励更多的人像我一样享受交谊舞蹈。对我来说，交谊舞蹈是，也仍然是，通过欣赏音乐、锻炼身体，学习对另一个人

的身体和情感的敏感，来缓解日常生活和繁重工作的压力的一种方式。在我在威尔斯眼科医院的奖学金和住院医师期间，我没有太多时间跳舞，但当我在巴斯科姆·帕尔默眼科研究所进行角膜奖学金项目时，我又重新燃起了我对舞蹈的热爱。

在巴斯科姆·帕尔默的面试后的舞会上，我遇到了一对名叫米夏·巴特诺夫斯基和琼·鲁道夫的夫妇，他们都已经快60岁了。米夏是一位高大、优雅的犹太绅士，同时也是一位科学家。他的妻子琼，是一位美丽的日裔美国女士，对艺术有深深的热爱。我们一见如故，他们邀请我加入他们的桌子，我们整晚跳舞、聊天。第二天晚上，我去他们在德尔雷海滩的家里拜访，这成为了我们一生的友谊的开始。我被他们的快乐和对生活的热爱所吸引，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与我对家庭和教育的重视相呼应。

在我在迈阿密的那一年里，我花了很多周末去米夏和琼的家里，我们一起跳舞、笑闹、聊天。我的父母和弟弟还在波士顿，所以我在城里没有别的人。由于我的亲生父母离我有1500多英里远，米夏和琼成为了我的义父义母。巴斯科姆·帕尔默的医院食堂提供的饭菜口味一般，所以我经常去琼和米夏的家里享用美味的日本菜和美国菜。米夏是一位工程大师，他帮我保养我那辆二手车，让它在我整个研究期间都能正常运行。我们经常一起上舞蹈课，讨论我们对舞蹈的热爱。即使在我离开迈阿密后，我也会和琼和米夏一起去英格兰布莱克浦的冬季花园——这是我们每年都会去的国际标准舞的首都，也是布莱克浦标准舞节的所在地。琼和米夏还帮我在美国眼科学会年会上组织了一次舞会。给一群通常不以脚下灵活著称的眼科医生教授舞蹈，是一种有趣的体验。琼和米夏像我自己的父母一样爱我，我也爱他们，最终把他们当作我的义父义母。

1997年初，我完成了角膜研究工作，接下来的人生轨迹被交谊舞蹈推上了关键的转折点。当时我在考

虑接受范德比尔特激光视力中心创始主任的职位，哈利·雅各布森博士，这位新上任的大学健康事务副校长，在面试后问了我一个问题：“明，我们需要做什么才能让你加入范德比尔特呢？”

在我当时的求职过程中，他的激光眼科手术中心是唯一一个为我提供这样有声望的主任职位的机构，因此我已经倾向于接受这个机会。然而，接下来的对话加速了我的这一决定。

我告诉他：“我是个热衷于交谊舞蹈的人。纳什维尔有合适的舞蹈场所吗？今晚我能去哪里跳舞？我明天早晨才离开。”令我惊讶的是，雅各布森博士同样热爱交谊舞蹈。他立刻拿出一支笔和一张废纸，为我绘制了通往贝尔米德的一个舞蹈工作室的地图。那天晚上我在舞蹈中尽情畅快，这让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范德比尔特。

自那时起，交谊舞蹈在我的医学生涯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它帮助我更好地与病人建立联系，就像在跳舞中的引导——需要对舞伴的敏感性、意识和沟通，并试图做出共同的决定。通过交谊舞蹈，我学到了这些独特的品质，使我能够更近距离地接触我的病人，更多地倾听他们，更多地关注他们的需求。当保险公司的限制和现代技术的成本在医生和病人之间制造障碍时，这种敏感性使我能够通过倾听、关心和全面地与病人建立联系来克服这些障碍。

我在进行眼科手术之前，总会和我的病人一起祈祷。我们的祈祷邀请上帝从旅程的开始就引领我们，而不是仅仅在我们遇到困难时才向他求助。祈祷也让我能够暂时停下、放慢节奏、集中注意力，与病人建立情感联系。这种过程，我在交谊舞蹈中磨砺的合作技巧中学到了很多。

我一抵达纳什维尔就开始了舞蹈生涯。我的导师和搭档，夏琳·阿彻，是一位前美国职业交谊舞冠军，我几乎每周都在她那里学习。我们参加了全国各地的比赛，她是专业组，我是业余组。我们的舞蹈生涯在2007年11月达到了顶峰，当时我们在俄亥俄州哥伦布

的俄亥俄星球舞蹈比赛中，赢得了美国专业/业余国际十项全能冠军的第四名。我曾邀请格温参加这个比赛，这也是我们在哥伦布机场最后一次见面之前参加的最后一个活动。

* * *

2003年，王氏复明基金会成立，我们的创始董事会成员包括了银行家基因·安格尔，他负责董事会的财务工作；财务顾问查尔斯·格鲁蒙，担任秘书的律师玛丽·贝丝·托马斯，和房地产高管雪莉·泽特林。在我们为基金会的第一位病人，乔尔·凯斯进行治疗后，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更多的董事会成员，更多人了解我们的使命，最重要的是，更多的资金来支付除了医生费用之外的费用。因此，我们决定举行一个年度筹款活动。我们只需要一个吸引人的主题。

受到我通过舞蹈所经历和学习到的东西的启发，我提议我们举办一场以交谊舞蹈为特色的晚会……并将其命名为“眼球”。这个设想是在我试图寻找一种创新方式，以呈现一个球状体，象征视觉在感情层面的重要性时产生的。眼科医生常常用20/40、20/60、20/100等数字的方式来评估视力。但是，视力远远超越了数字的界限。它是一种情感体验，深深影响着一个人的内心。观看，无论在物理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是我们生活的基本方式。我们通过视觉来感知世界，寻找生活的意义，辨别真理。我想，找到一种创新的方式去揭示视力在这些人类深层次体验中的作用，将对恢复盲人视力的事业产生强大的情感推动力。我坚信，交谊舞蹈的优雅风采会完美地展示美和视力的重要性。当我们目睹像交谊舞蹈这样令人震撼的美景时，我们会真切地感受到，如果失去了视力，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凋零，以及帮助失明者复明的重要性。

2005年10月1日，我们的第一次“眼球”晚会在纳什维尔的奇克伍德植物园和艺术博物馆的菠萝房间成功举办。这场活动的主题是“视觉与声音”，因此，我们特别邀请了纳什维尔室内乐团。菠萝房间内，抛

光的混凝土地面熠熠生辉，水晶吊灯璀璨夺目，一整面巨大的窗户向外，可以看到阳台和花园。阳台之外，山峦叠嶂，延伸至地平线。

2005年的“眼球”晚会吸引了超过200人的参与，包括国会代表、大学教授、企业主、媒体人士和社区的其他人。当所有人都坐下来享用晚餐时，我们邀请了几位基金会的病人上台分享他们失明的经历。一位女士因为遗传病而失明。她天生没有虹膜或瞳孔，她的眼睛不能调节接收的光线的量，所以她在年轻的时候逐渐失去了视力，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完全失明。她让我想起了我在哈佛的第一年遇到的那位失明的病人，他激发了我帮助其他人复明的决心。另一位病人因为车祸失明了。他因此经历的痛苦和绝望导致他产生了一种破坏性的饮酒问题，至今他仍在努力摆脱这个问题。

“今晚很美，不是吗？但我看不见，”他说。接下来，布拉德和杰基·巴恩斯上台。那时，布拉德还没有进行他的最后一次复明手术。“我从来没有看过我妻子的脸，”他告诉观众。“我想听到她像我现在听到的那样笑，我想看到她的笑容。”听到布拉德谈论这样一个简单而又压倒性的愿望，观众中的许多人的眼睛都闪烁着情感，这是房间里的每一对夫妇每天都会理所当然地拥有的东西。

乔尔·凯斯是最后一个作证的人，他分享了他手术后从黑暗中走出来的经历，以及成功的复明手术是如何改变他的生活的。他告诉大家，他因为在母亲的子宫里就感染了风疹，所以他已经生活在黑暗中40年了，他的基金会手术让他恢复了视力，他在去年的婚礼上第一次看到了他的新娘。

在病人们发言后，我走上了舞台。“我们为乔尔·凯斯的复明奇迹而欢喜，”我说，“我们渴望那些仍然生活在黑暗中的人能够体验到这种复明的奇迹。但我们真的知道失明是什么感觉吗？真正欣赏视力的人是那些失明的人，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体验一下失明和生活在黑暗中是什么感觉。”

我们请所有的宾客戴上我们放在他们椅子下的深色太阳镜，然后在整个宴会厅里熄灭了所有的灯光。

“暗夜华尔兹”，一首由哀伤的弦乐和女高音合成的曲子，开始在背景中播放。

当房间变暗，宾客们戴上太阳镜后，我说：“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想请你们站起来，走到宴会厅的另一边，和那边的某个人握手。”

房间里立刻响起了一片惊叹声。我能听到人们撞到桌子和椅子被撞倒的声音。在黑暗中，没有人敢走得太远。我能感觉到他们被要求做对于能看见的人来说是日常任务的恐惧和紧张。

当现场观众在黑暗中静立，不敢有过多动作时，董事会成员吉恩·安格尔在舞台上点燃了一只蜡烛。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束微弱的光芒上，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就如同这一支蜡烛一样，”我继续说道，“我们的复明工作从一个病人、一双眼睛、一次手术开始。”接着，吉恩点燃了几位董事会成员和志愿者的蜡烛，他们便走向每一张桌子，点亮那里的蜡烛。房间渐渐被温暖而微弱的烛光照亮，随着宴会厅的灯光一盏盏重新亮起，黑暗被逐渐驱散。客人们纷纷摘下太阳眼镜，露出了如释重负和喜悦的笑容，因为他们再次看到了光明。

“这就是我们的起点，”我接着说。“一次一盏灯，然后光就会传播。如果我们都参与，那么整个房间就会被照亮，然后是城市，州，国家……最终是全世界。”

节目结束时，我邀请所有人走上舞池，我的好友，也是一位专业的舞者，莫妮卡·奥列尼克，与我共舞。当我们在舞池中起舞时，我想起了二十年前在波士顿看到的那对舞步熟练的老年舞伴。我的舞蹈生涯已经从一种避免被下放的方式，转变为一种被人们欣赏的艺术形式，再到一种有意义的方式，通过恢复视力将人们聚集在一起。我感觉自己像水面上的雾一样轻，

终于，我也在超越年龄的舞蹈中跳舞了。

第十八章 对孤儿的关爱

一天清晨，当我在浏览收件箱里成百上千封邮件时，一封邮件引起了我的注意，让我为之震惊，聚精会神。我几乎贴着电脑屏幕，当我看到邮件内容时，下巴都快吓掉了。

“这个孩子在火车站里被发现，孤零零的，身上尽是污垢，饥肠辘辘。她只有四岁。我们得知，她的眼睛是被人用酸液故意灼瞎的，然后被遗弃。”

那是2006年的秋天。这封令人震惊的邮件，标志着我与卡贾尔的人生旅程的开始。这个小小的印度女孩，从被无情地抛入的漆黑世界中挣扎出来，她的故事对整个纳什维尔社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卡贾尔的出生背景很复杂。我们所知道的是，她的继母和亲生母亲为了争夺抚养权激烈争吵。在她的母亲去世后，卡贾尔的继母在一个夜晚，趁她熟睡时，故意将腐蚀性的酸液倒入她的眼睛，使她失明。这个令人发指的行为是一个阴谋的一部分，目的是让卡贾尔成为一个盲童歌手，他们希望卡贾尔在街头唱歌乞讨，引起人们的同情，以此获取捐款。然而，当她的继母发现卡贾尔在唱歌方面并无天赋时，她便将这个无辜的小女孩遗弃在加尔各答附近的一个火车站，任其生死由命。幸运的是，卡贾尔被一个名为“贫困人民协会”的基督教传教团体救起，然后被转移到印度北部的阿拉哈巴德市的一个庇护所。卡马尔·乔伊·扎伊迪和他的妻子格蕾丝，管理着这个庇护所，承担起照顾卡贾尔和其他在被该组织收养之前被残害、

虐待和贩卖的孩子们的重任。

2006年5月，一位名叫阿什莉·罗杰斯的范德比尔特大学学生从纳什维尔前往印度，在庇护所做志愿者。她刚刚见到卡贾尔，就给纳什维尔的格蕾丝社区教会的家人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寻求帮助。教会的祈祷小组的一员，珍娜·雷，建议庇护所联系王氏复明基金会。

收到那封令人心碎的邮件后不久，基金会启动了我们将称之为“卡贾尔项目”的活动，以激发社区的支持，把她带到美国，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是否能恢复她的视力。一如既往，基金会的医生们放弃了我们的医疗和手术费用，纳什维尔和其他地方的捐赠者提供了资金和航空里程，以资助卡贾尔和格蕾丝来美的旅程。几个家庭提出要在他们的家中接待这对母女，包括大卫和珍娜·雷，布莱尔和卡尔希·马斯特斯，以及托德和卡米拉·奎林。

基金会的一位董事会成员，一位94岁的绅士华莱士·拉斯穆森对卡贾尔项目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帮助我们欢迎卡贾尔来到纳什维尔的方式上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心。我应该去机场接卡贾尔和格蕾丝的那个晚上，华莱士坐着轮椅来到王氏视力研究所，带着一个手工制作的音乐盒。华莱士病得很重——卧床不起，依赖呼吸机，因中风导致腰部以下瘫痪——但他也是一个热衷于木工艺的人，想为卡贾尔制作一个特别的礼物。

所以他从病床上爬起来，推着自己进入他的木工车间，用深红色的桃花心木制作了一个机械盒。在平坦的表面上，有一个黄铜筒，可以播放“耶稣爱我”的旋律。

“今晚你得去机场接卡贾尔，”华莱士的声音中充满了担忧，“我只能想象那个可怜的孩子在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时，会有多么的紧张和恐惧。她是个盲童，英语也不怎么会说。对她而言，一切都会是那么的陌生和恐怖。”

他递给我一個音乐盒。“她到的时候，把这个给

她。上好发条，把它紧贴在她的脸上。音乐的振动会安抚她的心神，”他解释道。

我深受感动，知道华莱士从病床上挣扎起来，制作这个礼物一定很辛苦。“谢谢你，华莱士。这真是个特别的礼物。我相信她会很喜欢的。”

在纳什维尔机场当局的特别许可下，我得以进入机场，在他们的到达门等待我们城市的特别客人。透过玻璃，我看到卡贾尔和格蕾丝从飞机的露天梯子下来，然后我透过飞机舷窗观察着陆续走出的乘客，直到我看到我一直在期待的面孔。格蕾丝牵着小卡贾尔的手，卡贾尔的脸色紧张，双眼紧闭。她安静得就像一只小兔子，紧紧地依偎在她的照顾者身边。格蕾丝低头，用安慰的手抚摸着卡贾尔的短发。

我向格蕾丝打了个招呼，然后弯下腰，轻轻地对卡贾尔说你好。她害羞地笑了，于是我上了华莱士为她制作的音乐盒的发条，按照他的建议，把它放在她的脸颊上。当卡贾尔感受到音乐的振动时，她的脸上立刻亮了起来，露出了最可爱的笑容。

当我们走向行李提取处时，我递给卡贾尔一个棒棒糖。“谢谢你，王医生，”她说，这是她特别为这个时刻学会的一句话。在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后，我们每周都会在一个印度餐馆吃午餐，每次我见到她，我都会给她一块薄荷糖。由于她看不见，我想在她手术前尽我所能与她建立联系，通过她的其他感官建立一致性和熟悉感。

第二天，格蕾丝和卡贾尔来进行初次评估。办公室里挤满了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支持者和朋友，他们都来见卡贾尔，并给她带来了欢迎礼物。然而，在所有的兴奋之下，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几个月来，电视和报纸的报道都在记录卡贾尔从印度到美国的旅程。感觉整个纳什维尔市都聚集在一起帮助她，现在都在看这个小女孩会发生什么。通常，我试图对我的病人保持情感上的疏离，因为作为一名眼科医生，当你手持刀片，准备切入某人的眼球时，一定程度的客

观性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我对卡贾尔的关注完全不同。我深受这个四岁孤儿所经历的悲剧和黑暗的影响，这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自己经历的黑暗和生存的挣扎，我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个过程中，所以我已经情感投入了。我还没有对卡贾尔进行任何手术，但我已经远远超过了医生和病人关系的通常要求。

王氏视力研究所的一位正在做角膜研究的医生，丽莎·马滕博士，是第一个检查卡贾尔的人。

“你能看到光吗？”马滕博士问。格蕾丝为卡贾尔翻译，卡贾尔回答说，“能。”“你能看到我的手吗？”

卡贾尔轻轻摇了摇头。马滕医生为卡贾尔的眼睛拍完数码照片后，愁眉苦脸地找到我。

“她的左眼已经无法挽回了，”丽莎低声地告诉我。她明白我此刻身上的压力，也知道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有多么沉重。“那只眼睛已经没有任何挽回的可能了。”

卡贾尔的左眼因为营养不良，内部构造已经萎缩，结构遭受破坏。我感觉好像被重击了一下，因为我一直期望着有机会修复她的双眼。我知道她的伤势非常严重，但由于伤害的性质，我曾以为如果一只眼睛的手术失败了，我们还能有第二次机会对另一只眼睛进行手术。但现在，她的左眼已经无法挽回，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剩下她的右眼了。

“至于她的右眼，”丽莎继续说，“伤势也特别严重。她的那只眼睛几乎只能感知到光，所以可能只剩下原本视力的百分之一。”

我心中像是落了一块石头。卡贾尔的视力比我预想的还要差，更糟的是，她的伤势已经持续了至少一年了。在这么小的年纪失明，对她来说不仅是身体上的损伤，心理上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大脑接收和处理视觉刺激的能力在出生到八岁这段时间里不断发展。卡贾尔已经在黑暗中度过了至少一年，所以在她四岁的时候，如果她越长时间没有视觉刺激，她在剩下的眼睛中恢复任何视力的可能性就越小。

但我仍抱着那一丝微弱的希望，拒绝放弃。我们为她的右眼计划了一系列的手术，这将会持续两年。一个无情的家庭成员残忍地夺走了卡贾尔的视力，但如果上帝愿意，我会尽我所能帮她找回光明的世界。

2007年5月14日，星期一的早上，我为卡贾尔进行了第一次手术。这个手术的目标是用清晰的角膜替换她那些瘢痕密布的角膜，也为她的眼睛做好准备，迎接更为明确且复杂的涉及干细胞的手术。

然而，我对我所发现的一切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在手术过程中，我首先切割并移除了她那浑浊如白色磨砂玻璃的角膜，打开了她的眼眶。然后我发现，她的眼睛内部看起来就像是遭遇过炸弹袭击一样。她的眼睛充满了血色的凝胶和疤痕组织，这些疤痕组织与一种奇异的闪光物质交织在一起。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我对手术团队说，我震惊不已。

我也从未遇到过眼球受损如此严重的情况，即使是布拉德·巴恩斯也没有。

当我意识到对卡贾尔的暴行是在她睡着的时候犯下的，目的就是要伤害她的眼睛，使她失明，我感到震惊。当布拉德·巴恩斯在一次铝融化事故中失明时，至少他有一些防护装备，有反射神经闭上眼睛，从伤害源跳开。尽管他被烧伤得很严重，但损伤仍然相对较浅，所以我们能够成功地治疗他。但卡贾尔对她的攻击者毫无防备，她的攻击者选择在她睡着的时候伤害她，把她按住，撑开她的眼睑，让腐蚀性的酸液有足够的时间破坏她两只眼睛的最深层。酸液撕裂了彩色的虹膜，分解了晶状体、玻璃体，即填充在晶状体和视网膜之间的透明凝胶，被血液染红。

作为医生，我遇到了最糟糕的情况；我看到了许多外科医生永远不应该看到的事情，却没有找到我希望找到的任何东西。

震惊之情化作了怒火在我心中燃烧。我对她继母的不道行径感到深深的愤慨。怎么可能有人会对一个

无辜的小孩实施如此残忍的行为？在我作为基督徒的生涯中，这是我第一次对上帝感到愤怒。我不明白，一个爱孩子的上帝，尤其是爱孤儿的上帝，怎么会允许这样的恐怖发生在一个如此无辜和无助的人身上。

我为卡贾尔清理眼部，移植了清晰健康的角膜并用羊膜包裹，然后送她去恢复。手术历时甚长，我疲惫地坐下，双手扶住额头。我因手术的艰难而满头大汗，然而更让我疲惫的是内心的挣扎。我对上帝为何未能阻止这种暴行感到失望，他把卡贾尔带到了地球的另一端，然而他知道我们实际上能为她做的真的有限。

“上帝，你若是爱卡贾尔，为何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这样一个无辜的孩子身上？”我带着痛苦质问，“为何不能留给她一丝视力，哪怕只是一丝，而非让她的受伤深入到眼睛的最后一层？”

我等待卡贾尔从全身麻醉中清醒，然后和格雷丝以及寄宿家庭进行了交谈。

卡贾尔的右眼被厚厚的白色绷带紧紧包裹，术后的疼痛和不适让她的眼泪从绷带下滑落。格雷丝把卡贾尔抱在怀里，轻轻地在摇椅上摇晃。

“这真的很难，”我向格雷丝和卡贾尔的支持者们坦诚，尽管我并没有表露出我内心的愤怒和痛心，“我们已经尽力了。她可能会恢复一些视力，也可能一点也恢复不了。我们只能看上帝的计划是什么。”

2007年7月，我为卡贾尔进行了第二阶段的手术，移除了羊膜，移植了另一个新的角膜，并移植了能帮助她的新角膜愈合的干细胞。手术后，卡贾尔能看到形状、阴影和一些颜色，这比她到达时的视力提高了大约10%。然而我希望的是更多……远远更多。

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我的信仰和对上帝都没有平静之感，但我没有跟任何人谈论我的感受。我把这份苦楚深藏在心底。没有人问我我感觉如何；我是医生——每个人都带着他们自己的忧虑和恐惧来寻求我的帮助——因此我不能是那个发问的人。我没想到支持所有人的希望，却让我自己的希望在压力和

情绪的负担下崩溃。人们向我提问，但当我转过身来，我背后没有人能够回答我的问题。“上帝怎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一个无助的孩子身上？”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始终未能找到，我深深地被这个问题困扰。

* * *

2007年的秋季，基金会在纳什维尔市中心的希尔顿酒店隆重举办了第三届年度眼球筹款晚会。那一年的晚会主题为“以黑白制造头条新闻”。虽然华莱士·拉斯穆森身为活动的主席，却因病未能出席。他定会欣喜若狂地看着我们的嘉宾卡贾尔，她身着宽松的黑色连衣裙，裙上白色的波点与腰间的白色腰带相映生辉。卡贾尔的苦难经历、她的勇敢，以及社区为帮助她付出的英勇努力，无疑在纳什维尔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在每一次的眼球筹款晚会上，总有些从王氏复明基金会受益的患者分享他们的感悟。格雷丝带着卡贾尔走上台，向所有为卡贾尔贡献力量的人表达了感谢。随后，许多支持或接待过卡贾尔的人陆续走上舞台，围绕在她和格雷丝身边。他们接连述说自己是如何照顾卡贾尔，以及她又是如何深深影响了他们的生活。那些寄宿家庭的父母和孩子们谈论着卡贾尔对他们的影响，她是如何打破他们在美国的舒适生活，让他们看到另一个世界，那里有许多孩子正在承受痛苦。卡贾尔展示了如何在失明和不确定中保持快乐和满足，即使在经历了如此可怕的虐待之后。一个又一个的人分享道，他们原本以为自己在帮助卡贾尔，但最后发现，她帮助他们更多。他们意识到自己曾经如何把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他们应该感恩在美国的生活。

直到那一刻，我始终无法释怀对上帝的愤怒，因为他让卡贾尔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即使我们竭尽全力，她的视力也没有多大改善。我觉得卡贾尔理应得到更多。我深深地期望她能像其他基金会的患者，如弗朗西斯科、乔尔·凯斯和布拉德·巴恩斯那样，恢复更多的视力。但当我听到卡贾尔的支持者们描述他

们对帮助她的机会的感激，他们与她形成的情感联系，她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快乐，以及他们在自己的孩子们身上看到的变化，他们现在对他们在美国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更加感激。我看着卡贾尔，她站在我旁边等着轮到她发言。我突然意识到，卡贾尔不再是她几个月前刚来到美国时那个害怕、胆小、安静的孩子。她现在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小女孩，充满了生命和快乐，性格活泼，热情洋溢。

卡贾尔的快乐，源于她被爱。自从卡贾尔第一次手术以来的几个月里，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对上帝的愤怒开始消退，渐渐地，我感到我的心与上帝和解。我曾让自己相信，卡贾尔的悲惨境况是无法挽回的，但当我考虑到她的巨大变化，以及她对社区的深远影响，我意识到了上帝所做的更大的计划。卡贾尔教给我们，当我们经历黑暗，感觉无论我们在哪里寻找都找不到光明，光明可以从我们内心发出。她散发出一种发光的快乐，激励了每一个遇到她的人，包括华莱士·拉斯穆森、寄宿家庭、我们整个的手术护理团队和办公室员工、以及全世界关注她故事的每一个人。说实话，我仍然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上帝会允许如此可怕的痛苦，但我至少接受了卡贾尔所经历的有一种目的，就像我最终接受了我在中国年轻时经历的痛苦。

等到每个人都分享完他们的故事后，我把麦克风递给卡贾尔，轻轻地在她耳边说：“卡贾尔，你想对今晚在这里的每个人说些什么吗？我们都非常爱你！”

她自从几个月前来到这里以来，已经学了不少英语，所以我以为她会有些话要说。但她静静地站在那里，犹豫地把麦克风握在手中。然后她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混杂着一丝淘气。显然，卡贾尔已经为这一刻做好了准备……她有一个特别的惊喜，卡贾尔有一个秘密。

后来我才知道，自从卡贾尔来到美国，她一直暗自渴望学会唱歌。从她四岁的视角看，她认为自己被遗弃在印度的火车站，被故意弄瞎眼睛的原因，就是因为她不会唱歌。她想证明自己确实能唱，因此值得

被留下。在美国，卡贾尔和几个寄宿家庭的孩子成了朋友……她学会了唱歌。

卡贾尔把麦克风举到嘴边，开始唱歌：“是的，耶稣爱我。是的，耶稣爱我。是的，耶稣爱我，圣经告诉我这一切。”

我认出了卡贾尔正在唱的歌。这是华莱士为欢迎卡贾尔来到美国而制作的音乐盒上的歌曲。

当卡贾尔结束她的歌声，整个房间爆发出如同交响乐团般的热烈掌声。当我们周围的大多数面孔都流下了泪水时，卡贾尔的脸上却洋溢着满足的笑容。乐队随即奏起了田纳西华尔兹，我带着卡贾尔走上舞池，开始了第一支舞。她在可爱的裙子中跳舞和旋转时露出了笑容。她看不清他们，但超过五百双眼睛在看她的时候，都充满了泪水和幸福的光芒。

第十九章

多莉

“多莉·帕顿光临了。”王视力研究所的一名员工兴奋地宣布。

乡村音乐的女王，正盛情等候在我的大厅中！我心中洋溢着喜悦，走出门去迎接这位特殊的客人。纳什维尔艺术界的其他璀璨星辰，如妮科尔·基德曼、娜奥米·贾德、朱莉安娜·霍夫、肯尼·切斯尼、乔·迪·梅西纳、查理·丹尼尔斯和阿什利·贾德等，也曾光临过我们的检查室。他们寻求我们的眼科护理或视力矫正手术，每一次，我都深感荣耀。能被托付如此珍贵的视力——不论是名人抑或普通人，总让我充满敬畏。

多莉身材娇小，充满活力，反应敏捷。她首次来访时，我便清楚地知道，她明确自己的需求，因此，没过多久她就回来接受了LASIK手术。几个月后，她又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我原以为她是来复查的。

“实际上，我今天并不是来看眼睛的，”她笑着说，“我是来和你，王医生，一起演奏音乐的。”

“你是来和我一起演奏音乐的？”我问，以为她在和我打趣。

“哦，是的。我听说你会演奏中国的二胡。我正在制作一张新专辑，我想在一首乡村歌曲中加入你的二胡。”她的话让我感到既惊讶又喜悦。

“你是认真的？”我说，“好的，那我们就来试试吧！”

多莉正在制作一张名为《那些年的日子》的专辑，她希望我在一首名为《残酷的战争》的歌曲中演奏二

胡，这是一首源自内战时期的老民谣，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孩想陪伴她心上人约翰尼赴战场的故事。

2005年7月的一个湿热的午后，我和我在纳什维尔过暑假的儿子丹尼斯，以及我的朋友兼摄影师J. R. 戴维斯一起驱车前往多莉的录音室。我既兴奋又感到些许手足无措。

“爸爸，你觉得我能从多莉那里得到一个亲笔签名吗？”丹尼斯问。

我笑了。“当然！我们会问她的。”

我们在纳什维尔海洋之路的前面停车，这是一个位于纳什维尔埃奇希尔社区的百年教堂里的美丽录音室。多莉热情地迎接我们，带我们进入A录音室，这是主要的录音室。我对所有的设备感到惊奇，我从未见过混音台上那么多的小按钮和旋钮。这与我在马里兰州熟悉的激光实验室的复杂设备相去甚远。通过一块大的玻璃矩形，我可以看到里面由神圣的教堂变成了工作室，装饰着闪闪发光的橡木地板和高耸的彩色玻璃窗。海洋之路录音室体现了音乐城的精髓，神圣和世俗的世界融合成超越人类经验的表达。

多莉和我并肩落座在一张硕大的会议桌旁，我们与汤姆·霍华德一起——他正在为专辑操心着弦乐编排——细心聆听一首精简版的歌曲。丹尼斯和J. R. 在一旁忙碌地为我们的工作过程拍摄照片和录制视频。我带来了一把近十年前我在香港旅行时购买的手工制作的二胡，因为我有预感，这将会是一个独特的夜晚。多莉和我准备尝试一些新颖且极具特色的东西——用一种古老的中国乐器演奏一首美国乡村歌曲的旋律。

演示结束后，我对多莉说：“这首歌真棒。有我那部分的乐谱吗？”

“我没有你那部分的乐谱，”她回答。

“好的，那我可以看你那部分的乐谱吗？”

“我也没有乐谱。”

所以我们没有我这个乐器的乐谱。多莉对这首歌了如指掌，她只是凭记忆来唱歌。

我意识到我不仅是来演奏，而且还要作曲。我最后一次写歌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在火车上去中国科技大学的路上写的《小鸟》。在那之前，我主要是和天马一起作曲，试图避免被下放，避免一生的贫困和艰苦劳动。回想起那些日子，我意识到我们实际上很幸运没有被逮捕，因为我们的一些歌曲——比如《囚犯之歌》——描述了我们从共产主义压迫下获得自由的渴望，如果政府发现了，我们可能会陷入深深的麻烦。

近三十年后，我再次拿起了作曲的笔，但这次，情绪、目的、人物和地点都大不相同。唯一的相似之处是两首歌中表达的渴望，对自由和爱的持久渴望。

二胡是表达渴望的完美乐器。汤姆、多莉和我开始尝试旋律，试图找出一种东西和西方还未听过的声音。我们希望创造一些非常特别的东西，将两种完全不同的音乐风格融为和谐。中国音乐主要使用五音阶（钢琴上的黑键），而西方音乐使用七音阶（黑白键）。我们反复听《残酷的战争》的演示，将其分解成许多不同的段落，并在二胡的两根弦上试验音符。

几个小时后，我们将各种音字符串在一起，最终为二胡制作了一个可行的乐谱。当我们等待工程师为录音做准备时，我感到欢欣鼓舞。我为东西方的融合以及它们之间产生的美妙和谐感到欣喜。

“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唱，我就弹一首歌，”我对Dolly说，当我们在教堂的礼拜堂等待时。

“让我看看，我记得什么中国歌？”多莉对自己说，嘴角带着调皮的笑容。

“哦，这首你肯定知道，”我回答。

自从我初到美国，我最喜欢在二胡上演奏的歌曲就是爱尔兰曲调《丹尼男孩》。坐在那个宽敞的房间里，一个世纪的歌手的记忆在头顶上方飘荡，我开始在弦上拉动我的弓。

多莉立刻加入并开始唱歌。她有如此巨大的才华和这么多年的经验，她不需要任何准备。当我演奏这首著名旋律的主要音符时，她和声唱歌，补充了二胡

的哀怨声音。当歌曲结束时，我在高音阶区演奏，多莉紧随其后。

“我不清楚你接下来会怎样演唱，但我已经按照我的方式唱出来了！”她娇笑如铃。那一刻，我整个人仿佛被快乐充溢，无比灿烂。我刚刚用中国的乐器——二胡，演奏了一首爱尔兰赞美诗，并有幸与美国乡村音乐的偶像共享舞台。音乐的力量真是奇妙，它以一种无法言喻的方式跨越了文化的鸿沟。如今，我即将开始录制那首我几十年来的首度尝试的二胡作品，整个创作过程如梦如幻。我对于能有机会亲身经历这样的转变，感到无比欣喜，从年轻时的恐惧驱使的挑战，到三十年后的生活和爱的庆祝，我的二胡演奏历程仿佛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蜕变。

录音结束后，多莉亲自送我们出门，我由衷地对她表示了感谢，告诉她我有多么喜欢她新专辑的音乐。“那些年的日子，真是太美好了。”我带着微笑说，暗指专辑的主打歌曲。

“是呀，”她回应着，嘴角上扬，“那些都是过去的美好日子。”她挥手向我们道别，我们便驶出了停车场。我看着丹尼斯，他看上去非常享受这场东西方的艺术合作。至于他之前要求的签名，多莉也没有让他失望。她找到了我们写下原创乐谱的草稿，用她那大大的、独特的草书签下了名字。几年后，当我站在艺术家们的一方，为他们的权益而奋斗时，我会记起和多莉的那个下午。

第二十章 回馈

会议室内充满了紧张气氛，我几乎坐立难安。我被词曲作家、音乐业界的巨头以及国会的权威们包围着，他们齐聚一堂，共商如何打击中国的音乐盗版行径。起初，我甚至对自己在这房间里的存在感到困惑，毕竟我只是一名眼科医生，并非音乐领域的专家。但当我听到他们的争论和主张，我内心深处燃起了热情，使我无法再保持沉默。

自1982年起，我便在美国生活，我的成年人生几乎全部在美国度过，因此我对美国给予我的所有机会深感感激。自我踏上华盛顿特区的那一刻起，我便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国家，我有幸能够过上我心中的美国梦。

我童年的岁月充满了东方的传统。我在父母和祖父母的呵护中成长，他们教我家庭的价值观，教我努力工作，相信自己。而美国则教会我怎样展望未来，怎样拥有雄心壮志，怎样去领导他人。我的医学成就和我影响生命的能力，都是在我东方的根基和西方的教育交融中独特地塑造出来的。这些经历的混合造就了我在医学专业领域的领导洞察力和能力，帮助解决我们社会中的冲突问题。我一直对东西方之间的政治对话和文化交流感兴趣。从我小时候在尼克松访华期间见到他，到我在天安门广场悲剧期间的社会活动，再到我在白宫与里根总统和布什副总统会面，我与我们的时代的一些伟大政治领导人有过交往。我从这些经历中学到了很多，这激发了我参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兴趣，回馈美国。

关于中国音乐盗版的听证会在BMI大楼的一个宏大礼堂内举行。主要的讨论焦点是如何保护美国的词曲创作家，防止他们的作品在中国被肆无忌惮地盗版。

一位国会议员提出对中国实施制裁。“我们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再也不会忍受这种情况！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执行我们的法律，包括经济制裁。”

听到他的话，我不禁皱了皱眉。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在这个问题上并非明智之举，也不会有效地支持美国的词曲创作家。此刻，是我回馈和贡献的时候。我站起来，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

“试想一下，三十年前的香港音乐和电影盗版猖獗的情景，”我开启了话题，“那个时候，香港市场上有一半的音乐作品都是盗版。而现如今，这个比例已经大幅度降低，几乎只剩下零星的几个百分点，这已经接近了西方国家的标准。这正是我们期望在中国大陆看到的改变。你们知道，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为何香港能有如此巨大的转变吗？并非是因为美国威胁要对其实施经济制裁，而是香港本土的艺术家们——像国际巨星成龙那样的人物——意识到了保护艺术家的知识产权也是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因此，我坚信，关键在于我们需要共同努力，与中国的艺术家以及政府进行沟通，帮助他们认识到，减少音乐盗版不仅对美国有利，对中国自身也同样有益。”

我说完后，会议室内鸦雀无声。我能感觉到在场的听众正在深思熟虑我刚刚表达的观点。接着，纳什维尔歌曲创作人协会的执行董事巴特·赫比森开口说道：“我完全同意王医生的观点。我们应该按照他的建议去做。”

我心中充满了激动。我意识到我正在影响着保护美国歌曲创作人知识产权的领域，同时我也保持着对不同文化和人民的敬意和尊重。我明白在那一刻，我想要做出更多的贡献，于是我加入了纳什维尔歌曲创

作人协会，成为了顾问委员会的一员，并且积极推动中国和美国的音乐家进行对话和交流。

除了强化纳什维尔的音乐和创意社区，我越来越感到，提升我美国同胞与中国人民之间的文化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通过帮助田纳西州本地企业将他们的产品销往海外。我对美国从中国购进了大量商品感到困扰，因此我想要鼓励贸易流量反向运行——从田纳西州向中国出口商品，同时也鼓励中国的制造公司迁移到田纳西州，在这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2007年，我创立了田纳西州中国商会（TCCC），帮助田纳西州的企业将产品销往中国。后来，我也成为了田纳西州美国商会（TACCC）的名誉主席。作为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企业主，我既了解东方的文化观念，也熟悉西方的商业思维。我坚信，销售产品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任何企业来说——就是理解客户。因此，了解其他文化，比如中国文化，不仅仅是作为全球公民的义务，实际上，这已经成为经济必需品，因为如果我们想要增加对中国的出口，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客户。通过教育论坛，TCCC和TACCC教育田纳西州的企业主们去了解我们的潜在客户——中国人——包括中国的历史、人民和文化。

在最近的一次商会会议上，一些本地企业主问他们应该如何找到与中国企业合作的途径。

“你的独特价值主张是什么？”我问道，“如果你想与中国企业合作，在中国国内生产和销售商品，你能提供什么，这是你的中国商业伙伴没有的，最需要的？”

“我可以提供资本，”一位本地企业家回答。

“美国实际上欠中国2万亿美元，我们与中国的年度贸易逆差达到3180亿美元，”我说。“中国不需要我们的资本。”

“好吧，如果不是钱，那技术呢？”

“中国对科技的接纳速度惊人，”我表示，“他们拥有一批非常出色的工程师。”

“那管理技能呢？”

“美国的企业管理确实很好，但中国也有自己的高效经理人，他们很快就能学会这些技能。”

此时，会议的参与者似乎对其他的想法感到困惑，所以我重复并强调了我最初的问题。

“我们能为中国提供什么？我们的独特价值在哪里？在任何商业合作中，我们都必须对这些问题有答案。尽管中国可能并不需要我们的资本、技术或管理，但他们确实需要一样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东西……这是只有我们才能提供的。”

会议室内一片寂静，每个人都在等待我的结论。

“中国人需要的，是我们的美国品牌。”我总结道，“在他们眼中，美国的商品质量一直都高于中国制造的产品。如果一种产品带有美国的标签，它在中国市场上的价格可能是同类中国产品的三倍。未来五到十年，将是与中国进行商务合作的黄金时期，我们可以利用美国品牌的声誉。”

“我们的独特价值，就在这里……我们是美国人！”

以TCCC主席的身份，我被邀请参加了由田纳西州前州长菲尔·布雷德森领导的对华贸易代表团。自那年10月底开始，我们这个由商业和政府领导人组成的团队，花了十天的时间访问北京、西安、杭州和香港，与中国的商业、科技和医疗保健领域的领导人会面。代表团的目的是对2007年在北京成立的田纳西州-中国发展中心进行后续访问。这个经济发展办公室的设立，是为了促进两国之间的商业交流，希望鼓励中国的公司迁移到田纳西州，从而在这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我参与代表团的的活动，是我个人愿景回馈美国的又一步。

我们对多元文化的理解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包括那些在美国的移民群体。为此，我与盖伦·斯宾塞·赫尔博士合作，他是一位教育家，长期以来对联合移民和少数族裔企业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们共同创立了田纳西州移民和少数族裔商业团体（TIMBG），

其首次会议于2013年9月16日举行。TIMBG的使命是促进移民和少数族裔企业之间的沟通，确定和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在田纳西州中部，每四个企业中就有一个是移民或少数族裔拥有的，这代表了我们的商业社区增长最快的部分。

近年来，我也开始渴望重新与中国建立联系。1982年我离开中国时，我只有21岁，但已经经历了一生中有些人可能都无法承受的艰难和痛苦，我不再想与共产主义独裁者有任何瓜葛。我来到美国是为了追求自由，我热爱并拥抱了这里的语言、文化和基督教信仰。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更加珍视我民族的一些价值观，如家庭、教育和尊老的重要性。所以，我也想回馈中国。2005年8月22日，我在中国进行了首次无刀全激光LASIK手术，这是在14亿人口的国家中首次进行的此类手术！2006年，我成为了上海爱尔眼科医院的国际总裁，这是爱尔眼科医院集团的旗舰医院，也是中国最大的私立眼科医院系统。在我出版的八本眼科教科书中，有五本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中国的眼科医生也是我们在纳什维尔的王氏视力研究所的常客，许多研究员在这里接受过培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一直在用我在西方学到的知识来帮助我出生的国家。

除了医学，我也对帮助中国的精神层面感兴趣。美国不仅给了我世界级的教育，也给了我对上帝的信仰和信任，这改变了我的生活。随着我基督教信仰的不断增长，我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帮助传播对上帝的信仰和信念到中国。随着中国物质财富的增加，腐败现象也显著增加。这需要改变，但我不认为仅靠法律就能解决这个重大问题。今天的中国社会需要更多强调个人责任和道德，这些都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

初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我常常听到周遭的人说：“你不应该那样做。”这句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平淡无奇，但在我出生的中国，这却是罕闻的说辞。在这看似朴实的语句中，蕴藏着道德准则和对是与非的内在洞悉，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美国基督教文明的

历史烙印。而中国，作为一个以无神论为主流的国家，自然很少有这样的言论。在美国，至少有一半的公民自诩为基督徒，他们的生活被对上帝的信仰所引领，他们坚信自己的行为要对上帝的更高标准负责。而在没有信仰和对更高权力负责的情况下，一个人可能会毫不犹豫地走向腐败，只要他认为自己不会被发现。我们当然可以加强法律和法律制度，但在没有信仰的情况下，我们永远也雇不够警察。我深信，中国最需要的，是让人民相信上帝。

2008年，我创立了王氏基金会，致力于资助中国的基督教传播。我们的主要项目，就是中国圣经笔友项目。我们的目标是将一万本圣经送到中国，并从接收圣经的中国人那里收集电子邮件地址。然后我们将这些电子邮件地址分发给他们在美国的基督教兄弟姐妹，以此建立联系，从而帮助他们培养信仰。我希望能一点一滴地将我自身深受的基督教信仰传递给中国人民，因为这是一种丰富了我生活的信仰。我对于中国圣经笔友项目有可能为上帝的王国招募四分之一的人类感到无比激动！

我的信仰转变历程从无神论者到基督徒，也激发了许多人的关注，因为我可以分享我对于信仰和科学并无冲突的理解。近年来，我在全国各地进行讲座，希望能弥补信仰和科学之间的鸿沟。我坚信，信仰和科学是朋友，而不是敌人。我的羊膜接触镜手术经历就是信仰和科学可以共同工作的证明。只有当信仰和科学结合，而非分裂，我们才能找到新的、出乎意料的、更有力的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法。

2012年秋，一位来自田纳西州布伦特伍德的贝瑟尔世界宣教教会的牧师赖斯·布鲁克斯找到我，希望将我的故事收录在他的书《上帝未死》中，这本书提供了上帝存在的证据。我非常荣幸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本书出版后，启发了一部同名电影，讲述了一个大学新生挑战他的哲学教授的无神论信仰的故事。电影中的一个角色，一个正在探索基督教的中国学生，

正是由我的生活故事启发的。当这本书首次印刷时，这部电影在全球已经收入近1亿美元，超过2500万美国人已经看过。如今，续集《上帝未死2》也已经上映，在其中，我的角色决定回到中国传播福音，这个故事情节是根据我们现在的中国圣经笔友项目设计的。我相信这部电影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我们许多人对与神性连接的渴望，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渴望，它贯穿于全人类，遍布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从东到西。

无论我们从何处来，无论我们将去何处，我们都在追求同样的东西——爱、和平和安全——我们都欣赏上帝创造的美。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彼此对立，因为，就像信仰和科学一样，看似极端的人们确实可以以创新的、互利的方式共同工作。作为一个以亚洲根源为骄傲的美国人，我向东西两方伸出手，希望能让他们更近一些。

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曾经说过：“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我将这句话牢记在心，我相信回馈的理念是一个持久的使命，是我们需要向下一代传递的使命。这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我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我并不完美，我也没有所有的答案，但我确信：我工作越努力，我自己的行动就越能激励别人——即便是我第一次见面的人——对这个伟大国家赋予我们的自由心怀感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改变奠定强大的基础，更加珍视我们作为美国人享有的自由。只有心怀感激，我们才能有动力在我们自己的社区、公民、宗教和家庭中寻找回馈的方式。这无疑会增强我们的家庭、工作场所和敬拜场所的力量。这种回馈的心态将在我们自己的影响范围内以及更远的地方产生积极的变化，它将带来更丰富、更充实的生活。

这种感激之情和回馈的愿望一直是我建立王氏复明基金会、王氏基金会、田纳西州华人商会和田纳西州移民和少数族裔商业团体的动力，也是我多年来所有社会和社区工作的灵感。我很荣幸也很谦虚地接受了多年来我在慈善和社区工作中获得的许多奖项，包

括NPR的年度慈善家奖、基瓦尼斯俱乐部的年度杰出纳什维尔人奖和特雷韦卡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我想尽我所能帮助每一个人从黑暗中走出来，走向光明，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第五部分 我如此美丽!

第二十一章 玛丽亚（下）

2013年11月7日，星期四的中午时分，全球的朋友和支持者们都在默默为玛丽亚——以及我——祈祷。我面临的，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为艰巨的眼部重建手术。这种情况看似无法逾越。那个星期天，在我首次诊断玛丽亚之后的教堂中，我试图专心听讲道，却反复在脑海中回想着即将对她进行的手术的细节。玛丽亚自出生以来就面临着视力问题，因为她是早产儿，出生时只有两磅重。在摩尔多瓦的孤儿院中长大的她，基本的医疗保健和必需的营养都显得捉襟见肘。玛丽亚患有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她的左眼视网膜脱落未曾得到治疗，因此，她已经无法用这只眼睛看到任何事物。她的右眼只剩下光感知视力，然而这也被严重的眼部损伤和慢性炎症所影响。因此，由于我们只能用她的右眼来实施手术，玛丽亚复明的希望几乎微乎其微。

我坦诚地向玛丽亚及她的寄养家庭，以及史蒂夫和琳恩·亨德里希解释，玛丽亚的右眼手术可能会失败，如果真的失败了，她可能会失去在那只眼睛剩下的微弱视力。如果手术出现任何并发症——比如感染——我们可能不得不彻底切除她的右眼球。那将是一场灾难，因为至少有光感知视力的眼睛总比面临余生全盲要好得多。此外，如果眼球必须被切除，她眼眶周围的组织和骨结构会恶化，这可能会永久性地改变她那张天真无邪的脸庞。

此外，如果我打开玛丽亚的眼睛，发现更多的损伤，就像我在卡贾尔身上发现的那样，我能处理另一次这样的心碎吗？我感到紧张和不安。

玛丽亚手术相关的巨大风险和高期望值让我感到身心交瘁，仿佛自己要彻底崩溃。我别无选择，只能向上帝求助。坐在教堂的长椅上，我低头祈祷。

“上帝，为什么我要同时经历所有这些磨难？这简直是难以承受的。面对玛丽亚即将到来的手术，如果有人能够构想出一个关于强度、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绝对最糟糕的情况，那就是现在这个！这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每个人都对她的手术寄予了如此高的希望，而且在此之上，我的生活也在同时崩溃！现在上帝，这真的是我需要你的时候，主……我迫切地需要你！你是我唯一的希望，能帮我度过这一切。主，我并不害怕或恐惧自己的失败，或者我现在的处境有多么艰难，我在我的生活中已经多次看到压力和失败。相反，我害怕和恐惧的是可能让玛丽亚失望，她是如此无辜、珍贵和脆弱。上帝，请帮助我们！”

在玛丽亚即将接受手术的那一天，我有幸在洗手的瞬间，有一刹那的片刻属于自我。尽管挑战重重，但这些日子以来的热切祷告为我带来了心灵的宁静。我感到上帝与我同在，我可以将自身的压力放在一旁，全心全意关注于玛丽亚，全神贯注于她即将进行的手术。虽然手术看似困难重重，但我坚信，正如上帝曾帮我度过了弗朗西斯科、乔尔·凯斯、布拉德·巴恩斯和卡贾尔等无法想象的手术，他同样会再次指引我完成对玛丽亚的手术。

也许，上帝让我在个人和职业生活中面临如此严峻的考验，是为了让我明白，我有多么需要他的帮助。也许，他希望我深刻认识到，即使是我全力以赴的努力，也不足以帮助这些病人，甚至无法帮助我自己。我需要静听他的教诲，顺从他更大的力量和意愿。只有通过勤奋工作和真挚的信仰，我才能从困境中挺身而出。

我从洗手台走开，举起双手，心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平静而坚定。在我走进手术室之前，我告诉史蒂夫和琳恩，我们已经进入了无路可退的境地。我们都

清楚，手术将会充满危险，玛丽亚最终可能会恢复部分视力，也可能会完全失明。我们为上帝的指引、力量和智慧祈祷。因为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祈祷上帝能够帮助我们所有人接受他对结果的安排。我深知，真正的信仰不是向上帝提出我们的需求，然后期待他满足，而是以“非我所愿，乃你所愿”的谦逊之心，向上帝献上我们的祈祷，然后接受他对我们处境的安排。

我会尽我所能……其余的，全权交给上帝！

在手术室中，团队正在准备手术器械，我则在整理我的手术服和手套。

我们准备开始了。

恢复玛丽亚右眼视力的难题有十个，而我们到现在只解决了一个——超声波显示她的视网膜仍然完整。接下来的问题是她的瞳孔无法扩大，必须手动撑开，这无疑增加了手术的风险。手术的目标是：通过她收缩的瞳孔，破解坚硬、混浊的白内障，挖掘并植入人工晶状体。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一个疤痕状的角膜来完成——这只给我提供了非常有限的视野——和一个慢性炎症的眼睛，有一个扭曲的解剖结构。此外，我还不确定我是否会遇到不稳定的晶状体，或者囊状结构是否足够坚固，以支持去除密集的白内障和植入晶状体。最后，即使我们在所有这些步骤中都成功了，我仍然必须面对处理扭曲的虹膜，试图重建她的瞳孔，以及手术后，处理潜在的视网膜和视神经问题。

当我试图手动打开她的瞳孔时，我意识到她的虹膜粘在包含晶状体的囊中，这就是为什么瞳孔不能扩大。我将不得不分离粘在一起的组织，这是一个极其微妙的程序，因为在这样一个慢性炎症的眼睛中，损伤囊状组织的风险非常高。如果囊被损伤，去除坚硬的白内障将变得更加困难。要将虹膜从其紧密附着的囊中分离出来，就像将两片塑料薄膜粘在一起，然后用手术刀从两片中间切开，而不撕裂或刺穿任何一片……而且，虹膜比塑料薄膜还要薄！我感觉我正在尝试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我看着护士，低声说：“今天可能会过得很漫长。”

我借助一台庞大的手术显微镜，用最精细的镊子的尖端轻轻地拉扯组织，直至它绷紧，然后用超薄的手术刀以最大的谨慎和精确度切开它。大约一个半小时后——在我看来，这仿佛是一段无尽的时间——我成功地切开了大约75%的粘连组织，长度仅有几毫米。然而，当虹膜从囊中分离时，囊和晶状体脱离并开始四处移动。晶状体，因为不再紧密地固定在虹膜上，开始摇晃，好像随时都可能掉入眼眶。此时，分离工作变得更加艰巨，就像切割两片互相粘连的塑料薄膜，只不过现在它们在风中飘摇。

面对这种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我可能需要放弃了。我的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再无法前进一步。我无比遗憾地意识到，我可能无法帮助玛丽亚，情况可能会像卡贾尔的那样糟糕！

我注射了一些凝胶以稳定眼内的结构，然后将显微镜推到一边，从手术台边滚开手术椅。我全身都在出汗，压力和紧张让我需要休息一下，恢复一下。护士帮我拉下手术口罩，递给我一个纸杯，让我喝一口水。

我知道，我已经尽力了，但是我已经达到了我的手术能力的极限，不能再自己进行下去了。

突然，我第一次祈祷的祷告——三十年前在马里兰州站在原子碰撞器上时的祷告——涌上心头。“上帝帮助我们！”我回想起那个夜晚在哈佛广场的情景，我在科学中寻找意义，寻找解决胎儿组织研究的道德困境的办法。上帝提醒我，在我生活中我认为没有希望或解决方案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地展示了他的力量，就像他揭示了胎儿研究困境的解决方案一样。

现在我知道我需要做的是上帝在我以前的每一个困难情况中都鼓励我做的事情——谦卑地向他屈服，请求他的帮助，通过玛丽亚眼睛手术中这个极其狭窄

的通道。这一刻的精神象征意义如此深远，使我想起了马太福音7:14的圣经经文：“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低下头来祈祷。

“上帝，我已经完成了，”我说。“你给了我一个挑战，这超出了我到目前为止在生活中获得的知识 and 技能。请揭示你的计划！你已经带领我走到这里，那么你能不能帮助我通过这个最困难的部分？你能不能稳定我的手，因为我现在真的不能犯任何错误。我以耶稣基督最有力的名义请求，阿门。”

虽然只是大约十分钟的休息，但对于手术室的工作人员来说，这感觉就像是永恒。所以我知道护士和技术人员在想发生了什么。由于手术看起来像是无望的，一位护士实际上已经准备好一旦我宣布手术失败，确认我们已经完成，就把灯打开。但我只是保持在祈祷的静止中，倾听上帝的引导。

手术室很安静，非常安静，只被心脏监护器的单调的蜂鸣声打断。

慢慢地，我感受到一股平静之感油然而生，如同过往那些我将一切交给上帝的时刻，我感觉到他在我内心深处的存在逐渐加强。我心中充满信心，思绪清晰，手也异常稳定，我将手术椅滚回到了原位。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全神贯注，勇往直前，坚定地分离那最后一处，也是最棘手的粘连组织，同时还要应对晶状体不稳定移动的额外挑战。当我终于穿过剩下的组织，瞳孔终于打开，我惊讶地发现，囊性组织竟然完好如初。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当我请求一种新的工具时，工作人员明白，危险的解剖过程终于成功完成，整个团队都松了一口气。

最困难的部分已经过去，我感到一种巨大的释然，但我不能停下，工作还要继续。接下来，我必须通过扩张的瞳孔，极其小心地打碎坚硬的白内障，而不能损坏晶状体背部的囊或已经弱化的支持结构，然后稳定晶状体囊，并植入人工晶状体。剩下的手术包括去除角膜混浊进行得很顺利，完成后，我转过手术椅，

满意地看着工作人员，给他们竖起了两个大拇指。

“我们做到了！”我高声欢呼，手术室里随即爆发出欢呼和掌声。

上帝再次为我，为我们，来了！

通常，白内障手术只需要大约十分钟，但玛丽亚的手术如此复杂且层次繁多，我们在手术室里待了超过四个小时。尽管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但结果仍有待确定。我已经恢复了眼睛的解剖结构，但我还不知道玛丽亚是否能看到任何东西。还有几个障碍需要我们去克服。

如果她的视网膜或视神经功能出现问题怎么办？我们在取下她的绷带后会有更好的了解，但即使她的眼睛各部分都恢复了健康，我们仍然要面对她的大脑是否能够处理视觉刺激的问题，尤其是对于一生都无法看见的她来说。当玛丽亚慢慢从麻醉中恢复过来时，护士来找我，说：“王医生，她在找你。”

那一刻，我面临一个决定。我可以自己取下她的眼罩，测试她的视力，这样如果手术失败，没有恢复视力的失望就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但如果她能看到，我将是唯一见证这个一生一次的奇迹的人。我们中的很少人知道有人试图从黑暗中走出来，重见光明，但我们中的更少人在一个人从黑暗中走出来，进入惊人的视觉世界的那一刻在场！

我决定将我所有的自尊心搁置一旁，接受可能的结果，即使它并非我们所有人所期待的那样。我坦然接受了我已经尽我所能的事实。然而，若是玛丽亚能够重见光明，那将会是一段我们一生都会记住的经历。这样的机会实在太过珍贵，任何人都无法错过。当一个失明者重见光明，那一刻无疑是奇迹的降临。

我询问了玛丽亚，当我摘下她的眼罩时，是否可以让她的寄宿家庭、支持者和工作人员在场。玛丽亚答应了。整个团队围绕着她，这个团队已经为她付出了近两年的辛勤努力。我过于疲惫，无法详细描述手术的情况，所以我只是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紧急的情

况。

“这是真理显现的时刻，”我说，“上帝已经引导我们走到这里，这是他展现光芒的时刻。上帝，请帮助我们接受你的旨意。”

玛丽亚无力地躺在床上，仍然裹着一条薄薄的白色毯子，大大的太阳镜遮住了她的精致面容。琳恩站在玛丽亚的右边，眼泪汪汪，满脸的紧张和不安。她和她的家人已经将自己的许多东西全部投入到这个年轻女孩的生活中。如果玛丽亚在取下眼罩后无法看见，琳恩和史蒂夫已经决定他们会照顾玛丽亚一生。这实际上是基金会最大的挑战——找到愿意为一个可能不会恢复视力的孤儿提供终身照顾的寄宿父母，即使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我知道琳恩并非因为她害怕眼前的挑战而哭泣。她紧张而充满希望。她深深地爱着玛丽亚，希望她能得到能改变她生活的视力的礼物。我们都渴望着同样的事情。

当所有人都在注视的时候，我摘下了玛丽亚右眼的太阳镜，然后取下了眼罩。她在手术前只剩下非常有限的光感知视力，所以我的第一个测试将是看她是否还有同样的视力，或者手术实际上已经进一步减少了她已经非常有限的视力。“玛丽亚，房间里的灯亮着吗？”我问。

她点点头。我松了一口气，至少我们没有失去任何东西！

然后我鼓起勇气，继续测试她的视力，而她的寄宿家庭和支持者在看着。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结果取决于上帝。

改善视力的第一个迹象将是她能感知到我的手在移动，所以我在她的脸前来回挥手。“玛丽亚，你能看到我的手在动吗？”她又点了点头。

我开心极了！她的视力实际上有所改善！我无比兴奋，我在想我是否应该就此停止，以一个高潮结束测试，或者冒险进行下一个测试，面对可能的负面反应。没有视力图表，我只能做一个更多的测试，所以

经过一会儿的思考，我决定去做。我举起我的食指，问她能看到多少个手指。

房间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在屏住呼吸。玛丽亚眯着眼睛看着我的手。一片沉寂。

接着，她轻声细语地说出，“Unu”，那是罗马尼亚语中的“一”的意思。玛丽亚能看见我的手指了！

房间中响起了欢呼声、笑声与松了口气的喜泣。每个人都满溢着喜悦，那是经过两年的时间，跨越五千英里，汇聚了数百人努力的成果。我们见证了一场奇迹，这是只有上帝才能创造出的奇迹。

终于，玛丽亚能看见了。

随着眼部肿胀的消退，玛丽亚的视力持续提升。亨德里奇一家带她回家，让她得以休息并恢复元气。当晚，玛丽亚从麻醉后的昏睡中醒来，史蒂夫、琳恩和他们的女儿凯西陪她站在宽敞的浴室镜子前。她一只手紧握着墨镜，另一只眼的眼罩被取下。

玛丽亚疑惑地望向镜子，似乎察觉了什么。史蒂夫看到她脸上流露出的是迷茫和难以置信的神情。

“你能看到自己吗，玛丽亚？”他问道。

玛丽亚开始戴上墨镜，差点戳到了自己的眼睛。

“哦，哦，小心点，”史蒂夫轻轻地将墨镜从玛丽亚的脸上推开。

玛丽亚再次看向镜子，这次当她移动时，镜子里的影像也跟着动！当她意识到镜子里的人……实际上是她自己时，她的脸上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

“Sunt frumoasa！”她用兴奋而尖锐的声音尖叫出来。她的罗马尼亚语宣言是：“我好漂亮！”

凯西走近玛丽亚，问她：“你能看到我吗？”

玛丽亚转向凯西，认真地盯着她。“是的！”她高声回答，然后两个女孩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

玛丽亚再次看向镜子。她安静地看着镜子里反射出的美丽影像，思索着刚刚发生的一切。

玛丽亚看到了自己，看到了她周围的世界，这是她生平第一次！

* * *

在她的第一次术后复查中，玛丽亚接受了羊膜接触镜的治疗，以帮助她的角膜在移除角膜混浊后愈合。羊膜接触镜在市场上的应用仅有短短几年的历史。自1999年和2000年这项技术获得美国专利后，我花了近十年的时间试图研发出一款切实可行的产品，并最终将专利授权给了一家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公司。因此，经过我们团队十六年的努力研发，羊膜接触镜终于在2011年11月实现了商业化。这项开创性的技术迅速得到了广泛应用，全球超过一千名外科医生使用它们帮助无数患者恢复了视力。

我在羊膜接触镜领域的经验，强烈证明了科学与信仰能够和谐并存。我坚信，上帝无私地爱着所有人，他希望我们尽力去探索，去研究，因为这样才能提升人类的生活品质。然而，他也期望我们以正确的方式去实践。羊膜就是上帝赐予我们的一份礼物，让我们可以针对胎儿组织进行研究，同时又不会对未出生的孩子产生伤害。如今，我们已经可以在不违背道德、伦理以及精神原则的前提下，为那些患有视力问题的人提供帮助。

羊膜接触镜使玛丽亚的眼睛开始复原，她的右眼视力从只有百分之一提升至二十分之一。到了2014年初，我们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之前，很少有证据表明，一个从出生或婴儿早期就失明的青少年或成年人，能够重新学会看世界，理解视觉刺激。

然而，玛丽亚的情况独一无二。她的生理年龄已经十五岁，但她的视觉年龄却只有几个月。按照我们的认知，玛丽亚应该无法解读视觉图像。但出乎所有人预料，她的大脑开始适应，开始理解这个新鲜的世界。在视力治疗以及著名验光师、基金会医生沈大卫的帮助下，玛丽亚逐渐学会了理解她所看到的東西。她现在可以独立完成拼图，甚至在放大镜的帮助下，她可以自己做数学题。事实上，当我和她一起玩需要数学技能的纸牌游戏时，她有时甚至能够赢我！她还学习骑自行车，现在已经成为学校的优秀学生。她学

会了弹钢琴，并且已经举行了她的第一场公开钢琴独奏会。看到玛丽亚，这个曾经生活在被人口贩卖和卖淫边缘的盲眼孤儿，如今已经成为一个能看见、被人爱着、和她的寄养家庭在田纳西州弗兰克林市快乐生活的少女，真是一种无上的祝福！

2014年10月11日，星期六，王氏复明基金会在贝尔蒙特大学的马西音乐厅举行了第九届年度眼球筹款晚会。自从2012年的眼球晚会上，玛丽亚的照片首次在大屏幕上展示，激发了许多活动的参与者围绕她提供帮助，已经过去了两年。

自从2003年成立以来，王氏复明基金会已经帮助了来自美国四十多个州和全球五十五个国家的患者。基金会的医生无偿提供他们的服务，其他的支持者帮助支付所有其他的费用。当基金会决定接收更多的盲眼孤儿时，我们意识到最大的需求和挑战就是找到像亨德里奇一家这样的寄养家庭。因此，我们为2014年的眼球晚会提供了免费入场。尽管这个活动历来都是一个筹款活动，但我们希望尽可能多的人听到这个对寄养家庭的需求，这样基金会就能帮助更多的盲眼儿童。

那次活动有超过七百名客人出席，主题是“给我们的孩子一份视力的礼物”。与我们通常的舞会不同，这次我们举办了一场音乐会。我和卡洛斯·恩里克一起演奏二胡，迪德雷·艾默森演奏大提琴，大卫·费舍尔唱高音。著名制片人罗伯特·斯沃普策划了这个节目。节目进行到一半时，我们播放了玛丽亚非凡旅程的视频，然后史蒂夫、琳恩和玛丽亚走上舞台。史蒂夫向观众分享了他们在摩尔多瓦的基希讷乌的夏令营如何遇到玛丽亚，以及他们是如何被感动而决定帮助她的。然后琳恩谈到了玛丽亚对她的家庭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她是如何帮助她的孩子们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今天的美国是多么的幸运，他们应该心怀感恩。

当我们的嘉宾，玛丽亚，步上台前，她与我们分享了从即将到来的贫困中被拯救出来和恢复视力带给

她的深深的欢喜与感恩。

“谢谢大家在此，”她说。“我真的很爱你们！”

然后，仿佛卡贾尔再现，玛丽亚带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后来史蒂夫告诉我，玛丽亚喜欢上了“主，我需要你”，这首歌最初由加拿大当代基督教艺人马特·马赫尔演唱，现在她一直在唱这首歌。

她情感澎湃地演唱每一个字。“主，我需要你，哦，我需要你。每时刻我都需要你。我的唯一防御，我的公义，哦上帝，我多么需要你。”

玛丽亚克服了我们许多人永远无法理解的困难，但她的精神仍然非常甜美、善良和温柔。如同卡贾尔，玛丽亚对认识和支持她的人，以及全世界超过二十五万其他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人都看过玛丽亚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视频，她喊出“Sunt frumoasa！”玛丽亚走进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带着一个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目的。她指引我们向上帝，提醒我们，当我们到达自我的尽头，当没有人类的选择能够帮助我们时，他会为我们提供帮助。

当史蒂夫、琳恩和玛丽亚离开舞台时，玛丽亚给了我一个深深的拥抱。然后我们继续音乐，在我们开始最后一首歌“奇异恩典”之前，我对观众说话。那天晚上在场的客人包括来自不同国籍、文化和信仰的支持者——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佛教徒，以及许多支持卡贾尔的印度教印度人。他们都聚集在2014年的眼球晚会上，目的是一样的，做他们的一部分，给盲眼孤儿带来视力。我希望这最后的表演能包括所有人，帮助我们所有人超越我们的差异和障碍，团结我们在为穷人和弱势群体服务的共同目标中。

“眼球晚会是我们所有人庆祝给予精神的时刻，展示我们爱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我说。“我们正在庆祝一个年轻的孤儿女孩从黑暗走向光明的非凡旅程。今天的世界并不总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地方，但今晚在这里的爱心、慷慨的人们提醒我们，人类仍然有希望。这最后一首歌，无论你的种族、文化或宗教信仰是什么，都提醒我们我们的脆弱、我们的死亡，

以及我们相信一个不朽、永恒、全能的创造者的需要。”

然后，我们的合奏团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开始演奏，每个音乐家都演绎出一种反映他或她自己的生活经验的“奇异恩典”，以及超越他们所有人的永恒品质。

从迪德雷的大提琴中传出深沉、忧郁的音调，其悲伤的声音回忆起玛丽亚过去的黑暗，以及今天世界各地许多盲眼孤儿仍然遭受的痛苦。它提醒我自己曾经承受的痛苦，以及我为了能坐在这个舞台上，为我爱的人和国家表演，我已经走了多远。

接下来，卡洛斯的古典吉他响起，弹奏出一首充满活力又欢快的南美曲调。他的版本让我回想起我们团队取得的一切成就，回味我生活中的轻松愉快时刻，以及回首我所遇到的所有美好人生，那些曾经助我一臂之力的人，以及我有幸得以施以援手的人们。

大卫的版本是唯一的人声演唱，充满了他对上帝的敬爱和敬畏。“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

紧接着，我拿起二胡，演奏起这首歌，故意把旋律放慢，让每一个音符留连绵长。我希望这两根琴弦能传递出生活的真谛，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经历的挫折，遭遇的歧视之苦，辛勤的努力，快乐的时刻，以及连结我们所有人的情感与爱。

最后，所有的音乐家们联手演奏了这首歌的第五遍和最后一遍，邀请所有的“眼球”宾客一同高歌。许多人起立，情感澎湃地唱起赞美诗。我可以感受到整个礼堂的共鸣，每个人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演绎这首歌，每个人都渴望成为比我们所有人更伟大的事物的一部分。“眼球”提醒我们，无论我们的文化、宗教或种族是什么，作为人类，我们的共同之处远大于差异。我们都渴望同样的事情，去爱和被爱。

“眼球”之后，我们在纳什维尔的夕阳烧烤店为

主要赞助者举办了一个派对。当我走进餐厅，我向大约80人的团队打招呼，其中包括王氏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参与的医生，医学顾问，音乐家，艺术家，摄影师，和活动志愿者。在整个晚上，我身边有一个特别的女人，她的名字叫纪安乐。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终于明白了生活不仅仅是工作；它也是，更重要的是关于家庭，关于在工作和那些对我们所有人意义重大的关系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我也学到，为了真正爱别人，我们必须先爱那些离我们最近的人，比如我们自己的家庭成员。在这个方面，我现在花更多的时间和我的儿子丹尼斯，我的兄弟明宇和他的家人，我的父母，和我的义父母米莎和琼在一起。我开始意识到我是多么深爱我的家人。他们是我的支柱和力量，他们的爱在我工作中支持我。我的父母现在都已经八十多岁了，爸爸有严重的帕金森病。为了更好地照顾他们，我把他们都搬来和我一起住，陪他们度过他们的余生。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父母为我做了很多事情。在他们的晚年，我想好好照顾他们。

我现在也明白了我作为一个男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离婚后，我遇到了安乐，一个美丽、成熟、温柔、关心人、支持我，而且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华裔美国女性。她也受过良好的教育，来自一个像我一样的强大的学术家庭。安乐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我一直缺乏的东西——工作、责任和家庭时间的平衡。在安乐的帮助下，我正在学习什么是相互支持，作为一个团队面对生活的意义。我生命中第一次，我能和一个我深深爱着的人在一起，我们有共同的热情，想要让我们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也想让我们周围的人的生活变得更好。

握着安乐的手，我走向每一组客人，感谢他们对基金会本身和2014年“眼球”的贡献。当我走近史蒂夫和琳恩·亨德里希时，我们彼此分享了我们上帝让我们一起见证和完成的所有事情的深深的感激和喜悦，自从他们第一次给我看玛丽亚的照片以来，已经

过去了漫长的两年。

最后，我走向了玛丽亚，她正在四处走动，和每个人聊天。

“你想跳舞吗？”我提议道，“还记得我教你的摇摆舞步吗？”她抿嘴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优雅地将眼镜交给了旁人保管。随着大乐队的悠扬乐曲在背景中起舞，我们也开始随之摇曳，周围的客人纷纷围观。在那些曾经伸出援手的人们面前，玛丽亚有机会展示她新找到的快乐，这似乎是再合适不过的事情。起初，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显得有些羞涩和胆怯，但随后，她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随着对音乐和舞蹈节奏的熟悉，她的动作越来越自然，脚步轻快，每当我转动她的时候，她的酒红色裙子都会随之旋转起来。

舞蹈之中，她的笑声越来越开朗，仿佛内心深处压抑已久的快乐终于得以释放，这种快乐已经被她多年阴暗的生活所压抑。她新恢复的视力已经开始改变她的生活。她不再是孤儿院的孤儿，也不再面临在摩尔多瓦街头过着贫困生活的命运。反之，她正在一个自由和繁荣的国家生活，与上帝的信徒和深爱她的家人共度时光。她终于可以成为她应该成为的那个爱玩的少女。

每当我们共舞，我都会沉醉在玛丽亚的笑声中，那笑声如同甘甜的春风，充满了整个空气。我从未见过她笑得如此开心！她的快乐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终于落下帷幕时我所感受到的。那些黑暗、恐惧以及我身上一直笼罩的驱逐的恐惧都已经消散。我曾经在对抗种族偏见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和痛苦也已经消失。我逃离了生活中的幽灵和黑暗的冲动。

现在，我整个生活的经历——无论好坏——都对我来说有了更深的意义。我的性格被我的东方起源所塑造，我的心灵和灵魂通过我从西方接受的信仰得到了医治。我现在可以更全心地去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走出黑暗，我能够帮助其他人走出他们的黑暗。上

帝赐予我天赋和能力，我将继续用这些天赋和能力回馈那些最需要的人，特别是那些失明的孤儿。玛丽亚脱下她的高跟鞋，跳起了我无法比拟的舞蹈。我突然意识到，我对玛丽亚进行的手术不仅恢复了她的视力，更重要的是解放了她的精神。

她曾经是失明的，现在她是自由的。

关于作者

王明旭博士，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医学博士，优等生），是世界知名的激光眼科手术专家，一位慈善家，曾荣获“基瓦尼斯纳什维尔年度人物”殊荣。他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同时持有激光物理博士学位的白内障和LASIK手术医生。王博士的手术经验丰富，已累计完成超过55,000例手术，其中包括超过4,000名医生的手术，因此他被誉为“医生的医生”。

1960年10月24日，王明旭出生在中国东南部的美丽城市杭州。然而，在他14岁时，他的教育生涯因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爆发而突然中断，他不得不面对被下放，被判处艰苦劳动和生活贫困的命运，这是当时中国数百万青年所共同承受的严峻考验。为了避免这样的命运，王明旭开始学习中国小提琴——二胡，以及舞蹈，希望能够加入共产党政府的歌舞团。然而，政府发现了他的计划，他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此后，他开始暗中学习医学，并创作了一首表达他渴望回到学校并实现未来的歌曲。1976年，当年的独裁者去世，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在十年后重新开放了大学。王明旭在短短几个月内学习了三年的高中课程，并成功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1982年，王明旭带着仅有的50美元和一本中英文词典来到了美国，但他的心中充满了对美国梦的追求。

1986年，王明旭在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完成了激光光谱学和原子碰撞动力学的博士学位。1987年，他进入了哈佛医学院/MIT医学博士联合项目和博士后研究员。他与乔治·丘吉尔教授一起开发了一种新的方法来研究体内的DNA-蛋白质相互作用，并在世界知名的期刊《自然》上发表了论文。1991年，王博士从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毕业，获得了医学博士（优等生）学位，并获得了生物医学科学毕业论文的第一名奖项。

王博士在费城的威尔斯眼科医院完成了眼科住院医师的培训，然后在迈阿密的巴斯康帕尔默眼科研究所完成了角膜专科的培训。1997年，他被任命为范德堡激光视力中心的创始主任，并成为范德堡大学眼科和视觉科学系的全职教员和住院医师项目的主任。从1997年到2002年，王博士还担任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眼科设备小组的小组顾问。

2002年，王博士开设了他的私人诊所，王氏视力研究所，后来更名为王氏视力3D白内障和LASIK中心。他进行了该州的第一例无刀全激光LASIK手术，激光白内障手术和KAMRA手术，美国的第一例Intacs手术用于治疗晚期角膜锥形变，以及世界上的第一例激光辅助人工角膜植入手术。王博士已经发表了八本教科书和一百多篇论文，并拥有他发明的新生物技术的几项美国专利，这些技术用于恢复视力，包括世界上的第一种羊膜接触镜。他是美国眼科学会荣誉奖和美国华人医师协会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

王博士目前是田纳西州唯一一位进行3D LASIK（18+），3D激光Kamra（45+），3D永远年轻的晶状体手术（50+）和3D激光白内障手术（60+）的医生。他建立了两个501(c)(3)非营利组织，王基金会基督教对华援助和王基金会复明，迄今为止已经帮助了来自美国四十多个州和全球五十五个国家的患者，所有的复明手术都是免费进行的。

王博士是田纳西州华人商会的创始主席，田纳西州美中商会的名誉主席，田纳西州移民和少数族裔商业团体的联合创始人，以及中国上海爱尔眼科医院的联合所有者和国际主席，爱尔眼科医院是中国目前最大的私人眼科医院集团，拥有超过一百个地点，占据了中国的眼科护理市场的十分之一。2005年，王博士进行了中国的第一例无刀全激光LASIK手术，这是14亿人中的第一例。

作为一名业余舞蹈冠军，王博士是世界舞蹈锦标赛专业组/业余组国际公开交谊舞赛的前决赛选手。他至今仍然演奏二胡，并被邀请陪同乡村音乐传奇人

物多莉·帕顿在她的CD《那些年的日子》中演奏。王博士还利用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到的舞蹈技巧作为他的基金会每年的复明筹款活动——眼球舞会的灵感，该活动以古典舞蹈为特色。眼球舞会现在已经进入了第十个年头，吸引了来自全美和世界各地的参与者。

作为一名国际知名的慈善家，保守派活动家和社区领导者，王博士经常在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进行与他的两个501(c)(3)非营利基金会相关的工作。他是一个受欢迎的公共演讲者，他的两个最喜欢的话题是“欣赏美国的自由”和“信仰和科学：朋友还是敌人？”。

王博士因其慈善贡献和社区服务获得了许多奖项，包括NPR的年度慈善家奖，基瓦尼斯俱乐部的杰出纳什维尔人奖，以及特雷韦卡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王博士与他的妻子纪安乐和安乐的父母一起住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

致谢

如果没有大卫·邓纳姆，邓纳姆集团，特别是希瑟·埃伯特的全力投入，这本书将无法实现，他们为这个项目付出了无数的时间，辛勤努力并耐心地指导我完成这个过程。他们的专业素养，艺术才华和建议都是无价的。谢谢你，大卫和希瑟！

我感谢大卫·费舍尔，他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想法，并全面阅读并协助修改了手稿。我希望很快能再次与大卫合作，将这本自传改编成一部故事片。

我感谢参议员比尔·弗里斯特，医学博士，为这本书撰写了前言，并在过去的几年里给我提供了建议和指导。

我非常真诚地感谢那些为这本书背书的人，包括多莉·帕顿；查理·丹尼尔斯；参议员拉马尔·亚历山大；参议员比尔·弗里斯特，MD；市长卡尔·迪恩；州长比尔·哈斯拉姆；州长温菲尔德·邓恩；以及许多其他的朋友和同事。

我想对我那些花费了许多时间阅读并为这本书提供建议的朋友表示诚挚的感谢：理查德·尼尔森博士、詹姆斯·海亚特博士、查尔斯·格拉蒙、拉里·汤姆扎克、大卫和梅根·麦卡洛、杰瑞·莫尔、托尼·罗伯茨、托尼·阿什利、蒂姆·斯科、戴夫和简·道尔顿、苏珊娜·金特里、基普·多森、史蒂夫·路德维希、约翰·布兰克福德、凯恩·哈里森、雪莉·泽特林、琳达和大卫·埃夫杰恩、鲁迪·卡利斯和罗伯特·斯沃普。

我感谢我在职业生涯中遇到的所有老师，导师和同事，包括詹姆斯·麦克内斯比，博士；约翰·韦纳，

博士；乔治·丘吉尔，博士；拉里·多诺索，医学博士，博士；谢弗·曾，医学博士，博士；理查德·福斯特，医学博士，；威廉·卡尔伯特森，医学博士；唐·加斯，医学博士；斯宾塞·桑顿，医学博士；阿伦·古拉尼，医学博士；伊兰·科恩，医学博士；大卫·张，医学博士；亚历山大·斯通亚维奇，医学博士；弗朗西斯·穆尔，医学博士；盖伊·古泽林，医学博士；李丽；陈邦；刘宝松，医学博士；周迈克尔，医学博士；王小兵，医学博士，特蕾西·斯瓦茨，视光学博士；海伦·博尔曼，视光学博士；艾米·韦迈尔，视光学博士；珊娜·希尔，视光学博士；多拉·马特，视光学博士；阿拉·苏德特尔特，视光学博士；梅根·布莱姆克，视光学博士和格雷琴·布莱姆克，视光学博士。如果他们不断挑战我去追求知识和发现新事物，我可能无法实现我的医生梦想。

我想对王视力3D白内障和LASIK中心的整个团队表示感谢：莎拉·康诺利博士，视光学博士；内森·洛克博士，视光学博士；大卫·齐默曼博士，视光学博士；希瑟·布朗；莉奥娜·沃尔索恩；塔米·卡德韦尔；安娜·马丁内斯；苏珊娜·金特里；卡梅伦·丹尼尔斯；斯科特·豪根；埃里克·内斯勒；克里斯塔尔·米奇洛；阿什利·帕蒂；贝丝·莱利，认证眼科助理；斯凯勒·尼尔森；凯拉·辛亚德，认证眼科技师；克莱尔·斯托尔伯格，RN；海莉·威尔逊；詹姆斯·赖特；克洛伊·詹金斯；阿曼达·奈特；香农·麦克隆，认证眼科助理；纪安乐；江丽博士，医学博士，赵辉博士，医学博士和本雅明·易卜拉欣博士，医学博士。你们每个人在我的生活和工作中都占有特殊的位置。我们一起改变生活，我非常感谢你们所有人。

我非常感谢王明旭复明基金会的董事会，以及所有捐赠他们的时间和资源来帮助基金会的许多患者从黑暗中解救出来的医疗委员会医生们。

我深深感谢基金会的患者及其家人，他们把他们

的视力托付给我，并与我一起从黑暗走向光明：弗朗西斯科；卡罗尔·克莱因；克莱门蒂娜；布拉德和杰基·巴恩斯；卡贾尔和格蕾丝；鲍比·乔尔·凯斯；玛格丽特，戴夫和旋律·斯诺德格拉斯；安娜，丽莎和杰夫·波斯特；安娜和贝丝·安；马修和希金斯夫人；韦德和库克夫人；克里斯·迪克森；托马斯·布鲁因顿；兰迪·马瑟尼亚；最后是玛丽亚，史蒂夫和琳恩·亨德里希。有了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实现了不可能的事情！

我要向我的家人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的爱和支持使所有这一切成为可能：我的父亲王振生博士，我的母亲徐阿连博士，我的兄弟王明旭宇博士，他的妻子佩吉和他的女儿永永，我的儿子丹尼斯和他的甜心阿丽莎，我的义父米沙·巴特诺夫斯基和琼·鲁道夫，以及我的妻子纪安乐，没有她的体贴，关怀和爱，我可能永远无法完成我所做的事情，也无法写下这个故事。安乐还花了无数的时间帮助整理这本书的照片。家人和朋友在人生旅程中是重要的生命线，我在生活中遇到的成功和失败，我一直在思考和记住你们每一个人。我们一直在一起，互相支持，我深爱着你们每一个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要感谢上帝，他把我从黑暗中解救出来，让我被如此辉煌的光明所环绕！

王明旭，医学博士，哲学博士，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2016年

如何帮助复明基金会

由王明旭博士，哲学博士于2003年创立，位于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王明旭复明基金会是一个501(c)(3)非营利组织。基金会的使命是为贫困患者提供重建眼部手术，恢复视力，否则他们无法负担这样的手术。

基金会由一支医疗委员会医生（眼科医生和验光师）组成，他们捐赠他们的服务，以及由社区领导者和慈善家组成的董事会。

您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帮助基金会：

寄宿家庭：基金会目前的重点是帮助盲童。很难想象有谁比这些孩子更值得得到帮助。例如，玛丽亚的生活因为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从摩尔多瓦的一个盲童，处于人口贩卖和卖淫的边缘，变成了一个快乐的少女，现在住在田纳西州的弗兰克林，受到人们的爱护，而且能看见！玛丽亚的寄宿家庭，亨德里希家庭，使所有这一切成为可能。如果您有兴趣成为寄宿家庭，或者您知道可能有兴趣成为寄宿家庭的人，请通过我们的基金会网站（www.wangfoundation.org）通知我们。您可以指定您希望寄宿的孤儿的年龄偏好，以及您可以寄宿多长时间。基金会与几个基督教传教团体合作，他们在世界各地旅行，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可能能够帮助的盲童时，我们会尽力将他们安置在最匹配的寄宿家庭。

胎盘：基金会继续进行积极的研究，以进一步研究羊膜的治疗效果，并根据我们的美国专利改进羊膜接触镜的技术。这些镜片的处理涉及到胎儿组织研究，

不会触碰或伤害任何未出生的孩子，因为它使用的是分娩后通常被丢弃的胎盘。

如果您知道任何有兴趣在他们的宝宝出生后捐赠他们的胎盘的孕妇，请通过我们的基金会网站（www.wangfoundation.org）通知我们。一个胎盘可以被处理成近一百个羊膜接触镜，因此有可能帮助恢复一百个老年人的视力！

眼球：每年，基金会都会举办其年度筹款晚会——眼球——展示古典交谊舞蹈的美，提醒与会者视力的珍贵。没有视力，我们就无法欣赏这种舞蹈的优雅。我们需要尽我们所能帮助那些失去视力的人。我们需要未来眼球活动的志愿者，以及实物服务和无声拍卖物品捐赠。

捐款：尽管基金会的医生捐赠他们的服务，但是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来照顾这些患者，包括旅行，住宿，衣物，以及超出基金会医生专业范围的其他医疗护理。

因此，任何财务支持都非常感谢！帮助盲人，尤其是孤儿，从黑暗走向光明是王明旭复明基金会的使命。一起，我们都可以做出改变！

王明旭复明基金会

一个501(c)(3)非营利慈善机构 1801 West End Ave, Ste 1150

纳什维尔，田纳西州，37203 615-321-8881(0)

615-321-8874 (传真)

www.wangfoundation.com

关于这本书的额外推荐

“我以为我很了解王博士，但是阅读这本书让我了解了 他偶尔提到但从未详述的挣扎的全部情况。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学习音乐和舞蹈技能以挽救他的生命的，也不知道他是如何为了获得大学名额而面临劳动生活的。这本书揭示了他的专注和工作道德，这些都是他承认的有帮助但代价高昂的东西。《重见光明》适合任何想了解手术面罩后面的人，或者只是想了解一个决心的移民的挣扎，他逃离了暗淡的未来，在他的新家园中创造了成功和服务的生活。”

—查尔斯·G·格鲁蒙，CFP®，副总裁 - 投资，
富国银行顾问

“我个人从未知道比王明旭更好的舞蹈和生活的学生。他的开放思想和愿意学习只能与他的智力，欲望和才能相匹配。我从王明旭那里学到的东西和他从我这里学到的一样多……关于生活的智慧和他是决心和慷慨的鼓舞人心的例子。我们的合作是独特而特殊的；我们都认为舞蹈是刺激智力，身体和情感的最终活动，王明旭已经把这种对舞蹈的巨大热爱找到了不仅分享他的激情，而且利用舞蹈作为帮助他人的方式。我不能要求一个更好的伙伴和朋友。”

—沙琳·阿彻，前美国职业美国交谊舞冠军

“我很荣幸能够出版《重见光明》。王博士是一

个真正的有远见的人和自力更生的人，他的故事关于奉献，坚持和希望将激励数百万人。这是一个年轻人的真实而引人入胜的故事，他逃离了中国残酷和不人道的共产主义驱逐，来到美国，克服了种族歧视，获得了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位，成为了美国领先的LASIK眼科医生。”

—大卫·邓汉姆，邓汉姆集团，公司，出版商
重见光明

“在圣经中，箴言16:9写道：‘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但是他的脚步由耶和华指引。’对我来说，这就是王明旭博士。他早年的所有挑战都给了他对他人的理解和同情，以及决心做出改变。将这些与卓越的智慧和显著的才能结合起来，你就有了一个上帝可以大力使用的人。他被一个永不停止的渴望所驱动，寻找新的方式来通过视觉的奇迹来缓解痛苦和给予希望。他将站在他的创造者面前的那一天，他会说‘做得好，好而忠实的仆人。’”

—鲁迪·卡利斯，主播，WSMV/Channel 4/NBC

“王明旭有一个了不起的故事，他克服了难以置信的困难，在美国实现了他的梦想。他把他的生活奉献给了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我很自豪能认识他。”

—贝丝·哈维尔，田纳西州众议院议长

“我认为王明旭博士是我认为的现代文艺复兴人。虽然他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交谊舞者，当然也是一位深思熟虑的科学和医学人士，但他每天都在生活中实践他的信仰，并且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如何生活我们的生活的例子——不仅仅是用言语，而且是用行动。他慷慨地把他的时间，资源和医疗技能给予那些不能看见的人。他是一个朋友，也是我真正敬佩的人。”

—格伦·卡萨达，田纳西州众议院多数党核心小组主席

“很少有人像王明旭博士那样对我生活产生积极影响。他的个人友谊激励我继续追求我上帝赐予的梦想。他的坚韧不拔激励我在山似乎无法逾越时完全信任上帝。他在宣扬上帝和科学的联系方面的无畏，帮助无数人超越他们自己的人性，达到对神圣的更大的信仰。”

——大卫·麦科洛，市长，切塔姆县

“能够对王明旭博士及其生活进行评论，真是一种特殊的荣幸。我有机会听他讲述上帝如何影响他的生活，我也亲眼见证了这一切。他不仅谈论上帝如何影响他的生活，我还听到他的见证，并看到他的行动。能看到他在我们城市中使用他的伟大天赋，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乔·格林，基督教行政官团契创始人

“飓风中的龙卷风！王明旭是一位世界级的眼科医生，他致力于在限制性的医疗环境中引入突破性的技术，这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也有所体现，他对帮助人类的热情不受生活中反复出现的风暴的阻挠。他内心淳朴，智商极高，我相信他所取得的成就只是他的能力的见证，这种能力还有待于被用于更高的功能。”

——阿伦·古拉尼，古拉尼视觉研究所

“从王明旭博士在中国作为一个年轻人的求生斗争，到他在美国的巨大成功和转向基督教，王明旭的人生故事对我们所有人都有许多教训。推动他前进的不仅是他的聪明才智，还有他对基督的爱和他的仆人之心，这使他的生活充满了热情的目标。”

——杰瑞·莫尔，生活派遣事工创始人，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

“我在项目中长大，戴着可乐瓶眼镜，被人嘲笑和欺负。当近视眼手术的机会在近25年前出现时，我

觉得这太好了，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个改变生活的奇迹，最近当王明旭用永远年轻的镜片替换我的白内障时，这个奇迹又一次发生。奇迹确实会发生，尤其是当一个有天赋的医生谦卑地跪下，和他的病人一起祈祷时。耶利米书29:11中的话语恰当地应用到这个有天赋的上帝的人身上：‘我知道我对你们所怀的意念，’主说，‘这些都是为了使你们繁荣，保护你们免受伤害，给你们希望和未来。’”

——迈克尔·谢泼德，NMC公司首席执行官/主席，
谢泼德集团创始人

“王明旭是我们在纳什维尔遇到的第一个人。他的活力、信仰和善良使我们成为了一生的朋友。作为王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我有幸为那些从未梦想过能看见的人提供视力的事业工作。无数的儿童和成年人都得到了这份礼物。王明旭给了我‘视力’，让我想要为他人不懈努力，成为他对信仰和治愈的深深承诺的榜样。他对国家的热爱和他在生活中的挣扎，使他对他所做的事情有一种献身和热爱，这是值得我们钦佩和尊敬的。在那些人们已经拥有的很少的国家，王基金会能够给予的恢复视力的礼物，将意味着生命的礼物。对许多人来说，这意味着能够再次工作，照顾他们的家庭，重新获得他们的尊严。王明旭的生活是对人性中好的和理智的部分的赞美。上帝保佑你，我亲爱的朋友，谢谢你在我的世界里。”

——琳达·埃夫杰恩，埃夫杰恩和伙伴们

“2010年，由于另一位专科眼科医生的错误，我即将失明。在最后的希望时刻，我在一个他是演讲者的活动上遇到了王明旭博士。他的预约已经排满了几个月，但他立即为我放下了所有的事情。我在中午就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和他的团队一直工作到下午5点。到第二天，侵入性的感染已经被控制住，我的恐怖经历开始从即将来临的黑暗中逐渐恢复到完全的视力。今天，我看得很清楚，感谢上帝和王博士。当我在

1979年访问中国时，作为最早被允许在毛泽东开始统治后访问中国的美国人之一，年轻的王明旭离我访问的地方不远。他还在他的挣扎和寻找的岁月中。今年，我能够多次阅读他的生活故事，因为它正在被写下来。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也许是因为我在中国看到的，也因为我见证了他经历的一些事情，我在阅读痛苦、希望和最终的胜利、成功和精神祝福的段落时，我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情绪激动！我和我的妻子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和他在一起，无论是在他的家里还是在公共活动中支持他。他和他心爱的安乐一起，成为了我们珍视的亲密朋友... 值得我最好的爱和最高的尊重！这本书对任何阅读它的人都将鼓舞人心的... 我热情地推荐！”

——理查德·A·尼尔森博士，牧师/作家/建筑师

“王明旭博士关于他在美国寻找信仰和自由的斗争的引人入胜的描述，让我们深入了解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理解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所有对发展与中国人在商业、教育、医学或事工中的关系感兴趣的美国人来说都是重要的。”

——威廉·H·斯莱特，亨德森维尔基督教学院
校长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王明旭博士为田纳西州和全国带来了一种在手术护理方面的技能和卓越，这使许多人恢复了视力，并激励了其他医生效仿他的榜样。他是一位教师、作者，也是新一代眼科医生的导师，使未来更加光明。王博士的人生故事是一个克服障碍，掌握优秀，并将眼科护理的科学变成无与伦比的艺术的故事。多年来，我一直很高兴看到他获得了他应得的认可。我预测在未来的几年里，他将获得更多的荣誉和认可。”

——斯宾塞·P·桑顿，美国白内障和屈光手术

学会前任主席，田纳西大学眼科系临床教授

“必须讲述鼓舞人心和永恒真理的引人入胜的故事！从创世记中的约瑟到迪士尼的灰姑娘，我们都被英雄和女英雄面对巨大困难的伟大故事所吸引，他们在面对难以置信的困难时，完成了伟大的事情，达到了难以置信的高度。我们为善良和忠诚，以及勇气、坚持和诚实的辛勤工作的胜利而欢呼。《重见光明》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花几分钟时间和王明旭博士在一起，你会得到启示，得到鼓励，得到娱乐！”

——詹姆斯·T·海亚特，特雷韦卡拿撒勒大学
商学院和技术学院院长

“作为眼球制作人，我有幸了解并欣赏王明旭博士，这是大多数人可能无法体验的。虽然王明旭可能是我见过的最有才华的人，从眼科医生到音乐会表演者，从竞技舞蹈者到物理学家，我注意到他也与世界分享了一种你很少在这个时代找到的善良。《重见光明》是一本精彩的读物，它包含了这个人如何努力成为他在多个层面上的世界级专家，同时通过上帝找到内心的平静，以一种非常真实和显著的方式与人类分享那些天赋。能称王明旭为朋友，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荣耀。”

——罗伯特·斯沃普，眼球制作人，日出娱乐公
司总裁/首席执行官

“我有幸与王博士一起度过了一年，作为一名学习先进激光眼科手术的研究员。他致力于使用技术帮助人们看见的决心令人难以置信，他为我们的专业做出了我无法计数的贡献。他是一位伟大的导师和珍贵的朋友。”

——兰斯·库格勒，屈光手术联盟主席

“我们认识王博士已经近二十年了。他是一位有天赋的科学家、临床医生和企业家——一位鼓舞人心

的文艺复兴人。他的书《重见光明》的标题，是他生活的完美隐喻。他从黑暗中转变为信仰、自由和慷慨的精神。我们，他的朋友和病人，是受益者。”

——约翰·达亚尼，范德福资本顾问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伊丽莎白·达亚尼，心脏护理集团创始人和副主席

“王明旭博士是一个真正独特的人，他的才华和原则在一个人中很少见。他是一位出色的、关心病人的医生，一个有远见的人和企业家，一个创新者和慈善家，一个对寻求‘美国梦’的移民的榜样。更不用说他跳舞比我好得多了。”

——哈里·雅各布森，范德堡大学健康前副校长

“作为从古巴移民到这个国家的人，我亲身体验过共产主义的压迫，王明旭博士的故事对我来说特别感人。就像王博士一样，我也很幸运能够生活在这个尊重辛勤工作、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国家。”

王博士对我们所有人，特别是移民社区，都是一个鼓舞，因为他提醒我们，这个国家真的是一个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地方。我把王博士当作亲密的朋友，我知道他是一个致力于公共服务的上帝的人。我鼓励每个人都去拿一本《重见光明》，因为这是关于‘美国梦’最好的个人记述之一。”

“拉乌尔·洛佩斯，拉丁美洲人为田纳西州的执行董事，这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致力于向田纳西州的拉丁美洲人推广信仰、家庭和财政责任。”

“王明旭博士是我们这个时代在手术创新和技术方面的首屈一指的先驱。他的手术技巧和神奇的手感改变了许多寻求他的帮助和专业建议的患者的生活。他不断引入或采用处于角膜和屈光手术前沿的手术技

术，令人惊叹。我有幸观看他的手术，并在多次机会上与他一起洗手，我可以自信地说，我会把他列为世界上前五名的外科医生。他的丰富职业生涯从帮助患有极度残疾眼疾的患者（使用基底干细胞移植）到选择选择性手术（如KAMRA植入）以提供更好生活方式的患者。他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作者、发明家和教师对眼科领域的贡献将使他的名字永垂不朽。”

——伊兰·科恩，眼科医生和角膜专家

“当你遇到一个真正可以被描述为‘非凡’的人，这是一个罕见而珍贵的时刻。我可以证明，我在王明旭博士身上看到了这个词的体现。他的非凡人生故事，在他最近的自传《重见光明》中被美妙地记录下来，令人鼓舞。他从中国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魔爪中惊险逃脱的故事令人着迷。王博士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眼科医生的成就，只有他的慈善行为才能超越，这些行为是由他坚定的基督教信仰所激发的。他是科学和宗教和谐的体现。我很感激认识王博士，并很荣幸能成为他的朋友。”

——法尔津·费尔多西，MRCO公司首席执行官

“王明旭博士是一个慷慨的人，他克服了许多逆境，成为世界知名的眼科医生和慈善家。他强大的人生故事有可能影响和改变数百万人的生活，他们将受到他非凡故事的启发和激励。我强烈推荐这本书给任何需要提醒自己美国的伟大和上帝的主权的人。”

——卡罗尔·M·斯温，政治科学教授和法学教授，范德堡大学

“在所有移民到纳什维尔地区的人中，明提高了移民社区的形象。他的众多贡献——无论是专业的还是文化的——以及他的商业领导力，都在我们的社区留下了他的印记。我很高兴能与明一起创立田纳西州移民和少数族裔商业团体。作为明各种各样活动的热心观察者，我曾经问他何时有时间睡觉。他的回答很

快：“哦，我每晚确实有两三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显然，这足以让能量免持续运转！”

——加伦·赫尔，田纳西州移民和少数族裔商业团体联合创始人，赫尔国际公司首席执行官

“我和王明旭博士已经是朋友和同事近20年了。我们第一次相识是在世界知名的巴斯科姆·帕尔默眼科研究所接受培训。在我们有一些空闲时间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谈论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梦想是利用我们辛苦获得的教育，对我们的社区、家乡和更远的地方产生伟大和持久的影响。在很多方面，我们谈论的是‘美国梦’。这么多年过去了，王博士体现了这个梦想的实现，无论是通过他作为王视力研究所的远见者的工作，他在社区和基于信仰的组织中的坚定参与，还是他的复明基金会，我有幸被邀请成为医学委员会的创始成员之一。这个基金会，给了我们机会照顾来自全美和55个国家的患者，我相信，这是王博士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更为非凡的是，他将与我们分享还未到来的礼物。我很自豪能称他为终生的朋友。”

——大卫·J·申，眼科服务主任，Vue Optique, PLLC

“我和王博士经常共同管理角膜疾病患者，通过一种独特的，以患者为中心的方法，我们在手术和隐形眼镜方面利用我们各自的专业知识，这种方法被称为角膜中心。他对患者护理的奉献精神和对卓越的近乎痴迷的追求，使他的手术结果出色。他真正关心每一个患者，不是作为‘需要手术的眼球’，而是作为有需求、愿望、期望和情感的人。有一位同事会像每个人应该被对待的那样对待我们的共同患者，知道他们将得到医学所知的最好的护理，这是很独特的。”

——杰弗里·桑西诺，眼科医生，美国眼科学会角膜、隐形眼镜和屈光技术外交官

“我认识王明旭博士已经有十多年了，作为一个患者和亲密的朋友。现在看到他的故事被写进这本书真是太激动人心了！我鼓励每个人都去读一读，从中获取新的灵感和对生活的希望。如果你需要鼓励重新开始，或者只是坚持你的目标，那就读这本书吧！”

——拉里·汤姆扎克，畅销书作者和文化评论员

“王博士的故事是对人类精神的惊人见证，反映出一——就像一幅惊人的画——其创造者的令人敬畏。虽然他的许多成就受到赞赏，但我最欣赏的是他的信仰的大胆。”

——马克·格林，田纳西州参议员和Align MD总裁/首席执行官

“在我长达28年的出版生涯里，我有幸能够与医学界的翘楚并肩作战。王明旭医生在技术精湛的外科医生中独占鳌头，他不仅是一位卓越非凡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位深具人道主义精神的人士。更令人着迷的是他的人生故事：他是一位真正的独树一帜的人物，这样的人在一生之中能遇到一次已经算是难得。”

——约翰·邦德，SLACK Inc. 首席内容官

“在我就读田纳西大学的那段日子里，我有幸有机会走出国门，去世界各地旅行和学习。我见识到了列支敦士登那些黯然神伤，贫穷潦倒的面孔，意大利历经沧桑的废墟，俄罗斯彼得大帝那庄严壮观的夏宫，还有欧洲那些富贵人家无比奢华的宫殿。在俄罗斯，我深刻感受到了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压抑和恶心，它通过剥夺创新和创造力的必要条件，束缚了人们的抱负和自由。然而，我所有的学习和旅行经历，都无法让我充分准备好面对王明旭博士在中国共产主义世界中所经历的一切。阅读他的人生故事，让我仿佛置身于他的世界中，那是一个充满志向和创新的世界，它穿越了黑暗和失明。这本书深入探索了黑暗的世界，揭

示了即使在最残酷的现实中，也仍然存在着可能的希望。它寻找着通往自由的道路，以及如何跨越重重阻碍，去实现那份向往的自由。”

——托尼·罗伯茨，文学士，理学士，工商管理
硕士